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四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四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 朱 德 (1)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
基本原则草案 (3)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我党在西安的工作方针
给周恩来、秦邦宪的指示 (7)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 毛泽东关于同张冲谈判的原则问题
给周恩来、秦邦宪的电报 (9)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 中共中央通知 (11)
——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的活动办法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 (12)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
停止内战通电 (14)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力主和平保持西北
目前局面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16)
(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

-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 (17)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西安形势好转后的策略问题
给周恩来、秦邦宪的电报 (19)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西安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21)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交涉问题
给潘汉年的电报 (24)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速同蒋介石交涉有关事项
给潘汉年的电报 (26)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 张闻天关于应贯彻坚决为和平奋斗的方针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27)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 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军应
同进同退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29)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政治及工作决议案 (30)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
指示信 (34)
（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
-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38)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 军委主席团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前途和
党的方针给各兵团的电报 (40)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
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 (42)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中的“左”倾教训
给张闻天的信 (45)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
- 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
给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 (54)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 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
给彭德怀、任弼时等的指示 (56)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57)
——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 (70)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
红军任务给任弼时的电报 (88)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 周恩来关于一月来同国民党谈判情况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89)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方针
给周恩来的电报 (92)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重新调整国共谈判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95)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条件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97)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
- 周恩来关于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
东北军的团结给刘少奇等的信 (99)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
-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 张闻天 (102)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 李先念、李卓然等关于西路军的斗争
给中央的电报 (110)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月)
- 刘少奇关于建议解答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
给张闻天的信 (113)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 任弼时 (117)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121)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 (125)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性
对日抗战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 (131)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
- 军委关于国共谈判和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
给各军政首长的电报 (133)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
- 附：彭德怀等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
给贺龙等的电报 (134)
(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
策略方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37)
(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法
与选举法修改问题的通知 (143)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
- 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 张闻天 (145)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 (159)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 (162)
——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
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 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 张闻天 (172)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
-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毛泽东 (178)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 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 朱 德 (190)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
- 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
领导权 刘少奇 (194)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
-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斗争 毛泽东 (202)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 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 秦邦宪 (211)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
-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毛泽东 (221)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 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 刘少奇 (229)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
- 保守党内秘密条例 中共中央组织部 (260)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
- 张闻天等关于同蒋介石谈判内容的补充意见
给周恩来的电报 (262)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 附一：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内容问题
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263)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 附二：周恩来关于向蒋介石提出外交、国防等
问题的意见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265)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毛泽东 (267)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

-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张闻天 (273)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
- 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 董必武 (306)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
- 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
给中共中央的信 (315)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334)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的方案
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337)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原则
给共产国际的电报 (341)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
组织的决定 (343)
(一九三七年)
- 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 (345)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 (354)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356)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介石电 (358)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 (359)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
给北方局的指示 (360)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 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
为抗日前驱的通电 (361)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 (363)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
- 军委主席团命令 (367)
——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369)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 (372)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 实行对日抗战 朱 德 (374)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 (386)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
第二次宣言 (389)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毛泽东 (393)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 实践论 毛泽东 (400)
(一九三七年七月)
- 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415)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
组织的决定 (419)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 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424)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430)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 矛盾论 毛泽东 (431)
(一九三七年八月)
- 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467)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
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 (47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47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议)
-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475)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毛泽东 (478)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484)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就职通电 …… (486)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 …… 张闻天 (488)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及
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 (490)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 对日作战刍议 …… 周恩来 (491)
(一九三七年)
-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 …… 毛泽东 (494)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
- 反对自由主义 …… 毛泽东 (497)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
战争的基本原则给彭德怀的电报 …… (500)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
- 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同阎锡山等谈判情形和
作战建议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 …… (502)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游击区谈判改编时
应坚持的方针等问题给秦邦宪等的电报 …… (505)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
-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战略部署
给朱德等的电报 …… (507)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 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 …… 张闻天 (510)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边区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任职
给秦邦宪等的电报 (521)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
- 毛泽东关于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方针给彭德怀的电报 (523)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 朱德、彭德怀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电报 (525)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月)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
决定草案 (528)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书 (530)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 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 (533)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成后宣传内容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536)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
为唯一方向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538)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执行第十八集团军
军委分会训令的指示 (540)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 附：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
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 (541)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要求国民党解决
陕甘宁特区问题的指示 (544)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 项英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
给刘英的信 (546)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毛泽东 (548)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 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应坚持普遍游击战争的方针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558)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
指示 (560)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 军委分会关于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
的指示 (562)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
- 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 (565)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
倾向给潘汉年、刘晓等的电报 (567)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
- 军委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 (569)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 毛泽东关于我军应坚持用游击战配合友军
作战方针给林彪等的电报 (570)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刘少奇 (572)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
指示草案 (582)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林彪 (585)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民先队工作
给刘少奇等的指示 (589)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
- 论鲁迅 毛泽东 (591)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 周恩来关于挽救中国战局新危机问题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594)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 论目前救亡运动中的几个迫切问题 何克全 (598)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 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 (610)
(一九三七年十月)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
政治机关制度给朱德等的复电 (614)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 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
政治机关制度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614)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毛泽东 (616)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 周恩来、刘少奇关于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
群众问题给任弼时、邓小平等的电报 …………… (629)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 转变中的时局 …………… 张闻天 (631)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问题
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 …………… (638)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
- 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 …………… 王若飞 (640)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
-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 …………… 毛泽东 (647)
(一九三七年十月)
- 中共中央对于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提议 …………… (658)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 毛泽东 (660)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 毛泽东关于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
在山西的任务给朱德等的电报 …………… (670)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 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 …………… 周恩来 (672)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 周恩来关于同卫立煌、黄绍竑商讨坚持华北
游击战争问题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 (674)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 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
原则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 (676)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 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刘少奇 (678)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周恩来 (681)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 刘少奇、杨尚昆关于迅速扩大红军争取华北游击战争
胜利的建议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 (689)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坚决执行游击战争
方针给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 (691)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 彭德怀 (692)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毛泽东等关于坚持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给朱德等的电报 (708)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
- 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项 英 (710)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工作报告的决议 (734)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735)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736)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 朱德等关于减少磨擦巩固抗战团结的训令 (73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 巩固国共合作 争取抗战胜利 张闻天 (743)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陈绍禹等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情况
给张闻天等的报告 (75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关于十二月会议讨论总的结论 张闻天 (75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等关于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
原则的指示 (763)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765)
——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
争取最后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 (768)
（一九三七年）
-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 (770)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及
决定事项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772)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朱 德

自前年八月以来，中国抗日红军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之下，无数次向南京政府及中国军队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且曾向进攻苏区一切之国民党军队，屡次作如是建议。

去年九月，胡、关、毛、曾^{〔1〕}各军及其他广大国民党军队向陕甘边区进攻红军之际，吾人以民族国家为重，遵照红军军事委员会之决定，曾向全体红军部队下达如下之命令：

(一) 停止向国民革命军之进攻行为；

(二) 只在被攻击场合，允许采取防卫手段；

(三) 当红军被迫自卫而缴获国民革命军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

(四) 国民革命军转向抗日阵地前进时，红军不加任何扰害，并予实力援助。

红军为执行上述命令，曾逐渐撤退，避免作战。直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方在自卫原则下，有山城堡之役，诚属不得已之举。战后立即发表宣言，请求各军停战议和，并愿在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共同抗日。

西安事件发生，吾人竭力呼吁停止内战，主张事变之和平解决，故有十二月十五日及十九日两次之通电，早为国人所共

* 这是朱德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名义对《红色中华》记者发表的谈话。

鉴。盖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吾人之停止内战主张，全以大局为重，绝无任何乘机争取地盘之野心，此一贯之主张，已得全国人士所同情，亦为事实所证实。

西安事变既告和平解决，蒋介石氏回返南京，当即下令撤兵，取消讨逆军总司令部与东、西两路集团军之组织，似有实现联合抗战之趋势，诚属时机之大转变，吾人与全国人民实同声庆贺。假如蒋氏能团结其部队，不为日本及亲日汉奸所威迫离间，动摇其在西安之诺言，使日本帝国主义挑拨内战之阴谋无由实现，则吾人坚决赞助蒋氏及其全部军队，以便完全统一中国，共上抗战之战场，而绝不加以任何之妨碍。

吾人现已遵守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命令，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全体红军战士均深明大义，绝不顾大局乘机侵占国民党区域之事发生，此可明告于国人者也。

至对西安事变之双方，吾人仍继续站在促进和平之立场，而愿何应钦、刘峙、胡宗南诸君坚决执行蒋委员长撤兵之命令，不致中道反悔。盖中道反悔不特违全国之民意，且违蒋委员长力求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兵之命令。红军正以全力注视于此点。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曾万钟。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 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

(一) 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党在统一战线区域内应该成为共同纲领最坚决的执行者，成为民族革命领导的核心。

(二) 在统一战线区域，我们只能有一个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个统一战线纲领应依照各地区不同的环境与群众斗争的情况而使之具体化。过去党的十大基本纲领目前应该为统一战线纲领所代替。目前力争统一战线纲领的实现，正是为了要在将来能够实现十大基本纲领。但已经实现苏维埃革命的区域，则不改变已成事实。

(三) 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变番号，接受统一指挥，但实际上仍应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之在统一战线中起模范作用，并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活动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红军应该在统一战线开展过程中，使之扩大与巩固。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苏维埃区域将实行同一的民主制度。

(四) 共产党在原则上应该参加统一战线的政权机关。在

* 这个文件原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二期。

那里的共产党员，应该：（甲）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实现而坚决奋斗；（乙）坚决的反对汉奸亲日派的阴谋，严厉的镇压他们的反抗；（丙）保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之成为自己依靠的力量；（丁）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并受党的严厉的监督。因特殊环境关系，共产党暂时不利于公开时，则共产党员可担任实际工作，不争名义。

（五）对统一战线区域内的旧政权不是采取敌对的、摧毁的斗争方式，而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办法，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压力，使之改造，把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进步的与革命分子，来代替汉奸国贼贪官污吏。但党应该有系统的使当地的实际权力操纵在当地群众的抗日救国会的手里。只有这样，自下而上的压力，才能发生实际的效果。

（六）应坚决用抗日救国的名义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参加一切有群众的团体中去，争取其中的领导。抗日救国的团体，同时应该为群众生活的改善与民主权利的实现而斗争。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适当联系，是使抗日救国运动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的主要关键。这里应该防止过早的偏狭的关门主义，及牺牲群众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

（七）有系统的加强在城市工人中的工作，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的统一战线，实行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组织的统一，培养大批的工人干部，创立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建立党在主要企业中的堡垒，武装工人群众，有计划的派遣工人积极分子及工人武装队到农村中去，军队中去，以加强无产阶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八）应坚决组织可靠的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武装及争取现存的武装（如抗日军、民团等）在党及可靠的抗日派领导之下，派遣最可靠的有能力的干部到那里去，在那里组织公开的

抗日军人团体及秘密的党的支部。用一切方法改造旧军队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抗日军队。对于不可靠的武装力量，应有严密的戒备，并设法改造之。

（九）应该吸收一切抗日的力量到斗争中来，就是暂时的一天半天的同盟者都不放弃。对动摇不坚定的同盟者，应与之进行斗争。斗争的方式，可以从解释、劝告、批评，一直到公开揭破，群众的威逼与打击，对于公开反对与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分子，在斗争无效之后，应以汉奸卖国贼处理。这种斗争，应依靠在群众斗争开展的基础上，并应根据于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不然反会使自己陷于孤立。

（十）对各党各派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联合民族革命的左派（抗日派）争取中派（妥协派）打击亲日派。只有左派的力量愈是坚固强大，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愈是坚决大胆，同中派动摇不彻底愈是能够使用批评的武器，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愈是明确坚持与愈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则中派愈是向左摇摆，而最后转到抗日方面来。但在任何时候，切勿放弃对中派的警戒，严密注意他在每一转变关头动摇叛变的企图，及破坏我们对左派的巩固团结的阴谋，使他在叛变成为不可避免时处于孤立的地位。各党各派的矛盾，应利用来推动抗日运动的前进，提高党的领导地位。党在某一派别、某一人物的掩护之下创造实力时，这个实力应该保障在党的领导之下。

（十一）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共产党坚决为统一战线的纲领而斗争，决不同其他党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的组织中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实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

（十二）共产党的组织，目前仍应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都应在抗日救国团体与组织中公开活动，在里面起核心作用。应指定一定的共产党员，完全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他们应该受当地秘密领导机关的指示。

（十三）共产党在现时更要保障党的纯洁与一致，要加紧进行有系统的征收党员的工作。但同时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只吸收经过考查的工人农民及学生入党。其他各阶层与各派别的个别先进分子要求入党时则必须得到中央及各地区的中央局与中央分局的批准。创造党内工人的骨干，教育老党员与新党员，使之能在新的环境下活泼的大胆的独立工作，是目前迫切任务。

（十四）采取一切方法，取得世界和平阵线各国援助，同人民阵线的国家，同苏联建立亲密的合作。善于利用各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以加强抗日的力量。

（一月三日拟稿）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我党在西安的工作方针 给周恩来、秦邦宪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周、博：

为便于揭破敌人的造谣中伤，巩固内部的团结统一，保障我党实际的取得领导权，我们在西安的工作方针，应坚持抗日救国的立场，尽量吸收各党各派各界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充分利用旧形式，实现新内容，实行真正民主化的工作方式，使每一决定大家负责，善于利用当权者的每一允诺，以开展工作。共产党员应完全以群众团体或各种合法机关名义，公开活动。有名的共产党员要多在幕后主持实际工作，少争名义。党的一切组织，仍须十分秘密。这样可使共产党不致过分暴露头角，造成包办，成为众矢之的，而同时却又真正实现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任务。如雷电社^{〔1〕}那种过红的组织，在西安确实无必要，这种力量应集中到解放社中去活动。宣传文件，不宜完全抄共产党的语调，要多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说话。农民运动亦可先从实际工作做起，不先从广播告农民书着手。如何望告。

中央书记处

一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雷电社，是几个参加扣押蒋介石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自行设立的电台。后经周恩来指示做说服工作，该台停止活动。

毛泽东关于同张冲谈判 的原则问题给周恩来、 秦邦宪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周、博：

汉年四日由南京来电转上。他与张冲即来西安，关于此事处置，我意如下：

(甲) 蒋宋⁽¹⁾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我们回答：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

(乙) 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

- (一) 立即撤兵；
- (二) 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
- (三) 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

(丙) 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但在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实行后，即证明南京尚愿顾全信义时，可去南京一行。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

（丁）请在汉年、张冲来西安前预先考虑，并望飞告。

（戊）电台应时刻联络。

毛 泽 东

五日二十二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宋子文。

中共中央通知

——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的活动办法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

我们的代表与陕西省政府各县行政专员商决红军在友军区域的办法如下：

(一) 粮食以买为主，次向地主劝捐，由红军调查指定，并给收据，由原有行政机关负责劝募，并给奖状，捐者红军派人调查，防生舞弊。

(二) 原有行政系统不变，联保保甲民团名义暂不改组，但改变其内容。他们派人去重新训练，我们派人帮助，使保安队民团改变其性质。

(三) 苏区游击队及白区民团均各守原防互不攻击，实行联欢，白区中心之碉堡寨子，经过调查并向当地行政机关交涉拆毁。

(四) 扩大苏区口号目前可不必提，扩红应更多着重于切实政治动员，游击队可编一部入主力红军，留必要的一部作为当地的自卫武装。

(五) 关于商业绝对保护，对商人劝捐办法，目前亦暂不采取。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 宣传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胡服⁽¹⁾：

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如下：

（甲）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乙）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²⁾联合抗日主张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面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丙）蒋⁽³⁾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丁）为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氏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见。

（戊）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在特赦令之后，又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换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

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

（己）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反对日寇及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本党这种主张，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但总是为日寇及亲日派所反对，因此，我们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并以此作为造成灭亡中国的“防共”协定的资本。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 〔1〕即刘少奇。
- 〔2〕指张学良、杨虎城。
- 〔3〕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奉化蒋介石先生，各省党政军首长，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公鉴：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亲日派均认为千载良机，以“拥蒋”为名，挑拨内战，以遂其灭亡中国的阴谋。当时本党本政府及全国人民，南京与各省抗日志士，均主张和平解决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卒因蒋介石先生之接受张、杨⁽¹⁾二先生抗日主张，张、杨二先生亦均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本党本政府深庆国内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从此完全实现，红军主力亦正准备接受抗日命令，开赴前线，参加抗战。然而日寇与亲日派，终不愿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见诸事实，当蒋介石先生一返南京，形势突趋险恶，在日寇援助下，亲日派一面扣留张汉卿先生，一面指挥已奉蒋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军又向西安进攻，企图爆发空前之内战，为日寇效忠。日寇与亲日派的阴谋毒计，凡属国人已洞若观火。当此危急关头，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立场，坚决的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肃清亲

* 这个通电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红色中华》。

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今日中国人心之背向，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寇之亲日派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全国人民团体舆论机关各武装部队，尤其是蒋介石先生及当权之国民党诸公与其大多数党员，亟宜一本救国至诚，起而裁制亲日派分子，化内战为抗战，此其时矣。临电不胜企祷之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学良、杨虎城。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 力主和平保持西北目前局面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

周并告彭任⁽¹⁾：

甲、力主和平，拉拢蒋宋⁽²⁾，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繆刘杜黄⁽³⁾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

乙、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商县方面加派杨部一团固守，但十五军团准备休息三天后开至商县待机。

洛 毛

九日二十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任弼时。

〔2〕指蒋介石、宋子文。

〔3〕指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繆澂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

蒋先生：

自汉卿⁽¹⁾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²⁾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³⁾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⁴⁾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5〕}与张、宋^{〔6〕}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伫候回教，并颂

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 恩 来

一月十一日午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张学良。

〔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政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分别发表陕甘整理办法，主要内容是：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撤职留任，调整陕甘地区部队驻地。一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又颁令撤销由张学良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3〕即杨虎城。

〔4〕即何应钦。

〔5〕指宋美龄。

〔6〕指宋子文。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西安形势好转后的策略问题 给周恩来、秦邦宪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

周、博：

甲、蒋⁽¹⁾十四日已下令有非得总攻令不得进攻，而总攻令必须中央决定等语。此蒋、张、宋⁽²⁾奉化谈判之直接结果，局势有好转征兆。西安之外交应付与对外宣传，务请注意更沉着些与更带策略性些。另方面宜由左派迅即组织陕甘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及西安市党部，并发表一愿与全国国民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共同致力于统一团结御侮救亡之很有策略性的宣言，宣言内主张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与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主张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救国会议，对亲日派不作硬性攻击，而用诚恳态度批评党内一部分同志过去错误政策之不对，劝其改正，一致救亡。此外，对三中全会应有一建议电。

乙、和平虽有征兆，但战争危险并未消灭，联军三集团军仍应极力备战，不稍松懈。西安城防及防空设备，应充分注意。

中央书记处

十六日十二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张学良、宋子文。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西安情况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

国际书记处：

关于西安情形，报告如下：

一、东北军现计辖步兵十四个师，除一〇五师九个团外，余均为三团制，骑兵三个师均三团制，共五十七个团。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在兰州，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四个师在平凉、固原、西峰一带，余在西安一带。现在东北军的军官士兵中，由于东北沦亡，连年飘流，高涨着要求抗日的情绪。内部有少壮系及旧军官系的斗争。少壮系有抗日同志会，该会与我们合作，政治上表现左倾，有一部分师团长在该会影响下。另一方面为军长及总部各重要职员形成之旧军官系，他们对我们尚无恶感，对同志会有成见，政治上较差。党在部队中已有若干组织，政治工作机关正在建立过程中，下级政治机关利用学生队派往工作，半数同志。现因张^[1]被扣，全军情绪愤激，用要求张回口号团结全军。我们正设法促进两系团结，张之离开，在东北军统率上自生影响，但尚不致成致命问题。

二、十七路军除四十二师冯钦哉已离开，杨虎城受南京影响外，其余尚有第十七师及三个警备旅及一新成立之独立旅，共十七个团。十七路军的战斗力及政治觉悟均较东北军为差。

目前杨尚能统率，除冯外不致有问题。独立旅中党的影响甚大，其余各部只有个别关系，杨本人表现尚好，其左右用着一些我们的同志，政治机关亦在建立中。

三、西安方面群众运动，在双十二事变后获得发展的机会，现以西安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总的领导机关，包括八十余团体，现在工人及近郊农民亦已有初步发展，并吸引商会参加外，已有三十余县成立救国会组织，但内容如何还没详细考察。党在西安除军队外，有党员百余人，一般群众情绪尚好，外县以陕南蓝田一带较好。

四、蒋⁽²⁾释放后，起初左派分子颇觉失望，在详细解释力求国内和平促成一致抗日的方针后，均已同意。自中央军重入潼关之后，一般情绪极愤激，反映在宣传方面的愤激语调，目前一方面说服并解释政治方法解决之必要，同时引导此愤激情绪为军事上的加紧战备，作自卫的准备。

五、蒋归后，南京方面的处置可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五日至年底，这时中央军确实撤退，允许张即回。年初至十号左右，军队重入潼关，监禁张学良，发布善后命令，战争空气颇为紧张。十号至目前为第三阶段，蒋派人两次来西安劝告接受中央任命，但防地等善后问题可商量，对政治意见则谓决不抹煞，可提出三中全会讨论，同时下令前方各军非得攻击命令不得攻击，攻击令须中央决定等等，但战争危险并未过去。我们方针仍贯彻国内和平，团结一致抗日。杨、于、孙⁽³⁾已发通电亲职，取消临时组织，同时要求蒋回南京张回陕西主持大计，并正联络国民党左派、桂川及其他实力派，联名向三中全会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等方案，一方面仍秘密的准备万一的自卫战争。

（六）红军对外未公开参加联军，但实际上三方面行动已

有配合一致的计划与行动，红军已取得一部分弹药、被服、经费的补充，恩来^{〔4〕}等在西安以红军代表团名义活动，凡所提议，杨虎城等一般的尚能尊重我们的意见，仅在南京向西安攻击时，红军才公开参加联军。

中央书记处

一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张学良。
- 〔2〕指蒋介石。
- 〔3〕指于学忠、孙蔚如。
- 〔4〕即周恩来。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 交涉问题给潘汉年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汉年同志：

本日十一时电悉。答复如次：

甲、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險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则红军束缚于渭水黄河之间是危险的。因为现有红军实数即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的伙食钱，每月也需五十余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将决无办法，这是第一。庆阳、淳化、富县、延安等县粮食极少，多兵久驻，亦绝无办法，这是第二。因此要求：第一，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我们并不要求商洛大道及汉中等要地，但请指定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上述各县本来大部是苏区。至红军主力则请指定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十五县三镇。我们本来拟请蒋调去陕北二高⁽¹⁾及宁夏马鸿逵，以其防地让与红军，但在目前恐增加蒋之困难，留待将来可能时再商。此外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

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

乙、对张、杨^{〔2〕}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其方式宜表现在防地分配及对张、杨二人之待遇上。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他们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的，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他们现在所顾虑的，完全在事件解决后，抗日主张实现与部队之保存恐无保证，蒋应于此点施以宽大，以安其心，在共同对付日本与汉奸面前，是决不会也不能与蒋分歧的。

丙、向蒋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二日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高桂滋、高双成。

〔2〕指张学良、杨虎城。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速同蒋介石 交涉有关事项给潘汉年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汉年同志：

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1〕}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2〕}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毛泽东、周恩来

二十六日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张学良、杨虎城。

〔2〕即阎锡山。

张闻天关于应贯彻 坚决为和平奋斗的方针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并告彭、任⁽¹⁾：

甲、此间左派主战，张慕陶等左派、托派分子亦主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军长一级均主和，杨虎臣愿和但对和平前途缺乏信心。

乙、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

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

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寅、提高杨虎臣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

丙、此间正为这一方针奋斗中，你有什么意见？

洛甫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任弼时。

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与 张学良、杨虎城军应同进同退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周博，洛，王，彭任^{〔1〕}：

我们意见如下：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

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毛 朱 张^{〔2〕}

三十日二十四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

〔2〕指朱德、张国焘。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及工作决议案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

(一) 当前政治形势的特征及其动向

A. 国际方面——大会认为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揭开了新的侵略战争的序幕以来，国际上一方面少数黷武主义国家日益疯狂地向着全世界挑战；一方面全世界一切有理性有人道的各国各阶层人民，也在一天天强固的团结起来，为了保卫和平而奋斗。在目前这一阶段，这两种势力斗争的特征是：日、德、意侵略集团已经具体形成，他们公开撕毁一切国际条约，公开要重分殖民地，公开援助西班牙叛军，但英、美、法、苏及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以及侵略国家国内的和平力量，虽然对于侵略集团已经予以重大威胁，但还不能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制止他们的暴行，因此战争的危机十分急迫。在制止这一战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努力是决定因素之一。

B. 国内方面——大会认为“九一八”以来中国政治的基本动向是：一方面是日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使中国的地位由各国的半殖民地向着日本的完全殖民地推移；一方面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联合战线一天天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向着自由解放的光明大道前进，“一二·九”是救亡运动的一个飞跃发展；

“西安事变”在客观上已成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联合战线。从宣传号召走向实际行动的信号，是“安内攘外”政策的致命伤，而在中华民族解放的途程中，又一次划出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会认为这一新阶段政治形势的特征是：

1. 西北一隅各种武装力量与民众的密切结合，已成为抗日联合战线继续向前发展的巩固而有力的基础。

2. 中央与各实力派的相互关系，急剧的重新配合着，虽然一大部分还没有完全站到抗日联合战线方面来，还没有真正开放民众运动，还没有放弃“守土抗战”的错误政策，但整个的演变十分有利于抗日阵线的发展。

3. 中央政府中抗日势力与亲日势力的斗争已经明朗化：抗日势力有力的发展起来，亲日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做着最后的挣扎。英美远东政策的转趋积极，在这方起着一种有利于抗日势力发展的作用。

4. 全国民众对于和平统一的要求已经十分一致，但民众运动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表现出分明的不平衡性。一般讲来，组织力大都还十分薄弱，远远落在政治影响之后；大多数地方救亡运动，还处在半公开乃至秘密的状态，并且局限于少数人中间。

5. 日本帝国主义“不战而胜”策略继续应用的范围与前途已经狭隘短促，以后它除了指挥亲日派官僚军阀作最后的疯狂进攻，并加紧某些地方当局之外，它必然将更加紧准备直接武装进攻。中国方面主动的发动全国规模抗战的形势，虽然还未形成，但日帝“个别击破”的政策已少胜利希望，局部抗战转化为全国抗战的可能性已占绝对优势。

大会认为最近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在这一新阶段政治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将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上述各种错综复杂的斗

争，将在这个会议上得到一个初步的解决，虽然这一解决是暂时的，但它对于以后发展，继续发展的斗争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大会认为最近我们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来向三中全会争取民主自由，争取联合抗日主张的实现。

（二）目前人民救亡运动的任务与路线

大会认为努力促成全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促成国内和平统一民主政治的实现，是目前人民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必须在支持扩大与发动每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如绥远抗战、抗日罢工、缉私运动等）中去完成，使国人从事实中去认识只有实行联合战线与国内民主统一，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

大会认为不但争取国内的和平统一与民主政治的实现，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个基本任务，并且人民救亡运动，必须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才能飞跃的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灵巧的提出适合于某时某地的口号，通过各种工作方式，来达到救亡运动公开合法的进行，打破目前半公开乃至秘密的状态。

大会认为救亡运动必须得到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的参加，如此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团体（职业的、娱乐的、学术的等等）扩大工作的领域，作为救亡运动向前开展的基础。

大会认为一般讲来，工农劳苦大众，目前正在日益显现其民族解放斗争中主力军的雄壮姿态；劳苦大众的训练与组织，自然是开展救亡联合战线的基本工作，但在某些特殊地方（如北平）的学生运动，不但在其本地，而且在全国还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对于这部门的工作，还应该加以特殊的注意，各阶层民众的各种运动，应当适当的去配合起来。

大会认为大规模武装抗战的日子已一天天迫近，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于各种已存武装力量（如军队民团等等）的抗日宣传，要自己加紧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并用各种方式建立民众的武装力量。

大会认为开展国防文化运动（如救亡理论、国防文艺、新文字等等）也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主要内容。

大会认为目前救亡运动应该加紧努力于组织工作，从速消除组织力量落于政治影响后面的现象，一切宣传工作，应该密切的与组织工作配合起来。这里应该加紧注意干部人才的培养与训练，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础。

大会认为各不同区域（如西安、太原、北平、京沪、广西等）的救亡运动，应当灵活的配合起来（如情报的流通，工作人员的分配等），来尽量打破救亡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三）结 论

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在今天正逢着一个飞跃发展而又是复杂艰难的阶段，大会号召每个队员同志起来积极的扩大及加强我们的组织，争取达到一年内发展队员到五万人的目标，用集体的力量，以千百倍的信心与努力，来开展抗日救亡的神圣工作，昂扬的向胜利前途迈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 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指示信

(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

少数民族委员会，高岗、梓铭^[1]诸同志：

去年十一月四日的报告，十二月二十八日高岗的信，今年一月十九日梓铭的信均收到。去年八月间，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曾经指出我们在蒙古人民中工作的方针，是“发动蒙古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帮助蒙古人民的抗日运动和民族解放，联合他们一同进行对日作战”。这个总的方针到现在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环境与半年前有大的变动，主要的是绥远的抗战已在进行，西安事变更促进全国和平统一，国共合作的条件更加成熟。估计这种新的情形，蒙古工作不能不有许多重要的变动。

一、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的人民拥护绥远的抗战，拥护阎傅^[2]抗战。在这中心任务之下，组织全蒙的人民，参加和帮助援绥的前线，组织大批的蒙人参加前线作战和到前线去慰劳。在蒙民中清楚的说明，只有积极参加援绥的抗战，才能保证绥远战争的胜利，从绥远赶出日本的侵略，绥远的沦亡，即是蒙民的沦亡。在这一中心任务之下，应在绥远召开蒙古会议，由各旗选派代表，王公均应出席与傅主席共商援绥具体方案，其主要点：（一）全蒙人民动员，

(二) 全蒙人民联合，(三) 组织蒙绥抗日武装，(四) 给前线以物质帮助，(五) 组织慰劳团去前线。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汉族军阀并提之策略，因为绥远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正在抗战，如果不改变过去这一策略，则使蒙民与正在抗战的汉族统治者处于对立地位，结果使蒙民不能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日本。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与分裂，甚至与汉族的统治者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会给日本以便利。

在你们的报告和信件中，虽提到抗日援绥的问题，但没有当作中心任务提出，而且与反对汉族的统治同时提出，这是不对的，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二、在蒙民中对于抗日问题，显然的已有分化，即一部分左倾分子主张坚决抗日，而且与我们更接近，如你们所说的亲红派，但还没有形成力量，另一部右派，与德王⁽⁸⁾有联系，在伪德王的蒙蔽之下，以为德王可以救蒙古。最近汤恩伯用很大力量，想帮助他们形成力量，作为反对共产党的工具。另一部分蒙民的上层中的大部分，或因榆林方面的威胁，或因其它关系，害怕与我们接近，对于抗日是赞成的，但不敢有坚决的行动，我们认这一派人为中派。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帮助抗日派的形成，扩大他的力量，争取中派，巩固左派与中派的联合，对右派应采取孤立分化，批评与打击同时并用。但是运用这些办法时，要看抗日的力量来决定，这一部分右派并不就等于亲日派，因为他们与亲日派还有若干的距离。

过去采取亲红派的名义去团结左派，在现在是不适宜了。

如果这样做，将使广大的蒙古人民不与我们接近，而使我陷于狭隘的、孤立的地位。不要用亲红而要用抗战的名义去团结左派，将使右派无法反对，而使广大的蒙民更易于团结。

盟克耳纪为蒙古之出色人物，素有威望，且有才干，应该让他出来主持援绥抗日的工作，多吸收蒙民的前进的和开明的王公参加。巴英为一无用之人，只以善骑射获得若干人、武侠者钦佩，恐不能成为团结蒙民的中心人物。

过去对调解乌审旗的纠纷，站在帮助那素的方面是不对的，因为那样做是帮助了右派的形成，而使左派瓦解。

三、目前的中心任务则为抗日援绥。为使这一任务迅速完成，不能放弃蒙民中的特殊要求之争取，减轻汉族对蒙民之压迫，蒙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生活等，以动员与团结内蒙之蒙民。但这种特殊要求，并不能违背抗日的中心任务。有些特殊要求则可与绥远傅作义在蒙民会议协商解决，有些则经过群众的斗争而实现。这都看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

在蒙地居留的汉族土豪，不能用迂回长城的办法去解决，只能由当地蒙民汉民的斗争去决定。

在蒙地居留有不少的汉族劳动者，应以汉蒙联合抗日，来化除民族仇怨。我们的工作步骤，不能有任何使民族仇怨加深。

蒙民的土地要归还蒙民，这并不是一部公式，只能看具体情形决定。目前我们不应过分刺激蒙民要回土地的斗争。只在不妨碍民族感情之下，我们帮助蒙民索回土地。如果使民族感情恶化的情形之下，我们则帮助调解，双方说服之。

四、从你们的来件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左派分子中组织的削弱，这里的原因有三：（一）由于我们提出“联红抗日”或“亲红派”使许多左派分子畏缩。（二）由于没有扩大力

量去争取中派，使左派与中派合作。（三）由于对右派没有正确的立场，结果帮助右派的猖狂而瓦解左派。纠正这些弱点是蒙古工作发展的基础。

中 央
二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罗梓铭。

〔2〕指阎锡山、傅作义。

〔3〕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 三中全会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 (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 (二) 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 (三)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 (四)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 (一)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 (二)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 这个电报原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新中华报》。

(三)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军委主席团关于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的前途和党的方针 给各兵团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

各兵团首长：

(甲) 西安事变后有两种前途：

(一) 是大规模内战。

(二) 是和平解决并停止“剿共”。党中央一贯采取和平，应力争第二种前途。

(乙) 两月以来克服种种困难，经过许多波折，终于达到和平解决的目的。这证明党九月十七日决议所指示的路线是正确的，胜利的意义是伟大的，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广，我们政策必获得全国同情。

(丙) 西安事变中的缺点是我们对东北军内左派的领导不够，发生刺杀王以哲事件，影响东北军的团结。左派主战主要是小资的疯狂，同时也有托派的挑拨，托派已是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直接联系的汉奸。

(丁) 现东北军、十七路军均已拟就计划向预定地点移动，中央军已到西安，没有表现有挑战行为。

(戊) 国民党三中全会将于十五号举行，党中央有致三中

全会电。党将依照这电来进一步的巩固和平，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

军委主席团

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之意义及中央给国民党三中 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一) 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国内战争，结果分裂中国，便利于日本之侵略与汉奸之卖国；一是国内和平，结果团结中国，便利于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与对日抗战之实现。

(二) 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

(三) 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对此任务，我们须给予极大的努力。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即为执行此新任务的具体方向。

(四) 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条：

(甲)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乙) 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丙)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丁)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戊) 改善人民生活。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出版的《党的工作》第二十六期。

(五) 如果国民党能够保证实行上列各条，即是说国民党放弃了他们过去的老政策，采取了上述的新政策，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全中国形成了，对日抗战就有了基础了。

(六) 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

(甲) 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

(乙)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丙)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

(丁)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七) 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现对日抗战，这是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案与去年九月决议案的具体施行步骤之部分。

(八) 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但在全国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必须没收汉奸分子的土地。

(九)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

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彻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能够执行这样的政策。

（十）总之，中央的政策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从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出发，全党的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而斗争。

中 共 中 央

二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中的“左”倾 教训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

洛甫同志：

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

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

* 这封信原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二期。

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得人们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

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到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

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途。

罗佐夫斯基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

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见惯了。但历史上都说工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过去的一些办法还可用。

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罢工自由，这个问题到处发生。否认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吗？这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这个问题将来发生时，使同志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

中国工人中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得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货做生意，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工人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

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还太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权对于工人的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

工人中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在工会完全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一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满意的纠正过这种错误。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陈云同志及其他许多人去，长期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的。国家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

怎样预防这种错误？（一）必须承认有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二）工会要有系统的改善工人生活，为工人计划周到，多方面来改善工人生活，不要等到工人自发的起来斗争；（三）工会要善于去运用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四）加紧对于工人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纪律。

至于这种错误发生以后，则主要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败，要将工会

弄到极困难地位。

以上我只说到过去工人运动，其他方面不说了。

八七会议以后，工人中的那些“左”倾错误，全被批准，盲动主义正就接受这些东西再加以发展。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常常在那个部分、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对于革命准备好了，而且非实行革命的进攻不能前进，不能保持高度的群众热情，而在这个部门、这个地方、这个工厂对于革命又完全未准备好，必须使革命推迟。如是就常常需要少数前进的等待多数落后的，这种暂时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难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觉悟与高度的纪律。这种等待不是机会主义。要工人暂时等待，甚至阻止工人过于左倾的行动，都不是机会主义。然而八七会议以来，认为这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是这种最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就自然无人去作了，人们都只作那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中的“左”倾情绪。

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我认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们重

复过去的错误，托派等更希望。

你的意见如何？请你讨论！

敬礼

胡 服

二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 给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洛、毛：

甲、关于谈判方针，我意：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1]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2]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乙、以上各项关系重大，请考虑后示复，并报远方^[3]。

周恩来

二十四日十九时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原文如此。
- 〔3〕指共产国际。

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 给彭德怀、任弼时等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彭、任并告伯承及四军、三十一军首长：

(甲) 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1〕}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乙) 增援军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必要之办事员由前方抽调，尔后由后方补充前方。

(丙) 除罗、宋^{〔2〕}所部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个军限三号准备完毕，四号开始，出动前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充实等，由彭、任负责处理。

主 席 团

二十七日二十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即林育英。

〔2〕 指李维汉、宋时轮。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 国内的和平统一；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新中华报》。

（二）对日抗战；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发展工商业；

（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一九二七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十九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

年八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之前夜，乃于二月十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

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

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

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

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十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

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与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

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

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

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

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等类和平

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

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渡过这个战争吗？

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¹⁾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

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

“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 Q 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 Q 的人，这个阿 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 Q 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

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²⁾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期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

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张学良。

〔2〕指杨虎城。

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 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

××⁽¹⁾兄：

前一星期写给你三封信，想你已收到了。这是第四封信，我想一般的说说过去的问题。从×兄来和我谈了以后，我觉得更有和你说的必要。

问题这样的提出：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力量，准备暴动。六次大会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任务我们完成没有？十年来我们的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

我们十年来的艰苦工作，有成功。我们组织了领导了伟大的苏维埃运动，在广大区域内，没收分配土地，创立了强有力的红军。这个运动在去年以前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力量还是强大的存在着。此外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有进步。去年以来，党又有效的进行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这些是我们的成功。但是一般说来，从六次大会起，直至前年十二月转变时止，我们是没有完成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的。在白区，在城市，在工人中，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不独力量与暴动没有准备好，而且我们在组织上大大的削弱了。数十万党员牺牲了，还有数万人被国民党监禁着。

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完成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主观

客观的原因在哪里？

关于过去苏区工作的经验，遵义会议已有初步的结论，我现在不说了。现在我只就全国范围内白区工作来说。有人认为过去的白区工作是失败了。我虽然批评了这种说法，但过细想想，我们过去在白区的工作如果不是失败又是什么呢？我们白区工作的成功实在太少。

我们白区工作削弱的原因，客观上固然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的白色恐怖，然而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的错误。我现在要说的也正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因为这种错误是起始于十年以前，所以我现在也不能不从十年前说起，不过我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只能全凭记忆来说。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坚决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发动了全党的思想斗争。但我认为八七会议同时有下列的错误与缺点：（一）开始了“左”倾盲动主义；（二）开始党内斗争的错误方法。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右倾的陈独秀主义。但是在革命前在群众运动中还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八七会议反对了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是批准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不独在理论上批准了，而且在组织上提拔了大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人。这就是八七会议后“左”倾盲动主义的历史根源。八七会议不是在两条战线上斗争。

八七会议及其以后，应该开展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斗争，但

这是中国党第一次思想斗争。党的幼稚与理论水平的低下，都只能使我们更多的采用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进行斗争，但当时是采用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意的打击许多同志，大批的惩办同志，这就助长了党内的派别斗争，引起了严重的无原则斗争，损伤了党。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吃过酒的人，头一次就吃一瓶白兰地，要损伤他的健康一样。俗话说火力太强，过火。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李维汉的盲动主义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方法，结果是剥削了党的力量。

六次大会是正确的。它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反对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等。但六次大会是否还有缺点呢？我认为有下列缺点：（一）对盲动主义的批评和反对还不够，因为当时全党大多数所犯的错误，是“左”的盲动主义，但六次大会对这方面的打击还不够，这就成为后来立三路线的根源；（二）没有从政治上着重的提出，使党确定的转变成为秘密党。大会简直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本来由一个公开党转变成为秘密党是一个最大而最烦难、最艰苦的任务。观于共产国际警告西欧各党准备转变为秘密党时，是如何着重的三令五申的提出来，那么我们从来就没有那样着重提出来过。这就使我们十年来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上，犯了一贯的严重错误，许多地方我们党的组织几乎是长期被敌人摧残了；（三）没有长期艰苦工作的准备。六次大会到现在是九年了。很明白当时是没有人想到会有九年的反动时期，而准备长期的秘密工作。“新的革命高潮不是遥遥无期的”，“新的高潮的征象已经看见了”，这些话在当时说并非不对，但这也成为后来立三路线暴动政策的一个根据，急性病冒险主义的一个根源。同志以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就没有长期

艰苦工作的准备和打算了。

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央，立三路线所执行的政策，是违反六次大会决议的，没有去准备力量、聚积与增强力量，而是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这在四中全会有了结论。

四中全会反对了立三路线，是对的。但四中全会是否还有缺点呢？我认为有下列缺点：

（一）反对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异常不够。这就使实际工作（党与群众工作）中的立三路线长期继续着，直到最近。本来立三路线是继续八七会议后的盲动主义而来，在党内已种下深刻的影响，在当时几乎大多数的罢工、示威和纪念节的工作中都执行着，在极大多数的文件、宣言、传单以至群众的要求条件上都表现着，这些是立三路线的最重要部分。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三路线的理论——半托洛斯基主义，是立三^{〔2〕}在十一号决议的前后才提出来，不久就受到共产国际的指斥，在党内的影响还很微弱，清除它的影响还很容易。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反对了清除了立三路线的后一部分。完成这部分虽然是极重要，但比较易为的任务，而对于立三路线的前一部分，极困难的任务，则只有很少的纠正甚至没有反对，后来还继续着。这是四中全会的严重缺点。当我在莫斯科后来回国时都屡次提出过这一点。

（二）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同样没有足够着重的提出秘密工作问题，并将这个问题解决。

（三）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内斗争的方式，同样有错误，过火的与宗派主义的错误。许多干部特别是旧干部的被讥讽，被打击，是不对的。同时四中全会本来是反对“左”倾，但后来反对“左”倾的斗争不久就停止了，反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主要的错误还是“左”倾，结果我们放

过了“左”倾。

因为四中全会会有上列的缺点，结果帮助了托派与右派。他们正拿着这些缺点向党进攻，进行破坏。

十二月决议的缺点与错误，在九月十五日的决议上已说过了，都是对的。但我们认为还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还是没有足够着重的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问题提出来；（二）对于白区工作中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的传统，毫无批评。以上两个缺点，在九月十五日决议上还是存在着，没有能完全补救。这就使白区工作的转变缺少根据，尤其是关于过去传统的转变。

因此，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有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策略的转变。他们满足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是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

从上述事实来看，“左”倾错误是从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十年来虽然经过许多变动，但在本质上是毫无变动的一直传遗到现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贯的。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成了一种传统，我从八七会议以来就是一贯怀疑与企图反对这种传统的。

*

*

*

我们现在需要来估计一下的，是四中全会以后至十二月决议以前，这一个期间中央在白区的工作。

四中全会以后，国际给了中国三位一体的任务：建立苏维埃政府；加强红军；领导白区群众运动。这个任务中央是忠实执行了的。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红军加强巩固

了，根据地建立了，苏区的工作有一个大的改进。这是中央最大的成绩。正因为有这些成绩，所以在四次、五次“围剿”中能够和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并能够长征，一直到现在还保有强大的力量。因此，不能说中央在苏区的工作在总的方面是错了。如果在苏区的工作在四中全会以后没有这一个大的改进，那根本就不能与国民党作长期的斗争，不能长征，不能在现在还保有这么大的力量。但中央在苏区工作上，也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在群众工作上，在党内斗争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因此，使得红军与苏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应该指出的是四中全会后，国际对苏区工作的有那一大批决议，我们是执行了的，虽然我们在执行中又犯了许多错误。

但是仅仅苏区工作还不能说明中央的领导。从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而中央在白区的工作就没有重要的成绩可说。因此，我们必须还得整个检查中央的领导。

我们从九一八事变说起。九一八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一个极重要的步骤。头一口就吞下满洲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但当时中央是怎样分析九一八事变呢？我们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革命。这是当时特别强调的两点。因此，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拥护苏联拥护中国革命。反而把日本殖民地化满洲与中国不提，或不着重提，拥护中国领土主权不着重提。这样就使我们一方面很难领导九一八后广大的反日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作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自己说我占领满洲是要进攻苏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占领了大于日本七倍的土地”（日本代表在国联演说）。由中央的上述分析自然就发展成为泽民^{〔3〕}同志的观点：认为以后红军作战的对象已经是日本的军队

了，国民党只是偏师。

九一八以后，全国的客观形势急转直下，有利于革命。革命的形势，很快到来，在当时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国防政府，是可能的。当时江西的红军粉碎了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将陈调元等打得“片甲不留”，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到南京，捣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上海群众捣毁市党部等，组织法庭审判市长、公安局长，满洲马占山正在抗战，全国各地捣毁国民党，王正廷辞职，蒋介石下野出洋。孙科、陈铭枢等上台，声言要与共产党红军妥协，后来南京政府迁都洛阳，这一个客观的革命形势，虽然还有大的弱点，但是具备的。群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统治的蒋介石投降日本的一派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许多在野的派别和军队同情推翻南京原来的统治者，或者中立动摇。大家都提出政权的问题，国防政府已被人家提出。在这时候，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我们和反蒋各派进行统一战线，联合与推动十九路军，提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正确的组织群众的进攻，红军采取配合行动，是可能使蒋介石不能回来复辟，并组织国防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

可惜当时这样好的形势，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统一战线的要求与提议，完全孤立，学究式的来讨论“民众政权，国防政府，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等口号。这样的形势毫不自觉的就放过了。不久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下联合改组派重新复辟了，抗日运动上海一二八战争受到镇压与破坏，蒋介石又重新组织对鄂豫皖红军的进攻。而蒋介石就在反共的口号下，进行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维持他的政权到现在。

本来在鄂豫皖的红军离开鄂豫皖以后，蒋介石组织四次对

中央苏区“围剿”的决战，全国抗日运动受到打击，在这时推翻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可能，是本来暂时过去了的。但这时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到了。国际说中国有直接革命形势（是根据一二八时的形势说的），然后我们就很原则的照着说，中国存在着革命形势。而且不大加思索的照着说了好几年。

在九一八后，统一战线，抗日反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就应该采取的。但当时我们没有采取。国际送来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我们没有了解，没有在实际坚持的去做，我们只是长期的把它当作宣传工具，反对各派的武器。

在一二八前，政权的问题已经成了当时群众中实际的中心问题，应该用抗日的国防政府的口号去对抗南京蒋介石的卖国政权。然而我们拒绝了国防政府的口号。在当时国防政府的性质是什么？它不是当时南京的卖国政权，也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各党派联合的抗日民众政权。这是当时广大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所以它应成为我们当时革命的主要口号。然而我们当时否认这种政权，我们所提出的是：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南京的卖国政权。在这两个政权中间不能有什么？即是只有两个政权的对立，再没有另外一种政权能够 and 南京卖国政权对立。很明白这就不能满足广大的群众的要求，广大群众是反对南京卖国政府，但也还不愿意即时就来一个苏维埃政权。

我不说当时两个政权的对立不是事实，或者不需要。当时以及后来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事实，是需要，是特点。这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我们忽视了当时在广大的群众还站在这两个对立政权的中间，他们要求另一个民主的抗日的政权去代替南京卖国政权，他们不满足于两个政权的对立，而要求用抗日的民主的政权去消灭南京卖国政权。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提出国防政府去代替南京卖国政权的口号。我们只提出两个政权

的对立——当然不满足与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在事实上就帮助了蒋介石政权的维持，帮助蒋介石反共阵线的建立。

当时应该采用抗日国防政府的口号，动员群众团结反蒋各派向南京卖国的中央政府进攻。但当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争取革命在湘鄂赣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指挥红军向湘鄂赣城市进攻。这在当时是不够的。这就放过了南京中央政府使全国白区的群众和同志只望着湘鄂赣的红军，只动员群众去拥护与配合红军的进攻，而忘记了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去准备推翻南京卖国的中央政府。在当时不承认国防政府，动员群众去直接拥护与响应红军，表现是“左”的。但实际上只承认革命在湘鄂赣等省有胜利的可能，而不承认有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有推翻南京卖国政府的可能，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白区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对于马占山的抗战，对于一二八上海抗战，我们的估计与策略也是错的。

在九一八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过阶级矛盾，我们此时即应强调民族矛盾，但我们还是照过去一样强调阶级矛盾。

对于福建事变，对于人民政府，我们的估计又有错误，我们还是不承认如福建人民政府那样的政权（不是苏维埃也不是南京卖国政权），可以对抗和代替南京卖国政权，因此，我们的策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既采取了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对反对南京政府的军阀战争就不应反对且应利用，以便共同推翻蒋介石。但我们不利用，也不对。

到了西南事变与西安事变之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动。日本要并吞中国本部，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动摇，企图改变过去一贯的卖国政策。在此时国内革命战争是要便利日

本灭亡中国的。所以此时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应当停止。此时即应反对军阀战争。但我们在西南事变中还是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同情西南。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

从我们应付上述各种事变的情形来看，发现我们应付事变的能力还很差，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很少，我们的创造力，实事求是的本事还很弱。我们在每一个重大事变的关头，都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给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已不够了。但我们没有新的建设，提出新的任务。

* * *

要估计我们过去白区的工作，说出了上面的事实还不够。必须还得着重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

总的说来，六次大会是要我们准备力量准备暴动。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同样没有把六次大会这一个决定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我们忘记了这个目标，而以直接响应红军作为白区群众工作与群众斗争的目标。国际说：“白区每一个经济罢工，都是对于红军最好的帮助”。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一句话。我们总是忽视经济斗争。因为我们没有把准备和聚积力量作为白区一切工作的目标，如是我们在千百件行动与斗争中，没有加强我们的力量，而且大大损害与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毫不警觉。我们的领导者还认为那是“对的”，因为他们在行动中提出了直接响应红军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在这一点上说，我们在四中全会后，是没有执行六次大会重要决定的。在

红军中“保存有生力量”、“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正是六次大会的方针，执行了，红军的力量越斗争越增加。但在白区，在全党，在一切工作中没有执行这样的方针，所以越斗争群众与党的力量越弱。这又对于党的威信和影响不好。稍为稳重的人离开我们，斗争中受了打击的人抱怨我们，坏分子就叛党反党。

此外，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的传统，还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几个问题上：

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八七会议以来直到现在犯了一贯的错误。开始我们一贯的不重视这个问题。本来白色恐怖那样残酷，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使每一个同志很好了解与运用这种联系，那我们就绝不能很好工作，绝不能准备革命，——甚至不能使党生存。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在白区准备革命的前提条件。然而我们从来没有着重的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绝大的政治错误。

我们在秘密工作上犯了一贯的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我们常有意的用“怕死”、“害怕”等说话去批评同志，打击同志，——竭力提倡同志的冒险精神，甚至夸奖。我们否认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认利用合法为右倾，为合法主义。

本来我们党的工作和纲领，一部分是能由公开的合法的团体和刊物来提出与执行的，那我们就应尽可能的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另外一部分不能由公开合法的方法来进行，那我们就秘密非法的来进行。但这是出于不得已，并非我们高兴如此做。因此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完全分开，完全采取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由不同的干部来做。同时又使二者联系起来，配合为党的整个工作。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取消一切公

开工作，能够合法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来做。在于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群众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公开工作的干部同时担负秘密机关工作。结果我们就完全没有公开工作，秘密机关就膨胀得骇人的庞大。这就帮助了侦探，群众工作和党均被破坏。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受的损害，是不可计算的。

过去我们说要把一切公开的群众附属组织，通通转变成为赤色工会，实际就是把一切公开团体转变成为秘密团体。群众不赞成转变，就不能不强迫，破坏民主原则。

立三说要争取公开，实际就是把不能公开进行的事情，扮蛮去公开进行。那完全是冒险，如占领会场，占领讲坛，占领马路等。

又有人说：不要去将就公开环境而降低党的纲领与口号。这句话完全用错了。就在这句话上要同志强迫的将党的全部纲领与基本口号，完全搬上公开群众团体的宣言、纲领、传单和要求上，结果，就使这个团体变成第二党。列宁“不为公开而降低党的纲领”的说话，是就整个党来说的，完全对。但我们的列宁主义者把这句话用在公开工作上，要公开的群众团体去全部提出党的纲领，完全错。中国党已经是秘密党，所以这句话完全不应提出。中国党没有合法主义，因为整个党已是非法的。

一九二八年我就提出上面的问题和许多同志争论了几星期，结果受批评，打击，撤职。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又全部提出了上面的问题，结果也是受批评，仅仅在决议上采纳了一句工会工作方式不要重复党的工作方式。一九三一年提出公开组织群众工会，结果闹成“第三种工会”完功。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一贯的。牺牲也是最痛心的。直到现在还没

有完全改正，还是多次的重复。

二、关于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为聚积群众的力量，就必须领导群众斗争。但在准备革命的时期，发动群众斗争的目的，在于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觉悟，而不是马上要向统治阶级实行革命的进攻与决斗，而是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与决斗。但我们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开始就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常常是为纪念节而罢工游行，或为直接拥护红军而罢工游行，虽然在这些罢工游行中，严重的损失了我们的力量也不顾惜。我们常常忽视经济斗争，不忠实为达到群众的经济要求而斗争。我们常常以“发动斗争”为满足，而不管斗争的胜败，结果及其影响的如何？我们常常是无条件的无目的坚持斗争到底，即使形势极不利，还要坚决。我们总不知道而且不许说选择有利时机暂时结束斗争。我们有一套机械的观念，小斗争发展成大斗争，大斗争发展成为暴动，机械的要将每一个斗争提到最高的阶段。我们不准备斗争，不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只要是纪念节，只要主观上能够发动，我们就无条件的要发动斗争，否则“就是阻止斗争”。我们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机械的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我们在斗争中完全不进行统一战线，要故意的反对一切。我们故意鄙弃一切合法的斗争手段，本来有许多斗争是可以合法来进行的，而我们故意要非法的秘密进行。我们在斗争中总是不估计当时当地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与方式，我们只是盲目的要“斗争！斗争！”或者空洞的分析世界形势、全国形势，而毫无联系的结论到某个工厂的罢工应当发动、应该坚持。我们在很多时整年的是为纪念节而工作。这一切错误的结果，不管成败利钝，斗争的结果，使我们常常失败，甚至悲惨的失败。力量的聚积当然就绝不可能。

上述错误，我也从一九二八年起在上海，在莫斯科，在四中全会之前及后，都严重的系统的提出来批评过。但结果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都是“对的”。决心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自然这种错误也是一贯的，还要用大力才能纠正。

在革命的传统与我们的工作上来说，北方是比南方落后些的。但我们否认这种落后。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斗争中，在河北、山东的平原暴动，使我们有重大的损失。

三、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问题。我们在宣传工作上的虚浮，夸大，形式，刻板，也是一贯的，至今还未纠正过来。我们常使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分别不清，使公开的宣传工作与秘密的宣传工作分别不清，使对外的宣传工作与对内的教育工作分别不清。我们常常在刊物上不自觉的向敌人告密。我们常常不估计宣传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常常是烦琐，把谩骂当作战斗。这一切东西在白区还继续着。

四、关于党内问题。过去在思想斗争中有许多错误。夸大右倾机会主义，甚至从沙子里面去淘出右倾来反对，代人造成右倾的系统，而忽视了对于“左”倾的反对。在思想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一贯是过火的。甚至以思想斗争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用教育与说服去推动工作。在斗争中带着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成分和成见。党内相互平心讨论的自由，可以说完全没有。党内一有不同的新奇的意见提出，就恐慌，就召集会议来斗争。领导机关工作的民主精神很差，每个党员与干部在党内应有的权利，常常不被尊重，官僚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还严重存在。秘密机关工作人员本绝对不应随便调动，但我们提拔过多的新干部到秘密机关，人员流动极大，而公开群众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有也弄坏了。党内的机关和官衔实在太多。

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一贯存在着。本来秘密领导机关的任

务，是帮助公开群众工作的同志工作。这种帮助顶好经常用说明用提议去实现（国际对我们指示的方式），只有必要时才用“指示”、“命令”、“决议”等，就是对下级也最好经常用提议。但我们是用“命令”、“指示”、“决议”等解决一切，即使最小的事，这就减弱同志的自动性与领导机关的威信。

党的纪律是必要的，但一切问题最好不用纪律与组织手段来解决，只在必要时不得已时才使用一下，一切问题最好在政治上原则上取得一致来解决，而不去使用纪律与组织手段。但我们相反，我们常常用纪律与组织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是极小的技术问题，这就成为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这就使下面一切都要等待上级指示与命令，自动性与责任心缩到极小，上面没有命令与指示，下面就不动，上面有指示与命令，下面就照办。在党内我们没有使同志和干部更活泼，自动性更发扬。相反，我们造成了同志中一般的不活泼，怕说话，怕错误，怕负责的现象。

* * *

上述四个问题上的错误，我认为是立三路线的传统，“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在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这种错误当然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做事有了原则就够，是不必实事求是的。比如“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原则上并不错。

但一拿到中国来实事求是的使用，那就“拥护苏联”的口号，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而“反对帝国主义”口号能够动员广大群众。那我们应该用反帝国主义口号去动员群众，而不要用拥苏口号去动员群众了。因为反帝即所以拥苏。然而我们硬要将拥苏的口号摆在前面最主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又责骂自己忽视反帝运动，这难道不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又如罢工要坚持到底，原则上并不错，但在某些具体罢工中坚持到底常是错的。然而我们常常只管原则，不去实事求是。

纪念节应罢工游行示威，原则上并不错。但在某个具体纪念节，形势如果不好，群众动员不够，敌人准备了流血镇压，还要罢工游行示威就错了。但有人认为不必要估计当时形势，罢工游行就得了。

决定一个工厂的罢工应否发动？应否坚持？主要要从本工厂本地方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世界形势、全国形势如何好，但常常不能决定这个工厂的罢工应否发动与坚持？而我们常常从世界形势全国形势来决定罢工策略等。这是因为我们的同志还不知道如何具体的在每一个问题上来估计形势？以及什么是决定条件？

上述各种例子过去在党内无虑千万。

过去我们党内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占极重要地位，指导同志的日常工作。这在同志中的影响很深。这也成为上述许多错误的根源。

上述这些错误长期在党内存在，千百次重复着，对党的损害极大，在一切刊物上文件上连篇累牍的记载着，在千百次罢工示威中明白表现着。为什么我们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没有发现，没有纠正与反对呢？为什么没有人起来批评反对，还拥护这些错误呢？这当然不能以感觉迟钝来解释，而是领导同志同

样有这些错误思想，同样有这些错误。

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

过去的错误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也是机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如陈独秀、立三路线那样完整的机会主义，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起直至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一贯的机会主义。还不到这样的程度。但不论在总的方面，在个别问题上，都有严重的错误。

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经过事变最多，但应付事变的能力还很差，创造力也还差。但对国际是最服从的。不过有时是机械的服从。

记得××同志回国时，华西里夫向我们谈话，头两句话说：在中国党内还没有如斯大林这样的同志。中国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还不能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华西里夫的话，还是对的。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做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广益，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更多的请示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犯许多错误，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骄傲与自满，在我们中是最坏的，最危险的，最无希望的毛病。为了成见与个人地位而来进行派别斗争，那是有意的破坏党。现在是要求我们抛开一切个人的怨恨，诚恳的平心的商量和讨论，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没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来。

* * *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过去遗留下来的恶果，我们都得吃下去。但这个转

变还在开始，甚至有些地方还未开始。

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有好些人要求检讨，甚至有同志对过去表示愤激，当然如果要在党内煽动大的波浪与同志的愤慨，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避免震动过甚，还要顾及中央的威信，还要顾及党外的威信，尤其在统一战线开始时，现在是采用如何的方式来批评过去？这种方式要能引起同志的注意与警觉，又需要避免过甚的震动。我觉得必须由你们尽速的发表一个文件，发到各地，这对现在的转变是有帮助的。

我这封信是消极的批评，你们的文件或者更多从积极方面说，有些问题或者暂时还不必说。但过去是必须批评的。

祝好！

××^{〔4〕}

三七年三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应为洛甫，即张闻天。

〔2〕即李立三。

〔3〕即沈泽民。

〔4〕应为胡服，即刘少奇。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国内和平 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任务 给任弼时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弼时：

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洛、毛

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周恩来关于一月来同国民党谈判 情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中央书记处：

本日周、叶⁽¹⁾与顾⁽²⁾谒张⁽³⁾会谈结果，均认为大体已趋一致，决将一月来双方谈判作一总结，由周写成条文，本晚即电蒋⁽⁴⁾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⁵⁾兹分述如下：

甲、政治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相当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行政经费请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饷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荐，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四、政治方面，请参加国民大会。

五、军事方面，请求参加国防会议。

乙、改编问题：

一、改编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个步兵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

二、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

三、红军原有之骑兵三个团及一个骑兵连，共约一千四五百人马，合编骑兵一个团。

四、实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国防编制表明九号下午可到手。

丙、善后问题：

一、编余的老弱残废，统请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

二、红军中之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其数目由行营及省府商定之。

三、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其人数及经费由中央检验后确定之。

四、红军学校约四千五百人（连工作人员），请办完本期末后结束，优秀者送军校或陆大训练。

五、红军中的医院工厂，请予保留。

六、河西方面请停止，马^{〔6〕}军退，继续进攻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后增援。

周 恩 来

八日十七时

并致彭、任、刘、张^{〔7〕}。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叶剑英。

〔2〕指顾祝同。

〔3〕指张冲。

〔4〕指蒋介石。

〔5〕周恩来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的电报中，汇报了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共同修改谈判条文的结果如下：（一）第一条：“承认”改为“服从”，“要求”改为“请求”。（二）第二条：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一语，并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行政经费照规定办法，不提）。（三）第三条：将国防师三个师明文规定，一万人一个师，定三万人。“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四）在第三条内插入改编问题：（1）改编初步，高级人员由其自己推荐，呈请军委会任命以后，待由中央派遣。（2）红军政训人员调来训练以后，中央派员参加。（3）副佐人员改编后，由中央逐渐派人充当。（4）总指挥部及骑兵团，请示办理。（五）新增第四条，红军任用人员须呈中央同意后发表。（六）改编后的经费给养等一条，加入为第五条。（七）善后问题，关于红校仍主张即时分散（优秀者入陆大军校，差者组织军士教导队）。（八）河西一条主张不写。电报还说：我意目前在有些小节上让步，惟有下列问题，请你们考虑电复。（一）民选制度不提，我们在行政区是否可自己执行。（二）分省行政区，我们是否可接受。（三）自己推荐改为初步，即不能提辅佐由中央派出。（四）政训人员到中央受训练，即不能提中央派人参加。（五）红校是否早日能结束。上述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6〕指马步芳、马步青。

〔7〕指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 谈判方针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

恩来同志：

甲、贺、顾⁽¹⁾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立场。

乙、彼方所提如：

- 一、划去民选；
- 二、分裂苏区；
- 三、派遣副佐人员；
- 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
- 五、缩小红军至二万余人；
- 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
- 七、改要求为请求；
- 八、服从一切命令；
- 九、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

丙、我们的最后限度：

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

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

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九千人。

丁、彼方对我所提如：

一、抗战准备；

二、民主制度；

三、改善民生；

四、释放政治犯；

五、民意的国民大会等置之不答，我们则必须与红军苏区问题同时解决。

戊、两星期来我方步步退让，彼方着着进迫，现应改换姿势。

一、一面坚持（丙）项各问题最后限度，一面将（丁）项各问题严重提出，向之进攻；

二、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2]解决；

三、将毛^[3]之谈话在全国发布造成舆论；

四、党的宣言正准备发；

五、红军准备持久斗争。

己、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有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中央书记处

三月十二日

并告彭、任、刘、张、贺、关、陈、聂、徐、程^[4]。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贺衷寒、顾祝同。

〔2〕指蒋介石。

〔3〕指毛泽东。

〔4〕指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贺龙、关向应、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重新调整国共谈判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

周：

甲、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已深刻表示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及与国民党团结救国之诚意，愿意拥护蒋⁽¹⁾委员长执行重定国策抗敌救亡之伟大任务，不料贺衷寒之提案，置我们于屈辱地位，全无团结救国之诚意，因此坚决不能承认其提案。

乙、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及拥护蒋委员长之根本方针，我们始终坚持不变，并不因贺氏带侮辱性之提案而动摇此种方针，因我们不但深信只有两党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抗敌救亡目的，而且深信蒋委员长领导下之国民党大多数及黄埔军大多数，亦与我们抱同一宗旨。

丙、西安谈判一月之久，最后被贺氏一人破坏，且使徐向前部陷于失利，见危不救，给红军伙食费不足买米，所有这些，我们认为均系违背团结之主旨，实际起了阻碍团结的作用。

丁、因此谈判须重新调整，并与蒋直接洽商。我们认为新的洽商，如果双方都站在诚意的团结救国宗旨上，是能够得到良好结果的。

戊、至于现在国内正在酝酿的分裂运动，至少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敌人而绝对不利于团结救国，因此我们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决不丝毫赞助任何的分裂行动。

己、此电请周交张、顾^{〔2〕}二氏转达蒋委员长。

中央书记处

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张冲、顾祝同。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 条件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

周：

谈判条件确定如下：

甲、中共方面承认：

一、承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宣传。

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

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1]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饷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

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讯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司令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交通队、卫生队、修械所等。红军原有骑兵合编为一个骑兵团。红军改编后之总数，不少于四万三千人。

六、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其数目及经费另定之。

七、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其人数与经费另定之。编余的老弱残病，由中央给资安置。

八、红军学校俟本年第一期结束后，改办随营学校。

九、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十、关于增加红军防地，另定之。

乙、国民党方面保证：

十一、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部停止“剿共”（如河西二马、闽浙赣边、鄂豫边、神府区等处，尚在进行的“剿共”战争）。

十二、民主自由权利的实现，释放政治犯，立即开始在全国各地释放共产党员，不再逮捕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在适当时期之公开。

十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汉奸卖国贼的当然在外）均能参加（包含共产党代表的参加在内），以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

十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真正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产党亦能参加。

十五、关于准备对日抗战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法与步骤，另行商定之。

中央书记处

三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周恩来关于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给刘少奇等的信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

胡服并转河北省委、河南省委：

(一) 在执行党今天巩固和平、加速准备抗日的总任务下，东北军与东北流亡人民中的工作仍是最重要的一环。“双二”杀王事变所造成东北军内部的分化，因为亲日派的播弄，还在继续下去。东北军的东调，将更增加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为要克服这个分化，使东北军更加团结起来，我们除掉在东北军中加强秘密党的工作之外，今天最好的方法便是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

(二) 估计到目前在调赴豫、皖的东北军中工作的困难及一部分左派站不住脚逃避平津，估计到东北军及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的数目并有相当的组织，因此，建立东北群众的统一战线并用群众统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这一任务，现在应当主要地由北方党来负担起来。

(三) 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在今天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为要进行这一工作，我提议：

一、把现有北方的东北各种救国团体加以整理并充实其群

众基础。首先，把北平、天津等地的东北救国团体的总会建立起来。然后，号召并筹备东北的救国联合会的召集。

二、在这些团体中，用最大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来参加。

三、在进行这一工作过程中，应当采用各种宣传与组织的方法来团结东北军的官长，提高部队抗日情绪。

四、这一工作，应特别注意到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否则，只是以团结一部分左倾分子为满足，那不但无益，反而会加深东北军的分裂。

五、应当注意到，把建立整个东北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联系起来，利用选举运动来团结东北军内部。

（四）关于建立北方东北军中党的工作，我有如下的意见。即是党的基础建筑在中下级官兵身上，但在今天发展的对象，应多注意到团营长，吸收其中个别的先进分子入党。下级官兵中的工作，应当多采取动员群众联欢慰劳提高抗日情绪，以及经师团营长自上而下地组织俱乐部等方法。要使得这些工作易于进行，党必须加紧上层的向军长等的活动。这虽然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作开展上是有很大作用的。

（五）为要担负这一工作，党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要大大地加强。尤其在华北，最好的干部应当做军队工作。我提议把联络局及地方党内的东北干部和群众关系做一次研究，以便适当地配备干部。为着帮助北方东北军工作，现在调宋、袁^①二同志前来，参加东北军工作。袁同志在五十三军上层有很多关系，宋原在“东委”工作，可做计划与推动东北群众工作。

根据此地“东委”工作的经验，党必须把东北军的上下层工作分开。上层工作由上层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党的工作由工

委来负责。上层工委书记参加工委。

五天前曾经有一封信给你们，里面有一些建议，未知收到没有。

伍 豪
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宋黎、袁晓轩。后来又改为宋黎和刘澜波，袁晓轩未去。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 形势与我党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张 闻 天

—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全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内部的大分化，以及国际形势有利发展的推动（如英法的倾向和平，特别是苏联为中心的和平阵线的巩固），使得南京政府的中派蒋介石不能不产生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召集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我们对它的估计是，其基本政策是有了相当的转变。

根据会议发表的文件及其经过情形可以看出，它在对内政策上是主张和平统一的，而和平统一的目标是集中全力以抵御外侮。一般的说来，它主张对国内问题不用武力手段解决，而采取政治解决的途径。对于西安事变，也认为以和平解决为适当。在其对西安事变的报告中，对张、杨的抗日八大主张⁽¹⁾是全文转述的。决议虽说到这种主张以“叛逆之行为及胁迫之方式”提出，不问其内容是否正确都不能接受，但对张杨与及首

* 这是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事诸人并未加以谴责。在民主问题上，决定要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同时，蒋介石在他发表的谈话^[2]中对于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也有相当表示。

在对日政策方面，《宣言》中说到，如果“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只有“决然出于抗战”之一途。“抗战”二字，在国民党文件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对于王英、李守信等汉奸行动，也加以指斥。这些都较二中全会的说法^[3]有所进步。在国际上，表示愿意参加到和平阵线方面来。虽然说得没有这样明显，其意思是倾向这一方面的。

对于同我们党的关系问题，三中全会的根绝“赤祸”决议虽然在前面阿Q式的说了一大套话，把些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最后提出了四个条件^[4]，表示在这四个条件下可与共产党谈判。这些条件和我们所提出的四条^[5]，实际上是初步的接近了。虽然它的说法有些不同，实际上跟我们所提出的是大同小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说，国民党三中全会不论在对内、对外、对民主、对群众方面，都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了转变。

再看会后的事实。南京政府部分改组，张群的外交部长由王宠惠接替，交通部长换上了俞飞鹏等，都多少对抗日派有利，对于亲日派给了一些打击。传说熊式辉、驻日本大使许世英等也要调动，最近孔祥熙又去英国，这些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对于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的追悼，以及孙科最近对中日外交的谈话，都表示对日态度比较强化。西北问题一般的已得到和平解决，对红军在前线上没有进攻的布置。与我党还是继续谈判，所谓“剿匪”基本上是停止了。这些事实，都说明南京国民党方面正在朝着抗日方向前进。虽然它的前进很慢、很慢，在决议中缺乏具体的明确性，但不可否认是在

前进。

所以我们应该说，三中全会后国民党的政策基本上开始结束了动摇，开始向抗日方面走。当然，仅仅是开始。我们在去年九月决议中曾估计到这一动摇有结束的可能，现在却是这一可能已开始趋于实现。这证明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

二

这一转变，会使国际国内的形势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国际方面，将更加巩固和平战线。南京与英、美要更加接近，与日本的冲突会增加，与苏联会更密切些。这会有利于争取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的努力，对于侵略阵线则是更大的打击。日本假使要进攻苏联，必然要顾虑到中国的牵制。因此，这是对世界和平有利的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策略，也必然会有重大的变化。

在三中全会前，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如王英、李守信的绥东进攻是失败了，伪军已被抗战的军队赶出了绥远。这是第一。第二，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挑拨是失败了。第三，在华北特殊化问题上，它最近碰到很多钉子。二十九军方面也不愿超过限度的执行日本旨意。他们内部团结，日本要消灭他们也不可能。就是石友三这类人，也不可能完全听命于日本。《字林西报》说：“中国人的民族性并不弱。”这是日寇很棘手的。所以，日本在华北问题上虽有所得，但大的成绩是没有的。最后，在三中全会期间，日本企图引诱南京，争取南京并指使其中的亲日派在会上提出对日妥协的主张，然而都未能得逞。

这样，逼得日本最近在对华外交的方法上不能不作重大的改变。日本现在正在大放和平空气，鼓吹其所谓新政策，即所谓佐藤外交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用各种方法来和缓中国，另一方面却在这种和缓的掩盖下积极准备侵略战争。日本表示，不一定要国民党承认“满洲国”，因为事实上已经占领了它。在华北问题上则强调“经济提携”，实质是要把华北经济完全握在手里。所以，佐藤外交在形式上似乎有些变动，但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放弃什么东西。广田三原则还是基本不变。仅仅是散播甚嚣尘上的和平空气，作为掩蔽其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烟幕。

日本要在对华外交上采取这一方式，当然是因为以前的政策受到了打击，不能不转个弯。同时，也是因为日本内部的冲突，如议会、政党与军部的矛盾、农民问题等，都没有得到解决。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也处于孤立的地位。它自订立日德防共协定后，除与德、意侵略者为友外，与英、苏关系都很差。

日本采取新政策的目的是，主要是想同中国和缓冲突，争取南京，把南京拉到防共协定方面。其次是想用以华制华办法来挑拨新的反蒋联共的内战，企图以最少的代价来攫取与征服中国。第三是想利用缓和的时间来巩固华北地位。在国际关系上则企图拆散和平力量，分裂和平阵线。

很明显，日本所谓新政策，所谓佐藤外交，其主要内容，还是实际的积极的准备武装侵略中国。一切花招，目的都在于此，都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走。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是日本用战争来夺取中国的准备时期。我们不应当为日本散布的和平空气所蒙蔽，而必须积极揭穿它的阴谋，准备抗战。

三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国内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自“一二九”运动至西安事变，是中国政治形势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心的一环，是停止内战。我们在这段时期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广泛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部分的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但全国的统一战线还没有建立起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南京政府要抗日，便不能不找群众，不能不找共产党，对于地方军阀也不能不寻求合作。

在这一阶段，主要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只有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平统一才有巩固的可能。现在全国民众普遍要求实现民主，从许多杂志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点。民主问题将来在我们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要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们必须完成实现民主主义的任务，绝对不应看轻民主主义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们应该争取国民大会通过给以民主权利的决议，这是在客观上有可能做到的。

总之，这一阶段是以转向抗日达到准备实际抗战。这种准备是必要的，我们主张加速度的准备。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一旦实现了抗战，就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到了那时，中国的形势又要进到另一个新阶段。

现在这个准备达到抗战的阶段，是有很多斗争，不是太平无事的。这些斗争主要是：（一）在国际上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斗争，其中包含中国与日本外交政策上的斗争；

(二) 中国内部亲日派与抗日派的斗争；(三) 民众与政府还是有斗争的；政府还是有动摇与妥协的，我们对此要严格批评，当然不是谩骂；(四)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斗争；(五) 独裁与民主的斗争。抗战的实现，就决定于这些斗争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时期可能发生各种曲折、困难，同时也包含着对困难的克服。如内战一般是停止了，但部分的内战的发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进步派同妥协派的内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以后我们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反对内战，而是反对日本的挑拨。

这一进到实际抗战的准备时期的长短，决定于各种力量的斗争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欧洲的局势一定要影响到中国，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也是可能的。应该估计到形势变化与战争突然发生的可能。

因此，应该进行加速度的准备。这是一个战斗的时期，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丧失的来进行准备。

四

在各种力量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运动是由国民党领导呢，还是共产党领导？我们怎样取得领导呢？

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后，其内部会有新的变动。在我们方面，则应帮助它前进，并且设法改造它。应该充实其力量，以新鲜力量参加进去。共产党员个别的秘密的加入进去是应该的，这样可以经过国民党来夺取广大的群众。我们要有忍耐性，坚持性。

但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有了改变。国民党企图控制这一运动，要同我们争夺领导权。

它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它拥有全国的统治，拥有全部的政权机关。它有长期的政治经验。它参加抗日，会提高它的地位。但是它的弱点是很大的。它要依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它的内部冲突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优点是：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有十年斗争经验；内部团结统一。我们的弱点是在白区的组织薄弱。这一弱点是可以克服的。总之，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党的政策与领导是否正确，将决定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怎样取得领导权？（一）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民主与群众生活等问题的处理都要环绕于抗日问题。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二）善于应用一切适用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判转到批判的武器。现在使用的斗争方式不是与国民党对立的方式。过去的方式是革命的，现在则适用一些改良的方式，当然这种改良是革命主义的改良。此外，还要利用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联系，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利用旧的形式为新的内容服务，等等。斗争形式很复杂，各种形式相互交叉。（三）要加强白区党的领导，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每个中心地区要有坚强的能独立工作的干部。（四）苏区、红军中要特别加强党的领导。以后在苏维埃中、红军中实现领导，要靠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使我们的同志有高度的觉悟。在苏区内要大大的发展党内民主，要向党员做报告，实行选举，开代表大会等。苏区改特区后，加强党的作用将更加重要。（五）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

最后，要保障党的领导，开展党的思想斗争。在目前，“左”的危险是主要的。“左”倾实际上是破坏党。反对“左”倾，反对托派，揭破托派的思想，现在非常重要。北方局提议

特别注意反对“左”倾，是有它的根据的。另一方面，右倾的危险也在增长。如在西安工作的个别同志表现腐化。特别是在新的环境下，一些同志容易接受外来的诱惑。有些同志在与人谈判时失去自己的立场，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要同这些倾向作斗争，保障党内思想一致，继续发挥长期以来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以保障我们的领导权的实现。不是在纸上，而是只有在艰苦的工作中，才能实现我们的领导权。

我们要全力工作，迎接实际抗战的到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八大主张是在西安事变中通电全国并当面要求蒋介石付诸实行的。这些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2〕指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对中央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3〕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七月十三日在会上讲话，对于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一语解释说，现在“并未达到和平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

〔4〕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中所提的四个条件是：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

〔5〕指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四项保证。

李先念、李卓然等关于西路军的斗争给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月)

三月二十三日的电报

(一) 西路军自本月十四号起与马⁽¹⁾敌四天最大激战，士气大受损伤，当即决定分路游击。由树声⁽²⁾率二十团为一路，约五连步骑；占云⁽³⁾率一路，枪百余，彩号、妇女千余；先念、世才⁽⁴⁾率一路，为三十军主力，约五个营与直属队。

(二) 据谍息，树声、占云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食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黄河以西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和五军共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毙、伤、俘敌共两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西路军余部成立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等率领的一个支队翻过祁连山，越过戈壁滩，经四十余天极其艰苦的行军作战，于四月底进抵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时有四百余人。当时正在新疆的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往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李先念、李卓然等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名义致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等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三份电报。

(三) 徐、陈^[5]所属部队由先念、世才、黄超、李特、传六、国炳^[6]、卓然等组织工作委员会，现随游击纵队行动。

(四) 我们今日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唯沿途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使我西进。

四月七日的电报

(一) 我们率九百余人及长短枪六百余支已到肃州西南山中，再经南山越祁岭正峰，约半月可到敦煌。

(二) 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于最近即可发觉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抢占敦煌。近二十日来，均在老林大风雪中零下十余度露营，缺柴火，烧牛屎；吃牛、羊肉，又缺盐；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现象无日无之。

(三) 祁连山脉中只有稀少游牧民，住帐篷，我无法游击。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决难在敦煌立足。因人员饥疲至极，武器弹药亦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制，实无再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稍休整，迅速经新疆到远方学习，培养大批干部。请转呈中央，速向国际^[7]及新疆交涉。时机迫切，请速复示。

四月十六日的电报

(一) 我们今十六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

(二) 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

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三）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

（四）特急！请即复昨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李先念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马步芳、马步青。

〔2〕即王树声。

〔3〕即毕占云。

〔4〕即程世才。

〔5〕指徐向前、陈昌浩。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6〕即曾传六、熊国炳。

〔7〕指共产国际。

刘少奇关于建议解答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兄：

我想在这里向你谈谈今后的问题。在国共合作的空气传布以后，所有思想的同志和左派人士表示□有种说不出的烦闷。这种烦闷，大约是由于下列的问题没有清楚的解答。一、蒋介石的统一将近完成，国民经济开始有向上涨的趋势了，国民党的统治有走向稳定的可能？二、国民党准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并预备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改革，这将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因此，我们的今后工作应该怎样进行？三、国民党的统一，经济状况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善，无疑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怎样？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怎样？四、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怎样？中国革命在将来的转变怎样？将来要经过何种过渡的阶段？采取何种途径使革命转变？

上述的问题已在少数同志中提出，要求解答。而托派已在刊物上系统的答复这些问题，向我们实行猛烈的进攻。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向同志向广大的群众答复这些问题。

托派对于上述的问题的解答如下：一、一九二七年后中国的内战，是资产阶级统一中国的战争，在历史上是消灭封建割

据的进步战争，红军反对国民党的战争，是维持封建割据的反动战争。二、资产阶级在战争统一过程中实行独裁，是必要的，在统一以后才能实现民主，也必定会实行民主。三、资产阶级及南京政府必定要抵抗日本的进攻。因为统治阶级要保护自己的生存、政权和财产，必然要抗日。四、九一八后，将以世界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建立比世界任何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还高的资本主义中国。五、在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将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因为此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各国的包围中（见二月三号《文化建设》）。

托派划定上述的公式后，认为中国正走着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这一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也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这个民族民权革命中要参加，但任务是援助资产阶级而已。待资产阶级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再来社会革命，和平转变。无产阶级在今天只要求生活的改善，援助资产阶级统一中国。削除一切封建割据，而且除和平统一外，武力统一也是必要的，而且无所谓联合战线，国共合作。因此他们宣言赞助南京政府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因此他们与南京 CC 等完全结合，京沪统一救国运动，他们有很大的作用。南京的人们得到他们的理论武装起来，是特别厉害的，请你们严重注意这一点。

如果国共妥协已经成功，国内和平与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那我们就必须估计目前统一战线的特点，目前与今后可能发生的形势。我觉得如果把目前的统一战线与一九二七年前的统一战线来比较，就有下列的特点：一、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是觉悟的，国共两党是已有十年仇恨。二、目标是对外的抗日战争。三、帝国主义各国已经分裂，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已不一致。四、苏联强大，且将参加直接的抗日战争。五、国民

党已有全国的政权和强有力的军队，他将站到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至少在开始的阶段内。六、已有红军和苏区。七、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是党外的合作。根据以上的特点：第一，国际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斗争，其胜负将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与革命胜负决定因素之一。很明白在和平阵线与苏联失败的情形下，中国革命的单独胜利，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困难是特别大的，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与革命的策略，应更多的根据国际形势来决定。国民党无疑以英美为背景，以争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为目的。英美对于苏联的态度，将决定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第二，因为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是觉悟的，他却不放松的加强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和领导地位，限制、削弱以至消灭我们和一切异己的力量和地位。这就要使我们采用特别技巧的工作方法去准备自己的力量，同时必须在彻底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下联合一切其他派别，团结与组织全国的左派及非蒋派是必要的。我们的同志大批秘密加入一切的党派，是必要的，同时必须以最大的警惕和警戒来对待自己的同盟者。第三，国共合作以后，南京政府的统一，及其政权的巩固，我们当然不能拒绝援助，因此我们在今后时期，当以合法的民主运动为主要的。而我们在政治上赖以和国民党争夺群众的工具：（一）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与民主的纲领；（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

我认为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和革命的转变，还是可能的，但这要经过许多过渡阶段。需要我们的努力，及其准备工作的充足，需要我们正确而无误的策略路线。而国外的帮助，也是决定条件之一。然而不能说我们在转变关头，就已经没有再次失败的可能，资本主义的再度发展不是绝对没有可能，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是要努力与大力来争取的。至于革命转变的途

径，现在当然还不能具体的说，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形下，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形下，在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不爆发的情形下，革命转变与其过渡的途径是各有不同的。现在我们就估计到这些不同。同时这种转变不一定是“和平”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暴动（如三月二十号事变的扩大），或者是革命的暴动，或者甚至于发生西班牙那样的战争，中国佛朗哥与日本一致来对抗中国的抗日政权。这些情形都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要准备在各种情形发生时如何应付？我们要争取何种情形的实现？

我们每做一件事，应该划定从起点至终点的轨线，对于国共合作与民族统一战线也一样，我们必须清楚告诉同志们，国共合作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怎样？它们将遭遇一些什么困难与危险？我们应该如何努力，争取何种前途？我想这些都是应该立即答解的，或者不公开的答复。因为我们的同志都不愿意而且不能在不明了自己的前途之情形下盲目工作。

希望你们对于上述的问题，不久就有文章或文件来！

祝好

胡^{〔2〕}

三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应为洛甫，即张闻天。

〔2〕指胡服，即刘少奇。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 国共合作的前途*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任 弼 时

我完全同意洛甫^[1]同志的报告。

一、国民党国策转变的原因：（一）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政局的发展，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转向抗日；由于这一重大的变动，使得中派不能不转向抗日。（二）由于我们一年来统一战线的号召与努力，不但深入群众中而且影响到各军队上层分子，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各派都公开谈抗日，加以我们的让步，更促成这一和平的实现。（三）国际形势的变动也推动了这一转变。

由于这些原因，促使国民党内部分化，使得它不能不转变。这一转变，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更有帮助，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严重的打击。

然而应估计到，日本要企图争取南京，破坏中国的团结；同时，要估计民族资产阶级害怕真正革命的起来，动摇妥协是不免的；并要估计英国的方针。亲日派虽然受到一些打击，但

* 这是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打击并不厉害，因此，蒋⁽²⁾并未脱离中间的立场。他仅仅表示了一些对日的请求，而在国防上并无具体计划；对于日本还在企图它有些让步，不过在外交上较强硬些；同时又利用日本的和缓而对抗日力量加以限制，特别是对我们更采取苛刻条件。因此，我觉得他还没有最后脱离中间立场。

将来趋向怎样？这主要靠斗争。日本如能作原则上的让步，让步到修改大陆政策，才能争取南京。但是这种可能在日本是很小的，相反的，它更要侵略中国。它仅仅以一些表面上的和缓来引诱南京，这就说明基本的趋势是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在这里，我们应争取南京，不要使它受日本的引诱。日本企图用“以华制华”的策略来破坏中国，我们必须揭破。对于托派污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亦必须揭破。我们应竭力巩固国民党的这一转变，并使它更向前发展。

二、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有了接受我们的主张的表示，虽然是不明确的。如果它有诚心于国共合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次国共合作的前途，我们应加以估计。前一次是失败了。今天的前途怎样？现在的客观条件比第一次是不相同的：（一）在国际间是处在第三次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严重关头，世界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前夜。（二）当着日本积极的侵略中国，国内阶级的变动比第一次也有些差异，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对日仇恨较深，也表示同情抗日。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在国内反对汉奸，所以我们战斗目标更明显。（三）我们党的力量与群众的力量和上次不同，我们有武装与地区政权，并且有丰富的经验。这就是我们比以前不同的取得胜利的条件。大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与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比上一次更复杂些，因

为国民党也有十年内战的经验，它必将到处来限制我们，所以这一次和上一次比，斗争是更加艰苦的。

同时，要估计到国民党十年内战中的反革命罪恶，在群众中是无法洗清的，虽然在今天它转向抗日，影响较好些，但群众对它的信仰是下降的。而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抗日的真诚和革命的彻底性是深入人心的，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我们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过程中会更有利。

我们应从哪些地方努力呢？这包括着在目前的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爆发后的时期，都应表示我们对民族的忠诚。我们应巩固我们的武装，争取民主权利，这一个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在这工作中来争取与巩固我们的领导权。

争取民主主义的实现，这是很大的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这样做的，需要很大的长时间的斗争，应该逐步地扩大。在民主斗争当中，党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在前方有些同志认为民主共和国就是苏维埃，我想不是的。必须指出由民主共和国到苏维埃，应该具有相当距离的。不过在党内解释，对于它的前途应指出有两种：一是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占着优势，是可以走向无产阶级争取的前途；二是相反的，在抗日实现后，资产阶级取得领导而排挤我们，那前途是不同的。当然，我们应该争取第一个前途。然而两个前途是必须指出而加以教育的。

关于中日矛盾问题，毛泽东同志那样指出是对的⁽³⁾。在这里要注意到的，就是曲解了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而放松群众利益斗争的领导。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产生的，不是我们取消得了的，我们不仅不取消，而且要组织。我们在组织群众斗争中便发动他们来参加抗日。土地问题的解决在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并不是完全把它取消，在相当时期，我们可以采取改良办

法来满足群众要求，在资产阶级妥协时，我们一方面从上而下的解决，一方面可采取不同方式，来发动群众求得解决。在前方，最近发生忽视群众利益的观点，我们是应该反对的。

党的组织发展跟不上政治影响的发展，红军进到渭北地区，影响是扩大了，共产党自西安事件后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在今天，我们的任务应加强党在全国的发展工作。对于党的教育的提高，在今天环境里是特别重要。在党内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并不会减弱我们的战斗力，然要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仅如此。对党内教育，办有力刊物是特别重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张闻天。

〔2〕指蒋介石。

〔3〕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处于服从地位。因中日矛盾尖锐，使得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取消苏维埃，主要的是因为这一理由。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同志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认为：

(一) 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豫鄂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二)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三) 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

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四）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组织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扎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五）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

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奋斗而得到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六）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党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七）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窄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联系着。

（八）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的，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九）中央更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扎维克的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表现自己的机会。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一 三中全会的意义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虽然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没有明确性具体性，没有坚定的方针，没有批评自己的过去的政策的错误，有许多非常含混的语句，但无论如何它是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

(一) 在对内政策上——确定和平统一，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是停止了；对民主方面表示相当的扩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

(二) 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指责我们，但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可以进行谈判，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

(三) 在对外政策上——在对日问题上，表示了“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才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比二中全会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进了一步。

* 这个宣传大纲是张闻天起草的。

在国际问题表示愿意参加到和平阵线方面来，因此使“日德防共协定”在中国失败，而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将获成功。

（四）在行动方面——三中全会后，国民党执行自己的决议虽然非常之迟缓，但亦在开始。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内个别人员的更动，多少是表示对亲日派的不利。对绥远抗战表示援助，如阵亡将士之追悼大会。西安事件和平解决，没有再挑起内战的企图，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派财孔⁽¹⁾赴英，与苏联更接近等等，这些都是说明三中全会后国民党政策的开始转变。

因为国内外形势变动，迫得国民党不得不放弃自己政策。同时，国民党政策的开始转变，又影响了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内则使内战停止后，团结御侮能更快实现。在国外则更加强和平阵线，而打击侵略阵线；加强太平洋的集体安全制度，而使日德防共协定更形孤立。

二 日本侵略中国的新政策

三中全会前日本在中国问题上遭受很大的失败：（1）进攻绥远的失败。（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日本挑拨内战的计划失败。（3）华北特殊化问题没有成功。（4）拉中国加入日德防共协定没有成功。（5）三中全会的结果更不利于亲日派。（6）英国在中国问题上胜利，更促进英日的冲突。

由于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日的力量的增加，日本国内冲突的尖锐（阶级与阶级间，政党与政党间），与日德防共协定使日本陷于孤立的状况，英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胜利，苏联与中国的接近。这些原因不能不使日本外交散播和平的烟幕弹。如是有所谓日本外交的新政策。这一新政策一方面想用各种方式来

和缓中国的抗日运动，把南京引诱到防共协定中去。另一方面则组织中国内部某些军阀以反对南京，还想用“以华制华”的办法，挑起内战。佐藤外交并没有放弃广田的三原则，他只想在新政策的掩盖之下，利用时间，巩固在中国已得的地位，拆散中国的团结，而准备新的占领，以达到灭亡中国。

必须在中国人民面前揭露佐藤外交的实质，使他的阴谋无从实现，使中国将告成功的和平统一不为佐藤的阴谋所破坏。

三 争取民主权利是巩固和平与准备抗战的关键

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面来。如果三中全会前一个时期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停止内战，一致对日抗战，那末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便是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的工作中心一环是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实现。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国内政治，召集国民会议，开放言论自由，开放民众运动。今天的民主运动是为着抗日，同时是在抗日运动上表现出来。

四 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许多的共产党员，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流血和牺牲。因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民生主义，

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精神。

国民党应当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吸收革命的分子进去，排斥亲日的和堕落的分子出去。

五 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

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而中日矛盾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主要的矛盾。因为国内战争应该以适应抗日的大局为原则。因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

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下，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民主权利，这也是为着增强抗日力量。中共中央主张不分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及武装推翻南京政府的方针，就是把国内的矛盾服从于中日的主要矛盾，把中华民族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

国内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矛盾，也必须在抗日原则下求得解决。当中央政权转向于抗日的方面时，地方政权的分裂，客观上将是有利于日本的。

六 揭露中国托派汉奸面具

中国托派在用“左”的空话，而实际上是日本的走狗，托派说三中全会一点转变也没有，托派说中国共产党投降了，托派说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不要抗日运动。他们的这些空话都

是证明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要阻止日本占领中国”——在最近苏联公审拉狄克时，托洛茨基给季诺维也夫的亲笔信上就是这样写着。“托派为日本军部供给苏联的情报”（日本贵族院上的声明）。在西安事变时托派又帮助日本挑拨内战。托派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法西斯蒂的走狗，在中国问题上，则成了日本的走狗。

七 党的基本任务

有人以为和平统一后，我们的事情就好做，恰恰相反，正是和平统一后，我们的事情更多、更复杂、更麻烦，而任务更繁重。我们由局部转向全面，由武器的批评转到批评的武器，由秘密的转向公开，由对立的转向合作的，因此我们的任务更加繁重了。

目前党的基本任务：1. 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抗日的救国的方针，对于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要环绕在抗日的问题上。2. 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利用批评的武器，善用一切适当的斗争方式，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批评朋友的每一动摇，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3. 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每个地区的坚强的独立的干部。4. 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的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5. 发展党内的民主，提高党员的干部的积极性、自动性、警觉性。6. 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左倾”，因为这种倾向将使党脱离群众，因为它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来破坏抗日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左倾”最有效的方法，是揭破反革命托洛茨基派思想和阴谋。同时在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它表现与另一种政党同化，成为尾巴

主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注 释

〔1〕指孔祥熙。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性对日 抗战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

胡服：

你三月四日的信收到，对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答复如下：

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国策已开始了转变，这结束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所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阶段。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停止内战。从现在起到对日抗战的开始止将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这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阶段。目前我们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实现抗日的民主权利。

乙、在这个新阶段内我们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推动蒋介石逐渐走向南京政权的民主化，以准备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我们不但应该敷衍地方军阀的反蒋要求，而且应该向反蒋的地方军阀坚持的解释，只有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合作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丙、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的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而决不能以此来同反蒋军阀作统一战线的条件，这种反

蒋统一战线只对日寇有利。

丁、在蒋介石南京政府转向抗日的目前情形之下民主的口号也将成为地方军阀反蒋的最好的旗帜，我们决不拒绝利用这些力量去推动南京更加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然而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拿此口号作幌子来进行分裂与反对和平统一的运动。我们应该要求他们首先在自己统治区域内实现民主以推动全国的民主。并指出民主与救国是不能分离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晨报》罗隆基的主张表示区别，才能争取最广大的群众。

戊、我们决不能赞助反蒋军阀的所谓“国际联盟”，这种组织只能使中国分裂，使我们与南京及蒋的合作破裂，而直接帮助日本。

中央书记处

四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军委关于国共谈判和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给各军政首长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

刘张左杨关宋陈聂徐程周袁李赖⁽¹⁾：

(甲) 恩来⁽²⁾见蒋⁽³⁾回来结果尚好。红军苏区问题，照我们最低限度处理，编四万余人，设总指挥部，副佐及政工人员不派，苏区不分割，两党共同纲领问题，现正起草携往杭州再谈。

(乙) 政治局会议完毕，讨论了政治问题与国焘⁽⁴⁾错误问题。关于政治问题，认为国民党已开始转变了，今后任务应完成其转变为中心一环是争取抗日的民主，中央将根据讨论发表告国民党书及告同志书，并定五月一日前开苏区与红军的党代表会议。关于国焘错误，认为是机会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及军阀土匪主义，其责任不在四方面军干部而在国焘的领导，国焘在会议中开始承认了错误，国焘退出红军工作，但党内组织结论暂保留。决议即发。彭、任、贺⁽⁵⁾已回防。

军 委

附：彭德怀等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给贺龙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

贺关宋刘张刘陈聂邓徐程王周袁富春⁽⁶⁾：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及国焘错误两问题，均将有决议发出。兹将讨论经过摘要告如下：

（甲）第一问题：

（一）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国际和平阵线，给侵略阵线以打击，使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二）因为中国和平统一局势及抗日运动发展，南京较前强硬，日本国际地位孤立与内部困难的增加，使日本侵略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对华和缓，其目的是企图继续争取南京到防共战线，设法寻找新方法施行其以华制华挑拨内战的伎俩，利用巩固在华已得势力，是积极准备大的侵略战侵夺中国的准备时期。

（三）三中全会后，使中国形势开始进入新的紧张准备对日直接抗战的过渡阶段；停止内战的旧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过渡阶段时间的长短，还依靠于各种斗争来决定，而且可能发生各种曲折变化与困难的。

（四）在新阶段中的国共重新开始合作，我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国民党占有统治地位、过去斗争经验和转向抗日地位还可提高等优越条件，但他有对帝国主义、

封建势力依赖妥协和内部不统一的重大弱点；我们在全国有很高威信，能彻底抗日，并注意群众利益，有列宁主义和斗争丰富经验，虽有白区组织力量薄弱的弱点，只要党的领导正确，是可以取得领导地位的。

（五）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党今后应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而动摇。党在新的环境中应善于利用新的斗争形式，党应加紧对白区工作的领导，党应加强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党应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培养新的干部，党应开展反“左”右倾的思想斗争，“左”还是主要危险。这都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乙）第二问题：

（一）认为国焘是犯路线上的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退却逃跑、反党反中央的路线，他是由于对革命形势机会主义估计、军阀土匪主义、派别主义有机联系起来的一种国焘路线，其哲学基础是狭隘经验论与机械论。

（二）国焘路线在鄂豫皖只是萌芽，在通南巴是形成时期，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是形成第二党的开始，取消中央是其破产的开始，西路军失败是最后破产，给中国革命很大的损失。

（三）国焘路线错误与过去大革命及六次大会时机会主义错误有密切联系，是半封建社会中农民、流氓、土匪、军阀意识在共产党内的反映，其前途只有走向托、陈取消派的道路。

（四）国焘已认为是路线上的错误，有进步，已承认错误，周纯全、何畏承认错误也有进步，对国焘除停止军事领导职务外，党内组织结论暂保留，看以后实际工作转变情形再作决定。

（丙）关于会议的经过，兹正将分别派人来各兵团传达。

彭、任、杨^{〔7〕}

七日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林育英、左权、杨尚昆、关向应、宋任穷、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周昆、袁国平、李富春、赖传珠。

〔2〕即周恩来。

〔3〕指蒋介石。

〔4〕即张国焘。

〔5〕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

〔6〕指关向应、宋任穷、刘伯承、林育英、刘晓、陈光、聂荣臻、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周昆、袁国平、李富春。

〔7〕指杨尚昆。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策略方针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

国际书记处：

甲、恩来⁽¹⁾从杭州见蒋回来，其经过如下：

(子) 关于谈判内容，我方以书面提出者有下列各项：

第一部、共产党方面承认：

(一) 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二) 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

(三) 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主制度，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

(四) 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准备国防需要时调赴前线参加作战，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军政人员由其部队长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

(五) 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个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

* 这个报告是周恩来起草的。

队，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

（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第二部、要国民党方面保证者：

（七）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

（八）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

（九）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

（十）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产党亦能参加。

（十一）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丑）恩来见蒋时，口头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因此中共为表示合作之诚意特承认上述书面中之六项条件，同时要求蒋及国民党给以上述五项保证并附口头声明六点：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

（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

（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

（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

（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

（六）红军防地须增加（因此六点均为在西安与顾祝同谈判到最后时的争执要点）。

其次复说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谋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对各省分裂运动，我们坚决反对，但愿蒋及南京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

（寅）蒋谈话大意：

（一）承认我们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要我们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于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二十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我们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恩来再三问他尚有何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但要我们商量。

（五）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我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我方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我们并由我们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我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令顾^[2]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商定他也

决不再打。

（卯）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明知：

（一）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能改变（宋美龄亦承认共产党可在中国公开）。

（二）共产党的国际关系不能取消。

（三）共产党不会无条件的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故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辰）我们现商定办法如下：

（一）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征求蒋的同意，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

（二）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答应赞助蒋为总统。

（三）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

（四）对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编另一万人，如此除老弱妇女外便无多余精壮青年。

（五）如基本上及具体问题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变发展，以便促蒋让步。

(六) 恩来俟纲领起草好后即将再度南下见蒋。

乙、目前各方情况及我党策略方针：

(子) 南京方面：亲日派的活动较以前改变了一些策略，这是反映了日本解散议会以前的外交面目。欧美派的活动较前增高。抗日派对我们虽表示好意，但迄未形成政治集团力量，对蒋亦甚畏惧。西西派是我们在民众运动中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强硬对手，他们最不愿意我党公开，虽然他们并不反对合作。黄埔系分为军官系与政训系，前者较易接近，后者常捣乱我们与蒋合作。士官、保定、陆大各系中亦有接近我们者。

(丑) 各省方面：东北军现已陆续开往豫皖驻防，一般的对我们关系均好，现正力助其内外团结。杨虎城部队经改编后托派分子尚未肃清，拟再向其严重提出，否则必会分裂。阎锡山与我们有商业来往，其守土抗战主张确能深入民众，唯甚限制我党活动。宋、韩⁽³⁾有五省联盟酝酿，韩并向蒋提议开晋绥直鲁川桂六省会议，以解决与南京纠纷，蒋恐不会允许。我们在河北活动尚较自由。广西方面现正转坏，过去因抗日而引起的民众运动现遭受摧残，胡汉民的新国民党残余人桂进行所谓“清血运动”，所有左派分子均被排斥，其策略系反对南京容共，反对我们联蒋，有接近日本可能，民族大同盟被摈，近在香港，甚无聊。托派分子拟往勾引。川刘⁽⁴⁾与南京冲突不致发生战争，但川刘左右极落后，在各省中欲打破其割据思想而提高到抗日与民主阶段以川刘为最难，与我们关系尚保持。

(寅) 民众方面：近半年来我党影响极扩大，但无组织力量巩固之。自七领袖被捕，上海及全国救联失败后，全国统一救国运动在国民党包办下左派群众尚未能加入。许多新刊物亦尚不能经常存在，尤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因我党尚未能经常的公开发表政治领导主张，致左派刊物在民主运动中尚不能形

成有力舆论，结果不能不使《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的资产阶级影响扩大。上海工人斗争颇发展，国民党力图控制，我党似有一部分下层关系，但无从指导。华北为我们学生运动根据地，唯环境复杂，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极费力量。

（卯）我们现时在各方面活动的策略中心是为着彻底的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加紧从各方面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其严重意义。也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醒，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和胜利。

中央书记处

四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即周恩来。
- 〔2〕指顾祝同。
- 〔3〕指宋哲元、韩复榘。
- 〔4〕指刘湘。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大会 组织法与选举法修改问题的通知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

关于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的修改问题，中央提出下列原则，望在各地造成舆论，并引起公开讨论。最好能做到各政治团体联名或各自署名致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要求照此原则（如在不违背此原则下的出入无妨）修改。

甲、基本原则：

（一）修改目的在使此次国民大会民主化，以便制定民主宪法及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并非欲推翻这一国民大会。

（二）因此，这一国民大会的组织原则除区域选举外，应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直接选派代表参加，以实现抗日的民主统一与决定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

乙、具体意见：

（一）凡年岁二十岁以上的中华民国公民，不需经宣誓手续，均应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取消圈定或指定的办法。应照候选名单实行不记名投票。

（三）代表总额数应增加各党各派及学生会的特种选举，各党各派的代表名额应不超过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

史一年以上的，以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平均分配，并由各该党自行选举。学生会名额应等于全国教育团体的代表名额，其选举资格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为合格。

（四）推选候选人的手续，应一律改为由各地各团体开选民大会，选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便依照选举区域或团体联合推选候选人。其留在东北四省的革命团体及革命部队所推选的代表，均得为该四省的当然候选人。

（五）候选人的名额照应出代表增加下列倍数：

（子）区域选举增加十倍。

（丑）职业选举增加五倍。

（寅）特种选举增加三倍。

（六）参加职业选举之团体，不论其为合法或不合法，凡在选举法修改公布前成立并确实拥有会员者，应照其同一职业选举，应使艺术家、科学家等团体均能分配有代表名额。

（七）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应实行特种选举，其代表名额至少应如青海举出九人。

（八）军队被选资格只限在役军人，不受其他限制。

丙、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将另以文章发表。

中央书记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

张 闻 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结束了从一九三五年底所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即是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艰苦奋斗的时期。现在内战是停止了，在全中国民族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即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阶段。

许多人似乎还不敢赞同本党对于目前时局的这种估计。有的对于共产党的是否有“诚意”还不大相信，有的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真的开始了转变也表示怀疑。对于这两种倾向，我们认为有加以解释的必要。

首先讲共产党方面。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即提出了“全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并为反对日寇占领东三省进行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同年四月即发表了对日宣战的通电与紧急动员令。一九三三年正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发表通电，愿意在三个条件之下（即一、停止进攻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一期。

苏区与红军；二、保障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同任何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华北危急，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创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同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十二月决议，更加详尽地规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致国民党书》，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实行“国共合作”，并于九月提出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任务。

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一九三五年华北事件之后，早已把日本帝国主义当做了中国民族的最大敌人，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当做了我们最中心的任务。不论国民党南京政府过去对于我们的提议怎样置之不理，怎样不断的向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实行残酷的进攻与“围剿”，然而我们并不因此改变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坚持的向着全国人民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我们的主张与要求，并为了自己主张与要求的彻底实现进行了坚决奋斗。

但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虽是得到了全国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然而在国民党中间，在中国社会的上层分子中间，一般的对于共产党的诚意还表示怀疑。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共产党团结御侮的诚意，才为国民党中部分的明达之士及全国社会的上层分子所了解。因为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但不利用西安事变实行趁火打劫，扩大内战，而且反利用自己的地位，坚持对双方冲突实行和平调解的方针。正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使当时内战危机得以避免，使和平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接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又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

电报。这个电报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五项要求与对于国民党的四项保证，更取得了国内外广大人士的同情与赞助。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至此才大白于天下。

所以现在还有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有否“诚意”表示怀疑，显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与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做了他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每一个黄帝子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

当然，共产党的这种主张要受到一切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汉奸、亲日派、托洛斯基派的攻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警犬托洛斯基派，现在正在用一切力量攻击共产党，企图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破坏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建立“防共的统一战线”。

中国托洛斯基派现在正在从两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他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国民党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因而大骂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错误政策（见《文化建设》杂志上托派的文章）；另一方面他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果然有不对的地方，但是现在是完全错误了。因而大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为出卖阶级、投降国民党的政策（见托派的《斗争》与《火花》）。托洛斯基派对中国共产党这种两方面的进攻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到处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的合作，团集一切“反共”的力量，给日寇灭亡中国肃清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给汉奸托洛斯基派的理论以彻底的揭发，这需要专门的文章。但我必须向全国人民声明：中国共产党最近所采取的一切办法，特别是《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决不能

解释为“中国共产党的投降”。我们承认：我们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上的四项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我们一种让步，但是这些让步不但不放弃我们的新政策，而正是为着实现与贯彻我们的新政策，因此这些让步是必要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全国各党各派间的互相让步、互相妥协，正是本党历来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所拥护与赞助的主张。这是一。第二，我们的这些让步与妥协，决不等于取消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置久在本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有高度觉悟的民众力量于不顾。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保持本党对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民众力量的领导，这是共产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是不能允许的。第三，我们的这些让步与妥协正是为了要使共产党在全中国取得公开的与更广大范围内活动的机会，使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得到完全的胜利。

同时，也决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今天的让步而认为过去十年来他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牺牲与努力是错误的。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违反人民利益、屠杀革命群众、使中华民族暗无天日、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扫地以尽的新形势之下，本党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只有这一方针，才把国民党所抛弃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高举了起来，才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及中国一切革命先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只有这一方针，本党才动员了最广大的群众，团集了革命的力量，创造了中国革命新的核心——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只有这一方针，才把中国民族的最优秀的代表与战士保存起来，锻炼着他们，使中国革命的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能够继续去领导了全中国的革命运动。正是因为这一方针，所以今天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今天使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能够这样深入人心，发生这样伟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无数烈士们与无数战士们十年来牺牲奋斗决不是徒然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给了伟大的贡献。

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警犬，充当汉奸的托洛斯基派走卒们去咒骂中国共产党吧！让他们向中国共产党狂吠吧！中国共产党将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

其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应该说，现在许多人，特别是广大的左倾革命群众对于国民党“停止内战”、“御侮救亡”究竟有何诚意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国民党十年来对外不抵抗，对内用兵，对民众压迫的政策，造成了全中国人民对于国民党的极大仇恨。这种仇恨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这种仇恨只有国民党在彻底转变他的错误政策之后才能消除。但是我们对于国民党发展趋势的估计，决不能从过去的仇恨出发，而应该从今天的现实出发。一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奋斗的艰巨工作，资产阶级的转向抗日，国际和平阵线与侵掠阵线的尖锐的对立，不能不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影响，使国民党政策从动摇到开始转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三中全会及其最近的行动，我们不能不说国民党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了某些善意的愿望，对于日寇的侵掠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此外他在所谓“根绝赤祸案”中，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虽是这种态度，在极端高慢自大的措辞之下，在对本党又一次造谣诬蔑的老套之下掩盖着。一切这些我们应该估计为是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开始。如果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政策的这种转变，或根本

否认国民党有这种转变的可能，那我们必然会产生对于目前时局的错误估计，而发生错误的行动。

国民党政策的这种转变的开始，对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是突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去年九月《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上已经指出。当时“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内政外交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本党当然就是根据于这种估计，采取了联合南京及蒋介石共同抗日的方针。现在事实证明本党当时的估计及当时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国民党政策的这种开始的转变，我们不应该取旁观的态度甚至攻击的态度。我们应该欢迎国民党政策的这种开始转变。这丝毫不是表示我们的“投降”，而正是表示我们的无成见，我们的不念旧恶，我们大中华民族的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我们愿意牺牲一切过去的争执，共同奔赴伟大的前程。我们不但容许而且愿意帮助一切过去犯过错误的人，使他们能够贡献他们的一切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然而我们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转变决不能有过分的估计。我们应该着重的指出：国民党的这种转变还是非常不够，还是非常迟缓与含糊，还不过是在开始。从转变的开始到彻底的转变，从现在到全中国抗战的直接发动，还需要经过一个战胜各种障碍与阻力，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艰苦奋斗的时期。

不要因为国民党政策还是转变的开始而唉声叹气，而悲观消极。也不要因为国民党政策开始了转变而表示发狂，而表示

“完全满意”，而坐待胜利。我们欢迎国民党政策的开始转变，但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这种转变。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转变，但决不因此悲观失望。我们应该看到中华民族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觉醒着，向着全民族的直接抗战迈进着，这是极可欢喜的事。然而从现在到抗日战争的发动与胜利还需要经过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努力。只有在创立全民族统一战线，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总方针下，坚持的艰苦的去发动千千万万群众参加到民族阵线中来，不动摇的用一切方法去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才能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发动与胜利。胜利是不会自然到来的，哭泣是无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对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必然胜利有着充分的信心，同时也有着最大的坚持心与勇气，为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也许有些缺乏坚定性或犯着急性病的朋友们要因此感觉得前途荆棘很多，胜利遥遥无期，因而要失望吧，因而要陷于冒险吧。对于这些人，我们要告诉他们，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这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抗日战争不是靠少数人的冒险冲锋就能够得到胜利的。这里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千百万大军的准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取得抗战的决定的胜利，我们需要最大的忍耐心与严肃的镇静的态度，急躁与轻视是有害的。在今天，国内外的形势既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积极准备的时期，那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空喊“立即对日抗战”、“反对一切准备”而是利用这一时期加紧的准备起来。

这个需要战胜各种障碍与阻力，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艰苦斗争的时期，这个加紧准备对日直接抗战时期，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目前新阶段，巩固国内和平，争

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即是这个新阶段内的任务。

为了顺利的完成新阶段内的任务，我们认为全中国人民，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应该始终不动摇的把日本帝国主义当做中国民族的公敌。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力量不能有过分的估计，而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恐日病”。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最近侵掠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已经受到了不少的挫折与失败（如川越、张群谈判的没有结果，进攻绥远的惨败，挑拨内战的阴谋的没有成绩，华北特殊化的停滞状态，经济考察团的失败等）。这证明，只要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只要全民族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然而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也不能估计不足。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有着世界最侵掠最野蛮的德意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援助，有着全副武装的帝国军队，而且他经常采取各种麻醉、愚弄、欺骗与威胁利诱的方法来达到灭亡中国的最终目的。尤其重要的，他善于利用中国的汉奸亲日派与托洛斯基派等，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实现他“以华制华”的阴谋毒计。因此全中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应该有最高度的民族觉悟，不要为日寇及其走卒汉奸、亲日派、托洛斯基派等所蒙蔽，不要中他们挑拨离间的奸计，给中华民族以无穷的祸害。应该把中国与日本的矛盾看做中国时局目前的最主要的与基本的矛盾，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都应该放在次要的与服从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国内的各种成见与斗争，而达到团结内部共赴国难的目的。任何人任何集团的一切破坏这一目的的实现的企图，不论在怎样好听的口号之下，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

看吧！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正在大吹大擂的实行他的“新政策”！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应该清楚的看到这个新政策的葫芦

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个新政策不过是日本在侵掠中国的过程中遇到挫折与失败后的新的阴谋。这阴谋的目的，是想利用一些甜蜜的言论以欺骗与麻醉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使他们投降就范。是想借此拉拢中国政府加入德日意“防共协定”自趋灭亡，是想再一次利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发动中国内战使他们渔翁得利。并且在这一烟幕弹下，使他有相当的时间加紧大规模战争的必要准备，使以上企图最后失败时实行新的武装占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新阴谋，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应该有最大的警觉与戒备！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汉奸、亲日派及托洛斯基派在中国民族走向直接抗战的道路上所埋下的一切障碍与陷阱，揭破他们一切阴谋诡计，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何的疏忽，会使中国民族受到极大的损失，使历史的车轮向后倒退，一切又得从新做起，虽是我们知道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当然，除了中日两国的主要矛盾之外，中国内部的矛盾如阶级间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人民与政府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而且正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还仅于开始，而且转变得非常迟缓与不坚决，所以这种矛盾还是相当的尖锐。但是这种矛盾，在共赴国难的总目标下是不难解决的。譬如国民党南京政府如果更坚决的走向抗战，给人民以民主的权利，改善人民的生活，则人民与政府间的矛盾自然减少，而且人民将热烈的拥护政府。譬如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如果中央政府积极准备抗战，坚决实现民主制度，则地方即失去反对中央的口舌，和平统一的局面即可逐渐巩固。即是阶级的矛盾，在共同抗日大前提下也是能够适当解决的。总之，国内一切矛盾的适当的解决，应该在共同抗日的大前提之下，而解决中国内部的矛盾的标准，应该是增强民

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而不是削弱他。

现在仍有不少的人还在诬蔑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只要阶级的利益不要民族的利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正是中国无产阶级也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今天的最高利益，所以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对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因此同意在今天民族解放运动中资本家应该无限制的剥削工人，地主应该无限制的剥削农民，政府应该无限制的增加人民的负担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这种只替少数地主资本家谋利益而牺牲大多数工农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这种单替少数人谋利益，不顾大多数人利益的言论与行动，会使全民族的抗战发生困难。为了全民族的总动员，为了使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加到民族阵线中来，改善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必要的。只要他们的生活能够相当改善，则他们救国的热情更增高，因此他们也能够理会到他们今天的利益与整个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也不是对立的。因此他们也不会提出超出抗日救国的利益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主张改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正是为民族的最高利益。

为了无限制的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健全的解决中国内部的矛盾，我们认为开放党禁，发展民主运动，实现民主制度，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完成目前阶段中一切准备工作的中心一环，正像停止内战是上一阶段中一切工作的中心一环一样。因为只有给民众以民主的权利，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潜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使战胜凶恶的日寇成为可能。只有实现民主制度，各种不同意见才有共同讨论与共同解决的机会，而不致诉诸阴谋与武力。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各种不同的信仰，才不但不会妨碍共

同的行动，而且正是使共同的行动成为可能。和平统一的局面，也只有在实现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巩固起来。

关于民主运动的重要性，国民党方面似乎还有很多人没有了解。国民党是向来惯于一党专政的；他靠一党专政维持了他十年的统治。一党专政现在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全中国人民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热烈的要求民主权利。国民党一方面不能不多多少少给民众以民主的权利，然而又怕民众得到民主权利之后，即会失去自己的政权。因此他们非常坚决的反对民主运动，想保持过去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的办法。然而我们应该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最愚蠢的。他们不懂得如果国民党今天要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提高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地位，那开放党禁，给人民以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是最好的办法。那些一方面用一切方法压迫其他党派的群众运动，而另一方面想创造在国民党包办下的“统一救国运动”，其结果是一定要失败的。雇用“反共”的专门打手托派分子的“文化建设杂志派”，我想结果也一定是很可悲的。民国二十六年的历史，不但证明武力统一中国的不可能，而且也证明独裁统一中国的不可能。因为只有吸收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革命与进步的力量才有所依靠，以战胜日寇，以消灭国内封建割据的局面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得以产生并将它放在巩固的基础上。

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情那些把争取民主权利与发展抗日救国运动分离开来看的倾向。脱离抗日救国的中心任务，民主运动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正像脱离抗日救国的中心任务的和平统一，在中国也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扩大，是为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也只有为了这一目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才能有所依托，并使之得到

胜利。至于那些以民主口号为幌子进行分裂运动的某些地方当局，那当然应该受到严重地批评。我们不但要求中央政府的民主化，而且也要求地方政府的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现在在地方与中央均是需要。如果某个地方政府能首先开放群众运动，实行民主制度，那我们不能称这种行动为“特殊化”，因为它代表的是进步的势力。中央政府要消除这种“特殊化”的最好办法，不是去出兵讨伐，去强制取消，而是把自己提高到同样的水平。除此以外，别无出路。

现在国民大会开幕期快要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起来要求政府立下决心，使国民大会真正能够成为代表民众，代表各党各派之救国会议与立宪会议。只有这样的国民大会，才能团结全国底力量，实行抗日救国的任务与真正之民主制度。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大会之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现在必须有彻底之修改。

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内经济建设首先应该是国防的建设，中国现在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先“建国”然后“救国”，而是在救国的中间实行建国。不在救国的大前提之下，建国是不可能的。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失败之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国民族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今天之建国，应该首先是为了救国，也只有为了救国，今天的建国才能成功。同时我们应该反对那种观点，好像只有国防建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开始救国。相反的，我们的国防建设，要准备任何时候的抗战的发动。在抗战的发动中，国防建设还将继续进行，而且更将加速度的进行。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此外，我认为经济建设应该同改善民生联系起来。现在正有些人高喊着，经济建设就要劳动者少吃饭多做工，要他们牺

牲一切。因为不然，他们说，中国的生产事业就不能同外国资本家竞争。这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说，中国生产事业不能同外国资本家竞争，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者不努力，偷懒。谁都知道，中国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勤劳耐苦的。而是由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要中国的工商业繁荣起来，必须取消这种统治。首先在今天，必须收回东北四省，取消冀东察北的伪政府，与冀察的特殊化，取消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停止无耻的走私等。专门在自己同胞身上打算盘，想怎样使他们没有最后一粒米，失去最后一条裤，那是最下流的勾当。相反的，我们今天应该尽可能的改善同胞们的生活，鼓起他们为救国而赴汤蹈火的热情，发动他们积极的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也是我们大家的出路。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新阶段内所要完成的任务。至于这个准备时期的长短，却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这决定于国内外的形势，也决定于我们的斗争。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时间是不会很长久的。敌人决不会给我们慢慢的准备好了，再来进攻。好战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是准备以冒险的战争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僵局”。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而且我们也不能长久的让东北四省的同胞长久的为敌人所蹂躏与屠杀，我们也不能忍受冀察特殊化的局面长此下去。走私、特务机关、浪人“皇军”、凶手等必须迅速根绝。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每一短促的时间，加紧我们准备工作。要有在任何时候发动直接抗战的决心。因此，我们决不能划出一定的时间，说在这一时间内，我可以答应敌人的一切要求，我可以忍受敌人的一切掠夺与侮辱，但决不抗战。这种观点，应该受到严厉的反。这样的准备，是永远准备不成的。相反的，我们要随时准备抗

战。我们相信在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还能实现更彻底的民主制度，还能更好的团结内部，使中华民族能够在空前伟大的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最后击破东方凶恶的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自己的独立解放与自由。这必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和平阵线中的伟大因素！

无疑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负担着这一光荣的任务。用我们一切的努力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吧！我们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对沈章诸氏 被起诉宣言*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数年来沉重的国难，大好版图，沦亡异域，民族生命危若累卵。

于是稍有热血之人，莫不奔走呼号以解除国难、解放民族为己任。沈邹章李王沙等诸先生，则为此种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之领袖。诸先生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然亦即因此而遭日寇之愤怒，去年十一月以莫须有之罪名，被逮入狱，铁窗风味于兹五月。国民党政府此种举动，非特为全国民众所反对，亦为世界有识人士所不满，甚且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亦多愤愤不平。西安事变之八大要求，以释放沈章邹等先生列其一，良有以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三中全会表示国民党自愿放弃其错误政策之端倪，全国人士亦正以诸先生之能否无条件开释以判断国民党有否与民更始之决心。不期四月三日苏州法院竟以“宣

* 这个宣言原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一期。

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罪状而起诉矣。并扩大此案而通缉现在美国讲学之爱国老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等七人矣。此种极端错误之举措，实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之重大障碍。实足以窥见国民党——至少其中一部人士之畏惧爱国运动之心理，及蔑视民权之态度。

吾人对此爱国有罪之冤狱，不能不与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并期望国民党中有识领袖之切实反省。

至于控诉沈邹章诸先生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尤为荒谬，盖沈邹章诸氏所主张固极简单，不外将孙中山先生在民十三时代之主张重行提出而已。倘吾人熟读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说，以之与沈章邹氏言论相比，实不能看出其中有任何之矛盾，沈章邹氏之主张固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相同，而今日国民党所需要者亦正为重新发挥革命的三民主义，倘以沈章各氏“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内容之主义”为起诉理由，则除非对三民主义给予另一种解释，但此种另一样解释，非特绝不能受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欢迎，抑亦将为对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为重大之侮辱。

国民党在三中全会，虽承认举国一致和平团结之原则，然而对民众渴望之爱国自由与民主权利，固未有具体之回答。吾人为中华民族之解放与进步计，自当要求国民党之彻底放弃其过去之错误政策，而此种彻底转变之表示，应由立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开始。危害民国之治罪法只能适合于汉奸及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谍走狗与乎挑拨内战之祸魁，而不能施行之于爱国之民众及领袖也。此种反对日寇及汉奸之运动，固不能单只依靠于一纸法律，而必须有全国民众之自动的参与。倘民众

无民主权利，则欲唤起民众亦将束手无策。

吾人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及全体政治爱国犯，立即取消陶行知等及一切政治犯之通缉令。

吾人要求立即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吾人宣言，真实之抗战准备，唯有给予民众民主权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

——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
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这些任务的完成，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我党全体同志为这些任务而斗争的最大的牺牲精神与坚强意志。

当日寇侵袭，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与十二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新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本党首先把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把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放在从属的地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就是本党当时动员群众的口号，也就是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最初目标。稍有常识者均能了解，本党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的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阵

线，一切说本党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第二西班牙的议论，其造谣中伤的作用，实是非常显然的。

根据于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内部的开始向着抗日救国方向的变化，本党从一九三六年八月即发表了《致国民党书》，提出了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目标。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主张“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九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详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虽则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不理我们的提议而且继续调动大军向陕甘宁苏区与红军进攻，然而我们毫不动摇的坚持这个基本方针，并且再三声明我们当时的战争，只是自卫战，当此民族存亡关头，我们是坚决不愿同国内军队作战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本党本此方针，调解双方冲突，使内战得以避免，和平获得最后的胜利。本党对于联合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忠诚，至此才为全国各界所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的是全中国民族的胜利，也是本党新政策的胜利。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本党新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向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这一宣言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做了他在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共产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是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当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最主要的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与

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从这个观点出发，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决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这些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种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与许可的。首先因为这是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必要步骤。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需要全国各党各派间的互相让步与妥协，需要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这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所拥护与赞助的。其次，这种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也不是等于对于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有组织的与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力量放弃领导。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最后这些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同时本党也决不因为今天的让步，而承认过去十年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努力是白费了的或错误的。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取消人民权利，屠杀革命群众，使中华民族暗无天日，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扫地以尽的情况之下，本党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只有这一方针，才把国民党所抛弃的民族与民主革命旗帜高举了起来，才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及中国一切革命先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因为只有这一方针，本党才能继续动员群众，团集革命力量，创造中国革命的新的核心——苏维埃与

红军，也只有这一方针，才把中国民族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与战士，保存了并锻炼了他们，才使中国革命的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中央能够继续去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正因为这一方针，所以今天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并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这样深入人心，在群众中发生了深切的信仰与伟大的力量。本党同志过去的牺牲奋斗，决不是徒然的。正是他们的热血与奋斗，创造出了中华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然而本党决不自骄自傲。在目前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使联合全民族的力量成为可能时，使国共两党的合作成为必要时，本党毫不迟疑的向着我们十年斗争的对手，伸出友谊的手，这只是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乃至怀念于过去仇恨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处处以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三中全会及其最近的实际行动，表示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与国民党爱国分子的压力下面，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了一些善意的愿望，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的，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虽是这些态度在极端转移动摇，高慢自大，与对本党造谣诬蔑的措辞之下掩盖着。一切这些，证明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开始的转变。这种转变证明本党过去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的估计，及本党年来所采取的联合南京及蒋介石共同抗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切这些也证明全国人民在本党号召之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逼迫与要求他们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改取新的救亡图存的政策，已开始发生了效力。我们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开始的转变，是表示欢迎的。为表

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公开声明，像过去大革命时代一样，我们愿意坚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胜利，即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的胜利，同国民党共同奋斗，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国共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得到了人民的信仰，而发动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也曾经因国共分裂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仰，造成了革命的失败。目前则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全国人民与国民党多数党员重复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再行整顿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实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乃是完全适合中国革命客观历史行程的光荣事业。

然而应当着重指出，国民党现时的这种转变，还是非常不够的，非常迟缓与非常含糊的，还不过是在转变的开始。从这种开始转变到彻底的转变，从现在到全国抗战的发动，还需要战胜各种障碍与阻力，动员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才能达到目的。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时期，一个需要紧张全党的精神，整齐全党的队伍，以争取抗战发动与胜利的时期。

目前的时局，要求本党全体同志的最大的坚持性与忍耐性，只有本党全体同志的坚持的工作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才能争取与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发动，胜利是不会自然到来的，空喊也是无用的。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彻底转变，以及全民族牺牲一切参加抗战的决心，也不是一天所得达到的。这就要求我党全体同志以最大的忍耐性，同一切急躁症与轻举妄动的倾向作斗争。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

作的结果，而决不是它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是一个持久的战争。

为完成目前阶段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但我党同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他不但有着世界最侵略最野蛮德意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援助，有着全副武装的侵略军队，而且他经常采取各种麻醉愚弄欺骗与恐吓利诱的不同方法，来达到他灭亡中国的目的。尤其重要的，他善于利用中国的汉奸与亲日派，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最毒阴谋。他更会利用世界法西斯主义的警犬的托洛斯基派，来捣乱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些法西斯主义的警犬，今天正在公开的或秘密的，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依靠汉奸，依靠中国各种黑暗势力，以至依靠国民党内一部分不觉悟的当权分子，进行着一切违犯中国民族利益的肮脏事业。他们在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高举着“剿共”旗帜，赞扬武力解决国内的分歧，破坏国共合作，离间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企图组织中国内部的“防共统一战线”以灭亡中国。

全党同志对于日寇汉奸亲日派，托洛斯基派的阴谋活动，必须有最高度的警觉性与严密的戒备，对于他们一切挑拨内战利用国内矛盾以达到掠夺目的的阴谋诡计，必须坚决揭发，给以致命的打击。不论他们在任何好听的名词之下，不论什么集团，凡足以破坏我们团结内部共赴国难的企图，必须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

当然，除了中日两国主要矛盾之外，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

存在着。阶级间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而且正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还仅在开始，而且非常迟缓，所以这些矛盾还是有相当的尖锐，我们的任务不是用强力去消灭一切矛盾，这些矛盾是无法消灭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解决，而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解决国内矛盾的尺度。

中央认为国民党开放全国党禁，发展民主运动，在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上说，在适当解决中国内部矛盾上说，都是必要的方法，因为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民气乃能发扬，敌人才能战胜。也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才能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适当的解决，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应该指出：目前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迫切地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也只有为了这一目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才能顺利的发展起来，以至走到彻底的胜利。把民主与抗日分开或成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应该指出：中国的和平统一，也只有在御侮救亡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为了巩固和平，并以和平方法取得进一步的统一，又必须经过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才能达到目的，民国二十余年的历史，不但证明用内战统一中国的不可能，而且也证明用独裁统一中国的破产。只有吸收广大的人民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当权的政党与政府才有所依靠，以破除国内封建割据的局面，而取得最后的真正的和平，以抵御外寇的侵略，而取得外

交与抗战的胜利。也只有全国人民的参与国家大事，才能使少数野心家独裁专制的企图失其根据，而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得以产生，并将他放在巩固的基础上。

国内外形势紧急到了极点。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十五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抗战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为了唤醒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依照目前的情况，提出能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切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纲领。并为这些纲领的具体实施而奋斗。这种纲领的具体实施，不但不妨碍争取民族革命胜利的最高利益，而目标为了这个利益，这些纲领的实施，成为迫切的需要。本党反对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正是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但本党认为他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只有这种改善才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的开展。

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以最大的政治警觉性，严密的去注意全世界与全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狭窄的局部的观点与事务主义中间解放出来。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党同志学习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去细心的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提出适当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慎重的正确的解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要记住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这样正确的去领导目前的革命运动，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每一错误常能给革命以损失。大的错误可引到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我们不能一刻忘记的。为使革命胜利的前进，我党同志，应该了解他们自己所负担的责任之重大。在理论与实际斗争中努力学习，使自己能够胜利的愉快的完成当前的任务。

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彻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评转变到批评的武器，从革命战争转到民主的与合法的运动，从同国民党政府对立转到同他们合作。我们还使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同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适当配合起来，使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求得辩证的一致。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在旧形式中灌输新内容，旧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这种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的研究学习与创造，今天成为展开党的全部工作的需要关键。这里，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很细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去接受每一个教训与经验，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关于领导群众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方式与方法的恶劣传统，同时又必须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只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方能保持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的不同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在党取得半公开以至公开的可能时，这些条件更有充分实现的可能，但不论在何种环境之下，这些条件的实现，决不能违反于党的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决不能使党的铁的纪律有丝毫的松懈。在目前形势下党内铁的纪律，比无论什么时候都重要。同时更应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加倍努力扩大

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的与坚固的堡垒。

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最后依靠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 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

张 闻 天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内战的停止，结束了从华北事变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种局面的取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党的新政策的正确性。

二、二月十日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决不能解释为“共产党的投降”。因为我们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一）只是本党两年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发展的必然结论；（二）并不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并不放弃党对军队与政府的领导；（三）相反的，正是为了争取共产党在全国的公开活动。因此，本党的这种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三、决不能因为今天的改变，而认为过去十年来本党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的，就是这一路线的坚决执行使我们：（一）继承了并发扬了过去民族革命的光荣的传统；（二）继续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

* 这是张闻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所致开幕词的提纲。

(三) 创造了苏维埃与红军——中国革命的核心；(四) 保存了与锻炼了领导的干部与领导的机关。

这是十年来的伟大收获与成绩。这些收获与成绩，首先是我党同志的努力奋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造成的。纪念在各条战线上英勇牺牲了的战士、我们的最忠实的同志、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许白昊、赵世炎、罗亦农、王一飞、郭亮、夏明翰、彭湃、杨殷、颜昌颐、张太雷、苏兆征、王荷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女)、刘华、汪寿华、方志敏、沈泽民、何叔衡、赵博生、董振堂、黄公略、黄甦、刘畴西、寻淮洲、唐在刚、陈寿昌、徐彦刚、林瑞笙、高咏生、严图阁、刘伯坚、贺昌、陈阿金、孙小保、傅维钰、黄励(女)、韦拔群、夏曦、陈香波、崔琪、鲁易、汤慕禹、朱勉之、谢子长、刘志丹、杨琪、杨森、刘天章、蔡申熙、王平章、甘济时、吴焕先、孙玉清等！纪念在国民党区域内，在苏维埃革命战争中，在满洲抗日战争中，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一切牺牲了的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们！对一切活着的残废了的我们的同志，以及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监狱中受着磨难的成千成万的同志们，大会向他们致最热烈的慰问与敬意。

四、正是过去十年来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本党今天：(一) 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有这样崇高的信仰，为他们所爱戴；(二) 有资格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始者与组织者，并成为其中的先锋与坚强的核心；(三) 能够有阵地的前进，并且开辟了光明的前途。我们同志的努力不是徒然的。烈士们的鲜血不是白流的。没有过去，我们就不能有今天。

五、我们丝毫也不用否认，在这十年中，中央也曾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六次大会后，中央曾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四

中全会到现在，虽是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般的执行了国际⁽¹⁾的路线，但是在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在国内战争中曾经犯过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对新发生的阶级力量的某些变动不能及时的认识与利用，对中国革命的持久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及干部政策中有过某些错误等。在地方党中间也曾经发生过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与错误，甚至还产生过张国焘同志那种反党反中央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路线错误。但是在国际路线的指导之下，我们的党终能战胜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了自己的各种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与锻炼了自己。本党今天的收获与成绩，就是本党在反对各种倾向与错误中得来的，这就是本党的伟大处，也就是本党能够不断前进的基本原因。应该承认，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本党是坚强了与进步了。这使本党更有信心去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

六、自内战结束后，革命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白区党的工作薄弱，是我党目前最大的弱点。国内和平之后，战争的最前线已经从苏区转移到白区了。我们应该：（一）细心的总结几年来特别是二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此来重新教育与培养坚强的干部；（二）抓住抗日救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一环，善于利用国民党每一允诺、每一合法的口号，提出积极的主张，组织群众，把运动推向前进；（三）恢复、整理、重新建立各地党的组织，加强已有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四）克服对于目前发展形势怀疑动摇与悲观失望的情绪。大会对于现在白区艰苦奋斗着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七、为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我们还需要十倍的努力，去完成下列任务：（一）文化教育工作的加强；（二）群众生活的改善；（三）群众组织的改造；（四）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五）同一切汉奸卖国贼的破坏捣乱、阴谋、暗算做坚决斗争，以肃清心腹之患；（六）善于利用同外面的各种关系，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扩大特区的影响。

八、红军必须成为模范的抗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的核心。这需要：（一）加强与保障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加强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三）增进与改善红军在友军中与居民中的工作；（四）同红军中发生的太平观念和享乐腐化倾向做斗争，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一切固有特长与光荣传统。

九、一切上述的任务，只有存在着坚强的党的领导时，才能完成。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这就必须：（一）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工作作风，为共产国际的路线奋斗；（二）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适合于白区与苏区的不同的条件）；（三）彻底转变党的工作方式与群众工作方式；（四）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团结忠实于党、同群众有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能遵守纪律的干部（“干部决定一切”）；（五）同关门主义与增长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肃清国焘路线。

十、只有实现上述任务，共产党才能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自己的领导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应该看到，在我们的面前，磨难与阻力还是很多。首先我们必须集中全力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中国的汉奸、卖国贼、亲日派与托洛茨基派。其次，在民族营垒内部的斗争，还是继续着。内战

停止，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消灭。阶级斗争将采取更复杂、更曲折的形式。阶级的敌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²⁾，将利用一切方法（欺骗、阴谋、诡计、捣乱、破坏、暗杀、侦探、金钱的收买、妇女的诱惑、利用落后意识——家庭观念等）来孤立我们，削弱我们，战胜我们，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只有我们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善于依靠群众与领导群众，善于使用一切斗争形式，发扬我党十五年来艰苦奋斗、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光荣传统与模范作用，我们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与阻力，取得与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只有取得这一领导权，才能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革命不是失败，而是继续前进。所以新的形势不但不减轻，而且加强了我们的领导责任，不但不放松，而且更应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治警觉性。任何的疏忽与错误，会使革命受到挫折，以致失败。

十一、在中共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过去与将来。我们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已经奋斗了十五年，曾经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的英勇气概，艰苦奋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创造了可歌可泣的空前的事业与传奇一般的光荣的历史。这证明，本党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本党的存在与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得到可靠的保证。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离开我们的目的还是很远。我们需要足够的忍耐力与坚持性，积蓄雄厚的力量准备持久战，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是能够胜利的。这就是我们代表会议的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共产国际。

〔2〕这里是指尚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那一部分大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毛 泽 东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

(一)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 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

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國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两广事变，绥远战争和绥绥运动，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

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七）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

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八）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

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一〇）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一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

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 Q主义和恶意的污蔑。

（一二）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1〕}。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

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一三）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

命的前进。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确的。

（一四）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领导责任

(一六) 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2]，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一七)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

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一八）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一九）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

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二〇) 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同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但并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

〔2〕这里是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所造成的情况。

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

朱 德

听了洛甫、泽东^{〔1〕}同志的报告，很同意。我现在讲讲红军新阶段的任务问题。新的阶段是从旧的阶段来的。红军过去的英勇斗争是影响很大的。从前中国革命没有很好的革命军队，使革命经常流产。大革命时，中国革命党有了一种觉悟：没有革命的军队，便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那时候，国民党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开办黄埔军校，改造了军队。我们共产党人也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团^{〔2〕}，创造了革命的光荣历史。但不久，因为资产阶级叛变，我们没有克服它，革命军终于没有造成。我们党后来领导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红军便光荣地产生了。还逐渐成立了游击队，与红军相配合，我们从敌人手中夺来武器，击溃了敌人。那是我们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最有成绩的时期。在军阀混战环境中，我们由各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我们主要的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共产党是红军的创造者、组织者、领导者。因此，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进步很大。这个时期，我们的给养补充靠打敌人。很多同志都高兴打敌人。在这时，曾

* 这是朱德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执行了立三路线，红军是受了些损失，但力量是集中了。在红军中很快克服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以后又经历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我们从斗争中得到伟大胜利并锻炼了自己，力量增强了，建立了正规的红军，统一指挥，集中一致，是很有纪律的。这个时期，是我们胜利的时期，胜利的原因是红军英勇，领导方面正确。讲究战略与战术，打了很多胜仗。我们在全苏大会时，已缴获敌人枪支十八万支。到五次反“围剿”，犯了保守主义错误，打消耗战是不对的，但敌人被消灭的还是不少，群众对我们很拥护。红军在苏区成了模范。苏区现在虽已变成了游击区，但红军在群众中还是榜样。

在这期间，抗日运动有了发展。五次反“围剿”以后，我们退出了中央苏区，经过长征的战斗，到了这抗日前线区域。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我们党是有基础的，红军的精神是从古至今都没有的，它能战胜敌军大部队追击，各省军队的堵截，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各种天险，能克服一切。我们虽有掉队落伍的，但他们还在各地组织支部。在这中间，假设同四方面军会合后，能顺利地北上，那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是红军新阶段。有些人以为我们是被打得投降了，这是不懂事的人。我们红军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对历史上的成绩，应有足够的估计。新阶段的到来，就是由十年的艰苦奋斗得来的。

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统一战线的建立，经过了很久的工作，起先还是一

边打一边讲，最后经过了山城堡的战斗，我们只用了十三个连打垮了敌人的一个师。于是，它才知道红军的力量是很大的，才结束了十年来的内战，经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达到新的阶段。

新阶段问题。

第一，在新阶段，敌人是日本侵略军，以前的反对者变成了抗日友军。我们红军要发展，还要得到白区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应注意到这一成分问题。

第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党中央要领导全国革命，因此，特别加重了红军中共产党员的责任。在组织上，会有些变动，但党的领导更重要了，因此，更要加强党的领导工作。

第三，提高军事技术，加强军事教育。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备期中，我们要学会使用。飞机、大炮是会有有的，不要等待那时才学习。要训练摩托人才，输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红军中去。只有这样，才有把握提高新的军事技术，来战胜敌人。

第四，政治教育，要把打土豪问题转移到打日本侵略军上来。红军应成为工农的学校，以后扩大百个师，抗日军及游击队都需要有成千成万的干部，白区要多派人来。

第五，反对不良倾向。反对国焘路线首先要反对军阀主义，不能以军治党。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去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使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另外，要反对右倾，只讲漂亮话、太平观念、谈恋爱等都应反对。

第六，红军要做抗日军的模范。在一切工作中做模范，发挥抗日先锋的作用，影响全国军队都上抗日前线。另外，对于

红军死难烈士家属、伤病员，要慰劳他们、救济他们、表扬他们；对残废的与有功的要奖励他们。这是我的建议。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即张闻天、毛泽东。

〔2〕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 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

刘 少 奇

同志们：

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同意的，我只说以下两个问题。

—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目前挽救中国、解放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两年来，全党执行这一政策，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了，国内政治已经相当地向我们所指示的方向转变，向民主与抗战的方面转变。党的政治影响在全国群众中迅速增长着，而且党在组织上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这证明，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民国成立以来的二十六个年头，中国是经常有内战的，没有国内和平的。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是民国历史上一件

* 这是刘少奇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最重大的事情，是中国的一个极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了。我们不应该小视这一个事件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用一切力量进一步巩固国内和平。

和平为什么能够实现？基本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企图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同时由于：（一）资产阶级的转向抗日；（二）英美法等国改变了分裂中国的政策；（三）人民大众要求和平与反对内战的强有力的运动；（四）最重要的，还是我党与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以及红军力量的强大。很明白，我党如果不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去领导群众运动，如果在西安事变中采取错误的政策，那末，国内和平至今是不能实现的。

和平在今天虽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总还在想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和平仍有被破坏的可能。所以有人提到怎样巩固国内和平问题时，我们的回答是实现民主、排除亲日派和对日抗战。没有民主与对日抗战，国内和平是不能巩固的，是不能长期保持的。

国内和平的实现，民主政治的实行，将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统一。我们当然赞成中国的统一，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要的条件之一。但是统一中国的途径与方法，我们与蒋介石之间是不同的。蒋介石原来是企图用武力讨伐和阴谋的政治手腕，排除与消灭一切异己势力，建立自己的独裁，来统一中国。而我们则主张联合与实行统一的民主制度，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统一。照蒋介石原来的办法，中国是不能统一的，甚至和平也不能保持。只有我们的办法才是目前统一中国的唯一途径。

南京中央政府如果不能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人民参与政治，而要求各地方实力派将政权、军队、地盘、财政交

给蒋介石支配，这显然是困难的。蒋介石如用强力和阴谋来这样做，不是采用光明正大的民主的方法去统一，那就是和平的破坏和中国的分裂，就会将某些军阀推到日本怀里，封建割据势力就会在这一点上来反蒋与割据。

蒋介石本来要消灭红军，消灭各派，建立独裁，统一中国。但因为日本的进攻，以及各方面的客观情形，使蒋介石不能继续这样做了。蒋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降日，二是抗日。现状不能维持。蒋现在是走向第二条路，虽然是违反他原来意志的。蒋介石武力消灭红军和各派的政策，暂时放弃了。但蒋介石还是继续采用阴谋、挑拨、收买、威胁等方式，即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削弱与瓦解红军和各派。

我们应该要求南京政府实行民主，同时要求各地方势力实行民主。要在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条件下，联合各地方势力推动南京政府实行民主。我们不能放弃对各地方势力的工作。在目前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各地方势力的反蒋要求，因为这是帮助日本的；同时，我们也不赞成蒋介石在非民主的原则下排除、瓦解各地方势力的要求，因为这也是帮助日本的。我们要批评各派的反蒋，同时还要批评蒋介石分裂、瓦解、消灭东北军西北军及各派的阴谋，因为这都是于和平团结有害的。

我们有些同志将就各派反蒋的要求，是错的。但对蒋介石非民主的倾向及排除异己的阴谋不采取各种形式的批评，也是不对的。

依照蒋介石原来的意志，不论在任何情形下，是不会不企图削弱、消灭我们的。仅仅根据这一点来看，国内和平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国内和平的保障，并不在这里，而在下列的客观事实：（一）日本的进攻不会停止；（二）红军力量的强大，

及其在任何情形下不松懈自己的战斗情绪和对于蒋介石这个老奸巨滑的同盟者之谨慎的应付；（三）全国人民、军队强烈地同情红军和我党，并强有力地反对内战；（四）各帝国主义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本、亲日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上述客观情势下，国内和平是有相当保障的。如果再加上我们在各方面正确的政策与有效的工作，民主的实行，和平就可巩固。如果我们不看客观情形，只看蒋介石个人原有消灭我们的意志，那我们就会悲观；如果我们不估计到蒋介石还采用改良主义来孤立与破坏我们，那我们就会松懈自己的戒备，这两种倾向都是危险的。

红军与苏区的戒备，比过去不独不应松懈，而且应加强。因为反革命从内部外部阴谋破坏红军与苏区的可能性更加扩大了。

党中央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作了某种限度内的退让，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这样，大大便利了我们在白区群众中的工作。在西安军事上所作的退让，是向日本、亲日派以及反共顽固分子政治上的严重进攻。因为我党在西安事变中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推动中国向前进了一大步。

有同志提出怎样在全国争取民主的问题，这自然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必须详细地讨论。争取民主的根本问题是立宪与国民大会的问题。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必须进行各种个别的立法运动，如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立法等。每一个关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具体要求，我们都必须加以注意。而苏区则应是实行民主的模范。

有同志说，民主要求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这不对。民主要求，特别是各种具体的民主要求，农民要土地，工人要改良生活，都是能动员广大群众的。在目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民

主、抗日，我们应使群众了解民主的重要性及民主与抗日二者之间的联系。

二

目前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内容和条件是怎样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和努力的方向。

如果历史事件可以比较的话，那末，现在的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同一九二七年前前的国共合作相比，不同的地方如下：

（一）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有一九二七年前合作的经验以及十年内战的经验。

（二）一九二七年前民族危机不如现在严重，联合战线主要是反对北洋军阀，而现在则将是直接对外作战了。

（三）一九二七年前世界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反对中国革命，而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已不一致了。英美法相当赞助中国抗日。国际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斗争的胜负，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

（四）一九二七年前是党内合作的形式，而现在是党外合作了。

（五）国民党今天已经有了全国的政权，但内部是更不一致的。国民党十年来的反动在全国群众中种下了极恶劣的影响。

（六）共产党有了大革命的经验，有了很高的政治水平，有了苏区和红军，有了十年苏维埃运动在全国群众中的影响，虽然党的重要干部有很多牺牲。

(七) 苏联的强大，世界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上列七项，就是今后国共合作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领导权就是要在这些条件下来争取。这些条件总合起来看，对于我党，对于无产阶级并没有变得不利，虽然国民党已有全国的政权和庞大的军队，并有英美等国的援助等优越条件。

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和前途怎样？这就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日战争必然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合作阶段中的中心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极优越的条件来获取最后的胜利。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领导中国走第三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要走到殖民地的。要战胜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对一切忽视这个问题的倾向，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懈怠，必须给以坚决的批评。

共产党如何来争取领导权呢？毛主席已正确地提出了四项原则⁽¹⁾。具体地来说，我们就要分析国共合作的具体条件，并善于运用这些条件，克服自己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利用对方的弱点，并避开与削弱对方的优点。

我们的方针是孤立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也企图孤立我们。斗争是复杂的，而且是残酷的，只是暂时不拿起武器而已。

我们清楚估计了上述七项条件，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努力。除毛主席提出的四项原则以外，我认为下列具体问题也应提出：

第一，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是有经验的，因此，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工作必须十分艺术。我们应该完全抛弃虚浮、夸大、空谈的作风，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

第二，统一战线免不了“纵横捭阖”。要对付国民党各方面的阴谋，我们的许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应该善于灵活接近各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不是将自己放在保险箱里保持纯洁，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

第三，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红军要成为干部学校，要采用个别退伍的方法为全国白区准备军事干部，并使苏区“全国皆兵”。大革命的经验，要立即从新研究与整理好，来教育我们同志。

第四，在党内与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策略的决定要更多地估计到国际形势，因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问题决定的因素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了。要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第五，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以上是几项具体工作。毛主席提出的四项原则，是更基本的。此外，如壮大红军与发挥特区的模范作用，共产党的发展与巩固，广大地组织群众，影响国民党的军队，都是很重要的。每个同志坚定正确地照这样去工作，结果一定是我们的胜

利，民主共和国就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否则，革命的再一次失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四项原则。其内容是：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第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和 平 问 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①，南京更动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

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²⁾，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央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误的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对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虑？然而究竟还不是这

样；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

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⁸⁾，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 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当时已开始实现的中国国内和平和正在逐渐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加紧准备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表面上对国民党当局暂时采取了和缓姿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曾两次唆使伪蒙古军政府发表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集中军力进攻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宣称同国民党军队停止作战。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外相佐藤尚武诡称要调整中日两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日本财阀儿玉谦次等还组织了所谓“经济考察团”来华，诡称要协助中国建成现代国家。所谓“佐藤外交”和“日本后退”，就是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骗人的阴谋。

〔2〕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军驻在潼关以东，准备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某些号称“左”倾的人们（张国焘是其中之一），主张“打出潼关去”，向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这种主张是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相反的。

〔3〕这里所说的分歧，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党中央路线和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使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新的一致，标志着这个分歧已经解决。至于后来张国焘公开叛党，堕落为反革命，那已不是领导路线上的问题，而只是个人的叛变行动了。

苏区党代表会议 组织问题报告提要*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

秦 邦 宪

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苏区的转变到民主共和制度与苏区党的工作适应于新的条件的改造。

一、新的形势与苏区党的任务

(一) 国内政治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动。新的形势的特点，就是连续九年的国内战争的停止。自八一宣言后，我们党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争取国内和平，争取实现创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的斗争，基本上说来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目前的情况正在转入斗争的新阶段，争取国共重新合作，争取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在这个基础上迅速与切实的准备以统一的民族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有加无已的日本侵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争取国内民主制度的实现与这密切的联结在一起，它成了新阶段的重要的一环。我

* 这是秦邦宪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们进入了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新阶段。

（二）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的血战中，产生与巩固起来的工农红军与苏维埃区域，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民众革命之最伟大的成果，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悠久伟大的过去及光明灿烂的未来。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我们党的革命的方针与路线的正确性。新的国内的政治情势的到来，不是偶然的，而正是我党及工农红军英勇艰苦的奋斗的结果。

（三）新的政治形势，根本地变化了苏区之政治的环境和政治生活。这种变化的实质就在：（1）从国内战争的不断的武装斗争的环境转变到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争取实现全国的民主共和制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2）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制度，转变到普通的民主共和制度。

（四）在这个新形势下，党在目前苏区中的基本的任务：就在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我们党应该把自己在政治上获得领导影响的区域创立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政治与军事准备及动员的模范区域，成为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模范的区域。这是争取抗日战争及目前革命阶段上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完成这样的任务时，我陕北地区有它的弱点（贫瘠，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战争的破坏等等），然而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的优点（群众革命斗争的丰富的经验，共产党的巨大的影响等等），这些优点帮助我们能够胜利的完成这个重大的光荣的任务。为着完成这个任务，苏区的党必须：（1）彻底地实施民主共和制度并保证在这个实施之中我们党的领导作用。（2）提高工农红军到新的阶段，以战胜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为目标而

提高军事政治的训练教育到新的阶段。(3) 大大的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的水平。特区人民应该成为识字的、智识丰富的文化的人民。(4) 恢复与发展苏区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五) 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党的工作的环境是更加复杂化了，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提高了，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及苏区人民面前的责任是更加重大了。因之，我们党的政治与组织工作就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线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的工作的质量好多倍的提高，要求我们党的工作方式、方法、组织形式有适应新的形势的改造。而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重大的弱点的存在，更使这种改造成为极端重要与迫切的了。无疑地苏区的党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基本地完成了放在自己面前的政治的与组织的任务；然而，工作中的弱点与缺陷还是不少的，而这种弱点与缺陷在新的形势下，是更加显著与不可忍耐了，旧的工作方式、习惯、组织形式等等的不能适应新的条件亦越加显明了。党的全部工作必须有适应于新的历史情况的改造。

二、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及党对国家 政权机关与群众组织之领导

(六) 从苏维埃制度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必须依照下列的方向实现：

A. 实现彻底的民主的选举制度及议会政治。特区及县应设立议会，区乡设立区（乡）政代表会议，各该议会及代表会议均应依照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议会在任期终了后，应按期重行选举，议员应对各该选举区之选民

负责。

B. 实行一切行政机关由议会或代表会之选举制及对议会负责制。

C. 改善行政机构，使之合理化，使之有工作能力，使之适应于客观的需要。

D. 依照地理的经济的，人口的历史的条件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行政机关更接近地方人民。

E. 保证工农劳苦群众在革命斗争中所获得的利益。

F. 保证抗日武装力量之政治的坚决成分之纯洁及组织的灵活，发展工农抗日自卫武装的组织。

G. 保证人民应享受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同时丝毫不减弱反对人民公敌、汉奸奸细、敌探之社会保安工作。

（七）转变到民主共和制，更加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及抗日团体）的任务与作用。群众组织是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最重要的支持与依靠，他们是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联络桥梁，是党的政治影响的传达者，是人民政权的轮带。这个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应该重新着重地指出来，特别因为许多的群众组织的过分薄弱与工作的不能满意。一切群众的组织必须在他们本身的民主化的基础上，活跃他们的工作，经过每个组织本身的特有的任务的完成以吸收和动员群众来巩固民主共和的制度与人民政权。

（八）到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毫无疑问的，将更加提高群众的政治的积极性，而同时敌视我们的分子与人民公敌亦必然地要加紧他们活动，破坏，阴谋，捣乱。新的情势下，阶级斗争将在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中发展与尖锐化。因此，党应该以最高限度的积极性与政治警觉性来迎接与领导这个转变，以

高度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来发展人民的积极性，组织他们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与保证我们党对于特区政治生活的决定的领导作用。为此必须：（1）进行广大的政治宣传解释，向群众说明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安置民族统一战线之坚固的基础而转变到民主共和制度去的必要、意义和实质。（2）坚持地不倦怠地进行反对人民敌人的斗争，具体地揭露他们的每一个武断的煽惑，严厉反对他们的阴谋、破坏、捣乱和盗匪行为。（3）热烈地准备民主主义的改选运动，在每一个选举区，党应该准备选举的纲领，党的候选人的名单，并进行拥护党的候选人的群众的动员。对于非党的但是忠实于民族事业的人，我们不应排挤他，而应该和他合作。（4）文化教育工作在新的条件下带着极端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必须大大地把它加强起来。

（九）转变到民主的人民政权时，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应该更使他的工作的方式一切经过群众，公开于群众，受群众之监督。而对党对政权机关之领导必须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党对这些党员之领导应该表现在总的政治方面的指示及按期检查工作，不应干涉他们的日常事务，尤其不能代替他们。

三、在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领导

（十）新的政治形势，将红军提高到新的阶段，使他能够更加迅速地走上正规化的道路上去。现在的环境是：A. 红军面前放着新的敌人——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B. 红军面前的新的任务——团结与领导国内的其他武装力量去战胜这个敌人；C. 为建立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实行的番号、编

制……等等的改变；D. 抗战准备的时期中的国内和平的环境。这个时期的久暂，虽然极难预定，但我们必须努力利用这个时期。

（十一）在这些条件下，党对于军队的领导的基本任务：A. 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分，共产党的单一领导，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特点及传统。B. 从求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上来改善红军的技术装备，掌握新的技术，及适应于此的部队新的战术的训练。C. 加强部队中之有传统的政治训练教育，改变我们政治工作之内容、方法方式，以求适应于新的条件。D. 以红军的模范的例子来影响其他的军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集的核心。

（十二）为着实现上述的任务，A. 政治工作组织机构之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甲）实行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而以政治部主任作为政治的助手，在连队中以连副担任政治指导的职责。（乙）健全与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提高各级党委员会之作用与威信，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中的决定的骨干，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丙）在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它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丁）政治机关应该主要地为进行部队政治训练教育的机关，并保证部队中之政治坚定及工农的成分。B. 加强部队中之经常的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工作，这种政治教育工作和提高干部及战士之文化水平联结在一起。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红军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应该特别着重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成为有远大政治目光能够正确的判断国内和国际状况而独立和迅速地采取决心的人。C. 加强与系统化部队的军事技术与

战术的训练。

四、党内生活之民主化，工作方式 领导方式适合新条件的改造

(十三) 为着实现党面前的新的巨大的任务，要求苏区的党及每一个党员的工作的积极化、活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展党内的民主，而目前苏区党所处的客观条件，允许我们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所以苏区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这就是说：（1）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是选举出来的；（2）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向党员报告其工作；（3）下级服从上级；（4）少数服从多数铁的纪律），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实行的方法：A. 苏区一切的党的组织，从代表会议后，即行开始选举各级委员会。B. 限制指派的方法，仅能用之于薄弱的组织，为着加强其领导之必要而派往的人员，应该取得当地组织之同意。C. 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一切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全会之讨论和决定。D. 常委会应该是集体的工作。在严密的分工的和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之集体的讨论与决定。E. 各级委员会必须有系统地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保证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及地方问题，都经过积极分子的会议的讨论。F. 一切会议必须在事前的准备、会议的日程、文件、决案草案等等都应该在事先供给会议的参加者。G. 会议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但是在决议通过后必须严格的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内民主为着加强党的纪律，不是破坏它。

(十四) 加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内教育的加

强——特别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是苏区党的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思想上武装我们的干部使他们能够掌握列宁主义，能够明晰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坚定地实行党的正确的路线。为此必需：A. 建立党内的教育网（除中央党校外，省县区应按期开训练班；党的补习学校，新党员训练，及党员理论自习的帮助）；B. 加强与创立党报，各分省（分区）应该要自己的报纸，必须在支部中组织党报的阅读和讨论；C. 必须以出版适用的党内教育的课本与材料及准备教育训练的干部，当做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一等任务；D. 理论的训练教育，应该和革命的实际工作渗透一起，在实际工作的过程，在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的纠正中，个别地，具体地教育干部。

（十五）发展自我批评与提高革命的警觉性。新的环境，国内战争的停止，并不是说，阶级斗争消除了，太平无事了，民族统一战线可自流地到来，相反地，新的环境更使阶级斗争复杂化起来，敌人、汉奸将采取种种的方法来进行反对我们的斗争。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够解决民族统一战线是否能够巩固及我们能否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十分地提高我们的革命的警觉性，——特别地注意到那些口蜜腹剑的分子——首先是亲日汉奸的托洛茨基派。新的环境，亦更使我们必须迅速地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不使我们的弱点为这种两面派的凶恶的敌人所利用来反对我们。自我批评就是最好的工具，是推动党的前进的有力的工具。

（十六）新的形势要求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他应：A. 有计划的确定的中心的工作而坚持地努力地贯彻计划而奋斗，应该反对“凡事突击”，没有计划或放弃计划地寒热症的领导；B. 必须是分别的，具体的，灵活的作战性的领导——

而不是公式化的，不顾具体情形的一般化的领导；C. 民主与集体的领导——不是命令主义与包办的领导；D. 启发下级组织及党员的积极化与创造性的领导，而不是抑制与束缚下级组织或党员干涉一切的领导。

（十七）干部政策。苏区的以及全国的党的面前放着巨大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成千成万的干部来担负起这个任务的完成，正确的干部政策，在今天尤其是重要。这就是：A. 具体的了解干部，知道他的经历善长与弱点；B. 适当的分配干部，首先注意他的政治上是否忠实以及某项工作是否适合他的能力；C. 注意干部的成分的调节，提拔和群众有联系得到群众信仰的干部；D. 提高干部的责任心，经常的检查，赞扬其成绩，批评其错误弱点，在他们本身的成绩及错误弱点上教育与提高他们。

（十八）发展党和成分的调节。A. 在发展党的工作上，应该严守个别吸收的原则，应该成为一种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要反对把党的发展做一种运动式突击。B. 注意调节成分只吸收工农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对其他成分应该经过郑重的审查与延长候补期。C. 自首分子不能允许从新入党。消极脱离党的分子非经长期考查不能恢复党籍。

（十九）秘密工作。苏区与白区中间联结之日益密切，必须严格提出秘密工作的问题，首先是遵守党的秘密的问题。泄露党的秘密看做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二十）反对倾向的斗争。A. 新的环境使得敌视我们思想更容易影响我们，因此，反倾向的斗争应该加强起来；B. 但是反对倾向的斗争主要地应该教育的作用和性质，而不应该变为对不同意见的人的狂妄的组织办法；C. 党内派

别观点的肃清与防止发生，把一切问题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上。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毛泽东

韦尔斯问：关于国共两党最近的和平谈判如何？

毛泽东答：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则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关于军队之改编及苏维埃之改变诸具体工作，不久即将进行。至现在为止，国民党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够，如对上海救国领袖之起诉，对上海纱厂工人之待遇及对国民大会法规之种种限制，皆使人失望。

问：内战的危险已经完全消灭了吗？

答：内战的危机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内中仍然存在着，不过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现在说和平完全成功，会使群众对于“巩固和平”这一个运动表示松懈。目前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仍然没有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散在全国各处的红色部队停止战争，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我们现在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这些地方的进攻。至于南京

* 这是毛泽东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原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救国时报》。

与地方的对立，也是存在着，唯有实行彻底民主，才能完全消灭此种对立与内战的危机。

问：共产党对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样？

答：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的革命。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他们挣扎着，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到人民这边来。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谓亲日派，也存在于国民党中，他们为全国所不满，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也不满意他们，这部分人如不改变态度，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

问：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呢？

答：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是有开展的，国共两党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怀疑共产党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反对国共合作；至于“左”倾分子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也比较减少了。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迄未具体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致引起全国的不信任。我们说“大家应该工作”，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它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问：国内各党派对统一战线的反应如何？

答：汉奸除外，其他一切党派，对全国团结都是同情的。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

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¹⁾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问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问：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

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求得其适当的解决？

答：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但在抗日战争的面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因此在统一战线纲领中，我们提出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农民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压迫，起来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给以民主权利与改善其生活，始能减少其矛盾。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之。

问：你们为什么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

答：关于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我已经在别的机会中讲过

许多。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问：怎样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答：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唯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

问：共产党对此次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

答：今天的国民大会，带着国防性，同时是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因此全国应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是准备参加的。南京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则国民大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全国应联合要求南京修改其不正当的规定。国民大会的选举，应由人民参加，它的召集与开会，应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务应不限于谈宪法，而须扩展到彻底而具体的讨论抗日救亡的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大会的意见，已向全国发表，并向国民党提出，现在仍继续谈判，目的在使国民大会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务。

问：对释放政治犯问题，共产党的意见如何？

答：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共产党早已提出，现在继续要求，把它当作同国民党谈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彻底转变，则没有理由不释放政治犯；不过目前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口头上答应释放政治犯，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而且还有继续逮捕爱国犯的事件。苏州对救国领袖的审判，大失人望，南京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满意，南京要真诚表示它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马上释放救国七领袖，并宣告其无罪。

问：关于准备抗战问题，你有何意见？

答：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暂时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在准备侵略期间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我们就应利用此时机作积极准备抗战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问：中日战争的结局你怎样估计？

答：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

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存在的。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发生此种危险，中国人民如果继续睡觉，房子就会被敌人抢去。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我们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地反对中国殖民地化，要求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并且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与解放的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问：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样看法？

答：日本统治者与英国保守党政府正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进行着妥协谈判，以达到他们牺牲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不能听他人的宰割，中国人民应当严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动摇与消极，人民与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对它都是不能饶恕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英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错，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国欲维持现状，但现状的内容容易时刻变动着，这从“九一八”后英国的步步退让中可以看出。在基本上，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但是一时的、某些部分的妥协是可能的，因为英国本来随时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达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中国不能完全孤立，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在今

天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中苏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接近与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问：你对北方青年有怎样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的一环；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系、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

刘 少 奇

一 彻底的转变

同志们!

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执行一个彻底的转变。

为什么要转变呢?

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转动。反动了十年的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两个政权的对立取消，国内和平在基本上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极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般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在目前阶段中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提纲中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目前阶段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这是刘少奇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的口号，已经过去了。在今后我们主要的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并且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我们需要在全国进行一个广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的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

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的执行转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并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一切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然而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任务的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须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般转变。

所以，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转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前一种转变，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毛泽东提纲）。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式逻辑转到辩证法。因此，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全般

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斯大林同志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定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全党同志必须进行极艰苦的工作与学习，来完成这一个伟大的布尔塞维克的转变！

应该指出，这一个转变从前年十二月决议发表以后，在党内就开始了的。现在要问：我们在这上面已经做了什么？转变达到了何种程度？

一般说来，党的政治口号与政治宣传在各地大体上已经转变了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党的政治影响已经无限制的扩大了，取得了极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然而组织工作的转变，则极不令人满意。在平津及华北其他几个城市固然已经开始从一切具体工作中去进行转变，并且已经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华北党扩大了，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也一直是发展的扩大的，没有将我们的工作基础与工作条件弄得更坏，相反，开辟了今后工作比较顺利的基础与条件。但在其他地方，或者还只是部分的开始转变，或者还完全没有转变，过去的一套，还是系统的无数次的被采用着重复着。因此使得这些地方党与群众工作至今没有什么进展，或者使已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的群众，重复又弄到解体坍台，或者变成极狭小的秘密组织。

党与群众工作为什么至今没有全般的决定的转变？

它的原因是：（一）我们和许多同志在过去没有了解这个转变是两重性的，是一个极深入极艰苦的转变。过去我们只在党内提出，形势变更了，策略也须要变更，这是一个比较易为的任务；而没有提出转变十年来为全党所坚决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此，就没有使党内觉得有进行一个彻底与全般转变的必要，

使许多同志感觉他们过去在党与群众工作中所熟习的那一套，是错误的，是需要改变的，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还是自信的重复那一套。（二）我们没有尽量的彻底的具体的揭发与批评过去的恶劣传统，否定过去的原则，并且提出新的原则去代替，因此使得过去错误的原则，还是指导着我们同志的日常工作。此外，中央与各地党部的关系的不密切，也是转变迟缓的次要原因。

因为许多同志了解我们目前的转变，只是策略的转变，他们就只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满足。他们认为只要把过去的口号取消了，换上新的口号，他们就已经彻底转变了。再多一点转变，他们都认为是不需要的，因此他们口头上尽管千百遍的叫着统一战线，他们的实际工作又还是千百次的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如是，使我们提出的需要在每一个实际工作中具体执行的新策略，经过他们就变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的空谈。

因此，为了要彻底转变今后的党与群众工作，我们除了在同同志中解释目前环境的变动与新的策略任务外，还必须着重揭发与批评过去历史传统中的错误。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般工作的问题。从总的任务起，一直到每一个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止，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转变。这或者是由于要适应目前新的环境与任务，或者是由于过去本来就错了。

二 今后工作的目标与方针

我们今后一切工作总的方针与总的目标是什么呢？

自然我们一切工作的目标还是为了要准备党与群众雄厚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就是要使我党变成伟大群众的党，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这一个工作的总方针过去是

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是不变的。而且一切的转变，正是为了要更顺利的达到我们这个目标。但在过去是采取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来实现这个目标，而现在则采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过去准备力量，是为了暴动，为了推翻中国统治阶级的决胜斗争；而今后准备千百万群众的雄厚的力量，则是为了要建立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这是改变了的。

自从我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暴动政策以后，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目标，就不是为了准备暴动；只要中国的统治者不加入日德协定与侵略阵线，不订立防共协定与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不会重新采取暴动的方针。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方针是不断的加强无产阶级独立的力量，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

六次大会以来，准备暴动的方针，是对的。然而在今天已经不对了。过去的错误，不在于采取准备暴动的方针，而在于进行没有准备的暴动与盲动。没有了解准备暴动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过程，需要长期聚集群众雄厚的力量，而在许多小的罢工示威中采取了冒险与盲动的政策，消耗了我们准备起来的力量，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违反聚集力量与准备暴动的方针。

过去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黄色工会等，采取破坏的政策与方针，是对的。然而在今后已经不对了。今后我们应该采取争取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黄色工会的方针。我们应该到这些组织中去，加强这些组织及其中的抗日派，改组这些组织，推动这些组织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并巩固与扩大它们的群众基础，使其成为抗日战争与群众运动的领导机关。

除开在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统治的区域以外，我们对于国

民党政权及其军队在根本上不采取对立的政策。我们进行民主运动，领导群众运动，推动与督促国民党政权实行民主的改革与实行抗日，并批评他们的一切错误。但对于国民党中个别的亲日分子，投降日本，压迫民众，仍然应该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对于叛变民族革命的个别分子，仍然不应该拒绝采用武力对付的政策。

三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我们目前应该怎样来领导与扩大群众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呢？怎样来动员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运动呢？

最近全国各地的救国运动，同时就是群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也就是民主主义运动。这一个运动一年多来举行了很英勇而光荣的行动，产生了极广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国内和平与全国各实力派的联合，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华北国”及侵占绥远的企图。这一个运动至今还是坚持着、扩展着，在将来还要更有力的进行，那是无疑的。

群众的救国运动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很光荣的成绩，但在组织上所获得的成绩是还很少的，这是目前救国运动的主要缺点。在华北的救国会，组织上虽然有一些扩大，但在其他地方反而缩小或涣散了。一般的是文化界、学生界为它的主要群众基础。最广大的群众还没有参加。经常工作没有建立起来。

救国会为什么在组织上不能获得应有的成绩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国民党对它的禁止与打击，另一方面还由于下列的原因：（一）在它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关门主义，工作方式太狭小；（二）它所号召的游行大会等行动过多（如上海），或者还有些冒险的行动（如南京、温州等）；（三）它的

下层组织基础很弱。因为上述的缺点，使得许多地方的救国会还仅仅是一部分积极分子的组织，还没有在组织上成为各种群众的真正抗日统一战线。

为要使救国运动更广泛的进行，使救国会的群众基础很大的扩大，纠正上述各种缺点是必要的。同时必须：（一）努力建立自己的经常工作——如举办国难教育等；（二）设法使它的下层组织帮助各种群众本身组织的创立——如学生会、农民协会、工会、教育联合会等；（三）救国会的下层组织特别注意帮助群众解决切身的要求；（四）与各地方政府取得谅解，努力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五）在可能的情形下（如援绥运动）联合其他团体（如商会、教育会等）组织临时的或永久的带救国性质的委员会。

我们的同志应将上列各项拿到救国会中去提议。

在目前群众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并不限于救国会，也不应限于救国会。所有一切学生的、工人的、文化教育界的及其他各界，均应分别的在本身利益上，在民主要求上，在抗日救国上进行统一与联合的运动。各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应该活泼的采用。

如果在统一战线内部包括了各党各派，内部意见的分歧，是不能免的。这时，我们的党员应该：（一）忠实的执行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二）团结内部一切忠实执行共同纲领的积极分子；（三）对于每一重要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或者与积极分子共同提出；（四）对于其他各派的错误意见与错误行动实行批评；（五）拥护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我们的同志参加各派的统一战线，照上述各项去进行工作，就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争取领导权。

因为救国运动的发展，在一切群众一切团体组织中产生左

派及坚决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我们的同志在统一战线中、在一切组织中应该团结这些积极分子，并援助这些积极分子去担负领导工作。团结的形式尽可以活泼采用，尽可能在组织形式上不着痕迹。

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可能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我们应该促成国民党的改组，排除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加入。如此，国民党将变成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国民党不能改组时，我们也应该说服抗日的积极分子去加入国民党及其各派，形成国民党中的左派。

目前的救亡运动，同时就应该是民主运动。但过去救国运动中有严重的忽视争取民主的倾向，很少自觉的去为民主而斗争。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因此，我们要在救国运动中特别强调民主。如果群众对于民主的重要性还不了解，还不觉得民主对于抗日、对于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那我们就应该向群众详细解释，并在各种实际斗争中证明给群众看。

目前将到的国民大会与宪法，是民主运动中的基本问题，关联到每一个人的切身问题，我们必须号召群众来注意。在群众中进行讨论，提出要求，提出修改的意见，动员群众向南京请愿等。国民大会的选举我们必须参加竞选（如有可能），提出竞选的候选人与纲领进行宣传。同时我们必须动员群众来要求与提出各种个别的立法，并要求个别的民主权利等。

向国民党要求民主，同时在一团体、一切组织（如黄色工会及学校等）中，也应该要求民主，在一切救国团体中都应该扩大民主的范围。只有使广大的群众在各种组织中身受民主的训练，才能运用民主的权利。

四 党与群众的关系

为了要争取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我们必须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正确组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必须分别清楚，领导党与领导群众的方式根本不同，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实际的了解，那我们就不要去幻想组织与领导千百万群众。

党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呢？

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就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钦定，由于党在理论上的定义或决议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的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正确。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心愿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就必须我们经过长期艰苦而正确的争取群众的工作过程，才能达到。

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的接受党的政治主张。

我们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

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然后当我们是多数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服从我们的意见。

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

我们是以群众中之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并提出主张与办法，使群众自动接受，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与指挥群众。

这些是党员群众的正确的关系。然而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些。他要求群众服从他，而他可以不服从群众尊重群众。他以为群众领袖是可以自称的，是可以由党的决议任命的。他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取消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破坏群众团体的民主原则。这种错误，大大的妨害党去争取与组织广大群众。

另一种错误，是作群众的尾巴。当着群众的思想错误拒绝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悲观失望，表示无办法，不去坚持的艰苦的批评群众的错误，解释我们的主张，刻苦的去纠正群众的错误，反而接受群众的错误思想，及作错误思想的俘虏。

正确建立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我党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国民党侮辱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与压迫群众，而我们则与国民党相反，群众就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抛弃国民党人，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

五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该怎样联系呢？

这个问题实际就是秘密党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在各地的同志首先应该估计各地在各个时期的环境，依照这些估计来判断何种组织、何种工作、何种方式在当时当地是可以合法进行，何者只能半公开进行，又何者只能秘密进

行。我们还应该调查各地有哪些已经成立的合法团体，甚至是反动团体，甚至带政治性质的与群众有联系的机关（如乡民会议等），是可以派人去加入在里面工作的。只有这种估计与这种调查，我们才能正确确定当地到底有哪些公开可能的机会给我们利用，并使公开的与秘密的工作配合起来。过去我们完全不作这种估计，结果弄出极大极多的错误。

一般估计我们今后工作环境的可能变动。如果和平实现，国共合作成立，那我们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将有更大公开进行的可能，虽然在全国各地程度上并不会一致。有些地方，合法运动或将成我们的主要工作，另外一些地方或者只能半公开工作，或者公开活动的可能较少，秘密工作还是主要工作。至于在日本及汉奸亲日派统治区域，党的组织当然还是处在绝对秘密的环境中。我们估计这些可能的变动，我们要准备更大范围的去进行公开与半公开的活动，改组我们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互关系。然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还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取消这个问题甚至没有降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只要环境允许，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采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去进行斗争组织和工作。秘密的党它的工作没有全部公开进行的可能，只能部分的公开进行。那我们就应利用这种部分公开可能去工作。哪怕是一点半点公开机会，都是宝贵的。能够公开办一个补习学校，组织一个灰色团体，出版一个灰色杂志，我们都必须去利用。但是有人说：这种部分公开我们不要，必须全部公开我们才来。因为我们的党纲不能部分公开提出，他们过去就这样取消一切公开工作。

因着环境的变动，我们公开可能的机会，可以随之扩大或缩小。但我们的公开工作不要超过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以外

去。因为超过这样的限度，就要使我们原来公开的组织及公开进行的工作，转入半公开或秘密情况之下。一般说，所谓公开工作，就是能够合法进行的工作。非法的事是很难公开进行的。利用合法并不是合法主义。我们过去在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中，认为所有一切需要合法进行的工作都是所谓“合法主义”，要把公开的灰色团体、黄色工会等均转变为赤色工会（当环境不能允许时），使秘密的团体和人员去冒险公开，那是极错误的。

一般来说，群众工作是应当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而党内工作则应当秘密的来进行（如有可能也应部分的公开的进行）。但我们在党内工作的方法，绝不能拿到群众中去使用。我们在群众中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与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

在群众中公开工作的同志不能兼负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应当与秘密机关断绝关系，只与特别指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党的秘密文件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不要使敌人从公开工作的同志那里找到任何党的组织关系。

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不要登载公开群众团体的情况，不要使敌人从党的机关中找到任何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党与群众工作，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就是在于组织上混淆起来，方法上又完全重复着。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做；应该秘密进行的工作，又去冒险公开（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兼群众团体的职务等）。结果，使得应公开的不能公开，应秘密的不能秘密。如是党与群众工作都被破坏。

我们过去忽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没有在党内着重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极大的错误。列宁说：“假使布尔塞维克党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不能保持联合秘密的与公开的斗争形式之职责——不能负责参加最反动的国会，及受反动法律所限制的各种组织，那么他们在一九〇八——一九一四年间，就决不能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中坚，自然更谈不到巩固与发展”（“左派幼稚病”）。中国党的事实证明列宁的话是对的。过去我们在白区的组织不能保持——更谈不到巩固与发展。

在目前我们一方面应该动员群众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允许救国会的公开，允许各种非法团体的登记，允许言论、集会、罢工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利用各种灰色团体的名义去组织群众，加入各种已有的合法团体去进行工作。我们的同志在各种灰色的合法团体中应该忠实的为群众直接的要求而斗争，建立自己的信仰，争取群众，争取领导地位，但不要把~~这些团体~~转变成为所谓“赤色团体”，表面上还应保持它的灰色与合法。

在日本及汉奸统治区域，采用救国会等名义去组织群众是不适当的。在这些地方应以组织公开灰色团体及利用原有的合法团体为团结群众的主要方式。

六 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

为了准备党与群众雄厚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我们必须领导群众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目的，与群众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不同的。群众起来斗争，是为了达到当时他们直接的要求。但我们必须忠实的为达到群众直接的要求

而斗争，才能实现我们组织群众与提高群众觉悟的目的。

当着我们去准备群众起来斗争时，我们必须详细的估计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敌我力量的对比，敌我的优点与弱点，并应预测斗争的结果。斗争中可能发生的变动与危险等。只有这样去详细了解与估计之后，我们才能正确的决定群众斗争所应采取的策略。在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在发动群众斗争前，常常不经过这样谨慎的估计（时间上允许），盲目的发动斗争，是不对的。

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动员上去准备斗争，是为了要加强与巩固群众的力量，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准备好了之后，就应该慎重的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要选择于群众有利的时机来发动。如果时机于群众特别不利，就应该暂时避免斗争，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发动（如可以等的话）。过去我们反对这种暂时的必需的等待，是不对的。

如果斗争发动，一般的应该坚持，应当扩大斗争的阵线，提高斗争的阶段，应当击破敌人的各种进攻与破坏，应当从各方面去逼迫敌人在群众面前屈服，答应群众的要求；但是如果当时的形势坚持斗争于群众不利，那我们就应当设法在部分胜利的条件下，或在不损害群众与损害最少的条件下，结束斗争，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待下次斗争。如果要无条件的甚至无目的的坚持斗争到底，是不对的。

任何一次斗争都是要结束的。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依照客观与主观的情势，适时的结束斗争。因为斗争如果结束得不好，是可能前功尽弃的。

当着一个斗争过去之后，第二个斗争还没有到来的中间，在表面上似乎是休息的状态，在里面则是双方均在准备第二次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时机来加紧组织工作，加紧组织与配备自己的力量，以迎接第二次斗争。如果放松这样的时

机，很可能在第二次斗争时失败。

在一次斗争胜利后，群众中常有看轻敌人力量，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观念，而产生骄傲与疏忽的情绪。但敌人在大败后，则常警惕起来，加紧准备力量，相机反攻。在此时领导的人如果不注意，就常常被敌人暗算而失败。过去这种教训很多。

在一次斗争失败后，群众中常产生悲观的情绪，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而敌人则常在此时继续进攻。此时应该迅速收集群众保有的力量给敌人的进攻以抵抗，方能保有群众的阵地。

当进攻敌人时，应该慎重，应有准备，应估计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任务。但是当敌人向群众进攻时，在各种情形之下都应组织群众起来抵抗。

在斗争中应尽可能的争取自己的同盟者，应分别主要与次要的敌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裂敌人的力量，来取得自己的胜利。在过去我们同志常不知这样做。

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应当是当时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而且是在当时情况下所能达到的要求。一次斗争不能满足群众一切要求，解决群众一切问题，只能解决一部分。因此过去在斗争中提出一切基本要求的办法，对于群众不见得是有利的，有时反而有害。

斗争的手段，我们不应当拒绝采用合法手段，如交涉怠工等，请愿也不应完全拒绝。合法手段不能见效，当然就应采取非法手段斗争。过去我们反对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对的。虽然在过去非法的斗争手段常应是主要手段。

除开当时主要的公开的斗争手段以外，还应该采用其他各种辅助的手段去进行斗争——如造成社会舆论，采用隐蔽的、上层谈判的手段等。斗争的手段是很复杂；只要于群众有利，我们应采用各种手段去斗争。

要注意利用在合法的口号之下去进行斗争——如在请愿的口号下举行示威，在旅行与赈灾的口号下举行示威等。

还有在进攻的口号下实行防御，在防御的口号下实行进攻，也是可以采用的。有时并必须采用。不过战胜敌人主要是依靠群众真实的力量；经常企图用一种夸大的空谈去吓倒敌人是错误的，达不到目的的。

斗争的发动、坚决转变和结束，应尽可能的经过参加斗争的群众民主的决定。这对于团结群众有极大的作用。

各种重要的纪念节应该发动群众起来表示，而且应该利用纪念节的帮助，发动群众为各种要求而斗争。但采用何种形式来表示与斗争？以及是否要在纪念节那一天起来表示与斗争？就一定要看当时的环境是否对于群众有利来决定。如果对于任何纪念节都机械的要群众起来表示与斗争，都机械的要举行示威罢工，不顾环境，不估计自己的力量，那就是错误的，过去曾经有过许多这种错误。

对于群众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尽可能的去参加，给这些斗争的群众以帮助和领导。但我们不要放弃自己原来计划与经常工作，去追随自发斗争的尾巴跑。

在群众斗争中我们当然要用一切方法去获得与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但我们不应拒绝在群众中与有力量的各派来共同领导群众斗争，而且在斗争中要与各派合作，共同的为实现群众要求而斗争，如果这些派别不反对群众斗争的话。

在北方有些黄色工会的分子表示悔过，表示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但他们常常提出一些过左的口号来煽动群众。我们对于他们，一方面应赞成他们悔过，不拒绝联合他们来进行斗争；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随着他们跑，要在群众中批评他们过左的口号。

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一般的提出“打倒资本家”、“打倒豪绅地主”的口号。但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为了对付这些顽强的资本家与豪绅地主，应该发动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在这些群众斗争中，应该采取一切方法来分化地方政权机关与资本家豪绅地主之间的联络，要设法使政权机关不完全站在资本家与地主一方面来反对群众。

在群众斗争中我们不应该提出过高的当时不能实现的要求；即使群众有了雄厚力量，提出当时超过对方所能担负的要求，也是不好的。如果群众中自动提出过高的要求时，我们一方面应该向群众解释，同时我们要从其他可能的方面来满足群众的要求。

七 争取与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争取与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党最基本的任务。

但现在我们在工人中的组织基础与工人干部，实在太过于薄弱了。多年来我们除开在个别的部门中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外，我们没有任何成绩。因此，今后建立我们在工人中的工作，成为最重要最艰苦的任务。

目前提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全国各地去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人运动？虽然目前在客观上已经开始有了工人经济斗争的进攻形势。

如何开始呢？第一，我们要从最好的党员中特别是工人同志中，训练一批工人运动的干部，派遣这批干部去进行工人运动。第二，我们要在工业中心地区创办几个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周报。第三，我们要在可能的地方创办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并竭力利用原有的职工学校、民众学校等。

目前我们要以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作为动员工人的口号，但我们同时要在反日与民主要求的口号下去动员群众，并使这两种口号联系起来。

在国民大会与宪法问题上我们要尽量动员工人来进行劳动立法运动。要求修改工厂法、工会法，规定八小时工作，最低工资，工会权利，失业救济等，同时我们要动员工人来争取工厂法上有利条文的兑现，利用工会法来成立合法的工会。过去“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的口号，是错误的，是完全空谈。

对于黄色工会我们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在黄色工会中团结积极为抗日与工人利益而斗争的分子，争取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对于空招牌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利用这块招牌来组织工人。在各种无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如我们有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即应依照国民党与工会法所规定的手续成立新工会。黄色工会的自卫组织我们特别应进去工作，设法扩大其组织。

在工人中各种灰色的附属的组织，我们要去加入。并要设法成立这些组织，但必须完全公开的来进行，要使之包括多数群众，要满足加入这些组织的工人之原来的要求。

各学校中的教职员与各机关的职员，也是工钱劳动者，他们在生活上有很多要求，应该帮助他们成立工会性质的团体，为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斗争。

八 在农村工作中的任务

在农村中党与群众工作的转变最少。一年来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只在个别的方面有一些成绩。华北农村组织因暴动失败

与破坏，有些还在恢复的过程中。

在国共合作成立后，土地革命的口号暂时成为宣传口号。抗租抗税分粮的口号，也应暂时停止。目前我们在农村中的主要任务是为改良农民的生活而斗争，为团结千百万的农民而斗争。

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要在各地农村中，提出各阶层农民的切身要求。这些要求要依照各地农村的特殊情况来规定。但一般的应根据下列各项：

(一) 要求减租减税减捐。

(二) 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办理农村水利，及其他公益事业（如修渠，筑堤凿井，修塘，修桥补路等）。

(三) 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救济没有饭吃的穷人及老弱残废，办理平糶，办理积仓，及预防灾荒。

(四) 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办理低利或无利借贷，救济缺乏资本的农民。

(五) 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设立公共医药所，救济无钱生病的人，设立公共的阅报处及农村教育等。

(六) 在训练壮丁时，公家要帮助农民及其家庭的伙食。

(七) 增加雇工工资，改善雇工待遇。

(八) 免除或减少向农民派粮派草。

除开上述各条外，在全国还要进行农民的立法运动，联合全国各地农民提出下列要求：

(一) 要求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全国减租百分之二五，并承认佃农对于土地的永租权。

(二) 要求国民政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减低间接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三) 要求从国库中拿出钱来或发行公债，办理大规模的

水利。

（四）要求国家拿出钱来，大规模救济灾民难民。

（五）要求国家拨一大批款项，拿到农村去办理无利借贷。

（六）扩大并设立农业技术研究机关，改良种子、土地及技术，扫除害虫。

（七）要求颁布保护农村雇工的特别法令。

上列各项应广为宣传，并设法联合各地农民向南京政府提出，尤其在国民大会选举运动中要宣传。

农民的合作社对于农民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动员群众来组织及加入。

对于乡村一部分真无饭吃的赤贫的农民。应该从各方面去要求救济，经过乡长、区长、县长报灾请赈，向有钱人筹募赈款，或要求地方举办公共工程，出外逃荒等。

这些农民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去抢与偷，我们是不能赞成的。但当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分粮斗争，我们还是要领导。

用什么方式去组织农民呢？很好的方式还是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雇工工会等。但这种组织如果不能进行，则应采取各种可能与农民了解的方式去组织，同时利用乡村中原有的各种组织。

在乡村中原有的组织，如保甲、民团、壮丁队、联庄会、祠堂庙会、及管理地方各种公共事业的组织等，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种组织，并设法获取这些组织的领导地位。

我们在乡村中要动员群众要求民主，要求保甲长、乡区长、民团及各种会社均须经过当地人民选举，人民并可撤换这些人，要这些人按期要向人民报告工作账目等。

小学教员在乡村中的作用极大，我们要组织小学教员的团体。

在山西我们要利用牺牲救国同盟去组织农民，并为农民的切身要求斗争。

在山东我们要与乡村建设运动合作，参加进去，帮助他们，使他们真能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并改良农民生活。但同时我们还应批评他们的理论。对于平民教育促进运动，我们也要参加，并帮助他们。

关于土匪、哥老会、红枪会及各种迷信团体，我们当然可以去进行工作，但必须有完全忠实于党而不为他们所引诱的人去工作时才可以。如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要随便派人去工作。过去进行这些工作的成绩是很不好的。

九 广泛的组织青年

一年多来中国青年学生进行了极光荣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在这个运动中建立了一些地方的学生会，并形成了全国学生会的组织。北方的青年学生还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运动在全国是已有了不坏的基础。我们的同志，应该积极参与帮助青年学生运动，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加强他们的组织，并为青年学生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但过去的学生运动是还有下列缺点的：（一）对于学生本身利益的工作还太少，有的甚至完全没有；（二）学生本身的组织还很弱，许多还很狭小；（三）他们内部的分裂现象还没有克服，这虽然要由国民党青年来负责，但左派青年中过左的关门主义也加深了这种裂痕。这些弱点，我们同志应帮助他们来克服。

我们要在学生中提出下列的要求：（一）组织学生会的自由，思想自由，救国自由；（二）多给学生以实习教育，取消

或减少一些对学生无益的课程；（三）保障学生在毕业后的职业；（四）减少并改善中学的课程；（五）津贴穷苦的青年学生。

北方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现在基本上还是民族解放运动中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但在它的纲领和组织上，还欠缺广泛，在它的工作中还残留一些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残余，但它应该成为广泛的愿意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青年群众组织。应该以抗日救国，争取救国自由，进行救国教育为它的纲领，在组织上也不应拒绝各派青年及某些愿意服从纲领纪律的青年团体加入。但它还应该保持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同志应在他们中相机进行上述的提议。

青年中的文化、娱乐、教育和体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在青年中有系统的经常的来进行这些工作与组织。

各地基督教青年会我们必须去加入，进行救国的宣传组织并便利青年的救国工作。童子军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去进行。

各种青年团体在抗日救国目标下联合起来，是必要的，我们应设法促成。

各地热情抗日救国的青年，应该组织他们自己的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那样；但它的名称，它的组织形式，不必一样。关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特别应该组织起来。

关于儿童的工作，各地应给以注意，应该促成儿童幸福促进会等组织，为儿童的幸福与教育而斗争，并应吸引儿童来参加抗日宣传运动。

最近的妇女运动，是有一些成绩的。妇女群众已直接起来参加救国运动。我们应吸引更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抗日与民主的运动，在目前就应动员妇女来参加选举，提出改善妇女地位的要求等。

十 争取一切武装部队抗日

争取中国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今后在一切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方针，应该比过去不同。过去破坏这些部队，举行兵士暴动、哗变等，是对的，但今后的方针，则是争取这些部队抗日，巩固这些部队，加强并改造这些部队成为抗日军的劲旅。因此我们可以不在根本上和各部队的长官对立起来。

在最近各地群众救国运动还有与军队对立的倾向，这种情形应即速改变。应学习北平学生的经验，坚持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派遣代表慰问，并向二十九军请愿等，影响到整个军队抗日的情绪，并改变了他们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应该动员热情抗日的青年去加入各种部队，尤其是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并宣传抗日。

设法输送各种救国刊物到军队去，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军队中的附属组织如有可能，即应该成立。

党在军队中应成立极端秘密的组织，争取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甚至个别的上级军官）到党的影响之下来，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为改善士兵生活而斗争，要求军饷伙食公开，组织监督委员会，反对贪污人员等。这些是应该做的。一般的我们主张节省浪费，改善士兵生活。

十一 党的转变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及其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是唯一的保障。

（一）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的认真的发展党员。

在国共合作成立后，一方面固然给党以比较顺利发展和工作的条件，但同时资产阶级对于党内影响的可能，也大大的增长了。从内部来破坏党的可能，也增长了。为了保持党的独立、纯洁与一致，应当：（1）提高新党员入党的条件，新党员要经过候补期的考查（工人可不经过）；（2）加紧对于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3）提高党的纪律，扩大党内的民主；（4）慎重的选择党的干部；（5）加紧对右倾尾巴主义倾向的注意。上述入党条件在秘密的环境下的党，可以放宽一点。

在有些地方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应依靠一些基本的党员与干部去进行。这些党员与干部是绝对忠实于党的，是可信托的，绝不应该随便调动他们。

（二）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的分开。党内一切工作与组织状况，比以前更应秘密些，不应该使同志互相知道，尤其是公开工作的同志。

党的机关应当很小。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组织与官衔。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尤其与公开工作同志的关系，应很技术的建立起来。这是秘密工作中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事。这种很小的秘密领导机关，即使在公开环境下，都必须保存。如环境有更大公开可能，只是群众组织与公开流动的同志去公开即可。

我们对于党的秘密工作，要有远见，要坚持，要忍耐，不

能有丝毫的急躁病和疏忽。因为环境是变动的，今天觉得不要紧的事，但到明天也许就不行了。今天是要服从明天的。我们许多同志在过去就是没有远见，不能忍耐，害着不能容许的急躁病，过于疏忽。他们在今天甚至不估计到明天的情形，甚至不估计当时的环境去布置与进行工作，如公开征收党员、举行革命竞赛、进行突击运动、随便调动干部与改组党的组织等。我们以后不要随便再以“怕死”、“动摇”等话去批评同志，助长同志冒险的情绪。秘密机关中那种忙乱的状态，也是不能继续的。

在秘密环境下，我们的组织如发生问题，即应暂时停止工作，风声紧张时，人员即应暂时离开（如可能离开的话）。如果没有相当保障，一切工作都不要冒昧去进行。工作没有做好，不要紧，要紧的是机关无论如何不能破坏，我们应该特别小心。应建立巩固的秘密领导机关，虽经各种风浪，也不致动摇的。

对于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同志，应坚决执行纪律。

只要我们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得适当——秘密机关的工作井井有条，不疏忽，不乱来，那我们就能够对付奸细。现在奸细还要混入我党，我们除开特别小心考查外，主要的要使公开的与秘密的工作配合适宜，使奸细不能更大的损害我们。

（三）在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的民主，如领导机关多与同志通信，多征求同志对自己领导的意见，多取讨论的态度去实现指导等。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服从多数，服从

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的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的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党内的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是还严重的存在着的。这表示在不彻底从政治上原则上去解决一切问题，而采用组织手段与纪律去解决一切问题（有些人甚至离开纪律，就不解决任何问题），表示在领导方式上的过分机械与绝对。这是一种极不民主的习惯。一切问题要从政治上原则上去解决；只有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以后，组织手段与纪律的采用才是对的。纪律在党内是必要的，应提高——但要在最后的时候去采用。

提高纪律，是提高同志服从多数、服从组织的精神，而不是要指导机关经常用纪律去制裁同志。相反，指导机关制裁同志愈多，就愈加表示那里党内的纪律愈坏。

党有纪律，不表示在不许同志向党内发表不同意领导机关的主张，而表示在同志虽有不同的主张，还能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与执行领导机关的决定。

我们党正也因为有这样铁的纪律，才能使奸细很难破坏我们。惩办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帮助奸细的。

党的集体领导，也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广泛的吸收了全体同志的经验与好的意见，才算是真正的集体领导。

党的民主集中制与个人负责制是必须同时采用的。重要问题应该民主的决定，但工作的执行则应个人来负责。工作机关应该有工作的秩序与工作纪律。机关的首长应该督促与检查工作。

真正的民主精神，与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道德是不能分离的。自私自利，是与大公无私相反的。自高自大，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人，他要居人头上，而不肯居人下；他要求支配别人的特权，他自己不受别人支配；他可以随便批评打击辱骂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他；他要别人服从他的决议，他自己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决议；他认为别人破坏集中原则是犯纪律，他不承认他自己破坏民主原则也是犯纪律；他只图自己个人的发展，甚至为发展自己而去妨害别人的发展。这是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党内的残余，这是与民主精神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首先就要我们的干部在精神上有民主的修养，在形式上作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训练。过去党内的同志与干部怕说话，怕错误，不敢负责，这是在不民主的情况下造成的现象。过去我们主要的不是用说服与教育去推动同志工作，而是用斗争打击同志去推动下级工作。这不是民主的办法。这就使同志怕斗争，而不敢说不敢做。斗争只是对于那些坚持错误、不学习、不自觉的人，才是需要的，而且还是为了教育。

（四）过去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随便因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而撤销工作，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使许多同志，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发表出来，这就掩盖了同志中在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也就不能克服这种分歧；这样只能造成党内表面上的一致，妨害了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真正的一致；这样并不能减少同志与领导机关对立的现象，反而使这种对立加深加多。同志们就不会去帮助领导机关的领导，他们会挑领导的岔子。这样，无原则的斗争又有了基础。

表面看来没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并不是好的现象。

我们不要在思想斗争中去随便打击同志，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抹煞同志中原则上、政治上的分歧。相反，正是要使同志能够充分发表他的意见，以便真正的消灭这种分歧。大多数的分歧意见，用说服、用讨论是能消除的。

以后如因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意见而开除同志，应特别慎重。除非是他在组织上违犯纪律，不能纠正。

（五）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训练出大批的干部分配到各个战线上去，是党的中心工作。各地方要特别注意选择干部来受训练。

毛泽东同志在结论中提出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干部的标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并拿出全部忠心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且没有自私自利、英雄主义等毛病。我们每一个干部应当按照这样的标准来修养。

我们是要把现有的干部以及新干部提高到那样的标准，这需要党与干部自己艰苦的努力，而不是用那种标准来考试我们现有的干部，把不够标准的黜职。很明白，我们现有的干部有各种的缺点，政治上的、能力上的、思想上的、意识上的缺点都有，甚至还带有旧社会各种污七八糟的残余尾巴来，然而现在就是要将这样的干部改造成为足够高度水准的干部。不能毁坏他们。这虽然是极艰苦的工作，但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还要改造全人类——将现在自私自利的人类，改造成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公无私的公民。

我们要经常考查干部，要恰当的分配各种干部的工作，给

他们以能够胜任的任务，并在工作上帮助他们。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领导机关做了不少的错误，应该纠正。

提拔新干部在目前是重要的。但新干部要经过一定阶段来提拔，不能照过去一样随便提得很高，反而使他无法工作。

在华北已有新旧干部不融洽、不合作的事情发生。这应给以注意。新旧干部各有不同的长处与缺点，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集体领导改善。

（六）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还是应该建立党团。但党团应很技术的工作。各级党团应绝对服从各级党部的领导，服从上级党团的领导。党部领导党团时应该谨慎周到，应该和党团同志讨论一切，但不要在一小问题上都去机械的决定。要活泼的领导党团，不是不给党团以具体领导。

（七）我们同志那种忙乱无章的作风，应该改变。应该抓住各时期中心的工作，分别各时期各种工作的轻重缓急，有秩序的去工作。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实务精神，才能切实，才能真正推动工作与革命。我们同志对于一件工作想清之后，就应有抓紧这一件工作干到底的精神。只有革命精神与实务精神的结合，才能肃清空谈的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八）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彻底转变，虽然最近我们在宣传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一些同志常分不清楚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的区别，对内教育与对外宣传的区别，党的口号与群众口号的区别，党的宣传与群众呼声的区别。我们常把“武装拥护苏联”、“武装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口号，去动员群众行动；常常在罢工要求上加上“驱逐日本出中国”；常把党内问题的文章登在对外刊物上，在对外刊物上宣布某些团体与行动为党所领

导。这种事过去我们做过许多。同时宣传的刻板、形式、琐碎、夸大、不注意事实、不注意对象，文件的八股化，是一贯的传统。这些东西必须彻底肃清。

在今后党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宣传，是更加重要了，这应该利用各种公开可能，组织研究会、出版机关等来系统的进行。

（九）最后，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表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我们的旧干部中它的毒最深。它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它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的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它使我们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使我们在群众斗争中盲动；它使我们在罢工工人的要求上加上“拥护苏维埃红军”，使我们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的上海“实行苏维埃劳动法”；它使我们把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不分，使我们的文件刊物公式化；它使我们在口里千百遍的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又千百遍的违反国际路线，执行立三路线；它使我们机械的处理问题，一切工作公式化、刻板化，使我们许多同志毫无生气，不去思索问题、考虑问题。由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发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

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塞维克主义来代替。怎样来改正我们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志们都应该学习，学习与教育，教育与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方法。只有这，才能使我们前进，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学习！学习！再学习！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我们是能克服

过去一切的错误，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保守党内秘密条例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 无论什么事情只应告诉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人，而不是告诉你认为靠得住的人。乱谈党的秘密只帮助敌探与内奸。

(二) 对于非党的人，不论他与你如何亲切，不应该向他泄漏党的秘密。

(三) 不应该在非党的报纸上谈论党的问题，对新闻记者绝对不准泄露任何关于党和苏维埃的秘密。

(四) 不应该到处打听你在工作上无需知道的事。

(五) 党的领导机关的决定在没有经该机关公布前任何人不得宣露。

(六) 关于红军人数、驻地、组织、武器……及苏维埃的财政经济等等均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七) 一切白区新来的人，不管他过去或现在是否党员，均不得与之谈论党内问题。

(八) 绝对不准在经国民党邮政的信件上谈论任何关于红军苏区及党的问题。

(九) 一切秘密文件递送时必须固封，受领者必须妥存(锁在文件箱内)，所有来往电报、表格、党内报告、刊物、记

录，及标明秘密之文件，均属此类。秘密文件，除发给指定的同志者外，发给组织的由委员会之负责人保存，小组由小组长，支部由支书等等。如有遗失，应受到党内的处罚。

(一〇) 一切派往国民党区域工作的人，任何时候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到哪里去、干什么。除专门的交通外，不得带任何文件。

(一一) 个人之笔记如摘录有秘密性的东西，应妥为保存。过一时期应焚毁。

(一二) 凡机要科、秘书处等机关，不准任何与工作无关之私人入内。

(一三) 禁止用电话谈论秘密问题。

(一四) 如有违反上项之一，应受到党的处罚直到开除党籍。

上列条例各支书各小组均应讨论。同志间应互相监督对于这个条例的遵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 刊印。

张闻天等关于同蒋介石谈判内容的补充意见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周：

关于见蒋谈判之问题，除同意来电所提者外，应增加下述各点：

(甲) 向蒋提出并询问蒋之方针者：

(一) 保卫绥远、青岛，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英日伦敦谈判等对日问题；

(二) 联俄问题；

(三) 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

(四) 国防军事财政之准备；

(五) 汉奸亲日派退出政府问题；

(乙) 须力争办到者：

(一) 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二) 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三) 取缔北平陶希圣、杨立奎等凶殴学生，西安扣留解放报及书籍，上海逮捕共党，《文化建设》杂志破坏两党合作等行为。

(四) 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之行为。

(五) 增加红军防地。

洛、博、毛⁽¹⁾

有午

附一：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内容 问题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洛、毛、博：

(甲) 蒋本日至洛阳见面，因杨⁽²⁾迟不走，不便来□，改约牯岭会面。

(乙) 我们用此行在沪宁多留几天，争取公开，如有可能，即将前商之周刊在沪筹办起来，请准一人来沪主持（凯丰⁽³⁾颇适宜）。

(丙) 我拟二十七号乘飞机去沪，此数日内与顾商定下列问题：

- (一) 本月份经费；
- (二) 夏衣；
- (三) 河西问题；
- (四) 各苏区首先派鄂豫皖及湘鄂赣去人问题；
- (五) 彭贺⁽⁴⁾徐（向前）来省见顾；
- (六) 议款问题，其他问题回后再谈。

（丁）见蒋飭定问题：

（一）纲领；

（二）联盟或改组国党；

（三）释放政治犯；

（四）停止全国“剿共”与派员联络；

（五）办报纸共同宣言或共同声明；

（六）发表边区及其委员会名单；

（七）改编红军发表名义，正规至少四万五千，地方部队一万，工兵一万，红校五千，老弱残废及工厂医院约一万；

（八）经费部队六十万，地方行政武装十五万，学校五万，遣散及善后六十万，收回苏票一百二十万；

（九）改编各苏区武装，集中者为各地独立队，零星者为团队；

（十）修改国大选举法及各党派参加国大；

（十一）宪法草案的修改原则；

（十二）国防会议；

（十三）释放七君子⁽⁵⁾问题。

（戊）你们当有何其他意见，请告。

周 恩 来

二十三号亥

附二：周恩来关于向蒋介石提出外交、国防等问题的意见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洛、毛、博：

（甲）两方面问题。关于第一方面，早已商定，我并有电告，拟即照原定提出。关于第二方面，我的意见如下：

（一）外交方面，以促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以中苏秘密）协定为基础，坚决反对日英勾结与收回冀东、察北及领事裁判权，取缔走私及特务机关，取缔上海、华北诸协定，严禁日机飞航，解雇日本顾问，严禁全国与日本订立任何丧失主权的各条约、协定或契约，为本年内第一步外交方针。

（二）国防军事以召开国防会议制度，军区根据平等原则整理各部队，提高部队技术装备和物质待遇，加强海空防御，布置资助冀察鲁晋绥，构筑国防前线工事，加强绥宁甘青的国防布置和兵力，驱逐日本特务机关及航空辖区，并与外蒙、新疆联成坚固阵线，构筑沿海沿江及沿铁路线的工事，广大的武装民众，切实的援助东北义勇军等项，为目前中心任务。

（三）国防经济以加速的建筑西北、西南的铁路线，打通新疆、苏联道路，巩固西面已通英法属地的交通，开赴西北与西南，大量提高军事及发展有关各工业为最紧张任务。

（四）要求国民大会选举，望再度修改，至少要宣布重选，国民党及各党派要规定名额，自选学生会等要有代表名额，并给人民以选举自由，发展对宪法草案的讨论，规定国大任务为行宪、通过纲领与讨论国防问题。

（五）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并切实的保障人民自由。

（乙）关于两方面问题，除向蒋提出外，并要求同南京当局商讨具体问题。

（丙）最中心的在全国事件上还可以要求召开各党各派联合会议与国防会议，如蒋不愿意，则要其先作具体答复，并介绍经当局商谈，在我们问题上则以与蒋直接解决为好。

周 恩 来

有已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秦邦宪、毛泽东。

〔2〕指杨虎城。

〔3〕即何克全。

〔4〕指彭德怀、贺龙。

〔5〕指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 和传统问题*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

毛 泽 东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1〕}，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部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

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2]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

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③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

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不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从洛甫⁽⁴⁾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之存在。因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

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缘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2〕指刘少奇、何克全和李维汉。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3〕即刘少奇、何克全、李维汉、林伯渠。

〔4〕即张闻天。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

张 闻 天

(一) 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

我党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一统一战线内与民主共和国内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自内战停止，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合作以来，在建立全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显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离开目的还很远。

根据过去二年来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经验，根据目前形势的特点，我们应该着重的提出下列问题，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第一，目前统一战线的组织，一般的说来，还不过团结了抗日救国的左倾积极分子。这是很大的成绩，但这是异常不够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依靠这些分子的力量去争取最广大的中间群众到统一战线中来。不是到处单独形成左派的组织，使他们同最广大的中间群众隔离起来，以满足他们左倾的情绪与要求，而是耐心的坚持的去教育这些积极分子，消除他们同广

* 这是张闻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二部分。

大群众隔离的现象，纠正他们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左”的空谈，使他们真能深入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工人、农民与学生中去，成为他们中的活动分子与领袖。对于破坏统一战线的少数极左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于各党派各阶层各阶级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也应该耐心的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即是为了一个具体行动的统一战线也好。只要同他们在最原始的与最初步的共同要求上行动起来，我们即有办法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从低级的统一战线转到高级的统一战线。

第二，必须根据中国各地的不同环境提出各种各样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共同要求，建立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组织，以促进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成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不要幻想以一个单一的口号与形式去组织所有广大的群众。这就要反对关门主义、公式主义与千篇一律。

目前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统一战线，实行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组织的统一。在农民中，下级官兵中，小资产阶级中，也必须加强各种统一战线的工作。使工人、农民、下级官兵、小资产阶级，真正成为我们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依靠的力量。

第三，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应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亲日派作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们一切斗争的火力应该集中起来向着他们。对于托派应该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的方针。

这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彻底，则全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愈是明显，斗争的力量愈是集中，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与分裂愈

是加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愈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但切不要把那些目前反对共产党与不赞成我们的全部主张的人称做汉奸亲日派。许多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今天不一定拥护共产党，赞成共产党的全部主张。我们仍旧应该耐心的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斗争的火力必须在少数真正凶恶的与无耻的汉奸与亲日派身上。

第四，我们应该成为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模范与支柱，成为他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只有我们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我们才能使全中国人民了解我们为民族事业的忠诚，引起他们对于我们的同情与拥护，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也只有我们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地位自任，我们才能一切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为利益，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精神去解决一切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实力派间的纠纷与磨擦，使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坚强起来。

第五，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斗争，相反的，他是在斗争中生长与巩固的。对同盟者的不彻底、错误、动摇、消极、怠工、投降出卖我们应该进行斗争。斗争的方法可以从友谊的劝告、诱导、批评一直到在反汉奸卖国贼的号召下公开的开除驱逐。斗争的总方针应该是集中火力打击亲日派，孤立妥协派，务必使一切叛变统一战线的分子，当他们退出时完全陷于孤立。

应该明确的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的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的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借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

但必须指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提出过高的过左的要求，使统一战线过早破裂，是我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我们应该估计到群众的局部利益，但必须同时照顾大局。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也是中国工农小资产阶级目前的最高利益，少数部分先进地区，群众阶级斗争过早的与过分的突出是不利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坚持说服群众顾全大局的方针。

第六，必须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适当的配合起来。上层统一战线是必需的。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本身的力量，同时便于我们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所依靠的力量，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力量去联合上层与威逼上层，达到我们抗日救国的总目的。上层分子抗日救国的可能限度与对民众让步的可能程度，常常决定于下层群众的斗争的与组织的力量。

在上层与下层的斗争中，共产党可利用各种方法以达到双方斗争的适当解决。共产党是在保护群众利益的基本立场上，采取调解、斡旋与中间人的态度，在原则上是允许的。

第七，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但同时不要放松尾巴主义、投降主义，保证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

（二）对国民党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国共正在走向合作但尚未达到合作的目的。

国民党正在开始转变他过去的错误政策，但并未彻底转变。

放在全中国人民前面的任务，已经不是用武装暴动的方法推翻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而是改组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使

之走向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革命三民主义的道路。这是从两个政权到一个政权，从暴动的革命到革命的改良的彻底的转变。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应该发扬它的革命精神，规定革命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如像过去大革命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政纲所规定的那样，同时应批评它的反动因素。我们表示我们愿意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奋斗。

对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我们以后不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而要区别对民族、民权、民生有利的地方与有害的地方。有利的地方我们应该替他发挥，并要求兑现，有害的地方，则应该批评。

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很薄弱。照现在的样子，他不能负担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倾的革命分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集左派，推动与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应该向国民党指出，为担任御侮救亡的工作，改组国民党的必要。同时革命的民众应该自动的去加入国民党，改造与重新建立国民党下层的基础，再用下层的力量压迫上层，实行党内的民主以达到改组的目的。共产党员不应拒绝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之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的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的面目出现。应该看到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现在正在展开中。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斗争，拥护左倾的抗日民主的分子，以反对极右的分子，以达到改造国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

取本党公开的目的。对于国民党各派别（如 CC、黄埔）可在个别的问题上与之采取统一战线的行动。

对中央与地方政权，我们的目的首先应使之民主化。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当权者的允诺与法令，以及一切合法的可能，发动群众的运动，要求对群众有利的条文的兑现。对于当前的每一具体问题，如抗日救国、国民大会选举、民主自由、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等，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动员群众向当局提出，使其接受。一般的，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意见，不采取完全对立的方针，而采取要求改良的方针。

在南京政府允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或群众选出共产党员为代表时，我们原则上应该参加进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坛与自己合法的地位，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各种有利于民族国家及民权民生的提案，号召与组织群众，推动政府走向民主化。一切选举的会议我们均应利用，提出我们的要求与主张，取得广大群众的赞助与拥护。在选举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共产党在原则上可与各个抗日民主的派别实行合作。

如果南京政府开始发表抗日救国的共同政纲，并表示其实行此政纲的诚意时，共产党在原则上可以参加这样的政府。但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必须：（甲）为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乙）坚决反对汉奸亲日派的企图，严厉的镇压他们的反抗；（丙）保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之成为自己依靠的力量；（丁）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并受党的严厉的监督。

当共产党参加政权时，共产党利用群众的力量，威逼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办法，决不应该放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办法是应该同时并用的。没有群众的运动与群众的压力，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对于地方政权机关的改造，在现在也可开始。号召群众反对地方政府中汉奸分子、贪官污吏，要求将抗日的、民主的、比较开明的、廉洁的、在群众中有威信分子去代替他们。在这种行动中应该集中力量于反对最凶恶的个别家伙，分化统治阶级内部，利用他们间的每一矛盾，以达到目的。

我们的公开工作的同志或同情者，如有可能，应该争取这类位置。他们到那里，不是也不能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好人”的面目出现。首先应争取那些最下层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位置，如保甲长、联保主任、乡长之类以及官办的有群众的经济与文化的团体。

争取这些位置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便于为群众谋利益，便于组织群众，或掩护党的群众的与秘密的工作。他们在为群众谋利益的基本立场上，可以以调人的资格调解双方冲突，向上级敷衍应付。他们的行动，要以群众力量为最后依靠。

在国共合作实现，国民政府实行改造时，改造地方政权的机关成为我们最重要任务之一。不是拿工会、农会、救国会等群众团体来各别的代替地方政权机关，如像过去大革命时一样，而是依靠这些群众团体的力量，来改造地方政权机关，使之民主化，使之成为代表群众的革命的政权机关。

应该立刻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分子的手中应该是我党目前第一等任务。

在统治阶级容许我们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时，我们应充分的利用这种合法的可能，培植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争取我们的领导，然后以群众的威力，压迫统治阶级逐步退让，以扩大我们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的自由。

在抗日战争已经发生的地区，可以超过地方政权所容许的范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大规模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实行民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那时在当地可成立代表各群众团体的临时统一机关成为必要。这种机关，当它集中一切抗战的任务在自己的手里时，必然要迅速的转变为当地民众的政权机关，但就是有着这样的机关时，仍旧不要忘记利用地方政权与改造地方政权的任务。

所有群众团体应该有自己的自卫的武装组织，如农民自卫军或工人纠察队之类。

在敌人及汉奸统治的区域，应组织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等发展游击战争。

（三）关于领导斗争策略的几点意见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在刘⁽¹⁾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我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曾经讲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参考。这些普通的原则，是同志们应该首先了解的。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每一个同志的普通常识。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在原则上是容易了解的，但在实际的运用上却常常发生极大的困难。特别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情形的极端复杂，使我们运用策略原则时困难更多。

所以特别重要的，当我们的同志懂得这些原则之后，决不要机械的把这些原则当做死的公式去背诵，而是首先要真正细心的与谨慎的去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深刻的去探求革命形势的特点，体验群众的要求、痛苦与他们的每一呼吸与脉搏

的跳动，再来决定适当的斗争的口号、策略、工作的方法与方式。

我们的同志决不要自高自满，以为他现在已经懂得了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原则。从原则到实际的正确的领导群众，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要不疲倦的虚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每一新的问题，要多方面的去思索与考虑，然后定出最可靠的解决方法。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如何从错误中去学习，去求得进步。只要今天我们有了进步，那过去所付的代价，就得到了报酬。

我觉得我们同志中平常所犯的许多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简直是由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知。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表示了英勇的斗争模范，表示了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犯了许多错误。对于这些同志，必须更多的耐心的去教育他们。

*

*

*

我们说要准备千千万万群众的雄厚力量以战胜日寇，争取民主资产阶级性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正确的。但怎样去准备呢？偷偷的准备吗？和平的准备吗？这种准备的方法是应该尽量采用的。然而主要的要在斗争中去准备。只有发动、组织与领导群众的各种各样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我们才能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加强他们的组织力量。实际的斗争对于群众（对于我们共产党员亦

然）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在斗争中，群众会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斗争中群众会感觉到团结自己与组织自己的必要，会学习如何向敌人进攻以战胜敌人，如何退却与防御，以保存自己。也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他们会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群众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斗争中学习。对于群众，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自己的政治经验。

群众革命斗争的胜利，固然对于他们是最好的教育，但是失败，也同样的可以教育他们。每一次斗争的失败，在失败后敌人残酷的屠杀与镇压，对于群众常常是最深刻的教育，他们可以暂时的消沉下来，医治他们的创伤，但是他们将在新的条件下，以更高的政治觉悟与更强的组织力量爆发新的斗争。只要共产党员能够始终坚持同群众在一起，群众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群众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泉源。

过去我们党的某些错误，并不是在于我们多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但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我在这里只指出领导斗争中的急性病的害处。

犯急性病的同志常常不了解在一次斗争之后，一般的说来，需要有整顿内部、加强内部组织训练与教育的时间。这是为了准备第二次斗争所必要的过渡时间。他们不了解，群众斗争也像世界上一切其他事情一样，是曲线式前进的。在波涛汹涌之后，必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白天紧张的操作之后，必然需要一个甜蜜的睡眠。想把斗争一直线的“提高”到革命完全胜利，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定碰壁。

我们一部分青年同志中的确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急性病，希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所以他们不能细心的去考虑问题，不

能耐心的去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而表示急躁、虚浮与盲动。但是当明天革命发生挫折时，他们就立刻悲观失望，烦恼消极，从极左转到极右。这些幼稚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实际斗争中去教育他们，锻炼他们。使他们懂得革命是艰巨的工作，革命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但革命必然要胜利的。

这种急性病必须纠正。

其实天下的事，你越是急躁盲动，结果一定越是迟慢，越是达不到目的。李立三同志是一个犯急性病的人，然而他的路线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我们不需要急性病，我们需要稳重的前进。我们要坚决的前进，要有阵地的前进，决不要乱碰乱撞。

这种稳重的前进，决不等于工作的散漫，不紧张，慢慢的干，或听天由命。相反的，这种前进，要求我们最紧张的与积极的工作。没有这种工作，就是一步的前进，也是不可能的。特别在目前形势之下，我们更需要加速度的前进。

在斗争中准备我们的力量吧！以镇静的、坚持的、切实的、紧张的与不疲倦的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工作，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吧！

*

*

*

列宁说：“第一，革命阶级，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起见，必须善于使用一切（丝毫不能除外）社会活动的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须时时准备以极迅速地，突然地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别一种形式。”（《“左派”幼稚病》）

我们说过，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是改变了斗争的某些形式，但斗争还是继续着。我们共产党今天除自己所公开声明停止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的斗争

方式外，决不要自己束缚自己在一定的斗争方式之内，这会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

即拿关于合法的斗争与非合法的斗争来说吧。过去我们利用合法的斗争方式非常不够，或甚至于拒绝利用，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在新的形势之下，合法斗争的范围将更加扩大，甚至将来合法的斗争可能成为斗争的主要方式。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去开展群众运动。但是这决不能因此就说，过去我们所做的非法斗争都是错误的，或者说现在我们不要非法斗争了。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减捐、减税、减租等类的改良要求，然而当统治者、剥削者不顾群众的合法要求，强迫群众交纳不能忍受的负担时，抗捐抗税抗租的“非法行动”不是仍然不能免吗？当饥寒交迫的灾民难民要求救济的合法行动无效时，他们不是有完全的权利去进行“吃大户”与“分粮”的非法行动吗？党不能不管。党应该给他们这类非法斗争以领导。

同时合法的斗争方式与非合法的斗争方式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变的。从利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开始，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转变到不合法的。合法的变为不合法的。非合法的斗争，由于群众的力量，可以变为合法的或半合法的。不合法的，变为合法的。

群众斗争的发展，常常逼使统治阶级实行让步。对于统治阶级光是说好话或是哀求是不中用的。他们要求力量的逼迫。南京政府的开始走向抗日，没有全国人民的“逼”是不成的。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农民的要求的一点让步，没有工人农民的“逼”也是不成的。这种“逼”的方法，在过去是需要，在今天还是需要。革命团体与政党的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改革或改良，没有群众的行动，是不

能实现的。一切世界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因为合法主义要把群众的斗争降低到适合于国民党的法律。但是利用国民党的某些法律的条文，利用某些合法的形式与可能，就是很小的可能，进行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工作，那当然不是合法主义，而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式。

在新的形势之下，就是武装斗争的方式，也不应拒绝的。但这不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而是自卫的武装斗争。谁能担保各地的政权及那些最凶恶的豪绅地主，不会用武装的力量来对付群众斗争与群众团体呢？不要一刻忘记准备自己的力量！

* * *

只有我们在群众中坚持的工作，在群众中建立起我们的信仰，群众甘心情愿接受我们的指导，甚至为我们的主张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取得了领导权。

我们说，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只是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是说共产党是天生的领导者，因此群众必须服从他的领导。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还需要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与艰苦的群众工作。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共产党真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而不是因为他能够高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与他的那副“领导者”的架子。从领导者的架子到领导者，这中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尽可少讲些（对外可完全不讲）“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类自夸自大的话，我们要尽量的谦逊些，更多的去努力于正确的政治领导与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人家能不能承认我们是他们的领导者，就看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程度。

但是我们的确已经取得了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时，我们也切不要因此就放肆起来，把共产主义的教条赤裸裸的搬出来，在那里大夸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赤化”在今天完全不需要，而且只有害处。对于每一个在我们领导下的团体，我们切勿自己宣布说：“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体”。这种幼稚病应该最后结束了吧。

我们过去常常曲解“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的这句话，以为这就等于在群众中高谈共产主义。其实这种了解是错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完全不用马克思、列宁的一句话，然而这种分析与解释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我们现在常常说要拿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全中国四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暂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正是要以马克思、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来教育中国人民。也只有马克思、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最后的解放。

少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耀眼词句，多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内容吧。

（四）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联系的问题，是关于党同群众如

何联系的重要问题之一。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的问题，过去争论很多，但总是没有能够使他很明确的为同志们所了解。这是一个损失。

应该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不是什么始终不变的东西，而是依照革命形势与具体环境的变动而变动的东西。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在民主制度没有实现的情形之下，在白色恐怖转变到民主制度的过渡时期，两者的联系都是不相同的。更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同一时期内，在各个地区，这种联系也是不相同的，如在华北与华中、平津与上海。

在过去白色恐怖统治时期与现在民主制度还没有实现的时期，应该确定：第一，凡能够公开存在的团体与组织，主要的都必须是合法的（包含成文法的与不成文法的），换句话说，必须是为当地政权所能够容忍的。如官办的各种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团体，群众自己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兄弟会、姊妹团、互助会、合作社、同乡会、学生自治会、文化教育的各种团体等。这类合法的团体，共产党自己也可以照样的组织，当然不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的合法的团体的工作方式，必须是公开的合法的。

第二，凡群众的革命斗争（如罢工、示威游行、抗捐抗税抗租等），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但主要的是非法的，即开始是合法的斗争，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常常要从合法的转变到非法的。

第三，在领导群众非法斗争中产生的革命团体，可以依靠群众的力量存在一时期，如革命形势发展有利，则这种团体可以转变为公开或半公开，可以比较长久的存在与发展下去。如革命形势发展不利，那这种团体必然要从一时的公开转向半公

开或秘密。如果为了要求得自己的继续存在，则应停止领导非法斗争，而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活动。所以争取公开的可能，决定于群众本身的力量，及当时革命的形势。

从上面三点，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进行公开工作，使公开团体能够存在，“利用合法”是主要的，“争取公开”是次要的。

在群众革命斗争中，非法斗争是主要的，合法斗争是次要的。

过去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由于没有清楚的指出这中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

过去有些同志强调了“非法斗争”与“争取公开”，因而拒绝了“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这当然是错误的。

“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特别在白色恐怖的情形之下，在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与保持党同群众的联系上，有重大的意义。即在改善群众生活上，合法团体与合法斗争也可以多多少少给他们得到些利益，当然说不上根本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这种“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当然不是改良主义或合法主义。凡主张共产党只要用改良的方法，而不用革命的方法，以为只要改良的方法，人民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解放，这就是改良主义。凡主张共产党只要做合法工作，而不要做秘密工作，以为只做合法工作，即可达到革命的目的，这就是合法主义。但“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却是我们共产党革命工作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担任公开合法的工作的同志，不应该自己看轻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党的革命工作的一种，其他同志也不能因为这些同志只做公开的合法的工作，而批评他们为改良主义者或合法主义者。这种批评只是表示他们对于“利用合法”的工作方

式的完全无知。

我现在单讲“利用合法”。

“利用合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即是到现存的公开的合法的甚至反动的群众团体中去工作，争取那里的群众。另一方面，即是我们自己组织合法的群众团体。

怎样在那些现存的群众团体中做工作呢？

首先要善于利用那些团体的纲领内同群众有切身利益的条文，利用他们领袖的好话，或提出最大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并争取这类条文的允诺与要求的实现。

只要在事实上证明我们确能替群众谋得利益，我们就能取得群众的拥护。群众相信我们，决不是由于我们提出的口号过高过“左”，而是由于我们对于他们所提出很低的要求尽了力量。只要群众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开始运动起来，不管他们今天在思想上怎样相信着他们的领袖，但如果他们的领袖，违反他们的利益时，那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中，必然会走到反对他们的领袖。

第二，我们必须物色与团结其中的积极分子，依靠他们去推动其他广大的群众。我们对于积极分子不必要求过高，只要对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肯奔走活动，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的分子都是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也不必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团结起来，但无形中我们应该同他们有一种经常的联系与共同商量问题的机会。把积极分子从群众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办法，只对于反动派有利。注意于教育积极分子，推动他们在群众中活动，告诉他们活动的方法，并吸收其中最优秀者入党。

第三，在我们已经取得群众的拥护之后，就要用我们能够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自己的领导地位。有人说我们对于群众团体，不应该争取领导位置。这话不但对于革命的团体不对，

即对于一切反动的团体，也是不对的。包办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都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能因此就得出我们不应占据领导位置的结论。问题不是领导位置不好，而是我们同志的工作方式不好。我们同志应该成为真能代表群众利益的领袖。当然他今天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而是以群众代表的资格出现的。

第四，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于群众觉悟的程度，来同这个组织中最坏的最反动的领袖实行斗争。在开始工作时，我们决不要忙于反对群众原来的领袖，不论他们是如何的反动，因为如果我们开始就这样做，我们立刻会同他们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对立起来，使自己不能立足。这是最愚蠢的。开始时我们只应站在群众利益上发表意见，并且首先要推动领袖们来做。

在批评时，开始应该是温情的批评，规劝的批评，忍耐的批评，根据群众意见的具体批评，使群众看到我们的批评是“仁至义尽”，而被批评者则是“不可救药”，使被批评者在群众中完全处于孤立。只有这样之后我们才公开揭破他的真面目，必要时驱逐他出去。这要使群众看来是必要的与不得已的。但如果认为这种驱逐会危害于这个组织的存在时，则仍可与之敷衍。

如果这类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有转变时，则对于这种转变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是拒绝。但对于他的每一新的动摇与阴谋，必须经常注意并在群众中宣布与揭发。

第五，即在我们占领领导机关之后，我们仍然不应包办，而应尽可能的吸收其他党派中进步的与优秀的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并与之很好的合作。在工作中处处采取民主的办法，处处依靠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只要群众相信我们的人，听我们的人

的指导，虽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取得领导的公开团体中以及在我们自己组织的公开团体中，要保持这些团体的长久存在，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一）这类团体，应忠实于自己原来的性质与任务。如合作社即应做合作社的事，工会做保护工人利益的事。一切工作的方法都是公开的与合法的。同当地政权要善于敷衍应付。

（二）这类团体中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宗旨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可以领导群众的合法斗争，但不应领导群众的非法斗争。在群众非法斗争发生后，它应站在公开的与合法的同时为群众谋利益的立场去参加，不要站在非法斗争的群众的同一地位。应严守自己可能活动的限度，不然即有坍台的危险。

（三）这类团体中的所谓灰色团体（如合作社、储蓄会、文化教育机关等），一般的不参加合法的与非合法的群众革命斗争。必要时站在第三者地位与斗争的群众以某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援助。

（四）这类团体内的群众或同志参加非法斗争时，不得用团体或代表的名义。

（五）团体中公开的领袖，应完全公开，工作方式亦应完全公开。如果是党员也不要参加党的秘密组织，只同个别党的负责人接头。他对一般的党员守秘密。但他应受党的严厉监督，执行党的指示。党的指示必须是适于公开团体的条件，并且对于公开团体的领袖是能够实行的。公开团体的干部，应过党的生活，但可不担负党内一定的秘密工作。

（六）公开团体中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进行秘密活动，

领导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斗争，党的工作完全秘密。秘密组织同公开工作的同志不发生直接关系，除个别同志外也不互相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遵守这些原则，则公开的与合法的组织，必定能够比较长久的存在下去，虽是任何的疏忽与缺陷，仍然有给敌人破坏的危险。这种危险性，自然大大的减少了。

凡是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革命斗争，主要的均由秘密党来领导。但党的同志在群众中仍然以群众之一员的面目出现。党的负责同志更应尽可能的不要在群众中突出，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斗争中尽量推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来领导。万不得已时，也只要个别同志以群众领袖的资格出来领导斗争。已经出来领导斗争的同志，应坚决的与群众在一起斗争到底。但在第二次斗争时，第一次领导斗争的同志可表示消极，推动别的积极分子来领导。特别在恶劣的环境下，在那些中心支部内（如兵工厂、军队、交通机关等）党的同志应该深深的埋藏在群众中间，只做秘密工作，不把自己暴露出来。保存这些支部不受破坏，是党的严重责任。非法的甚至合法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应建立另外的领导机关，如罢工委员会、罢课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斗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尽量使非党的群众参加，推动群众的积极分子来领导。应力争这些机关的公开与持久，但随时应准备敌人的打击与转入秘密。其他我们的公开团体，可表示与这些组织没有直接关系。

上面所说的是在白色恐怖下与民主制度还没有实现以前的办法。在民主制度开始实现，民主的合法的斗争成为主要方式时，则那些在我们领导下的公开的与合法的团体自然都可以参加民主运动，那时如旧形式妨碍新内容时，即可考虑使用新形式来包含新内容的问题。

如果当时的形势容许这种转变，而且转变后的确有利，那就可实行转变。

在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方面还应注意严密党的组织，考查自己的干部，极大的注意党内同志们的政治面目，丝毫不放松思想的斗争，以防止奸细的混入。秘密工作对于同志们的要求是谨慎、细心、镇静、严肃与勇敢，所谓：“胆欲大而心欲细”。

在白色恐怖最利害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应绝对的秘密起来。然而在条件顺利时，党应该有某些机关或某些领导同志同下层同志或组织更能接近起来，这可以加强对于它们的领导，使工作更容易开展。但党组织必须准备任何时候的突变与敌人的袭击。

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地区，党的秘密组织必须适合于战时的状态。

我这里的解释，当然还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同志们大家来补充。

（五）关于党的领导工作

民族统一战线愈是向前发展，愈是扩大与充实，则在我们党前面所提出的新的问题与任务亦愈多。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与任务，我们首先要求各地同志，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仔细的分析与研究各地具体的环境与各阶级力量分化的情况，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

有些同志在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时，常常不会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出发，而从自己所想象的东西而出发，把极端复杂的问题看成非常简单，或者为眼前的各种现象所迷

惑而看不到事变发展的基本趋势与前途，天天摇摆于各种矛盾的倾向中间而无所适从。这就是他们在决定自己行动方针时的各种错误的来源。

要免去这种错误，必须充分的估计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多方面的去研究自己所处的环境，从各种变化多端的现象里把握本质的发展。

一般的说来，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以前，决不要轻易的下判断与决心，这里，多花费一点考虑的时间是应该的。与其因为匆忙而下错误的判断与决心，还不如稳重为妥当。即在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已经决定之后，仍然要多方面的注意情况的发展，根据工作中的新的经验与教训，来修正与充实自己的决定，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然而只要我们不自高自大，虚心的谨慎的去搜集材料，研究问题，同当地群众与同志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更努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

其次，我们必须善于在组织上保证自己所决定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的实现。斯大林同志说：

“有些人认为：只要规定党的正确路线，当众宣布，用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发表出来，并一致通过，就可以使胜利自行到来，所谓自然而然的到来，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和形式办公主义者，才能这样想。拥护党的总路线的良好决议和宣言，还只是事情的开端，因为决议和宣言只能表示取得胜利的志愿，而不能表示胜利的本身。在正确的路线已经提出以后，正确决议已经通过以后，为要取得实际的成功，就要加强组织的工

作，就要组织实行路线的斗争，就要正确挑选人才，就要很好审查执行领导机关决议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受到严重损失的危险。而且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定出来以后，组织工作便可决定一切，甚至于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就是说政治路线是见诸实行还是归于失败，也看组织工作来决定。”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极大的弱点。甚至有人发挥这样的议论，似乎领导机关，只要政治上“领导领导”就可以了，实际的工作不由领导机关来负责。这种观点是极端有害的。领导机关不但有责任决定行动的方针与工作计划，同时也有责任去领导自己的决定的实现。

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组织领导，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是目前推动党的工作前进的主要关键。

第三，在组织工作中首先碰到的是干部问题。正确的挑选干部，配置干部将决定党路线之能否实现的命运。

挑选干部，第一，应着重于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面目。第二，还要看他的实际工作的能力。这是我们挑选干部的标准。如果以私人的与宗派的观点，来挑选干部，那合乎这标准的干部将被排除，党的路线将不能很好的执行或甚至于完全不能执行。这对于党是非常有害的。

不但要客观的与大公无私的去挑选干部，而且还要根据干部的历史、能力、特长、兴趣等来适当的分配他们。适当的分配干部即是说，第一，使每一个干部能够称职，能够“如鱼得水”，能够最大限度的以自己的力量贡献给革命。第二，使各方面的工作，由于干部的适当分配，能够以整齐的步伐前进，保障政治任务的完成。在分配干部时还应该特别注意于干部的

地方化的问题。当地的干部对于当地的情形比较熟悉，而且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工作办法也比较多。这类干部如无必要时，以不经常调动为原则，外面的干部如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并不比地方干部真正高明时，切勿任便调去担任指导工作。

在分配干部之后，还需要经常考查他们，这要求我们不只是根据于他们的一些书面的或口头的报告，而且还要根据于他们实际工作的结果来考查。如果发现过去对于某一干部的认识有错误，或他的工作分配不适当时，那就应该审慎的来补救这种缺点。切勿固执成见，使事情受到损失。

但考查自己的干部，不但要从上层来考查下层，而且也要从下层来考查上层。即在秘密工作环境下，这种考查仍然可能。下层同志对于上层领导同志有意见，尽可大胆的提出，提出他们工作的错误缺点与指给他们改正的途径。如果上层同志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固执自己的错误时，那下层同志有权利要求把他们的意见转达到更高级的机关，一直到中央。上层工作的同志，为了改善自己的工作，不但不应拒绝下层同志的意见，而且相反的，应该要求下层同志，提出对于自己工作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与要求。

在我们党内应该坚决开展反对对于下层干部的要求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与问题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无心肝的那种态度。他们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他们不去解决同志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敷衍了事。特别在秘密工作的环境下，下层同志冒了很大的危险到上级来，要求具体的指示，而这些犯官僚主义毛病的同志却漠不关心的去对付他们。这简直是罪恶！

第四，经常检查他们工作执行的程度，是推动工作前进，保障政治任务实现的重要关键。这种工作的检查，首先就是在

实际工作中正确的认识干部。这一点在上面已经说过了。这种工作的检查，第二就在检查执行机关本身的优点与缺点。这种工作的检查，第三就在考验党的决定本身的正确性与不正确的地方。所以工作的检查是必要的。

在检查工作执行的程度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即是发现工作中的错误，确定其根源，分析产生错误的具体环境，细心的讨论与寻找改正这些错误的方法。这种自我批评，对于党的需要，正像空气太阳之于人身。

自我批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是改善工作的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警觉性，可以在错误中教育干部，可以使党内生气勃发，而不是暮气沉沉，所以自我批评不是表示党的衰弱，而正是党的有力量的标记。

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或者惧怕自我批评或者把自我批评当做对于某一个人的攻击。这两种倾向是互相补充的。因为他惧怕自我批评，所以别的人就要攻击他，因为别的人以自我批评为攻击个人的武器，所以他更是惧怕自我批评。这种错误倾向，也造成了党内许多无原则的纠纷与派别斗争。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彻底纠正。

斯大林同志说：

“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饰他的错误，不是回避他的错误问题，而是诚实地公开地承认他的错误，诚实地公开地指出校正这些错误的途径，诚实地公开地改正他的错误。”

也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才能够教育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够训练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互相掩盖，包庇，袒护，姑息，亲戚朋友般的互相原谅，只有损坏自己的干部！

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使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成为日常的必需品。自我批评的发展，不但不妨碍同志间亲密的关系，而且更能使同志们在原则上团结起来。

第五，在每一次检查工作之后，我们必须得出一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即成为以后工作的具体指示。这种指示，首先应该指出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情况及推动工作前进的当前的中心任务（中心一环），这种指示更应该指出实现当前的中心任务时所必须的组织上的改变及人力上的重新配置。这种指示更简单明了，要有中心，使下面同志得到指示之后，能够更有把握的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具体指示决不等于烦琐，决不等于代替下级同志规定一切细目，或毫无中心的议论到一切，这种指示对于下级毫无帮助。

具体指示应该不但不阻塞，而且更能发挥同志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它一方面给了下级同志以具体的帮助，同时也并不规定一切细目，而使下级同志根据当时当地变动着的环境实行机动的可能。

要经常给同志们以具体指示，同时要培养同志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责任心与能力。上级同志没有十分必要时，不要处处干涉下级同志的工作，下级同志也不要事事依赖上级。

但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即使不同意时，也必须执行，他们不同的意见，应该经过组织向上级提出，不得在群众中表示任何异议。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最粗浅的一条道理。破坏这一条道理，就是违反纪律。

第六，在秘密条件允许的情形之下，应该尽量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集体领导的保证，问题的共同讨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意见的适当提出，一定的会议生活等，都是保证党内民主的具体办法。但是必须指出，党内民主

的实行，丝毫也不能削弱党的铁的纪律。在任何方面工作的同志，都须严守党的纪律，任何违反纪律的行动，都是给敌人以利益，给党以损害。

有人以为党的纪律就是惩办制度，因此以为反对惩办制度就是反对纪律。这种曲解必然走到党的纪律的漠视与破坏。党的纪律即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全部遵守。违反这一组织原则，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处罚不过是保证执行纪律的一种方法而已。

最近北方党内所发生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是必须立刻纠正的。

第七，党内教育问题，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

对于大批新的干部的党内教育，现在也成为迫切的需要。此外，每一个干部应该获得必要的军事知识。

（六）两条战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左”倾机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样，是生活在社会中间，因此它受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宗派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共产党内部最不坚定的分子

反映出来。其次，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成分中无产阶级骨干极端薄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还占多数，所以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容易在共产党中找到它们的社会基础。

一般的说来，中国党内工人贵族的成分是很少的。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上层知识分子是占着相当的数量。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至于那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贫穷的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盲动主义等的社会根源。

此外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也是产生两种倾向的来源。列宁说：

“见解分歧经常的来源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性——在矛盾中和经过矛盾发展的辩证性……。活的生活，活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的种种矛盾，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能够完全把握住。然而不言而喻的，群众是从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上去学习的，因此个别的人群或集团，常常在单方面的理论和单方面的策略体系中，过分重视或抬高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点或那点特征，过分重视或抬高这一发展的这个或那个教训。”

再从主观方面说来，我们的党还只有十六年的历史，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还薄弱，斗争的经验还不够，这也是使党内经常发生各种倾向的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党内在“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克服之后，常常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所以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是一天的或一个节期的斗争，而是经常的斗争，也是巩固党内布尔什维克思想一致的最主要的武器。

一般的说来：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还是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而关门主义却障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险中，我们应该清楚的向同志们指出究竟什么是“左”倾关门主义，而不是笼里笼统把什么工作中的错误，都叫作关门主义。

什么是关门主义呢？列宁同志说：

“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办到这事情，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这件事情离开胜利还很远。仅靠先锋队不能获得胜利。如果整个阶级，如果广大群众，并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这个时候仅把先锋队派去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可是想要真正整个阶级，想要真正广大的被资本所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上这种立场，仅靠宣传，仅靠煽动是不够的。还要有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乃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团体，共产主义的派别，它们目前的任务是要善于率领广大群众（而现在广大群众往往还是酣睡，消沉，守旧，暮气沉沉，而没有醒悟）走上这种新立场，确切些说，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也要善于领导这些群众以便他们转上接近新立场。”

（《“左派”幼稚病》）

关门主义即是不懂得怎样把各种各样觉悟程度极不相同的群众集团与阶层，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引导他们到共产党今天所要求的新立场。他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格式，满足于

教条主义与“党八股”。它把群众中极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它不去认真的了解群众而脱离群众。它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它只能走直路，不能走弯路。它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没有耐心的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它把自己的愿望当做实际。简单的说来，关门主义的实质即是把领导先锋队的领导党组织的原则与方法，去领导群众。

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政治形势的变动使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也随之而变动。比如，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与南京政府是正确的，现在拒绝同国民党与南京政府进行统一战线，却就变成关门主义了。所以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同对于时局估计的某种不正确的倾向联系着的。它有着一定的政治根源。但犯关门主义错误的同志，在政治上可以完全同意党的政治路线，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妨碍着党的群众政策的执行。

关门主义在我们党内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虽是同盲动冒险主义有着同一的社会根源，有着相互的联系，但不等于盲动冒险主义。盲动冒险主义是从一种对于革命形势的过分估计而产生的一种拼命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政治路线或倾向。比如立三路线，就是盲动冒险主义的一种。它同关门主义在质量上是不相同的，但不论关门主义或盲动冒险主义，其结果都会使党脱离群众。

我们党过去在领导群众策略某些的原则与某些群众工作方式上，犯过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某些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党内还严重的存在着。自然，这些错误的程度在各地党内也是不相同的。但总的说来，我党过去所犯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如果我党在这方面是全部错

误的，那我党今天就不能成为群众的党了。

为什么这种“左”的关门主义，在我们党内过去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而现在新的形势下，又成为党内主要的危险呢？除上面所说的产生“左”倾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外，还由于：

（一）过去十年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统治在广大的群众中所造成的深刻的仇恨，现在国民党的转变又只在开始，他们根本不相信国民党今天有什么转变而且也不肯相信国民党以后会有什么转变。他们反对同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

（二）我们党内过去没有严重的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为要消灭党内的关门主义，必须：

（一）坚决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打破“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二）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会用马克思列宁的方法来分析时局，学会马克思列宁领导群众的艺术。

（三）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提拔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

无疑的，这是困难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这不是一次的纠正，或空洞的叫骂一顿所能够解决的。这要无数百次的斗争，教育与学习。

然而在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实际上也是放弃领导群众走向新立场的任务的。难道在过去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吗？投降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共产党，不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吗？牺牲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谈统一战线，惧怕斗争等不也是露骨的机会主

义的表现吗？这类右倾机会主义的事实是很多的。

特别在国共走向合作、全国和平统一开始实现的目前阶段内，右倾的危险正在增长中。因此，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尤其因为“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互相贯通的，“左”倾的分子，在另一种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右倾，右倾的可以转变为“左”倾。“左”倾可以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而右倾又可帮助“左”倾机会主义的发展。

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党应该注意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与之斗争。在斗争中锻炼我们同志的政治警觉性，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真能拿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论去解决一切问题。只有政治警觉性与政治水平的提高，马列主义的武器的取得，我们才能征服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而保障党内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团结。

当然思想斗争的方式是要注意的。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与教育，而不是打击。对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随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然而思想斗争是决不能因为过去方式的不好，现在就不要甚至放松的。这种无原则的与市侩式的党内“和平共居”，是我们所不需要的。

每一同志的错误思想，我们是应该克服的，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保留自己的错误意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某一同志同党的路线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相信，他的错误就会不断发生，会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结果总不能为党工作，而且对党一定有害无益。因此，如果党无法说服同志，使他接受党的路线时，则这种同志可以最后“保留”他的意见，但可以不“保留”在

党内。

相反的，如果一个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就是他承认了错误时，我们也还要在实际工作中考查他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所有我们党内的同志，切勿要以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态度，对付党内严重的政治倾向的问题。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刘少奇。

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

董 必 武

伟大的国民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不仅创造了三民主义，创建了民国，而且定下了保证中国革命现阶段彻底胜利的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在长江流域的胜利，正是中国国民党施行孙中山先生这些政策的结果。工农奋起的浪潮，威胁了软弱的妥协的动摇的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使惧怕群众抬头的中国资产阶级迅速地脱离革命，而投到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的怀抱里去。暗云笼罩着国民革命正向前开展的前途，中国国民党不联共而分共，不联俄而仇俄，不扶助农工而压抑农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大业，如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大旗，不得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担负之。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固非孙中山先生所前定，而中华苏维埃的基本政策实未超过扶助农工的范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国民党不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提议，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放任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满洲傀儡的登场，冀东伪自治的扶植，冀察特殊政权的建立，特务机关的遍设，公开走私的横行，绥东蒙伪的窥伺，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六期。

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每个中国人的眼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利用汉奸亲日派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造成不断的内战，以便它自己不费一兵、不费一弹地吞灭四千万方里的中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但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来的对抗，也结束了民国成立二十五年来军阀混战。中国国民党又开始恢复孙中山先生手定的革命政策。这具体地表现在国共重新合作。

国共重新合作，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惹人注目的问题。国共是中国现代两大政党。十年前的合作，中国革命获得空前的胜利。国共分裂而后，帝国主义束缚中国愈紧，封建残余日渐嚣张，以致中国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独吞的威胁。只有重新合作，才是抗日救亡的前提，才能符合广大群众的希望，才能与世界和平阵线相接近。经过共产党年来的努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国共的重新合作正在展开之中。

听说国民党三中全会时，有人提议共产党员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只信三民主义，才能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中国共产党中亦有个别党员以为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员要保持其纯洁，只能信共产主义，不能再信三民主义。在两党以外的人，更多揣测，以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乃资产阶级的主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纵令在抗日政策上与国民党合作，决不会相信三民主义。于是过去成为问题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至今日随着国共重新合作同样也成为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将对国共合作没有信心，在抗日的艰难过程中要发生某些不应有的纠葛，甚至妨害神圣的民族革命事业。

我们须认识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不是简单的原来国共合作

的完全再版，而有它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目前提到每个中国人面前最严重和最尖锐的问题，是怎样救亡，是如何抗日，是如何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使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获得最终的胜利。中国国民党中有许多领袖和党员所劳心焦思的是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所奔走呼号、悉心尽力以求解决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国共重新合作的基础。这与过去是不同的。至于合作的形式，过去系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个人可以加入国民党。将来或者不是这样而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如果真的是党外合作，那么，国民党某些先生的提议是不成其为条件的。因为党外合作，国民党党员信仰他们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员也信仰他们的共产主义，这没有什么问题。即使党内合作，国民党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信仰三民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他和史沫特莱女士谈话中所指出的：孙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确，创造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相信基督教，蒋介石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基督教徒。国民党中还有些人除三民主义外，信仰与民权主义正相反的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有什么理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只信仰三民主义而不能同时兼信共产主义呢？

个别的共产党员以为信仰三民主义就损害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纯洁，这种理由也不充分。过去共产党员有一部分加入过国民党，他们信仰了三民主义，同时也信仰共产主义。这里我们不妨把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孙中山先生说：“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一种简明的素描。

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内阶级的分立，换句话说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一切方法与形式。从此劳动便不替资产阶级创造利益，劳动将由维持生活的工具，一变而为人生的第一种需要。一般人类经济的不平等，被奴役的阶级的艰苦贫穷等都将绝迹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及竞争消灭之后，则挟有破坏性的经济恐慌和破坏性更大的战争，便随之消灭。生产力的巨量浪费及社会发展的动摇既不存在，于是靠着生产力无限制无障碍迅速地提高，便可秩然有序地支配一切自然财富，而形成和谐的经济荣盛状况。物质生活的低下、分工中的等级性既消灭，于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没有了，最后男女中间的社会不平等，便也无踪无迹。农业系统的落后不复存在，因而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这时国家政权也将随之消灭，任何强制的形式都自然逐渐消灭下去，而一切人类所包含着的才艺之和谐的发展，就有了无限的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依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所描写的解放全人类的一幅较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图画。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是具有崇高理想而且有科学的根据。这种社会到来的经济基础，在全世界上日渐具备起来。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除苏联外都有很大一部分人阻碍社会的进步。

这就需要各国共产党按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各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推进各该社会经济的斗争，才能逐步接近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的经济好像一个杂色荷包，从氏族社会的原始状态的经济以至于近代的机械生产，样样俱全，然占统治势力的还是小商品经济。这样的中国的经济状况，还离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经济条件很远。只有托洛茨基派才认为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妄想在这种落后的经济条件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还受诸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残余到处还有很大的力量，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互相勾结，互相依赖，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特别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整个中国，要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目前要想把中国社会经济推向前进，首先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发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保证这一战争的胜利。这就需要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就需要尽可能的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只有这样干，我们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才能有力量从一切帝国主义者挟制下解放出来，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不至于殖民地化。我们共产党主张这样干，这与孙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三民主义在现阶段真正实施起来，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因为三民主义虽是孙中山先生创造出来的，但中山先生的著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如民族主义中之以大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族为民族的基本组织；民权主义中权与能的划

分；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的病理学家，并说马克思主张的不是共产主义，蒲鲁东、巴枯宁等所主张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等等。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伟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义的全面，所以关于我们不能同意的一部分，不在这里详谈，这里只略为提出罢了。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正因他遗留给我们还有革命的三民主义。

什么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呢？这散见于中山先生的许多著作之中，而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详尽明显地规定了起来。

关于民族主义，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之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国民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并说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关于民权主义，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则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是也。”又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但“国民党之民权主义，诚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国民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

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

关于民生主义，宣言上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之要旨，为“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节制资本之要旨，“凡为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农民之缺乏田地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农民之缺乏资本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对工人则“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谋救济之道”。“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宣言上所说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主张原则上相同；所说的民权主义如果真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马克思主义者亦当拥护；所说的民生主义如真能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实现，也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前进一大步。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革命方面有进步作用的任何主张，总是赞助的。

我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摘录这许多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意在说明我们信仰的是什么样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这样的革命性，十年来已被国民党当权的一大部分党员们完全阉割了。三民主义如果有不受人信仰的话，那不是毫无理由的。那正是因为国共分裂以后，三民主义的革命一方面，没有被国民党发扬光大起来，而南京政府日趋极端，反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完全抛之脑后。除在恭诵总理遗嘱时念到“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字

以外，再也无人省记了！国民党本身已不睬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规定的三民主义，别人不相信三民主义有什么奇怪呢？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应当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为什么呢？

第一，第一次大会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所开的一次大会，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大会。此后中山先生便溘然长逝，不能再到大会有所指示了。

第二，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自己提出来经过讨论通过的。

第三，大会宣言是大会总意的表示。

第四，孙中山先生在大会闭幕时，特别指出要全体党员遵守大会的宣言。

第五，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也指示要同志依照大会宣言去继续努力。

够了！够了！这些已足证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重要了。而大会宣言在叙述了三民主义之后，郑重地指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国民党提倡这样革命的三民主义，才与中国共产党有第一次的合作；淹没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遂与共产党睽离。现在国民党又有转向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征候，所以将重新与共产党合作。合作以后，共产党自当竭其力之所至以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并促国民党竭其力之所至以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争取平民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争取改善广大群众生活的民生主义，在抗日革命战争中是极端需要的。我们所信仰的就是这样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那些怀疑我们共产党员不会相信三民主义的人们，总可以了然吧。

我们是相信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自然，我们同时也相信共产主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董必武选集》刊印。

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政策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

我自离开苏区已近半年，各种情形已不熟悉，又未看到党的全部文件，但在上海报章书籍，较为易得。关于我党的政策问题，想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零碎意见，现且写下来，以供你们的参考。

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与前途

最近半年来政治形势的发展提醒我们去认识目前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其发展前途的一般推测。

一、今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国民族生存与保护土地之完整为目的。因为斗争的目标不是对内，而是对付外来的强盗；加之，在目前又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在国内反亲日派的斗争，也是为了反对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卖国贼、汉奸等等。因此，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广泛的，包括各个

* 这是王稼祥在上海候船赴苏联治伤前夕，写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的信。写信时王稼祥离陕北苏区已将近半年时间。

阶级、各个政党，一切力量都应集中联合，来为民族生存而斗争。日本的进攻，人民抗日情绪的澎湃，统治阶级也不能不为它自身的生存而斗争，英美法等国家对日不满等等都是有利于为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有利于全国团结，来抗敌救国。

二、在中国可以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党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其他党派人数较少，不能成为主要的政党。国共两党在阶级性质上、在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是极端相反的，而不是照西欧共产党与社会党等在阶级性上是比较接近的。国共两党，一个是代表压迫阶级——地主资产阶级，一个是代表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等。因此阶级利益之南北极的相反使国共两党不易接近。

三、不仅如此，国共两党都不是在野的政党，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合作，或者先从在野的时候合作而后夺得政权，而是过去合作破裂了。此后直至今日，国民党是中国当权的政党，一党专政的政党，它统治中国极大的地区，拥有庞大的军队；共产党也是一个地区的当政者（在国民党地区中的组织很少，所以不能称它是在野的政党），虽然组织了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地区虽较小较偏僻，但政治意义极大。因此国共合作，在今天不仅是两个党的问题，同时又是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问题，加之这两个政党、政权与军队又血战了十年，残酷的杀戮与斗争使阶级斗争尖锐到极高程度：一方面是工农及进步知识分子痛恨与唾弃国民党；另一方面，国民党及统治阶级中同样根深蒂固的反共与反革命，这都使情形复杂化。

四、再者，今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假若它可能形成。在大革命时代国共曾经合作过，后来，国民党出卖革命，合作破裂，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

义与封建势力，同时地主买办也进了国民党，使国民党自身变成地主、买办、官僚、军阀、资本家的集团。后来在反共斗争与“剿共”战争中，地主官绅的势力在国民党中更加强大起来。惧怕革命、反对赤化、出卖中国，成为国民党的专职，以前原有的革命传统与精神丧失殆尽，堕落腐败空气统治了它的党部与政府，重新振作起来是不容易的。所以直到现在，国民党首领的大多数人也是以亲日反共为其立场。上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群众的革命斗争吓怕了这些首领，不敢再来尝试第二次的统一战线，这同样又使情形复杂化起来。

五、南京政权，国民党的内部情形是与统一战线有密切的关系。

南京政府与国民党是代表着中国统治阶级的各阶层，因此产生了许多派别和各种不同政策与主张。因为中国经济落后与半殖民地地位，所以地主、豪绅、买办、官僚仍是中国统治阶级中最有力的集团。政学系及其旧派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在老蒋^[1]“剿共”的几年中，为取得地主、豪绅的支持以及对日投降，政学系在南京政府中的势力大大的增强起来，直到现在还占控制地位。他们的政策是反动的，亲日反共的，反对统一战线的。政学系还在扩大它的势力与其他反动分子如汪精卫等的合作。

中国资产阶级中势力最大的是财政银行家，人数最多的是商业资产阶级，至于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则很脆弱。国民党本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出卖了革命，同样也出卖了它。后来帝国主义势力之深入，民族工业的日益破产，再加上近年来日本的侵略与吞并，现在是到了最后存亡的关头。因此在中国，还没有比较有力的民族工业资本家的阶层，也没有以工业资产阶级为背景的强有力的政治运动——但不管怎样脆

弱，这仍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阶层。

正因为中国工业不发展和不能发展，资本就流进银行与商店中去，就产生了比较有力的、比较大的银行资产阶级及商业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中国，财政银行资本的特点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值得研究的很有兴趣的问题。中国银行财政资本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势力，它与政权密切联系着，政府银行成为最大的银行，它依靠帝国主义的财政帮助，它不以向独立工业投资为主要业务，而以投资于公债及与政府共同投资于交通及工厂之建设找出路，控制及吞并原有独立的工厂，在农村中它经过高利贷及地主去剥削农民。财政银行资本的特点都有其政治上的表现：政策之依靠帝国主义而不敢主张独立的民族的政策，在国营或官商合办的交通及企业中求出路，赞成经济统制，而不采取关税保护和自由发展工业的政策，要求集中，倾向于法西斯制度，而不要求民主自由等等。这个财政银行资本在南京政府中占据很重要的领导地位。

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影响中国政治，因为南京政权包括统治阶级各阶层，所以包括几个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主张与政策的党派（亲日派、抗日派、英美派、反共、联共，等等）于一个政府之内，这恰恰正是半殖民地中国政权的特点。因此，南京政府的政策时常不是很清楚的而是暧昧的，不是一元的，而是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时常是几种不同的压力，不同的主张互相抵抗而形成的一种政策。从目前形势看，南京政府内部主要的是亲日派与抗日派的斗争。

除了南京政权以外，另有许多军阀割据的地方政权。尽管怎样宣传统一已经完成，内战虽停，但一些地方政权的独立与割据仍旧是铁的事实。虽然英、美、法等国帮助南京统一，可

以得到一些结果，但军阀矛盾之解决，如不经过民主共和国的道路，而经过老蒋的吞并政策，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用与挑拨，更加使这些矛盾复杂化起来。这些军阀的矛盾与关系，同样严重的影响到我们为统一战线的斗争。

上述这些特点，告诉我们：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是处在一个极复杂的环境与极复杂的阶级关系中。把握统一战线的这个复杂性，是政治路线与策略之正确应用的最必要的条件与保证。

这些复杂条件，使统一战线之形成必须经过较长的艰苦的斗争，并且它会以完全新的面目来出现，绝不是第一次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复活。这些复杂条件又使统一战线合作的范围与程度时时受到限制，一方面有促成统一战线的力量与趋势，另一方面又有约束、倒退、反抗统一战线的力量与趋势。统一战线之发展不会是一往直前的平滑的直线的发展，而大概会是包含着矛盾与斗争，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螺旋形的发展。

在这个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我们的优点：有大革命及以后十年苏维埃斗争锻炼过的坚强的党及其领导机关，有红军及苏维埃政权，有大革命联合战线及红军斗争的经验，我们的统一救国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处在比较（大革命）有利的国际形势中。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党的主要群众基础是建筑在农民身上，红军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苏区是在极落后的地区，全国尤其是大城市中的党的组织万分薄弱，甚至于很多地区及城市已没有我党的组织，我党与无产阶级的联系惊人薄弱，党内无产阶级分子过少，爱国群众组织很薄弱。这些优点与弱点必须着重注意，因为这些国民党是充分知道并且要利用来对付我们，我们善于利用优点，迅速克服弱点，是决定今后

我们力量与工作之发展及成功的基本条件。

国民党南京政府政策之估计 与为民主的斗争问题

关于目前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政策的估计，我同意你们的论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性质与其整个政策方针必须明白说明，否则就会引起错误认识。国民党整个政策方针与路线还未走上统一战线，还离得远的很，一般的还是继续原有亲日的政策占优势的路线。但西安事变的压力，人民的抗日要求，内部抗日分子的斗争使其政策不能不起一些变化，发生一些矛盾与徘徊。我们可以这样来估计，假如说南京政府过去是处于完全亲日的阶段，那么现在是内部起了斗争，是抗日与亲日的斗争，处的阶段，当然还是亲日派占着上风。在这阶段，南京政府对日政策比之过去完全亲日投降是有一些变化。但还只是对日消极抵制，维持现状，不惜找出妥协途径，并没有走上积极的与日本侵略做斗争，决心抗战收复失地。一般的说，南京还没有站在中国的独立立场，来决定政策，还跟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伦敦的方针。对统一战线、国共合作，采取更坏的立场，“剿共”军事虽暂时停止，但并未改变对内的整个政策路线，对抗日群众仍逮捕禁止，对七君子⁽²⁾仍审判，对革命抗日运动仍继续反革命镇压政策，对游击队仍“围剿”。国民党与南京政府政策之矛盾性、中间性，内部亲日与抗日之斗争在其将来发展之趋势是：或者是亲日派重新完全得着统治，继续卖国“剿共”；或者是抗日派得着发展，取得上风，走上统一战线，积极反对日本侵略，决心准备抗战；或者是亲日倾向与抗日倾向继续斗争下去，一时难分胜

负，那么，它今天的基本上仍有利于日本及亲日派的矛盾政策、暧昧政策、动摇政策就会继续下去一个时期。

根据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南京政府内部各阶层各派各倾向力量的分布，我们及抗日群众运动的力量与摆度，南京政府目前政策继续一个相当时期的可能性较多。换句话说，南京政府政策之矛盾、暧昧、徘徊、动摇还会延长下去，统一战线一时还难成就，彼此间谈判一时还难取得明确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处在为实现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时期中，在统一战线成就以前的准备时期中。这警觉我们对南京国民党应采取适当的立场与态度，南京政府政策的变化，不管它怎样微薄，怎样矛盾暧昧，我们是欢迎的，但其整个政策路线，我们应表示不赞成和反对。我们对南京政府的政策，当然是以推动它走上抗日统一战线为目的，但这要求我们严格保持我们的立场，对其政策进行严肃的批评，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应当加紧，我们独立的抗日救国的运动与斗争应当继续进行，我们对国民党各种政策的态度应当公布于人民，如我们对二中全会“根绝赤祸”决议，对于七君子审判，对国民会议，对四川问题⁽³⁾等等，我们都应有及时明白的表示。只有最广大的民众积极起来为抗日、为统一战线而斗争，只有反亲日派与亲日政策的斗争和舆论强大起来，只有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占了上风，只有把亲日派势力压下去、赶出去，统一战线才能成功。

南京政府与我们的停战必须给以正确的估计与分析。南京政府并未走上统一战线，但为什么同我们停战？这因为老蒋在西安事变的压力下，在全国反内战空气下，不得不停战。停战是违背了他“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宣布这个政策的失败，是我们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斗争的胜利，是中国近十年来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件。长期的“剿共”，在经济

上、军力上、政治影响上，都给南京政府以重大的负担，屡次失败，国人坚决反对内战，张、杨⁽⁴⁾部队与我们合作给他以严重警告，蒋系部队也不愿继续“剿共”，因此老蒋暂时对我们停战了。停战当然是我们政策的胜利，但对他不是完全无益的。老蒋已被迫停战，于是就利用停战来巩固他的统治来对付其他派别，来对付日本，来降服左翼群众，来提高他及南京政府在国际，在英、美、法等国面前的地位与信仰，以取得帮助（如孔祥熙之活动，各国对中国论调之改善，借款投资等等）。老蒋在今天是不把我们与他们关系看作两党合作的问题，而当作地方问题——陕北问题来处置来解决，想把我们限制于原有西北地区，假暂时停战以争取时间，来进行他的“统一中国”的工作，而对全部政策特别是我们在国民党地区中的地位不愿有所让步。所以至少在目前他是利用暂时停战，来为他服务，至于将来，若形势发展有利于他，那他就会以重新“剿共”来威胁我们，逼我们就范，加之亲日派又在努力破坏和平，挑起内战，以达卖国目的。所以，在我们面前，重新内战的危险仍旧存在。因此我们应当为巩固和平而斗争。

至于两党合作，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纲领，抗日救国运动合法化，民主，共党合法化，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只有在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才能谈得到上述这些问题。老蒋对共党问题，是想取得“有利无害”的结果。假若说陕北的停战还不会引起英美及国内最反动势力的反对，因为他把这问题限制在局部地区的问题上，对于反动势力还不会怎样危险，至于统一战线与民主制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会引起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惧而拼命反对。所以目前在国民党，赞成的是极少数，反对的势力是大的、极雄厚的，直到现在，当权者中间只有张学良因为许多原因有勇气公开打出这个旗帜，其他赞成的个别

分子是有，但还没有公开表示与活动，并未形成一派强有力的势力。

我们的看法，实现对日抗战与争取民主是不可分离的。只有中国各阶级大联合，只有统一战线和民主，发动中国广大群众抗日，才能实现抗战，才能胜利。换句话说，对日战争不单单是只有中国的军队对日作战，而是人民的群众的战争，而是民族解放的战争，全体人民都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参加到这个战争中去。这就是说，抗日运动同时又是民主运动。可是统治阶级则不这样看，人民觉醒与民主运动对它是不利的。假定日本进攻逼迫着南京政府不能不抗战，那么它就以军队去应战，固然需要人民的拥护，对革命势力民主势力不得不作一些让步，但同样的是限制的。那还要看这些势力的大小，设想一旦抗战，民主及统一战线便不成问题，是没有根据的，也正在这里藏有这种被迫应战的妥协性与失败的可能性。

关于民主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的一些特点。中国不是为保持民主权利而斗争，而是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中国过去无民主传统，一向是东方的专制制度，由历史的演进而变成今日的军阀官僚政治制度，它与民主制度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中国统治阶级各阶层及各派都不是为民主而是反民主而斗争，军阀、地主与官僚及政学系当然不赞成真正的民主，CC派、军人黄埔系、财政银行家同样也反对民主，倾向法西斯主义和统制经济。中国没有为民主而斗争的比较大的民族工业家的阶层与中等阶级，中国为民主的斗争是落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身上，而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正是这个斗争的领导者。中国不会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力的民主运动，而只会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同时又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虽有民主共和国的外衣，但它与民

主制度无关，而是东方式的军事官僚专政。在中国现有的各种阶级关系下，中国政权也很少可能照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一样，渐渐地从专制政权蜕变为比较民主的制度。在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群众的民主要求压力之下，军事官僚政权被迫不能不对民主让步，但它本身不能变为民主制度，充其量也只会学习日本历史的发展道路，演变成一个歪曲的、表面的、民主很少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一方面具有历史性的官僚制度与官僚阶层，另一方面又有醉心于法西斯主义的CC派、黄埔派，而统治的基础又是中国独有的军阀制度，这一些都是反民主的，与民主制度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中国的民主运动是要经过艰苦的、长期的、流血的斗争才能得到。因此，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斗争的目标，将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新的方式的民主共和国，在半殖民地中国为民族解放推翻旧势力的特有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民主共和国还不是苏维埃制度，也不等于是苏维埃制度，而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阶级及一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反帝、反官僚军阀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可以发展为苏维埃民主制度。为民主的斗争同时是抗日斗争，一个斗争的两面。因此，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在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讲统一战线的开始，提出过高的民主要求是不可能的，而应当使大家了解，民主制度之实现是靠艰苦的、不倦的、长久的反日反旧势力的斗争才能得到。

因为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阶级性，因为他们过去政策之反动与现在政策之矛盾，因为它对抗日及民主运动的压迫、拘禁，党内外便有同志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统一战线无前途，共产党要上南京政府的当。或者不这样清楚肯定，但因谈判无大结果，国民党反动行动的刺激与恶毒谣言的挑拨，左翼分子

的愤恨等等而觉得党的政策总有什么成分不对，或者对斗争的前途发生烦恼、急躁、摇摆等等情绪，而使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及埋头苦干的精神受到损害。据我听说，党外左翼分子对我们与南京政府谈判及党的最近策略，一般的取怀疑的态度，甚至于不满和厌恶的情绪。我知道的当然很少，但不管怎样，对我们策略的解说教育，尤其是在国民党区域，在党内党外，都万分重要。因为我们最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历史的大变化，加之中国的形势与阶级关系是极端复杂，详细的耐心的解说，对国民党正确政策的表白，是保证党内的一致及左翼群众之团结在我们周围。否则，党内意见之分歧，尤其是形势较不利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的条件下是可能的。此外，党外左翼群众有可能离开我们或者软化，加之，国民党正在努力挑拨我们与左翼分子间的关系。

我们应当使全党与群众了解，在中国面前只有两条路：要就是为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为国共合作而斗争，这样，我们可以达到全国对日抗战，实现民主，救中国于灭亡，要知道国民党内部有抗日倾向与亲日倾向之分，事情是变化的，只有大多数人民之觉醒与斗争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或者要就是让亲日派盘踞南京政府，让南京政府不抗日，旁观者立场预言国共合作不可能，不去为联合而斗争，那么，日本就会灭亡中国，亲日派就会出卖中国，红军也只能与日本进行局部战争，群众只能组织抗日义勇军。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只有经过全国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南京政府加入抗日战线和国共合作才能前进，此外别无其他道路。争取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实现，就是争取全国实行对日抗战，这个能否成功当然由人民斗争来决定的。可惜，连某些左倾分子甚至党内同志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真理，以致不满意我党政策，不去积极为促成统一战

线而斗争，好像还有更妙更正确的方法。

在实现民族统一战线的准备时期的目前，我们的任务与工作，你们已有决定和布置，我只想贡献下述的意见，以供你们的参考。

1. 恢复我们在国民党区域中的组织与工作。

在为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保证和平实现统一战线的总任务下，我们在国民党区域中独立领导群众抗日民主运动和恢复国民党区域中、尤其是大城市中我们的组织与工作，是决定的一环。没有我们在这些地方的组织与工作，就谈不上为民主为抗战的斗争。要希望在我们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求得党在国民党区域中的合法化，不是一时可以达到的。相反的，不是谈判决定我党合法化，群众抗日运动民主运动的合法化，而是我党自行恢复，群众自己的斗争来决定谈判。国民党老蒋今天的政策是限制我们于原有陕北地区，给一些让步——如彼此谈判，少量给养，进出相当自由，邮政通行等等，以表示好像愿意合作，而在全中国则中立我们，利用我们对南京政府的政策和他的造谣以打击其他派别，特别是在上海、南京一带打击所谓“统一战线派”，禁止搞救国会，审判七君子等等，挑拨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不管国民党政权怎样压迫群众运动，但因对红军停战和国共谈判已经使反共空气不能如过去那样起劲，它的特务机关之反共活动不能如过去那样卖力，这使我们可以利用来恢复我们的组织。据我个人观察，上海的环境是允许我们迅速恢复我们的组织的，在恢复我们的组织之过程中，应该整理过去血的教训。我提议应当有同志来把过去白区特别是上海党的组织之经验、工作方法、秘密方式以及其破坏、塌台、失败等等作一有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以作现在工作的借鉴。我只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可以做党员，什么

人只能做同情者，应当分清楚，不能马马虎虎允许一些没有把全部生命供给党、能过严格纪律生活的人，只能做同情者的人入党，应当没有什么“特别党员”，这在国共合作发展的条件下，尤应注意。北方党的组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白区其他地方好像还未看重。

2. 加强我们对理论及思想的斗争的领导。

环境的复杂与新策略的应用，都须要加紧理论上及思想上的工作。要在中国政治生活占重要地位，必须在思想与理论工作上有强有力的表现。现在各派理论工作是在活跃，国民党宣传部是在拉拢学者，控制舆论，组织文学团体，企图领导和控制文化界；托派刊物也积极起来，专门攻击我们、攻击统一战线，以尽其日本奸细的职责^[5]；日本也在讲中日文化提携；而左翼刊物，左翼理论工作都表现缺乏我们之强有力的领导与帮助，最近在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犯了一些错误，给托派及其他分子利用来攻击我们。我提议在苏区组织一个研究机关，吸收一些同志来研究今天各方面的问题，从哲学到文学，从政治到时事，做一些文章与小册子，在苏区印刷后，有些可以在白区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印行。另外，我提议派一个理论上较强、有学问的同志到上海来，专门做指导和帮助左翼思想工作及刊物，用各种方式创造出有利于统一战线的舆论，我想意义与作用是极大的，环境也完全是许可的。同时对苏区也有帮助。

3. 对蒋系以外的各派的关系与工作。

蒋介石及南京正统是我们谈判的主要对象，但对其他派的联络与关系同样不宜停止或搁置的。南京中的抗日分子如三中全会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的提议者，非蒋系的各军派，在野的党派以及军政首领等等，都应当进行或继续联络和工作。我

想这不会妨碍我们与南京的谈判，因为我们与上述派别及分子的关系不是建筑在反蒋反南京的立场上，而是为了抗日，为了统一战线。在南京政府中，在各省，多一个赞成抗日、赞成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分子，便多一分力量来推动中国及其南京政府走上联合。据我听说，某一些军派对我们与南京停战谈判表示不满，这是值得注意的。对于那些军阀只要反蒋，甚至企图勾结日本，以反对“老蒋联共”的口号从右边来反蒋，以不能利用我们与南京的对立而表示愤怒，我们同样要明白表态度，给反共活动以打击。假若南京与我们关系有些进展，那在日本的挑拨之下，最反动势力，如亲日派以及最反共分子如何键、何应钦之流与某一些地方军阀有可能组织反共阵线，来压迫老蒋继续反共，分裂中国，重新引起内战，有消息证明这种活动的酝酿。

4. 过去经验之整理，干部、传统、作风。

假若说大革命是中国革命第一个时期，苏维埃运动是第二个时期，那么我们现在是处于新的第三时期的面前。过去革命历史与经验教训应当用来教育全党，来把握着这些实际的切身的经验来保证我们在斗争中的胜利。我想莫方同志^[6]可以利用其有利条件多做这些工作。

干部与干部的教育成为目前一个重大问题。过去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中，我们是由城市到农村，斗争的重心是在苏区的农村。党的干部集中到苏区去，工作方法也适应于农村，现在情形将有根本变化，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由农村到城市，斗争的中心移到大城市及抗日前线，干部应多分布一些到城市，工作方法应适应城市，应当由手工业转向大工业，科学化，系统化。

几年来的残酷斗争与战争使我们老的干部，城市中的干部

牺牲了很多，现在在苏区红军方面中下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农民或雇农手工业工人出身，他们是英勇的，但他们的社会经历尤其是城市复杂的经历较少，因为他们一向是在苏区与农村斗争，并且是关起门来同外面敌人战斗的缘故。现在情形会变化了，抗日斗争成为中心，有些干部将来会到城市或国民党军队中工作，就是红军、苏区同外面的接触也多起来了，尤其是统一战线可以向前发展的条件下。怎样使这些干部适应于更复杂的环境，把握着这些复杂关系而不迷失，在更复杂的人群与条件下，正确的进行工作，的确是一重大问题。

关于传统、工作方式、作风等等我无多意见，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文章及小册子专门谈这些问题，但我想到下述的问题：鲁迅在其作品中所揭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及他所号召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看重与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因过去士大夫阶级的遗传，爱门面，夸大，在斗争中虚张声势，拳头无力，对于思想的坚持性及殉难精神缺乏，因此鲁迅要求“韧”、“打落水狗”、“壕堑战”与“一口啮着不放”等等，我想这些知识分子的弱点对于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影响，鲁迅的斗争精神与方法值得我们应用到政治斗争中来。回想在立三路线及其以后的时代，惯于把力量与胜利说大些，在斗争中，喊声洪大，外表堂皇，而在实际上留着一个大漏洞给敌人来利用。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这给予我们多大的损害。

在苏维埃运动中，红军的创造者领导者树立了好的作风，真正接近农民群众和进行生死的战争，都要求脚踏实地的朴素的精神，虚夸、浮躁、妆饰表面等，都不应当存留。所以红军的领导同志以求战争实际胜利为出发，不拘泥于原则，不兢兢业业于辞令，于所谓 *формиларовки*⁽⁷⁾，而“有钱就干，蚀本不来”，灵活应用原则，持久坚韧，这样创造了红军，这种精

神与作风，党须要保留与发展。

华北的新起的革命学生是有新的作风与精神。我经北方过，虽然很少接触，但他们的斗争，都具备坚忍、沉着、热忱、实际、朴素，给我很大的感动。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新的精华，我们同样值得向这些群众学习。

拉杂写来，已不少了。我不过想借此提出一些问题，以供你们旁边来的参考材料。

我已走了半年，现在仍留上海，若轮船再不延期，或者近数日后，可以启程。回想近数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成了同疾病同伤口作斗争，而未能参加党的工作与政治活动，这实在是幕悲剧，令人苦恼与痛心。假若这次能够把伤与病医好，我是想很快的回来参加工作，我是不想在外国过老的。此致
布礼！

听了小 K⁽⁸⁾ 告诉我最后一次谈判的经过与内容之大概，补述几点意见于下：

这次老蒋与国民党对我们的态度，与对统一战线的立场证实我们以前的估计：老蒋与国民党不承认各党各派，不承认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他们的立场，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应当取消自己的政治面目与宣传，甚至于取消独立组织统到国民党统到老蒋那里去。对“陕北问题”可以让一些步，但在全国政策，尤其是对革命的抗日民主运动，对我们在国民党区域中的地位，是绝不让步的。甚至反而进攻，以对外口号与行动，以共党已经服从等等来夺取群众到他们方面去。

国民党与其政府的里面，反共与亲日的势力和意识还是非常雄厚，联共与赞成统一战线的势力还薄弱，还没有抬头出来，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国民党领袖敢于公开主张联共与统一战

线。对共党问题，老蒋的立场以保持国民党及其政府之一致为基点，而不采取排除亲日分子出国民党的政策。他因袭过去的政策与传统，没有勇气来做较大的转变，没有勇气来应付国民党及统治阶层之可能的分裂。因为国民党中假如一部分左倾，走上联共联俄，赞成统一战线，其他部分甚至最大的部分一定更加右倾，更加亲日反共，国民党与统治营垒一定分裂，不管分裂采取何种形式，分裂本身是不能免的。整个国民党与各派，整个统治营垒都走上抗日救国，与革命势力妥协而产生中国民族大联合和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只有国民党政府本质上继续过去的政策与传统，压服左派势力，不扰乱最反动最守旧阶层之平静与安全才能避免分裂。

上述一切指示我们：老蒋、国民党与统治营垒的政策之变化和演进在今天以及以后的每一时期都有其限度性的。因此我们对老蒋、对国民党、对南京政府之政策与态度，也应当在每一个时期，随着他们政策变化之限度而有我们的限度性与适当程度。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政治立场与组织始终是独立的，对国民党目前政策是不赞成的，并且要公开批评的。超过这种适当的限度，不仅使老蒋国民党认为我们软弱，急于求和，来压迫我们“降服”，并且使左翼及不满国民党的群众冷一口气，徘徊起来，并且使我们自己党的队伍和红军队伍软劲，减弱战斗精神，解除政治上的武装。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向坏的方向发展，内战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旧存在。

老蒋对陕北问题，对红军（不是对共产党），在目前可能让一些步，以维持停战，争取时间，进行他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但这不是说他们不企图来夺取红军的领导权和分化红军了，相反的，他们估计到，红军在基本上是农民的队伍，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队伍，物质生活是艰苦的，地区是贫穷的。他们

是预备以各种方法（欺骗，引诱，酒色财气，地位，收买恐吓，利用不坚定干部之家庭观念，利用他们不愿再作战的情绪，等等）来争取红军，软化红军，分化红军，或者夺取领导权，或者使它瓦解。红军编几个独立的师，直属南京军委，红军部队可以调到其他地点，原有苏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要他们的人等等，都包含这些企图在内，他们这些办法我以为是不能同意的。对红军与苏区的领导权是要绝对保持在我们手中，同时教育红军教育党员使他们适应于新的环境，保持革命的坚定与纯洁，保持艰苦卓绝的精神，不为任何东西所动摇，保持对国民党的仇恨以及随时应战的准备等等，是成为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了。

不管我们怎样为着顾及大局，为着全国联合反对日本，不管国民党政策之演进如何，过去，国民党之叛卖革命，清党的血浴，以及与红军的血战等等，都给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发展上一个深刻的烙印！我们的让步程度应随着国民党政策变化之程度而决定，我想这是值得注意的。余不多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

〔3〕指一九三七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派贺国光到成都与川军刘湘会谈，要求川军让出重庆，停筑防御工事。刘湘被迫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川军国军化”、“政治的问题中央化”的要求，率部撤离重庆，移驻四川南部永川。随后，“中央军”进驻重庆。

〔4〕指张学良、杨虎城。

〔5〕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

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系、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6〕指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志。

〔7〕формиларовки，译为：原则、定义、公式。

〔8〕即潘汉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

国际书记处：

恩来^{〔1〕}同志第二次见蒋谈判多日，现返西安，兹将周十五日来电所述谈判结果如下：

甲、蒋在庐山最后的表示如下：

(子) 两党合作部分：

(1) 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2) 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3) 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4) 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

(丑) 目前有关部分：

(1) 共党根据以前申明，发表对外宣言。

(2) 政府在上项宣言发表后，即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

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至四万五千人，其编制办法与顾⁽²⁾商定。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毛⁽³⁾两同志须出来做事。编就后部队可移防。

(3) 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由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选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

(4) 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行政经费亦照规定发给。善后费用可由中央另发。

(5) 各边区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领袖须离开。

(6) 在狱共党可由国方开始分批释放。

(7) 国民大会之二百四十名指定名额中，可指定共党出席代表，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8) 国防会议现尚未规定会期，开会时可容共党干部参加。

(9) 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最近庐山训练班，即拟收容各方人员训练，陕北如有人来受训练亦可。此外并拟召集各方人来庐山谈话。

(10) 凡有破坏合作及与共党为难者，由蒋自负责任解决。但为避免国内外恐惧与反对，共党应避名干实，不必力争目前所不能实现之要求。

(寅) 蒋又告宋子文声明：

(1) 共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

(2) 共党应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3) 共党不要使蒋大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乙、我因（子）项组织原则及（丑）项编制，与边区政府等问题都不能同意。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

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蒋仍坚主张设政训处指挥。我只有回来讨论。我并最后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

中央书记处

六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

〔2〕指顾祝同。

〔3〕指朱德、毛泽东。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蒋介石谈判 的方案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彭、任、剑英⁽¹⁾：

我们根据与蒋谈判的情形，现决定进行方案如下：

（甲）两党合作问题：

（一）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

（二）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其组织原则，由我方拟出草案与蒋商定。

（三）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

（四）我们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在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

（乙）目前具体问题之解决：

（五）准备七月中发表宣言（在拟），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方案为根据。

（六）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

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每师以编至一万四千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两旅两团，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约两千七八百人。其他编师直属队，总部编三千人，另外地方部队编一万人，保卫队在内。工厂医院另编。抗日军政大学另行解决，本期毕业后力求继续办一学校在此编制下。编余之老弱残废妇女及机关工作人员约三四千人，另设法安置。军委改为党的秘密组织，领导全国军政工作（红军在内）。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党的组织准备改变形式。

（七）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七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人任为边区行政长官（仅为挂一名义，蒋甚坚持），林伯渠同志为副长官。其下各行政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将来由边区参议会推出，请行政院任命。县长及其下各局长，则由县议会选出。边区将订出自己的经济和教育计划，并即起草各种条例及法规，以便与南京磋商。

（八）对其他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用款向富户捐募。政权则建立自己的联保、保甲长及区乡公所。大的游击区在停止双方攻击后，争取大的部队编成各省独立团或保安团，小的编成保安队或民团保甲，不成则不受改编。小的游击区可争取为上述形式的存在。

（九）即着手调查各省在狱共党及一般政治犯名单，俟宣言发表后交蒋实行分批释放。

（十）与蒋及国民党谈判，在全国公开发行人《解放》周报（现在延安出版）。

（十一）朱、毛^{〔2〕}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

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

（丙）全国政治活动问题：

（十二）我们对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并不放弃，但估计到蒋及国民党不会再修改其已经修改的选举法，我们应联合各民众政治团体。

（子）推出二百四十个指定名额的倍数候选人，要求国民政府聘任（力争不用指定）。

（丑）讨论宪法草案，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方案。

（寅）讨论并产生解决国难的提案，要求国民大会讨论和通过。

（卯）对各地国大选举，我们应影响推选人提出抗日及我们分子为候选人，在复选地方，我们应发动选民选举候选名单上之抗日左倾分子（现无我们分子）。

（十三）我们利用蒋、汪⁽³⁾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机会，在沪港平晋各地推动能向蒋建议的人，扩大召请范围普及于抗日领袖及左倾教授，以加强蒋之转变与扩大统一战线。

（十四）再次见蒋加上博古⁽⁴⁾、林伯渠、董必武与周⁽⁵⁾同去，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

（十五）宣言发表后，如得蒋同意，即组织我们考察团赴各地考察，扩大影响。

中央书记处

六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任弼时、叶剑英。
- 〔2〕指朱德、毛泽东。
- 〔3〕指汪精卫。
- 〔4〕即秦邦宪。
- 〔5〕指周恩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原则 给共产国际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国际书记处：

我们拟定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原则如下：

（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1〕}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与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最高会议，以蒋为主席，依据共同承认之民族统一纲领，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并调整两党关系，同盟会主席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二）国民革命同盟会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两党均保留各自组织之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之自由权。

（三）国民革命同盟会之共同决定，两党均须遵守实行，但议案内容如与共同承认之纲领有违背者，两党之任何一方得拒绝讨论，两党之任何一方凡有违背或破坏共同纲领及同盟会组织原则者，同盟会最高会议得决定补救办法。

（四）国民革命同盟会最高会议在必要时，得指定某地两党干部组织某地之地方会议，讨论某地两党共同行动，

并调整某地两党关系，但其决定不能违背最高会议决定之原则。

中央书记处

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 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

在新阶段的红军，为要适应着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为要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为要保存和发扬红军故有之优良的传统与作风，关于今后党和政治机关的机构应有如下的决定：

(甲) 改编后的红军，为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确定红军中实行单一首长制，以政治部主任为其政治的助手。同时为健全党的组织，以集体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故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则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他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并向中央或上级军政委员会负责。军政委员会以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组织之，其书记则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

(乙) 为使党内的工作与一般的政治工作分开，党的工作与组织应有其独立系统，故在团师以上则组织党务委员会。此党委不是如过去之师以上之党务委员而仅起监察之作用，他还应进行党内的组织与教育的工作。团党务委员会即现有之总支部委员会的性质，直接指导各连队支部的工作。师党务委员会则直接指导各团党务委员会的工作。团师以上党务委员会之产生应由团师以上之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在党务委员会的委员中应推选一部委员为常委，不兼他职专负党内工作。各级党务委

员会应在各级政治机关中的组织部门的面目出现，各级党务委员会除受上级党务委员会之指导外同时应受同级之政治部主任领导。旅直属队不组织党委，应由旅直属队各支部代表大会选举三人组成总支部委员会，专负直属队党的工作，不设常委，仅设书记一名。连队支部为红军党最基本的组织，各连队部的支委会应由支部大会选举五人至七人组织之，不分常委，应有书记组织宣传委员之分工。

（丙）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

改编后红军政治机关的组织，仍应在团师以上组织之，旅直属部队和营可设教导员，指导直属部队和营的政治教育及一般政治工作之责。

在目前抗日的准备时期，部队的中心工作是教育训练，因此政治机关也应以政治训练为中心。故其组织主要的应分教育训练部门，专司部队政治文化的教育，宣传部门负责部队的娱乐体育及居民友军的一般宣传工作，组织部门专负党内组织教育等工作及保卫部门的工作。连指导员应保留，专负连队政治教育并依靠着支部进行一般的政治工作。

列宁室名目应改为连俱乐部，其性质不变。团以上应有俱乐部之设，大大提高部队之文化娱乐体育。

朱德青年队改名为青年队，以便使这一青年军人的组织能发展到友军中去。

（丁）依据以上一些变更，责成前方总政治部拟定新的政治工作条例，并依据实际情形将各种组织具体规定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

周恩来

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十六周年，他曾经领导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他创造了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并为他苦斗十年，现在他又在领导全中国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年轻的幼稚的党，从包含几十个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展到包含十几万党员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又一直发展到现在，他没有像欧美那样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他可承袭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及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基础上，他已经不愧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之一员，他已经锻炼成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了。他的胜利，不仅在革命斗争中将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的政党，并且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创造了苏区，创造了打垮敌人多次“围剿”的铁的红军。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胜利？

第一，因为他“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不屈不挠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纪念会上的报告提纲。

地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季米特洛夫）——从职工运动开始，经过一九二二年海员罢工，一九二三年二七运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北伐夺回汉浔英租界，上海三次暴动，同时深入农民革命，经过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一直掀起了苏维埃革命的红旗，创造了各地的苏区和红军。目前更看清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提出了国内和平一致对外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从他产生到现在，没有一刻忘记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没有一刻不为工人、农人、兵士和一切被压迫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所以他能取得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拥护。直到今天，直经过十年的反动统治，我们还找不到像欧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拥有部分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对立，也找不到像中欧东欧那些自称为代表农民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或像俄国的社会革命党来与中国共产党对抗，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环境的不可能，也是由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接近群众，最能为群众利益而奋斗。

第二，因为他“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武装起来了，维护党的统一有如生命，不害怕以布尔塞维克的态度来揭发自己的错误，在错误中学习并适时地改正这些错误，不允许在自己队伍中混入着异己分子，把各种各色的投降者和阶级敌人的内奸驱逐出党。”（季米特洛夫）——不错，中国共产党是经过许多困难挫折的，是犯过许多严重不可挽回的错误的，然而他能克服困难，揭发错误，纠正错误，并在错误教训中站了起来。这样，就将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党从斗争中锻炼了自己，拿布尔塞维克的原则武装了自己，而走向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共产党自从成立到现在，没有一天不是在思

想斗争中过生活的——他从开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斗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斗争，与党内服从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特别是与孤立无产阶级的“左”倾思想斗争，与国家主义派斗争，与戴季陶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复古的妥协的思想斗争，与大革命失败时的机会主义斗争，与农民暴动初期的盲动主义斗争，与第三党改组派等等改良主义的思想斗争，与陈独秀取消主义斗争，与立三路线斗争，与富农路线斗争，与肃反中的错误路线斗争，与军事上冒险保守和逃跑主义斗争，最后与国焘路线斗争，而现在我们在统一战线运动中，更须与党内关门主义斗争，特别要与党内投降主义斗争！我们在这些思想斗争中，我们党曾犯过许多严重不可挽回的错误。陈独秀为领导的机会主义，曾断送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盲动主义曾使党及革命群众在革命失败后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减少了保存活力的可能；立三路线断送了许多大城市方将积蓄起来的力量，断送了党的组织，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恢复，在农村中亦丧失了许多阵地和有生力量；国焘路线使着红军苏区没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并且招致了部分的失败，——这一切错误，都造成了无可补偿的损失。然而党终究是揭发了这些错误，纠正了这些错误，并从错误中站了起来。凡是不肯承认错误，或甘心制造更多错误的人，我们是不容情的，将他们最后驱逐出党——我们曾经与无政府派分裂，我们曾经洗刷过谭平山等第三党分子，我们曾经开除托陈取消派，我们曾经与罗章龙□□□派分裂，我们曾洗刷过若干异己分子，我们曾驱逐过不少叛徒。中国共产党便从这样的锻炼中站立起来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王芸生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错误中过生活。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否认我们有错误，不否认我们自己领导有过错误，但我们的错误只是一时期的，我们党的革命的总路线为无产阶级及中国人民利益而奋

斗的总路线是没有一刻放弃过的。惟其如此，我们所以才能有今天。惟其如此，所以连我们的过去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有民族性、有革命性的。对我们党领导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不得不称赞为历史上的奇迹。难道一直在错误中过活的党，能够创造出奇迹么？这不是奇迹，倒要变成奇谈了！

第三，还因为他在这十六年的苦斗中，产生了几千几万的英勇的、坚决的、能干的、忠实的共产党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有党的群众工作的天才领袖，还有许多能够管理国家、指挥军队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有许多百战百胜的猛将，连敌人听到要怕的猛将。在这些天才干部中，我们党是承袭了中国民族英俊贤明、忠贞不拔、艰苦卓绝、奋勇牺牲的伟大的美德，表现了他们都是中国民族顶天立地的好儿女，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子孙。在大革命中，在为苏维埃奋斗的十年中，在内战烽火中，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党中，我们党贡献了他成千累万的干部，走上革命斗争的战场，走上沙场，走上法场，在那里，我们牺牲了成千累万的烈士。在工人运动中，我们有二七运动的领袖林祥谦、施洋等烈士，五卅运动的刘华烈士，省港罢工的领袖苏兆征、邓中夏等同志，上海工人暴动的领袖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以及一切为工人运动而牺牲的工人领袖如王荷波、郭亮、陈赞贤、余立亚、刘尔崧等同志。在农民运动中，我们有彭湃、陈英霖、阮啸仙、李慰农、韦拔群等领袖同志之牺牲。在学生运动中，我们有天才的为全国学生景仰的领袖如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的先后牺牲。在为国民革命与国共合作而奋斗中，我们有李大钊、杨匏安、宣中华、侯绍裘、杨闇公、赵醒农、萧国华、袁孟冰、孙炳文等同志之先后牺牲。在国民革命军的战斗中，我们的血是与国民党员合流的，在那里我们有许多杰出的干部，如河南战场上的蒋先云，围攻

武昌城的曹渊，东征中的章琰，沙基惨案中的曹石泉等等同志都是牺牲在最光荣的战场上的。在白色恐怖的统治十年中，我们党的干部、群众工作的领袖，被杀被砍在反动刽子手中的，更不知成千累万，著名的如蔡和森、陈延年、陈乔年、罗登贤、陈原道、何知应、杨殷、王一飞、傅烈、穆清、向警予等同志。在为苏维埃奋斗十年与内战烽火中，我们更有天才的政治军事领袖，遭受敌人捕杀与献身在沙场上的，从领导广州暴动领袖张太雷、周文雍，直到方志敏、黄公略、寻淮洲、赵博生、董振堂、伍中豪、刘铁超、胡少海、王亮、邓毅刚、朱云青、邓平、刘畴西、贺昌、刘伯坚、何叔衡、瞿秋白、陈寿昌、徐彦刚、蔡成熙、徐宝山、王秉璋、刘英、吴焕先、陈海北、孙玉清、周逸群、夏曦、鲁易、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有著名的吉鸿昌同志及东北义勇军中许多烈士。还有为党工作而劳累至死的，前有高君宇，后有沈泽民。这一切为党、为主义、为革命而献身的同志，代表着成千累万牺牲了的党的干部的流血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是在这些死难烈士的血迹中建立起来的。我们要将党的光荣，首先献给这些死难烈士。我提议我们大家起立向我们这些烈士致敬。我们不仅纪念死者，我们还要致敬于现在监狱中成千累万的同志，他们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志士勇夫，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我们更骄傲着在十六年的斗争中，我们还留存着不少最可宝贵的党的领导干部，如朱毛⁽¹⁾等同志已成为世界闻名的领袖，还有在各次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新的天才的能干的领导干部。在这些干部中，我们有许多同志都是十余年来没有一天放下过革命的担负，没有一天放下过武器不与敌人战斗的。有人说：共产党还出了不少叛徒。不错，我们不否认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历史基础还不雄厚，党还幼稚，敌人压迫残

酷，致许多动摇分子没有中间之路可藏，而走上叛徒的道路。但动摇分子愈肃清，愈走开，我们队伍也愈纯洁。那些帮助敌人破过我们机关，捉过我们的人，屠杀我们同志的叛徒，让他越走开点越好，越滚远点越好。现在有些叛徒眼看着捕人杀人的饭是难吃了，又想来和党勾搭。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再也不会理他们了，请他们滚开去罢！

显然的，我们对这些胜利还非常不满足，我们缺点还多，我们党在全国领导力量还远落在客观发展之后，还常常犯有错误——这就使今天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力量对比，还大大的落后。因此，需要我们党承受着上述的光荣的历史传统，要发扬光大起来，并要用百倍千倍的努力赶上前去。

乙、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重要历史教训

一、工人运动中的教训——十几年前勃兴的工人斗争与领导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但结果失败了。其教训在：（1）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与放弃争取领导权（在政府中，在国民党中央，在军队中）；（2）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3）革命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弱点！这些弱点一直到现在，在许多地方还没有纠正过来，还没有补救起来。

二、农民运动中的教训——农运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后，而在下层实际工作中却相反地推动了南中国广大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高涨，苏维埃革命将中国党带进了深入农村的教育，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获得了广大群

众的拥护，这个基础将是不可动摇的。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有过渡的办法，但根本上土地重分的原则是不能变更的。

三、军队工作中的教训——在雇佣的割据的军阀军队中树立共产党的军队基础与建立革命的军队是不易的法则。——过去所得的教训：（1）放弃树立党的基础；（2）回避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3）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和决心，结果因反革命军事力量大过我们而失败。——最近十年斗争教育了我们自己：（1）在极艰苦环境中保存力量的信心；（2）认识武装工农的无限源泉；（3）建立起共产党的唯一领导；（4）有了国内战争的胜利经验，这将指示着我们今后对日抗战胜利的途径，争取国民党军队的途径，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途径。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成功于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建立，领导了大革命两年的胜利和发展，而失败于：（1）帝国主义、封建力量还相当大；（2）资产阶级叛变；（3）革命军队的动摇；（4）主观上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其内容：

（一）对国民党是阶级联盟的党的性质的认识不足，及争取领导权的放弃；

（二）对土地革命不认识与工农运动之受压抑；

（三）对争取军队与建立自己军队工作之放弃；

（四）党失了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本身领导的混乱；

（五）对帝国主义策略，在革命开展中，尚不能善于利用其中的矛盾（虽然当时他们的矛盾要少于现在多多）。

这种教训应该教训我们在国共重返合作的今天。这其中有利的是：（1）工农有了初步巩固的联盟；（2）土地革命深入了；（3）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4）共产党锻炼出来了；

(5) 帝国主义中间有了可利用的矛盾，而日寇成为主敌。但同时也有不利的是：(1) 资产阶级有了与封建势力巩固的联盟；(2) 他们统治了十年；(3) 他们与一部分帝国主义有了密切的关系；(4) 他们有了较强大的军队；(5) 他们有了上一次合作及十年敌对的经验。因此，他们畏惧我们与其妥协性更加增大。因此，我们自信心与警觉性，应该同时提高起来，我们要发动、组织和领导千千万万的工农小资群众，争取抗日战争的发动，争取抗日战争直到彻底的胜利之途。

五、苏维埃运动的教训——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共产党唯一正确的道路，是组织工农贫民建立苏维埃政权。说我们错了，是完全不对。苏维埃政权给了中国广大人民以最实际的利益，在各苏区中尤其江西、福建。虽然因为：(1) 敌人倚靠帝国主义力量还大；(2) 日寇祸深，人民希望南京转好；(3) 中国国内革命发展不平衡；(4) 我们领导战争还有错误，致许多苏区失败，但不是完全失败的。在西北我们创造了苏区，保存了红军主力，成为今天抗日统一战线发起的中心，在全国失败地区中，我们还看见：(1) 我们影响的存在；(2) 我们活动地区的保持不少；(3) 我们力量保存不少；(4) 我们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保存不少。这样，便使我们今天有更多可能去发动抗战，组织抗战，领导抗战到最彻底的胜利。

承受着十六年头的光荣传统，学习着十六年来的革命教训，中国共产党员应该自负地自觉地担负起目前的伟大的历史任务——领导全国反日统一战线的任务。

党从小团体发展到现在，从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万人直到十几万人的今天，经过这样多的血的教训，我相信我们党员不会辜负这个光荣传统，不会不去学习这些宝贵教训的。

眼看着全国，眼看着无产阶级，眼看着全中国人民，眼看

着日本——主要的敌人，我们就必须散布到全中国去，领导起全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想到世界，想到将来，想到我们党创造的艰难，想到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目标，我们还要领导中国走入社会主义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毛泽东。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一) 党在任何时候，应当利用党内在被捕后始终表示坚定的同志的模范例子，来教育同志，提高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同时应当在思想上坚决打击那些无气节的动摇叛变分子。

(二) 凡国民党清剿区域内，整个乡村的群众均须填写自首书或类似的文件者，其中共产党员亦应同群众一样，填写这类文件，以保存党在群众中的秘密组织，这种行动对于革命是必要的，这类共产党员决不能称为自首分子。

(三)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志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查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四) 凡支部同志，在过去领导机关负责人叛变后，供出他的姓名住址，因而被捕并被强迫照例填写自首书，但并未供出组织内部秘密，又未进行任何反共工作破坏党的组织，恢复自由后，继续革命工作，经过工作中考查之后得恢复其组织。

(五) 凡在群众斗争中或被捕或因党的嫌疑被捕未供出他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即并未承认是党员），因有人担保，而法庭一定要照例填写自首书或一般反共志愿书，始能出狱者，亦可

不作自首论，经过工作中考查后，得恢复其组织。以上同志事实上均非自首分子。

（六）凡自动自首而无以上四种情形者，或被捕后一度动摇填写自首书，或发表反共宣言，但并未破坏或损害党的组织者，必须开除党籍。如彼等愿意继续工作，要求入党者，可给予某种工作以考查之。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而确有卓越的成绩者，可重新介绍入党，但必须经特委省委以上党部之许可。

（七）凡被捕之后，供出党的秘密组织，因而破坏党的组织者，永远开除党籍。但如彼等确实表示悔悟，党可使其做某种工作，可以左倾群众看待，不念旧恶。

（八）凡叛变分子依反共为业，现在还在坚决反共者，党应当坚决打击之。但对于那些虽在反共团或反共义勇队，或反共的区乡公所办事，而实际上并未反共或摧残革命群众甚至常能帮助党与革命群众者，则仍依照以上各条的具体情形处理之。

（九）应当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去细心的分别各种不同的“自首”的情形，而一律的采取排斥与打击的方法，这是一种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应反对另一种倾向，即是随便的恢复过去动摇叛变的分子到党内来，这是腐化党破坏党的纪律的右倾机会主义！

中央组织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

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 华北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 华北致宋哲元等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北平宋明轩先生，平津张自忠先生，张家口刘汝明先生，保定冯治安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除电蒋⁽¹⁾委员长，及全国友军请缨杀敌外，特此奉达，即祈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卢沟桥事变后 华北工作方针给北方局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北方诸同志：

卢沟桥战争有扩大可能，不管日方将扩大为大规模战争或将暂时取外交压迫形式，我党在平津在华北应立即开始执行下列方针：

甲、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提出：“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等口号，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

乙、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执行上述方针之具体办法，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

丙、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

丁、进行坚决的反汉奸斗争。

中央书记处

八号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人民抗日红军要求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 为抗日前驱的通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

庐山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汪主席，太原阎副委员长并转国民政府各院部长，西安行营顾主任、何副主任，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¹⁾并转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钧鉴，各省军政长官勋鉴：

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智，惹起虞晚卢沟桥宛平事变，杀伤我国军民，强占我国土地。此种盗匪行为流血惨剧，不特破坏国际信义，且为日寇侵占华北之信号。证明日寇灭亡我国之野心变本加厉。我冀察当局及二十九军将士为自卫而抗战，誓保国土与城共存亡，忠义勇烈，不愧为我大中华民族之男儿。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二十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谨此电闻，翘待钧命。

彭德怀 贺 龙 刘伯承 林 彪
徐向前 叶剑英 左 权 萧 克

徐海东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
战斗员 同叩

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林森、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阎锡山，顾祝同、何柱国，毛泽东、朱德。

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

依据最近的情势和我们的工作状况，目前蒙古工作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 绥东抗战胜利与百灵庙夺回时，有人设想日寇进攻绥蒙会缓和下来，事实与此相反，现在有一切的证据说明，日寇并没有放松他的侵略计划，而在积极准备比以前更大规模的新的进攻。绥蒙当局与蒙汉人民，应该有积极的准备和充分的动员，以抗击日寇及其走狗的新的进攻。

绥东抗战的胜利，瓦解了德王⁽¹⁾领导的军政委员会，德王及李守信、王英部下起了很大的动摇并发生了几次投到抗战方面的哗变，而在蒙古人民以及上层分子中，提高了能够胜利抗战的信心。在这种情势的下面，我们不但应该而且有很多的可能去发动蒙古人民中各阶层的抗日运动的广大潮流，以争取抗战更大的胜利。但我们的工作恰恰在这方面表现了很大的弱点。

一切指导蒙古工作地方党组织与担任蒙古工作的人员，应当把发动蒙古民族抗日运动高潮当做今天第一等重要任务和一切工作的中心。

日寇在前线不断的进扰与挑战，特务机关及其走狗在蒙古内地肆行无忌的活动，造谣，挑拨，制造蒙人内部的纠纷与冲突，破坏蒙汉的联合，以及日寇在平津的进攻及卢沟桥事件，

这一切事实，每一个事件，都应成为在蒙古民族中揭露日寇及其走狗之阴谋与发动抗日运动的机会。对于蒙人内部的冲突，如各族间之纠纷争执，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消解之，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适当的消解。我们的口号是：

蒙古民族，不分盟旗，不分上下，团结一致，抗日援绥！

保卫绥远，保卫蒙古！

驱逐日寇出绥蒙！

（二）由于下列的事实，对德王的策略应当改变之：

（1）德王对大蒙族主义的压迫有过较强的民族意识，曾经代表着蒙古民族独立解放的意向，他之转到日本傀儡方面，是由于日寇利诱与国民党政府逼之使然。（2）他在内蒙民族中有比较广泛的信仰。（3）他现在是一个日寇傀儡，但因为他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他没有完全成为殷汝耕与溥仪。（4）日寇对他的不十分信任与劫持，他的部下不稳固与进攻绥蒙的失败，都增长了他的动摇犹豫。（5）如果德王离开日寇，则日寇在内蒙中即失去其有力的支柱。因此，我们对德王应采取争取的策略，不要故意逼他做溥仪第二。过去“打倒蒙奸德王”的口号，应当改为“要求德王抗日”的口号。依据这个策略，应当向德王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同时向德王采取公开的批评，在德王统治下及其他各盟旗的蒙古人中应当揭破与解释德王投日是违反蒙古民族的利益。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只有这种解释才能使蒙古人民认识反动民族运动与革命民族运动的区别。在德王部队中与其统治下的蒙人中应提出“蒙古人打蒙古人”、“不打抗日部队”、“不替日寇当走狗”的口号，应发动要求德王抗日的运动。在其他各盟旗及汉人方面在不放弃公开批评的原则之下，应向德王表示，希望他回转头来，领导蒙人抗日。

(三) 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应当进行以下的工作：

一、共产党与南京、太原、绥远以至宁夏、榆林当局之间，须迅速求得对于蒙古工作的上层的谅解与一致。对于动员蒙古人民与武装力量援绥抗战的问题上，对于团结蒙古内部消解各旗矛盾、冲突，对于适当的解决蒙汉矛盾等问题上，只有极力取得上面各方的谅解与一致，才能顺利的进行，这同样也就是争取我党在蒙古工作中的合法与公开的地位，以便顺利的开展抗日救蒙运动。领导蒙古工作的地方党组织，蒙古工作委员会及蒙古工作负责人员都应当相机进行上述的上层统一战线。必须知道，共产党、国民党以及中国各地方政府在蒙古工作中的分立现象，客观上给了日寇及其走狗以挑拨离间的便利。

二、绥远当局（宁夏、榆林亦然）对蒙人仍然继续着大汉族主义的政策，如苛税的剥削，武装的镇压，不许蒙人有抗日的自由等等，都阻碍了蒙汉联合抗日政策之进行，我们应本抗日第一的原则，对蒙人与中国政府的冲突，采取调解的态度。我们应当号召蒙人拥护绥远政府抗日，给以各种援助，“蒙汉联合”、“援绥抗日”是我们动员的口号。同时对于蒙古人的迫切要求仍应赞助他们向绥远政府提出并达到目的。但在今天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如“取消双层税”、“允许蒙人自动武装起来”等。而对于要求赈济灾民，减轻某些过重的捐税，灾区免税，拨款兴办蒙人学校（南京已有此议），帮助蒙人扩大国防武装力量等，则可提出，也应该提出。

(四) 我们在蒙人中，应当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形式去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以团结各阶层的蒙人到抗日战线上来，过去秘密的不能公开的狭隘组织，应当转变到公开的合法

的形式中来。绥远当局采用的“抗敌救国会”、“国民兵”的组织，应当求得在绥远及蒙古当局谅解之下，运用到蒙人中来。

（五）去年八月中央所决定的“内蒙自救会纲领”已不适用，现拟定了新的纲领付来，应提到蒙人中讨论，由蒙人自己参加意见，并由他们自己通过与提出之。

中央二月七日“关于内蒙古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所提到的许多问题，仍然大部分没有失时效。所以这次信只说到上述几个问题，你们仍须参照前次信讨论工作。

中 央

七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军委主席团命令

——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 加强抗日教育问题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彭⁽¹⁾总指挥，任⁽²⁾政委，林⁽³⁾校长，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各师，各团及各军事学校，首长同志们：

(甲) 日本大举向华北出兵，国家危急，二十九军正在抗战，国民政府已调派援军，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

(乙) 令到着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员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现状。军事训练着重实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长途行军，无后方作战等项，各军事学校大体同此办理。

以上各项限十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

(此命令对红军公开宣布，唯对日寇及汉奸分子严守秘密，不得疏忽。)

军委主席团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 〔1〕指彭德怀。
- 〔2〕指任弼时。
- 〔3〕指林彪。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 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 这个宣言是周恩来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起草，七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正式交付国民党，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的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各地党部：

日本已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二十九军正英勇抗战，华北各地救亡运动正在扩大起来，中国政府正派兵增援。根据上述情况，为执行本党七月八号宣言所述坚决保卫平津，同日寇血战到底之总方针，各地此时最紧急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各地党应即派出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党政军学警商各界接洽，组织这类团体。如此种统一的组织一时不能得到多数同意，可先推动各界组织各自的救亡团体。同时宣传组织统一团体之必要，以待时机一到，即成立此项组织。如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加入此项组织，即先由人民方面各团体发起自行组织，而要求国民党当局批准立案。如国民党方面号召组织这类团体如北平市各界联合会，则我们即可加入工作。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

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对各界中之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总之，为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执行坚决抗战保卫国土的总方针，各地组织及同志应以无限的热忱及毅力，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使命。

中央书记处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实行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朱 德

一、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又响了

七月七号在卢沟桥又燃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是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

日本强盗这次对于卢沟桥的进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它企图着以这次的战争火把烧遍整个的华北，把华北变成满洲第二，至少变成冀东第二。卢沟桥的炮声在惊天震地的响着，日寇的炮火亦密集地向南苑射击着，平津路上已发生了激烈的对战，北平的周围被日本的强盗军包围着，北宁路上一列车一列车的日兵向着平津开来，至少已有五六万之多。日寇声言动员四十万大军到华北来，一切近代的武器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等都被输送到平津来。厦门、汕头等处已驶来了日本军舰。日寇的飞机在华北各处横行无忌地飞行着。这是说，日本法西斯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十二期。

蒂军阀的铁蹄又在驰骋于我们大好的华北土地之上了，又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国土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近卫上台以后，日本内阁与法西斯蒂军阀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完全执行着陆军省的蛮横意志，企图实现吞灭中国，企图以侵略中国来挽救日本国内又在酝酿着的经济危机，来转移日本人民对于社会不安的视线。它乘着英国被缠绕在德、意进攻西班牙的战争中无暇兼顾其他方面时，乘着美国暂时还无充分力量问津远东问题时，乘着中国虽告统一但国共合作还未完全进至具体状况的时候，首先在堪察资及柴那摩哈两岛附近轰击苏联舰队，企图以声东击西进攻苏联的空气来买得各帝国主义对日的好感，作为它对于华北的新进攻的烟幕弹。果然，日帝国主义者在这个烟幕下，在卢沟桥放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以一切近代所具有的武器，向我们的中华儿女大肆屠杀了。

现在的中国已不像从前了，它已有了和平统一一致抗战的决心。它知道，血的侵略只有以血的还击来回答！因此，卢沟桥的挑衅遭遇到英勇的二十九军的迎头痛击！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在这个战斗里表现了他们的无可比拟的勇敢精神，执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天职！

二、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被恐日病苦恼着，恫吓着。在全国人民大众群起奔向抗日巨流的时候，这些人还是匍匐于恐日病的恫吓下战栗着，坚持着中国不能与日寇抗战，因而还应继续妥协、退让下去的谬见。无疑地这一条反动的坝堤，阻挡了抗日巨涛的奔流，客观上尽了日本内奸的作用。我们要告诉这些

人，日本并不是那样可怕的。我们且把日本国内的情形观察一下。日本虽然也挤上了帝国主义的地位，而且又加上法西斯蒂的头衔，但它的经济基础却是那么脆弱，除意大利外，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拟。日本的国外贸易——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从一九二九年起无一年不是入超，它近年来廉价商品的倾销，除了扰乱世界市场与增加对日本劳动者的剥削以外，对于它的收入并没有多少的增加，因为它的这种倾销政策是以几乎低于成本的价格实行的。它的天然资源的贫乏真是惊人，煤、铁、石油、棉花等等的生产量，在平时已经不足用，在大量消费的战争时期，当然更是供不应求。这些对于军事非常重要的原料的缺乏，无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致命伤。

日本的农业经济更是日本整个经济生活中最弱的一环。农业技术的落后，封建剥削的残酷，地租及赋税的繁重以及农民的极端贫困化，一切这些都形成了日本农业经济的特征，阻碍了日本工业的发展，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永远使农民大众陷落在重债、贫困、饥饿与死亡的圈子里。直到现在，日本人民的食粮一部分还是依靠着国外的输入，以这样脆弱的农业来维持长久的战争，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

日本近些年来比较发展的只有军事工业。这种发展虽然给日本经济生活打了一针吗啡针，但它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这种大量消耗而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军事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要支持军事工业的发展，须有大量的闲余资本及军事工业所必需的丰富原料。但是，这二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煤、铁、铜、石油以及棉花等等的产量已不足以供给军事工业之用，财政的支持亦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日本政府这些年来因为支持庞大的海、陆军军费与军事工业的关

系，几乎靠着发行公债来度日。一九三一年后日本政府每年都有很大的亏空，国债是急剧地增加着。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财政年度中它的国债总额已达到一百一十三亿日元的惊人数字，而且还有继续增加之势！公债的发行只能在人民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如果超过这个饱和点，将会引起财政恐慌的危险，但是，日本的公债额早已超过人民能够负担的饱和点了。

日本一旦挑起了大规模的战争，那末，为了支持这个战争，据日本军事家横山的估计，一年需要发行一百亿日元的公债，他同时承认发行这样极大数量的公债是极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既要冒险地进行战争，每年非需要这么多金钱不可。国内既不能负担这么多的公债，国外借款亦是茫茫无着，以这种财政状况来进行战争，究能支持多久，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呵！

再看日本的军事状况。日本军阀对于他们的军队，时时引以自豪。我们也承认它在组织上、武器上都是有着相当的强点。但是，根据一家德国报纸的估计，日本现役的军队，连满洲的与驻在中国边界的共有一百二十万的数目。也许这个数目是夸大了一些。即使这个数目是准确的，拿这些军队一方面对付苏联，一方面又在漫长的战线上进攻中国，这显然是不够的。根据另一德国军事家的估计，日本能够动员的军队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这要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率——无疑地今后战争的死亡率将要大多少倍——来比较，这点军队不能够支持怎样长久，亦不能布置在广大地区上的。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也还有问题。日本近三十年来没经过什么战争，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早已是历史上的陈迹。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多是些纸上谈兵的“英雄们”，运用到实际的战争里不免便有些问题。淞沪“一二八”的战争以及日军在东三省“剿击”义勇军常常败北

的事实，便是活的例子，不要再狂妄吧！现在的中国兵已不是中日之战的那时候了。

有人说，日本的兵士有很大的耐苦的作战能力。这且让日本军阀来自供。前陆相寺内说：“一九三五年每一千人中有四百个人因为体质不佳的原故而被免除兵役。”积极提倡军事训练与体育的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大数目的体质不佳的国民？一言以蔽之，尽管日本财阀及军阀等等少数人吃得怎样脑满肠肥，但是，占着全国人民最大多数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大众，是吃不饱饭的！驱使这些饥饿的、体质不佳的兵士作战，只有狂妄的日本军阀会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战斗力吧。不只此也，日本兵士多是出身自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他们虽然一时期受了军阀的欺骗宣传，曾在满洲替天皇——日本财阀、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头子——出了一些力，但他们所获得的依然是悲惨的失业，苦痛的饥饿与死亡。当日本的大财阀们从满洲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时，日本工农大众的贫困丝毫未得到解决。这刺激着他们深想到战争的利益只是属于财阀、军阀及地主、贵族的，人民除了承受重大的战费负担与充当炮灰的作用之外，一无所得。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将更会动摇日本军队的军心，他们终会从“忠于天皇”的泥坑中自拔出来，倒转枪头向着他们的天皇、财阀、军阀以及一切好战的反动势力开火！淞沪战争中一部分日军的兵变可为明证。

上述的这些情形已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度不安。社会大众党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便是表现着人民厌弃战争，企图以另一方法找求出路。人民阵线在日本的抬头，亦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只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也加入了这个人民阵线。不错，近卫内阁的上台更与日本军阀接近，更增加了法西斯蒂的势力；但是，法西斯蒂势力的增

强，实际上亦是表现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削弱而采取对内的恐怖政策与对外的战争政策这种自杀的末路呵！我们自然不应忽视日本强盗的强大的侵略力量，否则，将会犯轻视敌人的严重错误；但是，如果过分估计日本强盗的力量，加重了所谓恐日病，对于日本侵略不敢作半点抵抗之想，妥协、退让，我们将会犯更严重的错误，结果是束手待毙！

所谓的恐日病，只是自己脑子里的魔鬼造出来的，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怪物，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牢地记着！

三、抗战是唯一的出路

过去的错误政策我们不必再批评，而且单是批评过去的错误也是不中用的。现在怎样来抗战是我们全国同胞唯一的急务！

东三省已失掉了，热河也不为我们所有了，冀东的汉奸政权形成了，华北亦弄至岌岌可危的形势。一误岂可再误？过去的这种无可比拟的损失终于惊醒了我国同胞，认清让步、妥协与退却只是死路一条，只是亡国灭种的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抗战，只有在抗战中找出路，求生存，不能踌躇，也不容徘徊，这是每个中国同胞应有的决心！

现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都是有利于对日抗战的。国际舆论一致地责斥日本的强盗行径。国内自从西安事变后，与中华民国有着同样长久生命的内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被结束了，国内和平实现了，国共合作的谈判亦有了初步的成功，南京政府的政治路线亦开始了新的转向——这一切，都是在向着我们团结御侮对日抗战的总目标迈进，都是在抗日阵线中的初步成绩。只要这样地继续下去，勇敢地大

踏步地继续下去，终会给与中华民族以新的激动力来实现它的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的！

但是，这些新的转变还只是开始，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还是非常的不够，向民主方面的迈进还是非常的迟缓曲折。我们的敌人正是看清了中国的统一战线的迅速成功对它的灭亡中国是绝大不利的。因此，它就在卢沟桥放了先发制人的侵略华北的号炮。这个号炮便是对我们的警钟。时间再不等待我们了，中央政府与我们全国同胞应该在这短促而紧张的时间里，勇敢而更勇敢地执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政府领导着在全国范围内发扬民主的精神，给民众以充分救国的自由，实现更广泛更坚强的上下一致的团结，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扩大人民对日抗战的力量！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侵略以重大的回击，才能挽救华北的垂危的命运，才能进一步地收复一切失地，实现真正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

自从“九一八”以来，红军便坚持着和平团结共御外侮的方针，从它在中央苏区提出的三个停战条件起，经过西安事变的勇敢的解决直到现在为止，红军一贯地坚持着这个抗日方针。现在，红军的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终于获得全国各界的谅解与拥护了。红军终于被认为是保卫中国与实行彻底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了，红军与各抗日友军的亲密合作与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再也不会被日本强盗的挑拨离间与种种恫吓所破坏了。相反地，在它愈逼愈紧的形势下，我们亦应团结得愈紧。红军在这十年的斗争里，锻炼了成千成万不畏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它的政治认识与政治信仰，红军中的每个战斗员以及饲养员、炊事员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认识，知道怎样执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务；创立了灵活的、巧妙的、任何强敌都为之战栗的游击战术；建立了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制

度；在广大群众中播下了新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种子。我们不是在自傲，而且亦不应该自傲，我们只是把这些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说明出来，热诚地贡献给一切抗日的友军与全国的同胞。这些宝贵经验对今后的抗日战争将会有极重要的作用，将会收结更多的革命的果实。不但每个红军战斗员应该继续学习，作更广深的运动，全国每个抗日的民众与抗日的士兵，亦值得采纳与运用的。

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力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是彻底地为民族解放，是实现真正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为了这个神圣任务的实现，他愿意放弃十年来有着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作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我们愿意开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愿意担负任何艰难、任何危险的战线与日贼周旋，愿意与宋哲元、冯治安将军领导下的英勇搏战的二十九军赤诚合作，把日贼驱逐出去，保卫我中华民国的华北！我们不但对于宋哲元、冯治安诸将军与二十九军的将士表示最热烈、最诚恳的敬意，并且忠诚地愿意以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援助为国为民而抗战的二十九军，来与一切抗日的友军携手！向着我们的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冲去！

四、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

日本帝国主义绝不是甚么可怕的恶魔，只要我们全国民众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向着它抵抗，搏战！除了抵抗与搏战之外，

我们再无其他的出路。因此，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奔向这唯一的生路！

但是，当前线的士兵正在以生命与头颅来与日寇搏斗的时候，日寇正在源源不绝向平津等处输运大军的时候，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奔向抗战的时候，从平津透露出来与日寇交涉“和平解决”的噩耗。我们希望宋哲元将军认清现在的趋势不再上日寇的恶当。这种和平解决能给我们什么呢？卢沟桥附近以及平津道上被日寇蹂躏殆尽了，该地成千成万的同胞被迫走到逃亡与饥馑的路上去了，日本开来了多少万大军盘踞在平津各地，作随时攫取华北为已有的准备，平津陷在日军的包围下，二十九军的后路亦被截断了。这样的和平解决是与虎谋皮，是自取灭亡，贤明的平津当局当不致出此吧！现在全中国已踏上了一个新的抗日阶段，再不允许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或何梅协定出现于中华人民的眼前！华北人民与二十九军的英勇将士再不会容忍一个这样的条约！

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我们应该把握住抗战的胜利条件。

现在南京政府为了应付紧急的国难，已由庐山搬回南京办公。蒋介石先生亦飞返南京。蒋先生并于十七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谈话，我们极端同意蒋先生的卢沟桥事件系最后关头，倘若北平成为沈阳第二，那么南京亦可成为北平第二的意见。南京政府对于应战亦已有所表示。但是，我们认为，要胜利地抗战，便应该坚决厉行集中一切抗日力量的准备，吸纳一切抗日的优秀人才到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中，排除一切妨碍抗战或

破坏抗战的分子，以民主方式广泛地动员全国民众，同时，以全力应付这一战争，迅速派遣大军到华北来。

我们不必讳言，华北各省的军队还是操在一些个人的手中，指挥上是不统一的，行动上亦不甚一致。这大大地妨碍了对日的作战，且有被日寇挑拨离间以及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中央政府应立即组织华北抗日军队的总指挥部，或由蒋先生亲自北来指挥，或委派华北的重要将领指挥。一切在华北抗战的军队，统由这个总指挥部指挥调遣。红军如被调到前线上去——这是我们所切盼的——当然亦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一切抗战的军队，免去一切隔阂（如果有的话），扫除一切门户之见，不分畛域，不分派别，齐心协力，整齐着步伐，实现一致的对日抗战！

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民为邦本，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与民众更密切地联合起来。西班牙政府与叛军及德、意法西斯蒂奋斗了一年之久，虽有德、意军队的强大武力直接参加进攻，但仍胜利地保卫了马德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赖民众，动员民众与武装民众的原故。这一宝贵的经验现在应该充分地运用到中国来。但是，我国民众的救国力量在过去是被钳制、被压迫了，即在今天亦还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这无疑义地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为了使抗战能够有把握，应刻不容缓地废除对于人民的束缚，予以广泛的民主自由，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到前线上去，领导着民众在前线上以及在日军已占据的区域中组织大众的游击队，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

华北民众，特别是平、津、保一带的民众，在这次抗战中

有着最重要的作用。应该动员他们到前线去与二十九军一同生活，一同作战，予二十九军一切必要的援助，实现真正的军民合作。应该组织成各种游击队，在日军出没的地方找寻它的弱点向之袭击，破坏敌人后方北宁路的交通，使日本人不能够再利用这条铁路运送军队。同时，在平津的民众应该组织起来，协助当地政府维持秩序，进行巩固后方的一切工作，缉捕汉奸，创立各种宣传队、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等等，随时准备着在前线与后方服务，以履行人民应尽的职责。

最后，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已在英勇地抗战了。这个战争不是某军某地方的抗战，而是全国一致抗战的开始。我们不能让这英勇抗战的军队孤军独斗，应该在实力上、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以充分的援助。因此，中央政府方面应立即调遣飞机、重炮及大军速赴前线应援，接济抗战军队以一切必要的武器、子弹与军需，这是极端迫切与需要的，愿立即实现。至于全国民众方面更应大规模地进行募捐运动，广泛宣传与组织各地民众到抗日的阵线来。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看护队、前线服务队、歌咏队、戏剧队、输送队以及义勇队，予以必要训练，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服务！总之，以一切的力量与一切的方式来增强与扩大这一英勇的抗战！

当然，应做的工作还很多，工作的方式也还很多，我们这儿只提出一些例子，不能一一尽举。只要认清了这个抗战的严肃性，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形，采用一切可能的工作方式与活动，予这个抗战以种种有效的援助，才能真正地实现救国的天职。战争是这样的迫急，时间是这样的紧促，联合各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的口号应立即变为实际行动！团结一切力量，动员一切力量，武装一切力量，奔向全国一致对日抗战的总目标！

不管敌人怎样残暴，怎样强悍，在抗战到底的进程里，最

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我们不但有着这样坚决的信念，民族解放的灯塔亦在这样照耀着我们走向最后的胜利！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 卢沟桥事件正在扩大中。日本政府已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大批日军正由日本、朝鲜、满洲伪国输送来华，这是日寇直接武装占领华北的整个计划的开始，其首先目的是在直接占领平津。

(二) 二十九军将士对于日寇的进攻，到处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最高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等则在动摇中。他们企图以对日让步来保持他们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但他们的这种倾向将遭受二十九军将士及华北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三) 在日寇进攻开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从新开始大规模的酝酿与发动，有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之势。到处发生着援助华北的行动，组织着各种救亡团体，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动摇妥协。许多国民革命军将领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同情抗战，要求抗战。

(四) 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氏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已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但是否已最后放弃暂时妥协的企图则尚属疑问。南京亲日派势力，采取隐秘的方式活动着。

(五) 国际上英法对中国虽表示某些同情的论调，但他们

不赞成中国今天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希望中日妥协。他们这种态度，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美国还保持着静观态度。苏联正在严密注意事变的发展，加强远东的防卫与警戒。德意正在西班牙以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响应日本。日本法西斯蒂有可能向苏联同时实行挑衅，以引起德意向苏联的进攻，以造成世界大战。

（六）我们认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与华北与全国免于沦亡的唯一出路。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于中国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华北葬送给日寇作为以后继续侵略的有利阵地。

（七）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这一总任务下我们主张：

（甲）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

（乙）全国人民总动员，立刻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丙）全面的抵抗，不但要在军事上实行抵抗，而且必须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

（丁）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

（戊）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

（八）在全苏区必须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进行援助抗战将士的运动，并号召全苏区人民与红军指战员准备立即抗战。红军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准备立即向华北出动，执行对日直接作战的神圣任务。

中央书记处

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 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武装部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据各方面消息已证实冀察当局宋哲元已接受日方所提出下列三个条件，即：（一）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二）二十九军从平津卢沟桥永定河以东撤退；（三）镇压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这些条件已开始实行。此外有无秘密协定，尚不得而知。

全国同胞们！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同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要求完全相反，同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对于卢沟桥事件之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亦完全相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万万不能接受这种投降屈辱的条件！我们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接受这类亡国灭种的条约！我们要求为保卫平津，保卫冀察的每寸土地而血战到底！

全国同胞们！形势是万分紧急了！日本大量海陆空军正向中国开进。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与妥协了！正像蒋介石先生所说的：“今日的北平若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亦何尝不可变成北平。”问题的中心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放弃平津，放弃卢沟桥永定河以东的大块中国领土，则冀察必然不保，必然成为第二个东四省，冀察不保，华北与全中国即将垂危，亡国灭种即将相继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对于日寇的让步与妥协！

全国同胞们！我们决不能对于宋哲元的投降屈辱的“已成事实”与中日间的所谓“地方解决”，表示默认与软化。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来贯彻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所宣布的抗日方针。在今天，仅仅是激烈的宣言，不承认的声明与抗议，已经不够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怕这些的。在今天，希望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干涉，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横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管这些的。今天，我们需要最实际的办法来保证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的实现，来保证蒋介石先生所宣布抗日方针的执行。这些办法应该是：

（一）立即命令冀察当局宋哲元等拒绝执行日本所提的三条件，率领全部二十九军实行武装抵抗，如宋哲元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则立刻明令撤消宋哲元现任职务，另派大员领导英勇的二十九军将士及华北各军实行抗战。

（二）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并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立刻召集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

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以配合抗日主力军的作战。

（三）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权利，满足人民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四）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武装缉私，抵制日货，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

（五）立刻改革政治机构，使中央与地方政府民主化，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会议真正成为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肃清潜在政府内部的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这样使政府与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六）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七）立刻实施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等各种新政策，以巩固国防，改善民生。

（八）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

全国同胞们！只要我们的政府与人民能够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我们就有力量战胜日寇，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一切失

地。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坚强的力量才能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新中国。

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现在是民族存亡紧急关头。大家紧密的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

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保卫平津华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毛 泽 东

一 两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十二期。

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就是方针问题。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就是方针问题。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

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 套 办 法

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

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

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

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的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

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随之以这一套办法，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

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一定要实行这一套办法。试验坚决抗战有诚意与否，看他肯采取并实行这一套办法与否。

另外还有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

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三 两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

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 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实 践 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 泽 东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

*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

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

觉，在他们的脑子里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

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

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

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1〕}。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

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

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

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

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

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

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

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

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中共中央关于南方 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目前统一战线开展与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形势，各游击区域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应该依据下列原则，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

（一）政权问题。争取地方政权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进行的步骤是：（1）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取消苏维埃的制度，采取国民党现有的政权组织形式，用普选的方法选举保甲长、分区长，保障政权实际上仍在党的领导之下。（2）凡游击区域没有旧政权的，同样建立现有国民党式的政权，有旧政权的，则力争旧政权的民主化，争取党的领导。（3）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尽量实施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如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等。

（二）土地问题。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争取与团结群众在党的周围。（1）尽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如增加工人雇农的工资，改良待遇，减租，减息，减税）。（2）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与合作社等等，到

里面去工作，真正在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得领导。没有这类组织的地方，组织这类合法的组织。这类工作，也应该完全利用合法的形式。（3）在已没收分配土地的地方，注意保障群众已得的土地革命利益。豪绅地主至多只能与一般人民得到同等的利益。（4）已被移民的地方，应该用各种方法争取移民回家，设法解决其土地耕具房屋等问题。

（三）武装问题。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1）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2）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处主任及总支部书记的三人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一切工作。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均须改变以适合于新的情况。（3）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4）赤少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的改变或混编在当地壮丁队民团中去起作用。（5）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但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须用大力量，利用时期，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每个指战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6）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判好以前，我们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式募集钱粮。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采取没收的办法。

(四) 群众工作问题。(1) 在顺利的条件下，原有苏区及游击区域已有的群众组织应保持其存在与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民主化与党的领导，改善群众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使之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纠正党代替包办群众团体和改变群众团体为第二党的倾向。(2) 在不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的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与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3) 在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争取人民的权利，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等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中，党必须及时注意防止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党时时刻刻应当注意能去团结与领导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针。(4) 必须有计划的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 对国民革命军工作。现在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军工作的方针一般的不是瓦解它，而是采取争取其官兵共同抗日的方针：(1) 站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向官兵宣传解释我党的主张，首先是以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主张，去争取停止内战，互不侵犯，以至进行和平谈判，成立协定。(2) 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士兵，提高官兵政治的民族的觉悟与抗日情绪，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从部队的日常生活出发，逐渐的进行改善士兵生活改良部队的纪律组织与教育。(3) 但在它们继续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仍应坚持自卫的游击战争。

对于民团，一般的要同样采取以上的方针，但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坚持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在我们和当地驻军与政权谈判好时，可同它们共同解决之。

（六）关于党的组织与工作。（1）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与党员，不应该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或左派分子，决不要他们直接做党与群众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的地位上，做他自己可能做的工作，如政权的民主化，以及经过政权力量减少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等等。（2）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首先，要把党的工作与其他政权的、武装的、群众的工作方式分别清楚，不能混淆，不能代替包办。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党不应直接干涉其他组织的独立工作。不仅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应当广泛实行民主制度，即党内在可能条件下，亦应发展党的民主，实行集体的讨论与党的领导机关的选举。（3）有组织有计划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与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的有系统的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的重要。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在没有和平以前，一面要进行坚决的自卫战，一面又要坚持统一战线的工作求得和平。在和平之后，我们的任务不但不减轻，而且更为加重了。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 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 的组织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之原则，具体规定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如下：

一 党的组织

(一) 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

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不向下级宣布。其关于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的决定，分别交给军事政治及党的机关执行，但不干预单一首长的日常职务和工作。对一般问题，也只作原则上的决定和定期的检查。单一首长对于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同意时，则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解决之，但在未解决前仍须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二) 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

完全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选出，师的由九至十一人组织之，团的由七人至九人组织之。党委会（以下同此简称）的职权是：

1. 师党委会在上级党委会及同级军政委员会领导之下，团党委会在上级党委会领导之下进行全部的党的工作。

2. 各级党委会的任务是：（1）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2）依靠党的工作和组织的基础，保证上级每一任务的完成；（3）对于干部的审定和保证；（4）监察党的道德和党的纪律之执行。

3. 团一级无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团党委会的职权，应较过去的总支部为扩大，也应较师的党委会为扩大，即须相等于过去特别小组的作用。团党委会的决定，同级首长在党的组织上有执行之责任，如有冲突则诉之于上级党委会和军政委员会。

4. 各级政治部（处）主任，有代表同级军政委员会和上级党委指导同级党委会之责任。

5. 各级党委会互推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常委委员任职于政治部（处）的组织部（股）内，负党的工作之责。

（三）旅营两级由军政主要干部，组织特别小组，讨论本部队的工作，与进行相互间适当的自我批评。

（四）连队的党的支部，是党在部队中的基本组织，支委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五至七人组织之，其分工为支书、副支书、组织、宣传、民运、青年等委员。

（五）连队的干部不另组织干部小组，混编入一般小组内，遇有关于干部的问题时，可由支委召集专门的干部会议解决之。团以上各机关，则须在支部之内，组织干部小组，以便于

本身工作的讨论和自我批评之发扬。

(六) 支委会三个月改选一次，团委会半年改选一次，师委会一年改选一次。在选举之前，须事先提出一倍以上之名单，交给党员或代表讨论，并可由党员或代表自己提出名单。

(七) 支委会至少一个月向党员作报告一次，团委会至少两个月，师委会至少四个月向党员或活动分子会议作报告一次，并发动党员对于报告之批评与讨论。

二 政治机关

(一) 改编以后的政治机关，仍为团师以上之组织。师以上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

(二) 确定各级政治部（处）主任为同级单一首长的政治助手。

(三) 各级政治机关在上级政治机关和同级军政委员会指导之下工作，其职务是：

1. 确定政治工作即是党的工作，故其中心仍是进行党的工作，保障党的策略路线的执行。

2. 实施部队的政治文化教育，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

3. 保障部队每一具体任务的完成。

4. 进行友军、敌军（日伪军）和地方居民的工作。

(四) 适应于上述的职务，在政治部（处）主任指导之下，应分设组织部（股），宣传部（股），民运指导部（股），敌军工作部（股），分任各项工作，各部（股）的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 组织部——专负党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政治干部的配备之责。

2. 宣传部——专负部队内的宣传教育文化娱乐之责，并于下设青年干事，指导青年工作。

3. 民运指导部——专负对外宣传及对居民和友军的工作。

4. 敌军工作部——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责。

（五）营设政治教导员，连队设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并依靠着支部进行一般的政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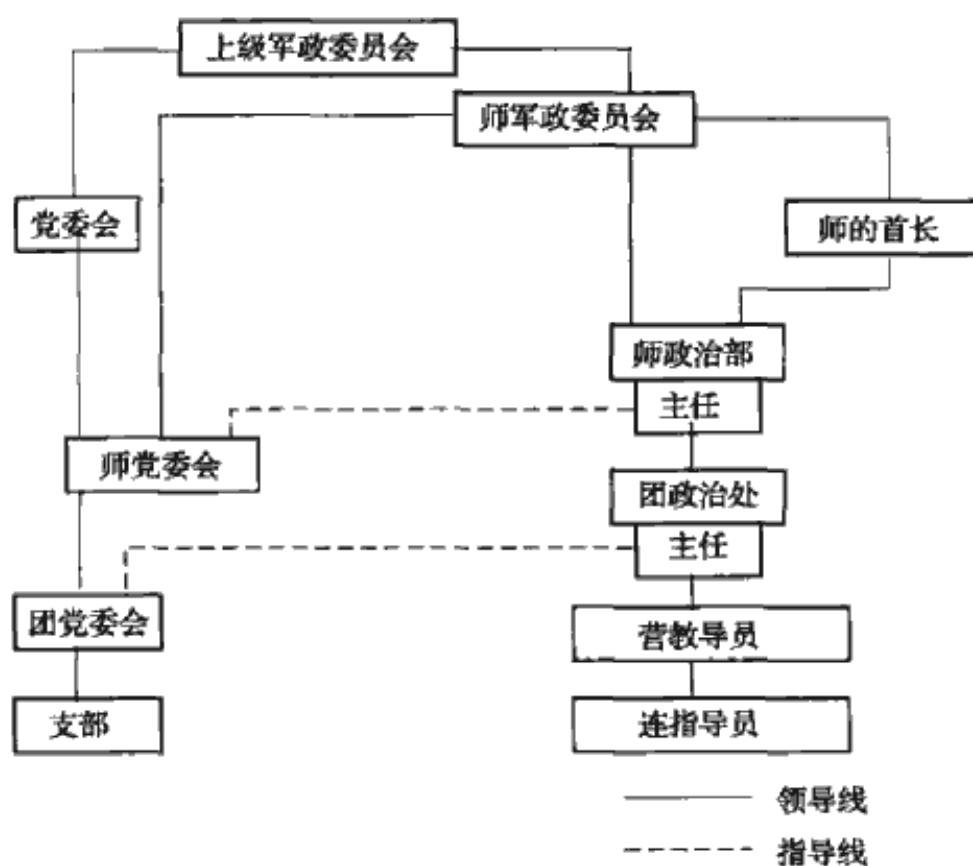
（六）团设俱乐部，连亦设俱乐部（列宁室改名），组织与进行部队的文化娱乐及各种课外的活动。在连队俱乐部之下，设立经济委员会，由军人大会选出，负责审查连队的经济，防止贪污，改善部队的的生活。

（七）青年工作系统仍保存，师团两级设青年干事，连设青年队（取消朱德青年队的名称），其工作中心是组织青年的积极性，活跃连队的的生活，发扬青年在政治文化的学习上和战场上的模范作用。连队青年队长，由支部青年委员充任之。

（八）在部队中以师为单位，设立互济会的组织，采取自愿加入的原则。连设互济会组织员，由会员大会选举之；团设三至五人的委员会；师设五至七人的委员会，由各级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之。

（九）连队的组织，除党的支部、青年队、互济会组织员及俱乐部和所属的经济委员会外，必要时可设立民运工作组，在支委民运委员领导之下进行地方居民及维持纪律等工作。

部队党及政治组织系统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下）刊印。

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 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一) 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抗战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第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停止了九年来的内战，在红军面前放着新的敌人——具有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第三，红军改名后，各种破坏者对于我们的破坏将必然采取更多更巧妙的方法；同时我们改名后的环境，一方面给了它的活动与外界不良影响的传入以更多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扩大自己影响的便利。

因此，这一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在抗战中的胜利。这一工作不仅在未加入作战前的每一分钟去进行，特别要抓住抗战中的每一空隙去实现。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创造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这些都是使红军成为抗日的模范军队，以及成为全国抗日武装和人民大众团结的核心的重要条件。

(二) 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为此，必须：A. 改善党的生活，充分发扬军队中所能允许的党内民主，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这里，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民主运用的伸缩性，应有正确的解释，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发生，防止把党内的民主用到军事上去，以致影响到指挥员的威信。B. 党的工作方式，应与一般政治工作分开。党的工作主要方式，是经过各级活动分子与推动整个的组织去进行，而不应用简单的行政方法去代替。C. 严密党的组织，保障工农成分。吸收党员应从政治上考查，经常的有系统的进行个别吸收，反对竞赛突击的方式。D. 提高党员的质量，这就需要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员不仅懂得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而且要懂得党的策略。对时事问题的分析与革命的前途，使每个党员的政治水平高过于非党群众，在思想发展上保持党的模范作用。E. 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必须确立严密的分工与个人负责制，建立有系统的检查和报告制度。这里，必须纠正包办与代替下级的工作方式，大度发扬下级和支部的自动性与创造性。F. 密切党员与非党战士的关系，党员应成为团结非党战士的核心。党员和支部固然应注意群众一切实际问题和每一表现的反映（但不是监视），但更主要是在于政治的解释与实际问题的解决。G. 加强干部意识的锻炼，发扬党的干部的模范作用，党对于党员的和非党员的干部都应起到审查与保证的作用。

(三) 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和爱关

系，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艰苦的斗争精神，都是红军历来的优秀传统。保持和发扬这些传统，是使红军于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然而，必须估计到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度等）以及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军阀军队的影响的容易侵入，可以侵害这些光荣的传统。我们对于自己的基础，应作足够的估计，但防止这些外界的影响与敌人的破坏，并与部队中一切足以妨害部队传统的保持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不断的顽强的斗争，仍然是政治工作的重要责任。

（四）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我们不拒绝新的技术人才的吸收，而且需要吸收一些来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准，但必须经过郑重的选择。对于自己从长期斗争出来的干部，应有足够的估计与信赖，他们始终是我们部队的坚强骨干。其次我们的部队，必须保持绝对大多数的工农成分。在补充与扩大的过程中，应注意及此。

（五）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路线和主张，并依靠于军事政治教育的加强，创造大批的新干部，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应该特别着重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意识锻炼，造就他们成为有远大政治眼光，能够正确认识国内国际环境与斗争的前途，并能独立的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的人才。为此，必须：A.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编定各种必须的教材以保证这些教材和课本以及课外读物的供给；B. 确立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分期推行，固然战争的环境将使系统教育的进行，遭到不少的障碍，

但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来补救这一弱点；C. 除基本的系统教育外，应特别着重时事问题与具体策略的讨论，干部必须阅读并讨论党报《解放》的重要论文和时事述评。各师小报亦须经常供给这类适合于战士的材料；D. 提高文化水准是提高政治军事水准的钥匙。必须纠正过去所谓消灭文盲的错误认识，消灭文盲的标准应该是最低限度能看报纸文件，能写普通的通报和命令；E. 干部的教育应采用轮换训练为基本方式，并加紧日常工作的学习；F. 教育的方式应采取“不求多而求深入”与“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的原则，反对一般的条文化、公式化与呆板的死记的方法。

（六）为了要战胜具有现代技术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大大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的素养，培养干部对于新的技术的基本智识，以便利于进一步的掌握新的技术。为达上述目的，政治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军事的研究，保证对司令机关每一战士的和干部的军事教育实施计划的完成。而政治工作人员的本身，亦须以身作则，加强自己军事学习和战斗能力。这不仅在学习军事的模范上，而且在战场的模范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上，有重大的意义。

（七）估计到公开环境给予我们活动的便利，对于友军和地方居民工作，应该特别加强起来，不要把自己束缚于狭小的工作范围内，而应采取完全公开的方法，在友军中、居民中进行各种宣传工作，进行上层与下层的公开活动，用联络、联欢、参观等等方式，在友军和居民中广泛散播党的主张、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实现民主的重要，号召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斗争，并以红军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他们，团聚他们。在友军中，不应由部队去进行任何的组织，主要的工作，应放在提高其抗日的情绪与巩固其战斗力的方向上。在群

众中更需进行各种抗日的组织，吸收当地进步分子负责这些组织的工作，保证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反对包办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关于日伪军占领区域的地方工作，需要专门的讨论和指示。

（八）在工作方式上应适合于新的形势的改变。估计到战时的环境，要求高度的发扬下级的自动性，保证在上级的意图之下，完成每一个工作上和战斗上的任务，因此，在领导上要具体，但不可呆板和代替了下级的工作，以免限制和束缚各级自动性之发扬。其次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政治工作的经常性保持与巩固起来。战时的工作，固然需要有更多的突击性，但是必须反对用突击来代替经常工作的方式，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把工作的经常性与突击性很好的配合起来，并依靠经常基础来进行某一工作的突击，而且对于突击工作的决定，亦须经过郑重的选择。最后，正由于新环境的复杂工作条件的不同，要求我们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来适应新的工作的需要。

（九）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一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重要，在红军中关门主义的倾向依然存在着，主要表现在地方工作和友军工作束缚于狭小的范围内，不善于运用旧的形式来实现新的内容，对部队战士的要求过高以及个别同志对红军改编的怀疑等。但是今天在红军中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情绪的增长。右倾情绪的重大表现是军阀主义的开始抬头与可能的发展，以及贪污腐化，动摇堕落，失掉阶级立场，易为外界所影响与乎对于革命的厌倦和对抗战缺乏胜利信心。而轻视党和政治工作，建立个人系统，忽视群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等，则是军阀主义的重要表现。只有用最高度的警觉性和不断的正确的思想斗争，才能预防与克服这些倾向的产生与发展，也才能保

证红军的传统和党给我们的伟大任务的完成。

(十) 最后，战时政治工作，基本上适用于过去十年的战时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估计到敌人对象之不同，作战地区和作战方式的差异，要求我们对本军、敌军和居民的工作内容、方式加以很好的研究和适时的转变，这一工作，今天就应该要求各政治工作同志开始准备起来。

总政治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 的原则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周、博、林^{〔1〕}：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2〕}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洛、毛

东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秦邦宪、林伯渠。

〔2〕指当时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朱德、彭德怀等红军总部领导人。

矛盾论^{*}

(一九三七年八月)

毛泽东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正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

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

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

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

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做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

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

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

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

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

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

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性，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

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

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

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群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群众，一笔勾销了人民群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群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群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

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

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

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

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

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

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和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

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

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便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

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

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

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

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

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

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

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 结 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

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 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一切地方工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为最基本原则，一切斗争的方法与方式，不但不应该违犯它，而且正是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

（二）对于所有参战的政府与军队，我们应该完全站在积极拥护的立场，在这一立场上，对于它们的缺点与错误进行善意的严肃的批评。

（三）可能时应该同各地政府与军队进行各种具体的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并尽可能的吸收其他党派及人民团体参加进来。凡已有这类官办团体的地方，我们应该积极的参加，逐渐扩大内部的民主，使之更加群众化。

（四）应该普遍组织合法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参战团体，或某些已经普遍存在的合法组织（如抗战后援会）转变为这类性质的团体。在它的总的领导下，可以发起各种吸收群众参加的活动与组织（如各种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慰劳队，运输担架队，募捐队，义勇军，侦探队，抵制日货十人团，国防文艺团体等），保证一切愿意抗日的派别到内面工作，并发展其中的民主。或者可以首先组织各种上述的个别的统一战线团体，然后再把他们联合起来，组织总的领导机关，这可以就各地的情

况来决定。

（五）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并用一切其他合法的可能，达到这一目的。

（六）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政府的确表示坚决抗日，容许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与公开活动，欢迎共产党到政府工作，我们可以公开用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去参加，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推动抗战运动的前进与胜利。

（七）在抗战中应该坚持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八）应该领导改善民众的生活的斗争。但斗争的方式亦应适合于抗战的利益。以采取用群众压力为后盾的民主的与合法的方式为主，在改善群众生活的过程中，应该鼓励一切同国防有关的生产事业中群众革命的热情，自觉的提高生产率。在抗日的直接后方，应竭力避免采取对抗战有害的罢工之类的斗争方式。

（九）在日寇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到处实行骚扰破坏，捕杀日本官吏，解除日军小部队的武装等。同察北义勇军及东北人民革命军义勇军取得密切联络。组织各种合法

团体（如在家礼等）以组织群众。或打入到合法的与汉奸的组织中与武装部队中去，以争取群众。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下，经过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活动方式去组织伪军及伪保安队的全部叛变与倒戈。在这类区域中党的组织应绝对保守秘密。

（十）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口号之下，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应该争取这些少数民族的动摇上层分子（如德王⁽¹⁾之类）到抗战中来。汉人的政府与军队，应该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使他们自愿的同我们亲密的联合。

（十一）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什么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公开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它党派的不彻底与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十二）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党的工作与组织应适合于战时形势，加强地方党独立工作的能力。共产党员应该以自己的正确主张，艰苦工作，模范行动，谦虚态度去取得群众的信仰，拥护与爱戴。

（十三）红军在抗战中，应该成为一切抗日友军的模范。取得友军与群众的信任。应利用现在公开的与合法的地位进行多方面的活动。

（十四）坚决同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做斗争。但不要轻易把这类帽子戴到动摇分子的头上，必须耐心的用一切方法争取他们到抗战中来，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应该经过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来进行。

（十五）必须同民族失败主义做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民族的自信心，指出抗战必然胜利的前途。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 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

(甲) 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

- (一) 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¹⁾发表谈话；
- (二) 发表边区组织；
- (三) 发表指挥部。

因为彼方的一再拖延，致使党与红军至今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此国难极端严重，要求彼方迅速解决上列问题。

(乙) 要求国民党迅速承认并立即实行下列各项，使红军得着必要基础，以便迅速出动，有效的作战。

- (一) 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
- (二) 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但此项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三原补充，一部分在太原补充）；
- (三) 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
- (四) 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
- (五) 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

（六）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韩城渡河前进）；

（七）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2〕}节制。

上述七项如不迅速决定，将使红军处于不利地位，有利于日寇而不利于抗战。

（丙）请依据上述十项与国民党谈判，务求实现。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阎锡山。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 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议)

(一) 卢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一切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

(二) 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三)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

(四) 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五) 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

* 这个决定原载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十五期。

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

（六）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和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八）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

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

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

对投机操纵。

(七) 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什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 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 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根据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十六期刊印。

为动员一切力量 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甲)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由于日寇无底止的进攻，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提倡、坚决实行和取得全国的赞助，使得“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使得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个提纲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

(乙)但在另一方面，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夺取平津之后，依靠其野蛮的武力，借助德意帝国主义的声援，利用英帝国主义的动摇，利用中国国民党对于广大劳动民众的隔离，毫无疑义将继续坚持其大规模进攻的方针，实行第二步、第三步的预定的作战计划，向着整个华北及其他各地作猛烈的进攻。察哈尔、上海等地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抵御强寇的进攻，保卫华北和沿海，收复平津和东北，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当局必须深切地认识东北平津丧失的教训，认识阿比西尼亚亡国的覆辙，认识苏联过去战胜外敌的历史，认识西班牙现在胜利地保卫马德里的经验，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多年企望的，我们欢迎这种进步。然而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果还因循上述的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有些国民党人说：待抗战胜利后再实行政治改革吧。他们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

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丙）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十大救国纲领如下：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

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

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

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

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丁）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精神，实行上述的十大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中国共产

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

*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九月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

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1〕}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 主 席 朱 德
周 恩 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即林育英。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副总指挥彭德怀就职通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南京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各院部长、太原阎副委员长⁽¹⁾钧鉴：

西安顾主任、蒋代主任、何副主任、孙主席、开封刘主任、商主席、成都刘主席、南宁李总司令、白副司令、黄主席、广州余总司令、吴主席、昆明龙主席、长沙何主席、南昌熊主席、汉口何主任、黄主席、福州陈主席、济南韩主席、保定冯主席、太原赵主席、绥远傅主席、万全刘主席、兰州贺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迪化盛督办⁽²⁾、各总司令、总指挥、军长、师长勋鉴：

各报馆、各民众团体公鉴：

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月养日（八月二十二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开，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肃电奉闻，敬候明教。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总指挥 朱 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叩
有
八月二十五日（印）

根据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十五期刊印。

注 释

〔1〕指林森、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2〕指顾祝同、蒋鼎文、何柱国、孙蔚如、刘峙、商震、刘湘、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余汉谋、吴铁城、龙云、何键、熊式辉、何成浚、黄绍竑、陈仪、韩复榘、冯治安、赵戴文、傅作义、刘汝明、贺耀组、马鸿逵、马步芳、盛世才。

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张 闻 天

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相同的方面，看不到区别的方面；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目前之所以特别提出警觉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右倾危险增长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与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有相当的经验。这样，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同时我们的党也有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米汤，就轻于相信，这是我们内部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之一；另外我们的斗争经验不够，我们土地革命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只有这一套，其他斗争的方式就不熟悉，这也是

* 这是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

容易产生右倾的一个因素，加上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不够。

当前虽然存在如上的危险，但我们有把握相信取得领导权，因为我们是共产党，有马列主义，有丰富经验，有共产国际的指导。这里需要的是我们努力建设自己：注意党的成分的改造，吸收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以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入党；另外加强我们自身的教育，在我们今天严重提出反投降主义这一问题时，思想教育就显得更重要！在统一战线形势下，我们尤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教育。

反对投降主义，重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是投降主义应该反对！农民容易相信人家，小的方面却往往看得很大。如果拿极左思想去武装，就反而忽略了大的问题。

二

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但同时斗争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故现在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还要各地看情况来加强哪一方面。

必须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则就变成神秘的东西。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意识。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前方军委 分会及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甲) 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个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1〕}、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会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第一百十五师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萧华组织之，以林彪为书记。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织之，以贺龙为书记。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织之，以刘伯承为书记。均受军委分会统辖。

(乙) 上项组织均系党内应组织之，党外应保守秘密。

中央书记处

八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即林育英。

对日作战刍议*

(一九三七年)

周 恩 来

一、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因之，必须由现时中央政府所发动领导的全国军队的抗战，发展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才能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民族抗战必须在全民族中进行战争动员，不单是军队动员，而且要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的动员；不单是前线动员，而且要进行后方动员。战争愈持久，后方的作用愈增加其比重。

二、政治动员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原则下进行。国防大计不但使各方面得以与闻，并且应使各方面参与讨论，共同负责。因此，第一要使国防最高会议实际上成为战争领导机关，负责实施国防大计；第二要使国防会议参议会成为讨论和决定国防大计的权力机关，并扩大其组织；第三要在国防最高会议下设立动员委员会，容纳各方面人才，负责实施全国各方面的动员计划，并推广这一组织到全国各省县市区乡。为保证战争动员的直接、迅速、普遍和有效果，战争动员委员会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和垂直的指挥关系，平常的行政机构应力求其简单、节省和合理，多余而有能力的公务员应尽量吸引到各级动员委员会参加实际工作。动员的基础应放在广大民众身上，必须坚

* 这是周恩来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关于“军事动员”部分未写完。

守保障人民权利和利益的原则，才能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必须坚守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有知识者出知识的原则，才能使一切战争动员得到实际效果，而广大民众才能成为支持持久战的不竭源泉。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基本要求，是给人民以抗日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和武装自卫的权利，是制裁破坏人民权利的行为和铲除汉奸的运动。保障人民利益的最基本要求，是减轻人民不平的负担（如减租减息、废除苛杂）、豁免战区人民过去的摊派和负担，实行新的合理的负担，并严厉地制裁中饱贪污。为着有力地实施整个动员计划，必须集中和训练大批人才。因之，国防教育有计划地实施，与对于青年学子和失业的知识分子的救济，是异常急迫的任务。

三、经济动员要在经济国防化的原则下进行。它不仅支持长期的对日抗战，并且要由此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抗战的发动和持久，尤其日寇的封锁，将改变着中华民族的整个经济生活。对外，它要求限制国际汇兑，避免资金外流。战争的持久使它必须选择购买军火和重工业材料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高价的消费品使它无力也无法购买了。一切国际借款和援助，也不得不直接放在战争用途上头，原有的经济贷款，也必须改变其用途或性质才能有实际的意义。对内，它要求容许国内资本流通，提倡土货，奖励分散在内地的小规模的生产，实行农村贷款与合作事业，改良劳动待遇，免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在今天，国家的资本要尽量用在国防工业上，而对于私人资本的发展，国家要尽其指导和援助的责任，并应在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及其计划下，健全经济动员的各级组织。在今天，许多平时的捐税，政府已无法征收。一般工农所受的残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压迫着他们无

力而且无法来参加战争动员。因此，减轻工农贫民的负担，改良他们的待遇，吸引他们积极地出力参战，而将战争在税收方面的需要，加重在富有者的身上，使累进的直接的所得税、遗产税、工商业税的征收与粮食征集的施行，符合有钱者出钱的原则，这将使战争动员能收到最实际最普遍的效果。

四、军事动员要在军事普遍化的原则下进行。它不仅要动员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并且要动员全民族实行参战。第一，在作战方面必须有全面抗战的整个计划，它应包含有任务、方针，军事布置、动员计划。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

毛 泽 东

甲、形势

(一) 日本大规模进攻开始

是大规模的

是继续的

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并有外援

但又是一个冒险的进攻

(二) 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

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

进入了实行抗战的阶段

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包含着严重的危险性

抗日战线中的左派、中派、右派，阶级关系在重新变化，估计到阶级结合之新的情况

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全国开始组织成功，但还是不充实的，不坚固的

(三) 结论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大纲。

是持久战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乙、任务

(一)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十大纲领，全面的全民族的战争

(二) 红军之团结核心的任务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

抗日根据地问题与义勇军问题

(三) 友党友军区域的任务

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

(四) 边区的任务

政治、军事与干部的策源地

(五) 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

两个特点

两个前途

(六) 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自觉与不自觉

反对急性病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混同不同的阶级、党与政策）

民族失败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一种是右的——民族悲观主义（存在于抗日战线的右翼中）

（七）团结干部在党的路线周围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反对自由主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毛泽东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

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

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 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

德怀同志：

真电⁽¹⁾悉。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²⁾。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³⁾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

林、贺^{〔4〕}。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给毛泽东、朱德的电报。电报中请示他是否仍随周恩来去南京一次，以便报告前方实情和争取补充，对整个作战方针和发动民众问题亦可相机进言。

〔2〕朱德、任弼时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致电毛泽东并告周恩来、彭德怀，认为目前前线紧张，彭德怀可不去南京，在以后适当时机再去为妥。因此，彭德怀这次未去南京。周恩来也因前线战事紧张，这次未能成行。

〔3〕指刘伯承。

〔4〕指朱德、任弼时、林彪、贺龙。

周恩来、彭德怀关于 同阎锡山等谈判情形和作战建议 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

毛洛：

请毛择要电博、叶^{〔1〕}。

甲、与阎、傅、杨^{〔2〕}等谈话，具体结果如下：

(一) 红军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运动战，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

(二) 察省境由我、阎做晋北绥远合作，河北非阎所辖。

(三) 成立绥察及晋北战地各级动员委员会，争取民主集中制，在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给人民权力与利益，以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及组织游击战争，各级政府不得干涉。我们拟出工作纲领，阎同意后，即由八路军出面与晋绥合作。

(四) 对改造现有部队与成立新的部队，杨爱源同意而不能做，阎亦在考虑。

(五) 阎欢迎我们派队伍到绥远发展游击战争。

(六) 阎希望我军在山西省内不更换县长，我们答以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

(七) 阎对红军愿受其节制极高兴，并声明红军作战有特长，他不能赞一辞。

(八) 阎允给红军补充物品(已见另电), 并下令兵站帮助运输。但公务机关执行迟缓, 汉奸颇活跃。

(九) 阎同意我们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给他十数条), 我们参观雁门关工事及对大同作战的建议亦采纳, 但恐部下未必能做, 阎亦无决心。

乙、现大同已失, 绥远空虚, 晋局更危。敌有可能以一部略取绥远, 以重兵“扫荡”雁北, 直逼雁门关, 以骑兵突破广灵、灵丘, 攻入平型关, 战代县、五台, 直下太原。另以一部随刘汝明后取涞源, 出白石山东下, 配合涿州、沧州之敌三路攻取保定。

丙、为击破上述可能, 我们复向阎指出目前战局危急。提议:

(一) 为保证运输统一和巩固, 应派兵护路, 统一指挥, 组织工人, 发动除汉奸运动, 迅速输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 以巩固恒山山脉。

(二) 不单死守雁门关, 应实行出击给敌以侧击和扰击, 对左云、右玉应布置相当兵力, 并援护晋绥公路, 骑兵应向大同、兴和、商都之线活动。

(三) 应扩大战委会为晋绥察三省战区动员委员会, 动员中心应放在雁门关以内, 不应再事迟疑。

(四) 我军派队发展绥远游击战争应取得傅同意。

(五) 立即开始政治工作, 改造部队, 特别是依靠国民兵军官训练团九千人为干部, 组织新的部队。

丁、已令汉宸^[3]持意见往前方见阎, 明晨可得回答。山西一切事无阎作主不能做。现华北关键在阎, 仍在努力争取阎多做一点。华北一份我们准备。

(一) 我军两个师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域, 依傍太

行山脉发展游击运动战。目前或将来万一处于不利，可依山向西南发展，并可吸收大批友军、流亡群众及散兵资材。

（二）请即准备王兆相部主力过河至平鲁、右玉、清水河地区，另调二十七军并配以少数民族委员会及游击干部至绥远发展游击战争。如同意，请即办。

（三）战委会如同意我们纲领，八路军拟以聂荣臻或邓小平代表主持，与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成立政府组织。如何，请复。

（四）改造与成立部队须派人帮助，现只有程子华一人。

戊、我们待上述各事有进一步结果后，即去保定与南京，现石家庄以南车不通。

周 彭
元 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秦邦宪、叶剑英。

〔2〕指傅作义、杨爱源。

〔3〕即南汉宸。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游击区 谈判改编时应坚持的方针等问题 给秦邦宪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

博、叶、周并告林、董、朱、彭、任⁽¹⁾：

关于各边区统一战线问题：

甲、湘鄂赣边区傅秋涛等派至武汉谈判代表，承认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及其他许多不利条件，完全错误。已电伯渠、必武，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认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坚持下列各点：

(一) 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

(二) 一定的军饷；

(三) 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

乙、郑位三到南京已见博、叶否？请转博严嘱郑位三依照上述三点进行鄂豫皖谈判，嗣后豫等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边之覆辙。

丙、要求南京责令余汉谋退回何鸣部⁽²⁾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博、叶交涉情况如何？

丁、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

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洛甫、泽东

九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叶剑英、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2〕何鸣，当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于他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近千人被包围缴械。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 及八路军战略部署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¹⁾：

关于情况判断及战略部署问题：

甲、判断敌攻华北大约分为四路，总兵力约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一路山东，现未出动。又一路津浦线，约一个半师团，现攻至马厂。又一路平汉线，约一个师团，现在涿州以北未动。又一路平绥、同蒲线，约三个师团，为其主力⁽²⁾，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至于上海进兵，于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外，又钳制中央军之主力，以便利其夺取华北。以上是对日寇第一期作战计划之基本判断。

乙、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三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东段、同蒲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由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军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

合兵团，至少两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

丙、蒋⁽³⁾以卫立煌军处于敌之包围中，令其向平汉线撤退。阎⁽⁴⁾以灵丘为山西生命线，拟集中十四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判断如决战胜利，则敌之南进可稍延缓，但必增兵猛攻。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使绥远西境之晋绥军、恒山山脉南段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不自行撤退，彼可不战而得上述各地，娘子关之天险亦失其作用。

丁、涞源、灵丘为敌必争之地。阜平、五台、盂县如无南北公路，或可暂时不被敌占；如有南北公路，敌有出一支向南切断正太路之可能。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证明。

戊、晋阎指挥下之傅、杨、刘、汤⁽⁵⁾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

己、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庚、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基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辛、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

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6〕}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7〕}在外交问题^{〔8〕}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9〕}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壬、你们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

毛 泽 东

十七日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

〔2〕当时日军进攻华北的主力系沿平汉铁路南下和由滏阳河迂回平汉铁路的六个师团。沿平绥铁路、同蒲铁路西进、南下的日军不是主力。

〔3〕指蒋介石。

〔4〕指阎锡山。

〔5〕指傅作义、杨爱源、刘茂恩、汤恩伯。

〔6〕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

〔7〕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8〕指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当时，党内曾将同国民党谈判称作外交问题。

〔9〕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

张 闻 天

中华民族的新时代

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开始到来了。

自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到中国以来（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华民族在它们的侵掠，压迫，蹂躏，侮辱与屠杀的前面，始终是不抵抗，始终是委曲求全，始终是和平妥协与投降屈辱。在“九一八”以前，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掠中国的长时期内，中国曾经有过八次因为敌人的压迫实在太利害，所以进行过抵抗。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以前，我们对于日寇的侵略，也曾经有过上海抗战，长城抗战，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的抗战，张家口抗战，绥远抗战。然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这些抗战，都是局部的与暂时的，而且除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以外，其他都是失败的。

近百年来被侵掠，被压迫，被蹂躏，被侮辱，被屠杀的中华民族，最后觉醒到非实行全国性的抗战不足以图存了。东方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十七期。

的睡狮，最后怒吼起来了。卢沟桥的抗战，从此成了中华民族新时代之开始的界牌！

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即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开始，也即是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诞生的开始，也即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历史的转变期的开始。

欢迎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时代之到来！

进步的与革命的神圣的民族战争

中华民族这次抗战的目的，是在打倒世界上最反动最侵略与最野蛮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即是中华民族最后觉醒的信号。这一抗战将动员四万万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武装起来，为保卫自己的祖国，为求得自己的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而斗争。这些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将在民族抗战中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这就是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的最好保证。

中华民族在这个抗战中，已经开始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蒂侵略阵线中一支坚强的生力军，成为全世界为和平为自由而奋斗的和平民主阵线中一个有力的战士。中华民族从此要同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班牙民主共和国，人民阵线的法兰西共和国，以及一切为和平与自由而奋斗的伟大民族立在同一条战线上，手携手的向着光明的世界前进。

这是一个神圣的民族的抗战。这是一个进步的与革命的民族抗战。用全力拥护这一个进步的与革命的神圣的民族战争！

中日两国间的决死战

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侵掠中国的战争，同过去所有侵掠中国的战争不同。它动员了它的全国力量来进攻中国。它用全力来征服中国，并吞中国，灭亡中国。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的战争，是决定日本帝国主义命运的战争。如果这一战争能够胜利，则日本帝国主义将并吞中国，而能够在—一个时期内把它的统治维持下去，并将与西方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如果这一战争失败，则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不能维持它的统治而最后为日本人民所推翻，而以和平自由的日本工农大众的日本，来代替侵掠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地主资本家的日本。正因为这样，所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的战争也是孤注—一掷的冒险的侵掠战争。

对于中国，这一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以后的命运的战争。如果中国胜利，则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幸福就有了保证。如果中国失败，则中华民族即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奴隶牛马与亡国奴，而—一时不得翻身。因此，中国也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参加抗战以战胜日寇。

因此这一次的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决死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日两国的命运，也将决定东方历史的前进的途径。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族万岁！

战争的持久性

日本帝国主义虽是企图用速战速决的战略，集中全国力

量，以达到迅速战胜中国的目的，然而这种企图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中国的抗战是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生存与正义而进行的拼死的战争。在战争的开展中，它更将有无数的人力，无尽藏的物力，来满足战争的需要，使战争能够坚持下去。

但中国方面，如果想要在短时期内战胜日本，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同世界最强大的英美帝国主义等国家比较起来固然是脆弱的。它的国内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阶级矛盾，它的国民经济中有着许多不能克服的弱点，它的国际地位也比较孤立。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东方的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国际上有德、意法西斯蒂侵略阵线的支持。

因此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日两国的战争不能有一时的与局部的胜负。这种相互胜负，在战争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的。特别在中国方面，因为中国今日的抗战还只是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还只是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以在抗战的最初一时期内，中国方面可能遭受到部分的甚至严重的挫折。但这决不就等于中国的最后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从速战速决转变到持久战将是不得已的与被逼的。而中国，则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因为这种持久战对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对于中国却是有利的。中日战争愈持久，则日本国内的矛盾愈益尖锐化，日本方面的困难愈益增加。这就是造成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有利条件。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

中日战争中，在中国前面存在着两个可能的前途。或者是

中国为日本所战胜，或者中国战胜日本。

如果中国方面，把今天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限制于单面的政府抗战，不去动员全民族参加全面的抗战，则中国将为日本所战胜。反之，如果中国方面，把今天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则中国将战胜日本。

所以今天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不论在抗战的哪一方面，如在前方作战方面，在政府施政方面，在肃清汉奸方面，在巩固后方方面，在财政经济方面，在补充给养方面，在宣传教育方面，只要到处能够吸收成千成万的民众参加，则抗战的力量就会几百几千倍的增加起来，一切在抗战中所发生的严重困难，都能够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得到解决。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源泉。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单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它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上的胜利，然而它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产生的危险，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平津的失守，南口张家口的被占，冀察方面及晋绥边军事上的失利，以及上海抗战中的困难情况，均与政府还不愿意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还不愿意把单面的政府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有密切关联的。

因此除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外，我们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万岁！

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

因为今天的政府是一个抗战的政府，所以它同人民的关系

比较改善了，它开始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今天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它虽是对民众的态度有了某些微弱的转变，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废除，少数政治犯的开始释放，但在基本上它还惧怕民众参加抗战，不愿意给民众以参战的民主权利，不肯发动民众与武装民众，不肯改善民众的生活，甚至到处控制与压制民众的参战运动。所以直到今天，它同民众的关系还是非常隔膜，还是非常不密切。因此四万万人民的伟大力量亦无从发挥。前线上的不利情况，抗战中的各种困难与障碍，就是由于这一基本原因产生的。

我们坚决拥护这个抗战的政府，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解决它在抗战中的一切困难，但我们还不能满意于这个政府。我们要求这个政府的进步与改造。而且我们相信，也只有把现在一党专政的政府，改造成为真正代表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才能使现在单面的政府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并坚持这一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是一切抗日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能积极参加于政府，是能够领导抗战彻底胜利政府，是与民众打成一片，代表民众自己意志，为民众所完全信任，又为民众服务的政府。这种政府是全中国人民今日的迫切的要求，也是当今政府中贤明的领导者应该赞许并自觉的促其产生的。

可惜在这样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当今的政府中还存在着某些把一党一派的部分利益看做高出于全民族的利益的近视分子，他们死抱着一党专政的成见，不肯自觉的向着政府的进步的方面前进。他们总是在逼得万不得已时，才肯向着民众让一些步，这种让步总是被动的，不愿意的，吝啬的，因此总是不彻底的，落后的，不能适合于当时所需要的。这对于争取抗

战的最后胜利，实在是很大的损失。

全中国人民应该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忠告这些分子：中国亡了，你们的局部利益也就没有了，你们应该赶快觉悟才行。全中国人民应该利用一切机会与可能，积极参加到抗战中去，表现出自己的伟大力量，以推动政府的前进与改造。

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

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

今天抗战的国民革命军在前线上表示了他们的坚决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值得全中国人民赞扬的。这证明：民族抗战是怎样能够发挥着潜伏在几百万将士心胸中的民族意识到很高的程度。然而应该看到在军队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军阀主义还没有消灭，官兵还没有能够同甘苦，士兵的生活还十分恶劣，抗战的积极性还没有提升到最高度，军队中还没有保障部队在政治上的坚定性与积极性，提高部队自觉的政治军事纪律与战斗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特别严重的，是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还是非常恶劣，军队还是拿过去压迫者的态度与方法去对付人民，人民对于军队的恐怖仍然存在着。

这样的军队，还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坚决拥护我们抗战的军队，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帮助我们的军队争取作战的胜利。但是我们还不能满意于我们现在的军队，我们还需使我们的军队进步，改造我们的军队。这就要求我们：肃清军队中的军阀主义，改善官兵的生活与待遇，建立军队中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们的军队同人民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军队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

只要我们的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人民的积极拥护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军队担负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是不能战胜的，是无敌的。

我们不但要坚决改造旧军队，而且立刻应该在崭新的基础上创造几十万几百万新的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吸收千百万革命的民众到军队中去。培养成千百万进步的、坚定的、可靠的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去率领这些军队。

此外，还应该鼓励全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到处组织人民抗日自卫军、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担任抗战的各方面的任务。

要坚决打破把军队当做私人工具的军阀思想，一切抗战的军队，应该变为全国人民的军队。军队同人民结合起来，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创造无数人民自己的军队。

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决定于全中国人民的总武装。以无数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蒂的军队！

同民族失败主义做斗争

在抗日的持久战中，部分的挫折和失败是不能免的。极少数没有气节的、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的动摇畏缩，甚至叛变，也是可以预先想到的。各种严重困难的产生也是当然的。而且这种挫败与困难今天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

每一个民族革命的战士，应该不为这些不利的情况与困难而张皇失措，而悲观失望，而动摇妥协。这些不利的情况与困难是应该预先看到的。因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也不是

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的。

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与困难底下，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必将如毒菌般的发生起来，啮噬着少数不坚定的人的心灵，消磨他们的民族的自信心与勇气。不论这种情绪与思想的散布是有意的或无意的，客观上都是有利于日寇，为日寇服务的。

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同张皇失措、悲观失望、动摇妥协以及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做坚决的斗争。要使全中国人民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要使他们了解一切困难只要大家努力奋斗，都是可以克服的。要在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心灵中，造成坚强不拔的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自信心，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上的保证。

每一个民族革命的战士，应该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去，成为全民族的模范。我们相信在这一抗日的持久战中，必将锻炼出无数这类坚定的、英勇的、充满民族自信心的民族英雄，在他们的统率下前进着千千万万有组织的、自觉的、全副武装的抗日大众。

能够产生这样众多的民族英雄与民族战士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赞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把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

国民党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战。所以国共合作，有了初步的成功。红军已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十八集团军，开赴前线，参加抗战。这表示共产党是坚决拥护国民党发动的抗战的。但是国民党今天的抗

战还只是单面的政府抗战，还没有实现共产党所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主张，所以国共的合作也还没有能够彻底成功。

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是保障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主张。共产党今天正在为着自己主张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是负责的，它历来把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做了自己中心的与神圣的任务。但可惜共产党的这一正确的主张直到今天还没有为国民党当局所完全采纳。共产党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可能在全国宣传自己的主张，还没有取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的自由，还不能在政府中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公开奋斗。这使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今天所采取的单面的政府抗战的方针及其由此方针所产生的一切结果，还不能负任何的责任。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是在前线上与政府的军队肩并肩的战斗着，然而这个军队的数量还只占全国军队总数中的最少数，而且处处受着各方面的限制。今天，它在前线的抗战中，还只能起抗日民族革命军的模范的作用，而不能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共产党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时，中国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这个时期是会到来的。当全中国的人民知道了共产党的主张时，是一定会一致起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帮助这个主张的实现。在今天的政府中也必然会有部分有远见的领导者，根据他们在抗战中实际的政治经验了解到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而决然起来为实现共产党的主张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最后解放的胜利的前途是有无限信心的。它决不因为目前的困难与障碍而动摇消极。它将继续

努力以求得自己主张的贯彻，使中华民族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使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出现于东亚！

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万岁！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 边区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任职 给秦邦宪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

博、叶并告周、朱、彭、任、林⁽¹⁾：

(甲) 关于边区以坚持林正张⁽²⁾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不待说不要丁惟汾)为合宜，依大势看，再过几个月，此层可以办到。只要宣言发表，我们已取得合法地位，边区即缓发表，无大妨碍，我们现正一切自行组织，不管国民党如何，刘⁽³⁾师候宣言发表后即开动。

(乙) 湘鄂赣边区大上武汉行营的当，承认派副司令等，投降主义的危险已在许多地方发生，请深切注意。

(丙) 你们如何指示郑位三的，是否郑已懂得坚持党与军队的独立性，前电询未据复。

(丁) 闽粤边何鸣部交涉如何，亦未据复。

(戊) 南京派来高级参谋四人，副主任一人已到西安，决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进入营门一步。又天津与国民党联络员候选好电告。

洛甫

泽东

二十日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叶剑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伯渠。

〔2〕指张国焘。

〔3〕指刘伯承。

毛泽东关于实行真正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德怀同志：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

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1〕}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毛 泽 东

二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陈光。

朱德、彭德怀等关于平型关 战斗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月)

一

林⁽¹⁾：

据阎⁽²⁾电：敌于昨夜以来，忽奇袭我平型关阵地，现正激战中。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

朱 彭

九月二十三日九时

并告聂⁽³⁾

二

毛主席并致刘、徐⁽⁴⁾：

(一) 灵丘之敌于昨晚返平型关附近，正在激战中。

(二) 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勤于灵涞间及灵丘以北活动。

(三) 贺⁽⁵⁾师正向宁武车运中。

(四) 总直⁽⁶⁾大部今在侯马待车。

（五）我们今晚到五台以北之南茹村宿营。

朱 彭 任⁽⁷⁾

二十三日二十时

三

我一一五师今晨八时出击平型关北面之敌，于十二时许已占领关沟、辛庄、东跑池一带敌阵地，缴获汽车五十，满载军用品，俘虏二百余人，敌伤亡甚重。但战斗尚未解决，仍向东跑池、团城口以东地区激战中。

我独立支队⁽⁸⁾昨日在灵丘东北地区击溃敌一部，缴获一部。

朱 彭

二十五日十二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四

博叶，小开⁽⁹⁾：

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八十二辆，大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步枪数百支，打死敌人一千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被围残敌乘夜从晋军阵地突围而逃。是役晋军本约定二路出击，乃打至黄昏才出动，致未能全部消灭该敌。我军伤亡四百余人，内有副团长、副营长二三名。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一带进

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救国会，杭州、福州、湖北、广东、陕西、开封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后援会等。

毛 泽 东

十月一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 〔1〕指林彪。
- 〔2〕指阎锡山。
- 〔3〕指聂荣臻。
- 〔4〕指刘伯承、徐向前。
- 〔5〕指贺龙。
- 〔6〕指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直属队。
- 〔7〕指任弼时。
- 〔8〕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和骑兵营。
- 〔9〕指秦邦宪、叶剑英，潘汉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共产党 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今天抗战的形势，急需要有一个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才能有利于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准备参加这样的政府，即直接公开担负政府的行政责任，并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然而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政府，今天有的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

（二）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时，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与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

（三）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的亦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推迟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之建立，是有害无利的。

（四）但在特殊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战区的地方政府中，由于

旧的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基本上愿意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自由，并且由于当前的紧急形势使共产党在人民与政府看来均已成为必要，共产党可以去参加。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

（五）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宪法与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因此共产党应力争自己的党员当选，到大会中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与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之建立。

（六）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例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共产党应该经过同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在一定纲领下亲密合作。

（七）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名为特区政府之后，它们的代表可以拿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参加到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军事的与群众的机关中去。

（八）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书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弟兄们！

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举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日本的工人农民，大批的强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当炮灰而牺牲了。每天在中国的战场上，成千成万的日本士兵被牺牲了。你们离开你们的家乡，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你们战死在中国的沙场上，尸首也无人收殓，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呵！

日本士兵弟兄们！你们都是日本工人农民出身的，试想一想，你们来中国打仗，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在日本时，在工厂里做工，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劳动一天所得甚少，连养活你的父母妻子也不够。但是日本的资本家有百万千万的家财，有工厂，有银行，有商店，有美丽的房子，坐汽车，吃大餐，抱娇妾。日本工人一切都没有，而资本家一切都有了。在农村耕地，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农民辛苦一年，大部分要当作地租交给地主了。日本的地主有田连阡陌的土地，有大的田庄，有满仓库的谷米，他们也同资本家一样，住的华夏，坐汽车，吃大餐，抱娇妾。农民一切都没有，地主一切都有了。

你们离开家乡后，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啼饥叫寒，时刻都在盼望你们回去。你们在中国战场上打仗，得不到一点好处，只有白白的牺牲你们的生命，而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则

坐享幸福。因为继续战争，日本国内又增加了捐税，这些战费都是从日本工农身上榨取来的，你们家庭的负担也更加重了，工人失业了，农民饥饿了，物价高涨，你们的父母妻子也无法生活了。你们生在日本，死在中国，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呵！

日本士兵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愿来中国，你们的父母妻子也不愿离开你们的，你们更不愿意打仗的，你们是被军阀强迫来的，你们国内的工农都反对战争的。你们要想回到日本去，只有起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同你们国内的工农一道起来革命，推翻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日本的工农士兵才能求得解放。

在前线上与你们打仗的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为着保护中国的土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家乡，为着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的军队不得不进行神圣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军队决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因此日本士兵应与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

日本士兵们！你们的出路或者是要求回日本去，与你们国内的工农一道起来革命；或者是与中国的弟兄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军阀，这样才能解脱你们的压迫。为日本军阀的利益而牺牲是万不值得的。

日本士兵们！切莫听信你们的官长的欺骗，中国军队决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他事情做。

中国共产党号召日本的士兵与中国的士兵在火线上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阀。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现在改名为八路军了，也开

赴前线与日本士兵见面了。这个军队就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欢迎日本工农革命士兵到红军中来！

日本士兵们！起来吧！倒转枪来吧，打倒压迫你们的日本军阀，与中国的工农弟兄团结起来！

要求回日本去！生在日本死在日本！

拒绝与中国军队作战！

日本士兵不打中国人民！

日本士兵不打中国士兵！

日本工农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法西斯蒂军阀！

日本士兵帮助与参加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回国去参加日本的革命！

日本工农解放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日本士兵与中国士兵弟兄的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

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十九期刊印。

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的士兵们!

你们大概早就听过红军这个名字吧，我们现在的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也就是日本报纸上所常说的“共产军”。

今天我们在战场上以血刃相见是不幸的!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被你们的军阀强迫的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了，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

日本士兵们!想想吧，你们在中国战场上被牺牲，被打死，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日本胜利了，牺牲是日本的士兵，日本的工农，而日本的资本家、地主、军阀则坐享幸福。如果日本胜利了，那么日本的统治者更加可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增强他们对于日本工农的剥削，延长他们对于日本工农的剥削，同时也更增强日本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奴役!

如果日本失败了，那么日本的军阀就要倒台，日本的工农就要起来革命，日本的工农就要得到解放，同时你们就可以早日回到日本去，与你们的父母妻子见面，与你们国内工

农携手共同斗争。

日本的士兵们！起来吧！倒转你们枪口，向着你们的压迫者剥削者——日本军阀。我们共同携手的奋斗，为日本工农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

今天我们在火线上，互相打仗，互相厮杀，战死的只是日本的工农士兵和中国的工农士兵。我们相互停战吧，我们在火线进行联欢吧！

日本士兵们！你们的牺牲是一钱不值的，你们的尸首也落在中国没有收殓，你们国内的工农也不愿意你们打中国人民，全世界的工农也都不愿意你们打中国人民！你们就是牺牲了，全世界的工农都在埋怨你们！你们想想吧，觉悟吧！

中国军队与你们作战，是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为着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侵略者，虽然牺牲了，但是光荣的，你们国内的工农也在赞助我们这种行动，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赞助我们这种行动！

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决不虐待你们，决不乱杀你们。如果你们自愿的到我们这边来，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民的朋友。愿意在中国军队做事，给事你们做，愿意回日本，设法送你们回去。如果在火线上，只要你们不先放枪，我们决不先放枪。如果在战斗中，只要你们允许解除武装，我们决不乱杀一个。愿意来中国军队做事的，我们热烈欢迎，不愿的，只要解除武装后，马上从火线上就放你们回去。我们决不虐杀一个没有武装或解除武装的日本士兵！

日本士兵们！不要为日本军阀而牺牲你们的生命呵！回日本去吧，你们的父母妻子在望你们！回日本去吧，与你们国内的工农一齐起来革命！日本士兵与中国士兵联合起来！停止战争进行联欢！日本士兵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拒绝打

中国人民的战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工农士兵解放万岁！

八路军 总指挥 朱 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谨启

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十九期刊印。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 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 宣传内容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周、林并告博古、剑英、汉年、胡服、云逸、觉哉（由林转）及朱、彭、任、林、聂、贺、关、刘、张⁽¹⁾诸同志：

甲、你们谈话请根据下列诸点：

一、我们宣言及蒋⁽²⁾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

二、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

三、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四、宣言是七月四日起草的，七月十五交付的，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

洛甫、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林伯渠、秦邦宪、叶剑英、潘汉年、刘少奇、张云逸、谢觉哉、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林育英。

〔2〕指蒋介石。

毛泽东关于整个 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 为唯一方向给周恩来 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周并转胡服、尚昆、朱瑞并告朱、彭、任⁽¹⁾：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再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毛 泽 东

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奇、杨尚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执行 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训令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及各级军政委员会与党的组织及政治机关同志们⁽¹⁾：

接读九月二十五日七时朱、彭、任⁽²⁾部署方针的训令，我们认为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毅力，坚决为这个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举南犯，首先企图灭亡全华北，然而我们坚决相信，在整个八路军坚决实行依靠民众的游击战争总方针下，必能造成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必能发动千百万民众，同十八集团军及一切革命的友军一道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坚决的打击；必能消灭许多敌人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配合党在全国的努力，达到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同志们！目前是中国存亡的关头！只有正确的政治与军事方针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每个十八集团军的同志都应为中央军委及军分会的正确方针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你们的伟大能力！在华北在全国树立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呵！现在我们已经打下了一个胜仗，兴奋了友军与人民，从此更进努力，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中央军委

9.26

附：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林、聂、罗、贺、萧、关、王并告刘、徐、张⁽³⁾ 诸同志并报主席：

一、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断绝其后方运输，增加敌人之恐慌和疲惫，分散敌人兵力。只有这样才便于主力打击敌人，以致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立即在我们占领地域，即以独立自主的担负起群众工作，对友军及政权机关，争取合作的态度。

三、立即在敌人占领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这些经济斗争的口号，来与基本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

四、立即在战区提出减租减税减息，没收汉奸日寇财产，分给抗日人民及抗日军人家属，宣传阎锡山的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反对曲解合理负担，反对借战争从中渔利的贪污官绅（利用阎锡山反对坏绅坏官的话），发动群众，督促政府实现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条例，与誓死不做亡国奴，保卫山西、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好男儿上前线去等基本的政治口号联结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宣传

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宣传红军改为十八集团军的任务，接受山西同志批评，红军宣传工作不够，特别口头宣传差。

五、战区暂时规定：以晋东北之灵丘、涞源、繁峙、定襄以东，正太铁路以北，曲阳、行唐以西；晋西北方面以静乐、岚县以北，包括宁武、朔县、左云、集宁以西均为战区。按战况及工作的发展逐渐向南发展。各级军政会政治机关，立即按着实际状况，定出具体计划，深入部队中，每一个指战员，在地方群众斗争中吸收进步分子，特别工农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成为地方群众斗争的核心。

六、各兵团分担工作地区如下：

甲、一一五师，包括灵丘、涞源以南，曲阳、行唐、灵寿城以西，五台、盂县边界以东地区。

乙、王震所率之团，担任柏兰寨里以南，平山县城以东，井陘、盂县以北。总直属队担任繁峙、代县以北，铁道以东。

丙、一二〇师暂照二十一号电告地域。

丁、一二九师，预定在正太铁路南北地区，该师到后，王震率领之团归还建制。

朱、彭、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此句之前在档案另一抄件还有一句为：“林、聂、贺、关、刘、张、周恩

来同志”。

〔2〕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3〕指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要求国民党 解决陕甘宁特区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伯渠同志并告博、叶、周、朱、彭、任、聂、贺、关、刘、张⁽¹⁾：

下列要求国民党解决陕甘宁特别区问题，早已向南京提出，拖延半年之久尚未解决。请再提交蒋鼎文先生转蒋介石先生，速为决定发表，保障红军在前线安心杀敌。

甲、承认特区的民选制度。特区政府经人民选出可以由南京加委。

乙、加委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九人为特区政府委员，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坚决拒绝丁惟汾，因为他是最先提倡反共及反共最坚决之一人。全苏区人民誓不承认）。

丙、设民政、建设、教育、农工、财政五厅（反对设处）及保安司令部。

丁、特区范围包括宜川、郿县、洛川、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西峰镇、镇原、预旺、环县、盐池、定边、安定、靖边、横山南、中部、安边（包括瓦窑堡）、米脂、绥德、清涧、葭县、吴堡、神府苏区，延川、延长在内。

戊、特区经费每月十五万元，另善后遣散费六十万元。

己、保安师编九千五百人。

以上六项是最低限度，必须要求国民党全部同意者。否则我们将受到全党责备。因此不能不坚持。

上电请伯渠原文抄送蒋鼎文。

中央书记处

九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林伯渠、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林育英。

项英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 集中改编问题给刘英的信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刘英同志并转全体同志：

自一九三五年春，你们由赣东北出动至闽浙边一带活动，加以各种环境的困难，即与你们断了关系，直到目前事变境迁，始有机会与你们通讯。

你们在两三年困苦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着，这是全党最光荣的战士，我们代表中央分局向全体同志致以最热烈的布尔什维克敬礼！

可是，在你们最艰苦奋斗的两三年中，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的向中国侵略，使民族危机达到最后的紧急关头，于是全国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一致团结起来，为挽救危亡求达民族解放而奋斗。

我们的党从来主张抗日。你们曾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现为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已正式宣布取消过去的路线和策略，已获各方谅解。全国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分局遵照中央指示，已宣布停止游击，决将一切游击队改为抗日的武装，统辖于政府指挥之下，以全力争取抗战胜利。我此次来南昌与政府商洽各边区集中改编诸问题，已得着具体解决，目前为迅速集中部队，特商请省府利用各县政府与驻军同你们接近的关系，将中央宣言，一封公开信，及我亲笔信，转达你们，求得迅速停止游击战，改编杀敌。你们接着文件和

信后，立即依照执行，并设法将宣言、信件转达各地部队的同志和游击队，遵照执行。你们及其他部的部队迅速向江西境内交通适当地点集中，以便与关英、黄道诸同志会合改编。集中时可先报告当地政府转告奉命集中情形，请给予通行证，以免沿途发生误会，但须绝对遵守纪律。关于政府方面，已请江西省保安处通知各查照。

我们在南昌设有总接洽处，由陈毅同志负责，可与他接洽一切。

至于集中前后一切经费，已蒙省府允许照发，你们可再向景德镇第五行政专员公署接洽领取。部队整编也有规定，仍到该处询问一切照办。

刘英同志将部队集中适当地点，指定一负责人统率队伍，自己务必亲来南昌到省保安处找陈毅同志接洽，或到分局顺便商定部队的各级干部，以便报请政府加委。

志敏^{〔1〕}同志光荣牺牲，他的爱人缪同志^{〔2〕}，我们请求政府释放已蒙允准，现缪同志在我处，不日回赣东北，帮助集中部队，特此顺便告知。

但你们应将全部捕捉之土豪无条件释放，并通知当地政府接收，给予正式收条。致布礼。

项 英

九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的《项英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即方志敏。

〔2〕指缪敏。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 泽 东

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那是因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九月，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不但发了这些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十八期。

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关于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问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释放政治犯问题，红军改名问题等，共产党方面都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

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著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

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这样伟大的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因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

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于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可是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

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现在国民党对待民众的一套，还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

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说到三民主义，还在十年前两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加以实行，并且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的手，在全国很大的地区中实行过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从此产生了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为什么共产党现

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祷祝之的。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我们相信，那些贤明的国民党人会有一天同意这个纲领的。因为如果不同意的话，三民主义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战胜，中国人民的亡国奴境遇就无可避免。真正贤明的国民党人是决不愿意这样的，全国人民也决不会眼看着尽当亡国奴。而况蒋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很对的。现在的急务在谋三民主义的实现，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改变过去的老一套，立即实行符合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彻底地与民更始。这是今天的唯一的道路。再要推延，就会悔之无及了。

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

速地开始改造。不是说把仗停下来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变制度。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应学习西班牙战争的教训，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是从极困难的境遇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条件优于西班牙，但是缺乏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缺乏一个能执行全部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又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军队。中国应该补救这些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他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实行同样改造的责任，今天是落在你们的肩上了。一切忠诚爱国的国民党人

当不以我们的建议为不切需要。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建议是符合于客观的需要的。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在山西 应坚持普遍游击战争的方针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周、朱、彭、任⁽¹⁾：

甲、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敌已从平汉、津浦两路的中间突破进来，保定已失，敌正迂回石家庄的侧面，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卫立煌、曾万钟、孙连仲三军退阜平、获鹿线，布置侧面阵地，将依托太行山脉。河北失后，敌将从海州登陆进占徐州，则山东将不战而失。不久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估计中国政局在数月后将起变化，我们应争取在彼时达到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实行三民主义与十大政纲、继续支持民族战争之目的。也只有在彼时，真正人民的民族战争才能实现。判断在彼时苏联将给中国以实力的援助。

乙、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坚持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人民参政及改造晋军的根本方针。

丙、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你们应要求阎锡山拿出一万支枪来武装人民。你们应在前方办一个五百至一千人的干部学校，由红军与地方党合办，以充游击战争干部。在六个月后，抗大的一期学生可以大部使用于山西。

丁、关于使用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广、蔚及其以北突击，捣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此着，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展开一个新局面，虽然不能根本地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但暂时地部分地破坏是可能的，这就大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九日十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云逸、南杰、博古、剑英同志并告周、朱、彭、任及伯渠⁽¹⁾：

关于南方各游击区问题：

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

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

丙、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

丁、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同时又答复了国民党。

一、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

(1) 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至少须要几个月时间。

(2) 各区游击队调动之前，邻近周围二百里内之驻军，保安队、民团首先调动参加抗日，至少同时调动，往后并不能再让部队去。

(3) 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决定保留游击队数目，以保留原有游击区内之游击队家属。

(4) 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

(5) 游击区土地关系不变更。

(6) 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部队移入及破坏游击区。

二、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

三、张鼎丞、何鸣、刘英三部原地不动。理由是日本将进攻粤闽浙三省。该三部即为保卫各该游击区及其附近土地而战，决不应集中。

四、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戊、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着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

中央书记处

十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张云逸、张文彬、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伯渠。

军委分会关于目前华北 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

（一）自我八路军出动晋北前线，特别在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大大地兴奋了全国抗日军队和民众，提高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我们的出现与胜利及各游击支队的积极活动，虽然还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而且敌人突破长城险隘后还是继续向太原攻进，但是增加了敌人许多新的困难与顾虑。

（二）三个月中华北的抗战，由于当局还不愿意动员群众来配合与参战，战役战术上指挥的守旧与愚笨，以及兵力配备上的不适当，以致平汉、津浦、平绥各线战局，都处于不利的状况。直到沧州、保定、雁门关连续失守后，由于我党及我军之策动，现在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已警觉华北战局之危险，而有集结与增加新的力量于晋北，求得部分决战胜利，以争取战局开展之新的决心与部署。

（三）目前山西成为华北战局中最后争夺的主要目标。如能打击深入雁门关以南敌人，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保卫太原，巩固太行、恒山山脉及晋西北地区，则可依托山西高原地带为堡垒，争取将来向平汉线战役以至战略上的反攻，以改变华北战局，求得华北抗战的持久，在国内国际条件有利变化下，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否则太原、石家庄均被敌夺占，敌

人达到占领黄河北岸各战略要点之目的，而使整个抗日战争将陷于更加困难与不利的形势。

（四）目前华北战局虽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但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已渐认识保卫山西为华北抗战堡垒的重要，增强晋境军事力量。如果改善军事上的领导，坚决实现已定战役计划，真正实现民主、改善民众生活纲领，动员广大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加上我军以自己积极行动的配合，推动和领导晋北战局胜利地开展，在敌人远离铁路交通增援接济困难条件下，争取歼灭深入晋境之敌，巩固山西，实现反击敌人改变华北战局之可能，是存在的。这种前途的争取成为我们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与战略上的任务。

（五）由于我军积极的胜利的行动、模范的群众纪律，我们在全国友军及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而且对于我军抱着极大的期望，我们逐渐取得对于华北抗战的政治军事领导地位。然而在过去一时期中，我们还存在有某些弱点，如某些部分行动欠积极，发动群众与开展游击战争还未收到必要的成绩，这些都是由于对争取巩固山西以支持华北战局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而产生的。

（六）在目前晋北决战当中，我们虽在决战的军事上仍然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我们正确地运用运动游击战对敌侧后的袭击与捣乱，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供给的积极行动，以打击钳制分散敌人，配合友军歼灭敌人，我们的活动应当成为达成晋北战役计划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以影响友军在战术上及对群众关系上的改进，巩固我军的威望，提高我们的领导作用。这里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这种情绪是可以减低我们行

动的积极性，削弱我们的领导作用。同时必须防止一切轻敌的冒险行动，这种“左”的乐观是要妨碍我们的艰苦动员和冷静考虑行动，将要招致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应运用平型关及游击支队胜利的经验教训来教育战士，以巩固和提高抗战的胜利信心，加强适用的战术教育。

（七）我们在积极行动当中，必须加强地方群众工作的领导，创造太行、恒山山脉及晋西北地区的根据地。要运用和扩大在山西已经获得的民主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纲领，正确执行党的策略，去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行动，争取壮丁加入我军，以补充战斗中不可避免的减员并求得部队的壮大。这里反对一切把作战与地方工作对立的观点，而须组织适当的干部，有计划地分配于工作地区，以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地方工作总政另有指示）。

（八）此指示应在党内进行深入的传达与讨论。

十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①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 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 给潘汉年、刘晓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

小开、刘晓二同志并告博、叶、周、胡、林⁽¹⁾：

（甲）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

（乙）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

（丙）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丁）国民党在华北失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老政策均表不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完全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

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

洛、毛

十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

军委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责通前后方的联系，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邓^{〔1〕}未回军委以前由毛泽东兼代其职。所有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希望上述各政治机关即与军委总政治部发生工作关系，并望将部队重要政治情报书面报告，如组织统计干部的履历等，须所属政治部随时送来军委总政治部。

军 委
十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邓小平。

毛泽东关于我军应坚持 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方针 给林彪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¹⁾，雪枫：

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²⁾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³⁾决定，周彭⁽⁴⁾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丙、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丁、一一五师现到何处？

毛
十六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 〔1〕指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聂荣臻。
- 〔2〕指阎锡山。
- 〔3〕指蒋介石、何应钦。
- 〔4〕指周恩来、彭德怀。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 若干基本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刘 少 奇

一 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 的主要斗争方式

在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主要是非武装的斗争方式（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当时敏感的学生与知识界常是站在反日斗争的前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已经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阶段了。这是一个对日抗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站在抗日前线的是抗日的军队和那些武装起来的人民。

一般说来，武装斗争有下列三种主要的方式：（一）正规战争；（二）游击战争；（三）武装暴动。今天，在全中国来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是正规战争。在华北，也主要还是正规战争。

但不幸的是，在今天抗日的正规战争中还存在着许多缺

* 本文当时由延安解放社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题为《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全文共六节，这里收入的是一至四节。

点。领导战争的政党与军政当局还坚持着许多错误的方针，不能全部执行正确的政策，使得今天的抗日正规战争在华北遭到相当严重的失败，许多主要城市、大部分土地与交通要道沦于敌人之手，被敌人利用来向中国内地进攻。这是十分痛心的事。然而，正规战争中这许多错误与缺点，还不是一天或一个月所能全部纠正的。同时八路军又还不是华北正规战争中的主力，真正的人民武装也还没有广大地组织起来。因此，华北的正规战争继续遭受一些严重的失败，仍是可能的。

华北抗日的正规战争如果继续遭受一些挫败，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虽然在全中国来说，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还是正规战争。

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一切愿意在华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的人们，都不应该放弃或逃避游击战争。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末，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

（一）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

（二）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

（四）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打击，暴露投降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的牵制。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

（五）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

有许多人对华北发展广大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意义，是估计不足的，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以为，数十万久经训练的、超过日军数倍的正规军，都不能支持华北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日军连续击破，难道在这数十万大军失败后，由人民组织起来的新的零散的游击队，能长期与更多的日军作战，并取得胜利吗？这些人的思想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华北正规战争的失败，是不能由这数十万军队与人民来负责的。不是由于数十万军队与华北人民的力量不能战胜日寇，而是由于没有发挥这数十万军队与华北人民的伟大力量，并错误地使用了军队与人民的力量。这是应由政府当局负责的。这种错误与缺点在今后的人民游击战争中，必能迅速地纠正与克服，也必须迅速地纠正与克服。所以，今后华北的游击战争，是有胜利前途的。

二 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胜利的可能

如果华北的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那末，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将在何种条件之下与敌人斗争呢？

敌人方面的情况是：

第一，敌人能在主要的城市、军事要地集结优势兵力，利用铁路、公路及工业中心，容易得到补充并能迅速地调动兵力；

第二，敌人有优良的武器装备；

第三，敌军到处受到华北人民的反抗；

第四，敌军不能没有后方作战，在断绝后方接济的情况下，敌军即不能生存；

第五，华北的地区广大，敌军不能在广大的乡村到处配置兵力，运输联络线很长，到处有被游击队截击的危险；

第六，敌军大多数士兵是被迫到中国来作战的。

以上是敌军在华北作战的优点和弱点。

我们的军队、游击队有哪些弱点和优点呢？

第一，我们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处在敌人后方和侧翼作战，外面的补充和接济很困难；

第二，我们的器械与军事技术低劣；

第三，我们能够到处得到人民的帮助，风土习惯、地形都很熟悉；

第四，有广大山地以及敌军不能经常驻扎的广大乡村，作为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

第五，我们的官兵是自愿地同敌人作战；

第六，在华北，有具备游击运动战特长的八路军为中心力量。

此外，过去华北的政府当局及豪绅资本家一贯地压迫剥削人民，人民生活状况的困苦没有改善；这次许多抗日正规军的纪律不好，又在人民中种下新的恶劣影响；人民长期没有民主权利，没有组织；中国政府在历史上对西北蒙回等少数民族一贯采取错误政策，以及华北有些地区的会门土匪很多等，这些也是在华北广大开展游击战争应该重视的条件，应该作为确定游击队战略战术与基本政策的出发点。在游击战争广大地开展以后，在正确的政策执行以后，这些条件即将逐渐地改变，而

对于我们有利。

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是在上述基本条件之下和敌人作战的。我们的战略战术与各种政策，都必须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

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有许多专著论述，我这里不说了。我只说：如果在华北能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能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末敌人愈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困难，绵延数千里的铁路、公路交通，到处都有游击队去破坏和截断。这就逼使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保护交通联络线，我们就可以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于主力部队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游击队能够对付超过自己数倍的优势敌人，并能打胜仗。东北义勇军的经验和八路军过去的全部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的敌人，但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的，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前途的。

但是游击队要战胜敌人，除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外，还必须：（一）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隐蔽自己的行动，了解敌情，并从人民中取得给养与补充，否则游击队不独不能胜利，而且不能存在；（二）在各方面都要有正确的政策，代表人民的利益与意志，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三）有很好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并实现官长与士兵的平等，保证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条件，虽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也是不能最后胜利的。因此，我们为使华北游击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除开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游击战争而外，还必须建立能够在各方面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并且改造那些不能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里建立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

三 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

如果华北沦陷于日寇手中，决心反抗日寇的不会只是共产党，其他一切有民族意识和抗日决心的党派、军队与人民，都会拿起枪来，参加游击战争，和日寇作战，华北游击战争就能广大地开展起来，这自然是很好的。但这也说明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将是很复杂的、极不一致的，各种游击队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政策与立场。对于这种情形，我们主张各种不同的抗日部队联合起来，配合作战，并执行一定的共同的政策。

估计将来抗日游击队约有下列数类：（一）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二）原在华北抗战的各派军队之一部；（三）以前在地主指导下的民团；（四）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五）土匪会门中抗日的队伍；（六）从伪蒙军中反正过来的队伍；（七）蒙民回民组织起来的抗日部队；（八）以至将来还会有从日军中哗变过来的士兵及俘虏兵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在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主张与政策上是极不一致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日寇，我们提议：

（一）所有在华北抗日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建立联军总司令部，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二）联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军区的联军司令部设经常的军事会议，由各种抗日部队的代表组成。军事会议决定战略战术方针和作战计划并选举联军司令官等。

（三）为了便于作战，各种零散部队应互相集中合并起来，成立正规的抗日军队。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即为集中、合并与团结各种零散的部队成为正规军而努力。但必须以自愿为原则，反对强制的兼并或改编。

（四）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不独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一切友军的胜利与发展。共产党愿意公开自己一切成功与胜利的经验，以完全诚恳坦白的态度，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帮助各种抗日部队的改造，使一切抗日武装都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部队。但共产党对各友军的错误与缺点，也将不隐讳地进行批评。

在抗日战争中迫切需要到处组织武装部队，也迫切需要各种武装部队的联合、集中、合并与改造。因此，共产党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及某些地方当局禁止人民自由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方针，主张让人民武装起来，发给人民枪支，帮助人民武装，不要怕抗日的武装部队太多太复杂。同时，共产党既反对各种抗日武装部队的分立主义，也反对强制的联合，主张民主的联合与集中。

我们认为，许多参加抗日的部队是需要彻底改造的。否则这些部队就不能胜利与发展，甚至不能在华北存在。这种改造是：

第一，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在政治上巩固部队，加强纪律，并提高对日作战的勇气与牺牲精神。

第二，必须改善对士兵的待遇，禁止打骂虐待士兵，废除肉刑，实现长官与士兵平等。因为游击战争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士兵已不是为了找饭吃、赚几元钱，而是为了抗日救国来当兵。他们是光荣的。因此，士兵就不能再受打骂与虐待，让别人把他们不当作人看待。一个抗日部队如果继续保留过去军阀主义的一切恶习，这个部队逃亡的必然很多，没有人愿意到这个部队当兵，这个部队也不能高度发扬士兵的英勇精神与敌人作战。这样的部队终究是不能胜利甚至不能生存的。

第三，必须实行部队的经济公开，并由士兵举人管理监督

经济。这样，士兵才能在给养困难的条件下不生怨恨，才能剔除坏人的中饱。

第四，必须淘汰对抗战动摇与不坚定的分子，才能使这个部队长期坚持抗日，并取得胜利。

共产党主张有上述缺点的部队要进行改造，并愿尽一切可能帮助友军的改造。共产党同样虚心吸取友军的特长和好的经验，来改造自己的部队。

四 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 与抗日政府的组织

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

在这些区域中，有的还存在着原来的政府，这些政府或者继续抗日，或者准备投降转变为汉奸政府；有的原政府人员逃走，汉奸们准备建立维持会等。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

首先应该召集这些区域中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原来政府的代表和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举行会议，选举临时政府委员会。在该区域政府领导下，各县、区、乡、村的政府，同样召集会议，实行改造。这个临时政府除开行政

府一切职务外，还要筹备正式政府的建立；起草政府的组织纲领、选举法，并办理各级政府的选举。待民选的该区政府代表大会召集后，正式政府产生，临时政府的职务即行終了，将政权移交于人民选举的正式政府。这是改造政府所应经过的手续。

这种政府实行何种制度呢？实行民主制度。实行普遍、秘密投票的选举，开始时或者还应采取复选制，凡男女公民年满十八岁无精神病者均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各级政府采取委员制，由委员会任命各部部长，表决时以多数赞成为通过。

这种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但它同时是地方自治的政府，它有权颁布地方性的法律和命令在自己区域内实行。

这种政府应该是地方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现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切在抗日战争中坚决奋斗并取得民众信任的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均应有代表参加政府。同时，这些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又应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共同纲领，作为政府施政的准绳。

这种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并争取胜利。因此，它施政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

这种政府如果能够最好地完成上述任务，就能取得群众最高的信仰，发动群众以最高的积极性去参加战争中的一切工作。群众就能组织自己训练自己，并愿意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政府去与日寇作战。这样，就能将这个区域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的给养与补充可以取之于这些地方，后方可以设

在这些地方，可以引诱敌人到这些地方来加以消灭。群众会以最高的热情从各方面来帮助政府与游击队。这样，就能使游击队长期坚持与优势的敌人作战并取得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 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一）在全国性抗战发动之后，国民党在民众救亡运动方面，表现了它的动摇。由于抗战本身的需要，由于广大民众参战的要求，国民党不能不相当开放救亡运动，但同时它又惧怕救亡运动超出于它的控制范围，所以它采取一切方法，对运动实行“统制”与“包办”（实际上是包而不办）政策，使运动不能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国民党这种政策实是今天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最大障碍。因此，打破国民党这种政策，使它在这方面有彻底的转变，实为我党目前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任务。

（二）共产党员不应拒绝去参加国民党所包办的有群众的抗敌后援会。他参加的目的，是在争取后援会的群众走上积极抗日的道路，团集其中左倾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并利用后援会的合法组织与其中的积极分子去开展群众的救亡运动。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必须用一切方法在后援会内，在群众中提出自己的积极主张，公开批评国民党统制与包办政策的错误，要求后援会的民主，进行驱逐个别坏分子的运动，而工作的重心，则放在群众中去，以达到动员群众的力量与依靠群众的力量，自下而上的压迫上层的让步。在今天左派

分子与个别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所包办的后援会中所得到的个别上层位置与活动方法，即应服从这个基本方针。

（三）但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参加抗敌后援会的活动为满足，或等待抗敌后援会来分配我们的工作，共产党员应该利用一切可能与机会，坚持发扬民权改善民生以动员群众的方针，独立自主的组织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发展多方面的救亡运动。这种群众的救亡团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在容许它的合法存在与公开活动的条件下，可以加入抗敌后援会中去，以充实抗敌后援会的群众基础，推动抗敌后援会的改造。

（四）在已有为党所领导的群众救亡团体的地方，我们的群众团体可以而且应该同国民党包办的抗敌后援会在一定的纲领之下，进行统一战线的共同行动与合作，我们也可以在国民党容许我们群众团体的合法存在，与公开活动的条件之下，加入抗敌后援会。我们更主张根据于共同纲领与民主制度的原则，根据于双方合作的良好成绩进行双方组织上的统一与合并。

（五）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种以自动的取消自己的救亡团体与独立自主的救亡运动为条件，以交换在抗敌后援会及其设计委员会中的某些上层位置的无原则的行动。这种行动像事实上所证明的，不但使救亡运动的发展受到损失，而且在群众面前完全失去左派与共产党应有的政治立场，在客观上，这是帮助国民党统制包办政策延长寿命，这是在群众运动中尾巴主义的具体表现。

（六）应该用一切方法力争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的公开存在与公开活动，力争救亡运动中共产党的主动性。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时，应该动员社会舆论与群众力量与之斗争，决不要因为国民党的恐吓与利诱而放弃自己的阵地。同时要善于

利用国民党某些领袖的有利于我们的言论及其各派内部的冲突，而达到开展救亡运动的目的。斗争的方法应该是完全公开的与民主的，肃清一切关门主义的残余，这样才可以取得舆论的同情与群众的拥护。

（七）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完全自由。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今天的形势正有利于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团结他们在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但这一工作的开展，没有同国民党“包而不办”的政策做严重斗争，使他在这方面有彻底的转变，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今天的形势不是我们不能同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做斗争，相反的只有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有进一步的成功与开展。

（八）目前党在全国工作中的最大弱点，是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十分不够。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成功，共产党的逐渐取得公开，使群众工作中的尾巴主义与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了。坚决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左派分子及某些共产党员的影响，千百倍的加强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工作，发扬全党同志在救亡运动中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克服一切障碍与困难，是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必要条件。

中央书记处

十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林 彪

八路军终于在九月中旬开到了晋北的前线，它开始执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神圣任务了！

在全国同胞热烈的期望下，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关与日军接触了。不负全国民众与友军的期望，不负八路军十年来的荣誉，我们的这次的第一次接战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仗的确给了日寇以重创，提高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的信心，特别是更加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

在这次初步与日寇交锋的战斗中，我们更获得了不少抗战的经验。这不但值得八路军全体指挥员与战斗员学习，我也愿意把它奉献于全国的抗战的友军与一切抗日民众，作为今后抗战的认识。据我个人在这次战斗中所感觉到的是：

一、一到山地战，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于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我们还在山脚，但结果我们还要先抢上去，给他一顿猛烈的手榴弹，他们只好像滚萝卜一样的滚下去了。至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呢，有些地方真使它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飞机的作用也不大。

二、敌人轻视中国军队，成了习惯，便由骄矜而疏忽，不

注意侦察警戒，不爱做工事了。打起仗来，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来到猛攻时，他们的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只隐蔽在沟里休息。这样的敌人，当然便利我们袭击。所以我们这次，一切布置得妥妥当当了，向他们开枪了，冲锋了，他们才知道。

三、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多里。在这样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关战斗，我们正是派了一部人在敌后路上阻滞其增援部队及粮食供给。最近又占领了涞源、广灵等县。

四、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在其行动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攻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五、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他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六、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出击中，却以区区的八团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在战役上于决战的地点与时机集中绝对优于敌人的步兵、炮兵、飞机以

猛攻敌人。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九、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有的竟至全无作用。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的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

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

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

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十月十七日

根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民先队 工作给刘少奇等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

胡服、博古、伯渠、小开⁽¹⁾、刘晓：

我们对于民先队及各地民先队员的工作问题有如下决定：

(一) 凡民先队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不应解散民先队。而应使之发展成为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并力争公开。

(二) 凡散布到各地去的个别民先队员，即应参加到当地各种青年群众团体中去，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并可依照各地情况组织各种名义与各种性质的公开的青年群众团体，如有可能时亦可组织民先队这类团体。

(三) 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队员，首先即应在各地平津流亡学生会中努力工作，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

(四) 散到各地的共产党员的民先队员，应编入地方党内，并受地方党领导。如没有地方党时，即应负责建立地方党。

(五) 优秀的民先队员应吸收入党。

(六) 尽量使各地区内各种各样各种性质的青年团体互相联络合作，逐渐形成一个地区以至全国的青年救国联合会。

中央书记处

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秦邦宪、林伯渠、潘汉年。

论 鲁 迅^{*}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

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周恩来关于挽救中国战局新危机 问题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毛，朱彭，博叶⁽¹⁾：

一、目前中国战局正转入新的危机。

(一) 日寇“扫荡”津浦、平汉后更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夺取上海，企图造成已成事实后，不论停战或续进都能有利。现日军在沪者八师团，其余在华者驻屯军七师团半、关东军两师团，并加满蒙军，大约分布在平汉线三师、同蒲线三师，目的在从正太、同蒲两路从速拿下太原。

(二) 中国军队现已用到最后预备队，而全民全面的动员、部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在全国范围内还没开始。南京统治者对于持久战的信心似已发生动摇，加以国际上的引诱，故和平妥协空气逐渐抬头。现上海方面，用兵达到近五十个师，消耗近二十师。胡宗南第二次上去，又消耗。最近桂军四师调沪，蒋⁽²⁾、李宗仁都亲去指挥。华北方面近六十师，能打者仅剩孙、卫、傅⁽³⁾等，不上十师。全国组成的预备队只有粤军六师、桂军二师、川军九师、滇军三师及武汉、陕西一部分中央军，总共不及三十师。故百数十万的正规军，真在战场上拼命的除我们外，尚不到二十万，比之日本在数量上亦居劣势，此最足令人警觉者。因此，黄河两岸正酝酿着放弃华北、

逐鹿中原的危险。宋、韩、商、万^[4]及一切溃军在敌压下都企图转入黄河南岸，划河自保。川军出兵武汉，桂军扼陇海东段。于此，蒋不能无戒，阎^[5]亦不能无感。如果南京和平机启，则妥协空气必风起各军，诱留红军单独在华北抗战的阴谋必大发展，局势亦必陷于混乱。

（三）全国救亡运动，特别南京属的大城市，因国民党包而不办，救国会等相当消沉，我党领导尚弱以及战役失败，空炸威胁等影响，反不及去年局部抗战时活跃。这不能不使“CC”、“复兴”满意于其控制力量，而前线部队遂发生抗战孤军后继不继之愤慨和动摇。

（四）各战区则非到火烧眉毛甚至眼睛，不肯开放民运、武装民众。尤因部队纪律之极坏、政治工作毫无原则、奸淫抢掠无所不为，故大兵一到百姓跑光。日军又从而威迫利诱，以致战区游击战争除红军组织领导者外，一般的不见发展。某些地方政府还预将各县保安队长、民团向后带走，致日军所过如入无人之境。

（五）总上所述，目前抗战正处在军队抗战已难持久、全民抗战尚未兴起、政府领导可能发生新的动摇的极严重的危机中。

二、为克服和挽救上述危机，我意应采取下述方针：

（一）我党发表公开宣言，指明当前危机，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民运、改造军队、武装民众，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抵抗到底。

（二）我们即向南京提出抗战紧急方案，并征求各方同意，内容依据十大纲领定出。1. 召开临时国民大会；2. 改革行政机构，规定战时施政方针；3. 改善军事指挥系统，建立分区制度；4. 改造军队计划及实施平等待遇；5. 建立民族革命战

争的军队的政治工作；6. 战略战术问题的意见；7. 民众动员计划；8. 经济动员方针；9. 决定抗日外交政策；10. 决定汉奸定义及制定肃清汉奸计划。

（三）向阎、黄、程⁽⁶⁾等提出保卫华北进一步的计划，内容分：1. 民众参加政权问题；2. 划分军区及统一指挥问题；3. 改造部队及建立政治工作问题；4. 战区政策问题；5. 正规战争及发展游击战争问题。

（四）分电蒋、程要求增加生力军到华北支持抗战，并揭破放弃华北阴谋，要阎、黄电蒋增兵。

（五）反对各军退过黄河南岸企图及南京企图解决杂牌军队的阴谋。力争各军留在华北，支持抗战并加改造。现华北统一战线正按此方针进行，并应扩大到河南。

（六）请由陕北出一支队赴绥西，创造绥西游击局面，以破坏秘密阴谋（具体意见已见删辰电）。

（七）红军在华北应采取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坚持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之方针，以影响友军，提高友军士气。同时应严重注意国民党及军阀主义的各种阴谋，我军主力如无友军配合，不应过于远击。

（八）根据党的宣言及抗战方案在全国进行运动，并公开批评抗战上的错误：1. 在国民党领导中；2. 在抗日上层领导中；3. 在抗战将领中（特别重要）；4. 在民众团体中；5. 在左派中；6. 在友军中（在华北特别重要）。

（九）应在全国加紧进行组织民众及统一战线的工作（如中央指示草案），并为此目的速派大批干部去黄河、长江流域工作。

三、根据党在陕甘宁的方针及对各边区的处置方针，应速培养政治上需要的独立支队（及民众中的武装），以分别隶属

于各省，较统一于南京为好。如民团、保安队、自卫队等集中到前线参战的支队，应谨慎出发。

四、你们意见如何，请告。^{〔7〕}我拟在此各项工作较有准备后，即去南京。

周 恩 来

皓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

〔2〕指蒋介石。

〔3〕指孙连仲、卫立煌、傅作义。

〔4〕指宋哲元、韩复榘、商震、万福麟。

〔5〕指阎锡山。

〔6〕指黄绍竑、程潜。

〔7〕毛泽东、张闻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复电表示：周恩来长电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并请周恩来拟定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我党的正式意见。“德怀即去太原主持，恩来即去南京。”

论目前救亡运动中的 几个迫切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何克全

一 目前救亡运动中的严重现象

中国共产党当着全国性的抗战一开始，就向全国人民和政府当局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并发出警告，指出目前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是“包含着极大的危险”，“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虽然这一纲领和警告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和重视，但是政府当局并没有了解到中共这一纲领和警告的深切意义，因此还是继续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多方限制和统制民众运动。这是造成最近在各个战线上军事的失利的主要原因。这一痛苦的教训应当使政府当局来深刻的冷静的想一想，如果不根本的转变目前对民众运动的政策，是很难转换目前的严重的局面；如果再固持成见，将要使民族国家蒙受莫大的损失。

当然国民党中也有不少的开明的人士，感觉到需要改变对民众运动的政策，改造军队与改革政治机构，尤其是在前线直接指挥抗战的某些军官中深刻的感觉到国民党十年来政治上的失败，军队不能打仗，民众不能动员，所以他们提出要恢复北伐时代的政治工作，这是非常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比较

客观的来观察问题，因为他们确实在抗战的实践中，在前线和后方都给他们以深切的教训。

目前救亡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现象，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要起来参加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是当局政府限制民众的救亡运动；一方面是前线作战军队感到没有群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当局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恐惧；一方面是许多的人要想参加救亡工作而没有工作做，另一方面是少数人占据抗敌后援会的机关有工作而不去做。这种严重的现象当然是反映出旧的政治机构与老办法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抗战任务。

因为目前救亡运动中表现出这种严重的现象，于是有人喊出“民众力量赶不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这种议论是否正确呢？我们能不能说现在的民众救亡运动落在军事抗战的后面呢？我想这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现在全国民众的救亡运动，是“九一八”以来从未有过的高涨。这次军事的抗战正是在全国民众的救亡运动的推动与压力之下进行的。因为全国民众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全国都为抗战的空气所压倒。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开始了全国的军事抗战。就在这次抗战中我们也看到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尤其是在前线上民众自动的参加抗战。因为政府当局不但没有采取开放民众运动，帮助民众运动和组织民众运动的政策，反而采取限制民众运动、抑制民众运动和统制民众运动的政策，因此使广大的高涨的民众运动不能发挥其作用。政府当局不愿意把军队与人民结合，不愿把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变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我们能够把这些责任加在人民的身上吗？我们能够责备人民没有起来吗？不能的。因此，我们与其说是“民众力量赶不上军事力量”，不如说是旧的政治机构与老办法不适合于新的抗战任务。

正因为某些人只看到目前救亡运动中的严重现象，而没有去把握产生这种严重现象的根源，于是也有人在说这次上海的民众运动不如上次“一二八”战争时的积极。其实这也是不合事实的。上次“一二八”战争时，上海的民众确是英勇的起来援助了十九路军的抗战，难道这次上海抗战，上海的民众就不愿起来援助吗？不是的。上海的民众是在积极的起来参加上海抗战，但是却受到上海政府当局的限制、抑制和统制，使他们不能尽量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上次“一二八”战争时，上海“民众反日会”是由上海民众自动组织起来的。它不是官僚的机关，不是包办的机关，不是空头的机关，它是群众的机关，它是民主的机关，它是工作的机关。虽然那时的“民众反日会”受到中国的和租界的当局的压迫，但是因为它是群众的机关而不是统制的官僚机关，所以它能冲破这种压迫，而取得半公开的地位，进行认真的援助十九路军的抗战。

现在的上海抗敌后援会是在卢沟桥事变后产生的。它是由上海市党部、地方协会以及一些买办所组织起来的。它是一个官僚的机关，统制的机关，空头的机关，不但不进行动员民众的工作，反而到处阻碍民众自动的参加救亡运动。在上海抗敌后援会没有出现以前，上海早已有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各地各职业团体的抗日救国会。但是自上海抗敌后援会出现后，借统一救亡运动为名，依靠官场的力量，将以前存在的一切抗日救国会加以取缔，禁止活动。结果上海民众的救亡运动在上海抗敌后援会的统制之下，都被禁止了。但是上海抗敌后援会从来没有认真进行一点救亡工作，不但如此，据说内部还有个别的买办分子反而接济日寇以粮食，并收买流氓充作汉奸。像这样的抗敌后援会怎样

能够去担任救亡的动员呢！

这能够责备上海的民众吗？不能的。这只能责备上海抗敌后援会，只能责备上海的政府当局，只能责备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因此上海前线抗日的军官不满意上海地方协会，不满意上海抗敌后援会，不满意上海市政府，不满意主持党务工作的某些人物，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当然的道理！因为这些党务工作人员只坐在洋楼大厦，高谈阔论，而完全不了解抗战的实际情况。

因为目前救亡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严重现象，也有些人在叫喊“民众没有组织”。这是正确的吗？不，不正确的。并不是民众没有组织，民众到处都在自动的组织起来。但是由于当局对民众运动的错误政策，却到处都在取消民众组织。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各职业团体的救国会都被取消了；西安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各地各职业团体的救国会也被取消了。难道这能责备“民众没有组织”吗？这只能责备当局不要民众组织！

上海某军官，发出下列的议论，他说：“在这次抗战中最使我们痛苦的是民众没有组织。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汉奸。我们因为途径不熟，要找一个老百姓作向导都找不到，有的时候我们竟误入了敌人的防线！至于汉奸，他们不光是破坏我们的交通，放信号，还把我们的军情报告给敌人，作敌人的向导，替敌人拉夫。汉奸之多如蚁，每天杀也杀不完。我们的电话一天要修十几次，有的时候甚至于误了指挥！假使民众预先有组织，非但汉奸可以在老百姓严密的组织之下不能站脚，其他如保护交通，帮助运输，作向导，作间谍，不知能够给军队以多少的方便。我们北伐出发的时候，民众对我们的帮助，真不知有多

少。这次我们为民族的生存抗战，照理民众应比北伐时更兴奋，更勇敢，但我们竟看不见一个老百姓，使我们军队感觉十分的不方便，连要一包盐非要到上海去买不可。但运输工具又如此缺乏。假使诸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我们情愿不要所有的慰劳品。因当地民众的帮助，实比诸位冒险跑来送慰劳品好得多。”

这里很明显的看到：第一，统制民众运动的恶果，不能使民众自动参加救亡工作；第二，前方作战部队急需民众的帮助，而上海抗敌后援会则从多方面去限制和阻碍民众帮助前线；第三，当某军官发表他的谈话时，他只把组织民众的责任委诸别人，他没有想一想自己在前线对于战区民众的组织负有什么责任。至于军队纪律的不好，自然也是老百姓逃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当局政府对民众运动统制政策的结果，使大多数愿意参加救亡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好做，而少数的人占据抗敌后援会的机关有工作不去做，因此也有人发出“没有工作做”的怨言，因而感到时局的“烦闷”。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当然国民党统制政策，使愿意参加救亡工作的人们受到许多的限制。但是以上海如此之大，中国如此之广，救亡工作如此之多，抗战工作如此之急，我们能说没有工作做吗？国民党的统制政策当然是限制救亡工作的开展，但是并不能从此作出结论，说救亡工作完全不能进行。只要把握着正确的救亡方针，加以不怕艰苦，不怕麻烦的到处去活动，到处去工作，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去开展救亡工作，哪里会没有工作做呢！

产生“没有工作做”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没有把握住正确的方针，因此不能去找得正确的道路来改变当局的统制政策。或者是由于怕艰苦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因此只在上

层的机关中兜圈子。而上层的机关又为少数的人所包办。如果能艰苦的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哪里会没有工作做呢！

二 统制政策是开展救亡运动的基本障碍

我们早已指出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是目前抗战中最大的危险。如果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没有全国广大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的。要使全国广大人民都来参加抗战，不开放民众运动是不可能的。全国抗战已经在进行，全国团结统一亦已初步成功。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争取抗战的胜利。现在再没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开放民众运动了。

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抗日救国还是有罪的，遭受各种压迫。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政府亦已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战，因此抗日救国运动也就成为合法的运动了。但是政府当局始终还没有了解民众运动在抗战中占着决定胜负的意义，始终还是惧怕民众的救亡运动。公开的压迫民众救亡运动既成为不可能，于是采取统制民众救亡运动的政策来限制救亡运动的发展。这种政策是目前抗战中最严重的危险，使抗战有遭受失败的可能。

自上海抗敌后援会产生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成立抗敌后援会。如果这些后援会确实吸收民众参加而且认真的做救亡工作，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这种抗敌后援会既不是由群众产生的，又不允许群众参加，而且还要去强迫取消原有的群众的救亡组织。这种举动确实违背目前抗战的方针。如上海抗敌后援会产生之后，既不允许群众参加，又不做救亡工作，反而要取消原有的民众的救亡组织。西安抗敌后援会也是一样，强迫的把群众的西北救国联合会和学生救国会取消。企图

用这种统制的政策来限制民众运动。这种政策既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也是违背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遗教，同时也是违背中央政府抗战的方针。

统制政策是开展救亡运动的基本障碍，不改变统制政策是不能使救亡运动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统制政策的危险是要使抗战有遭受失败的可能。不改变统制政策就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

在抗战时期中，在某些方面的确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统制的政策，如对财政经济的统制，对国防生产的统制，对外贸易和对外汇兑的统制，而且在这些方面均应采取统制政策才于抗战有利。但是民众运动就不能采取统制的政策。如果对民众运动采取统制的政策，那就要使抗战遭受失败。为什么对民众运动不能统制呢？

因为第一，民众运动的对象是“活的人”，而不是死的物品。他是有思想的，有意识的。如果把民众当作“阿斗”，当作死的物品而加以统制，那就不能发挥民众的力量。第二，因为过去的民众运动是在压迫政策之下，如果在抗战中又来一个统制的政策去代替过去的压迫政策，那就不能使民众积极的来参加抗战。

有人说对民众运动可以进行“合理的统制”。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说，对财政经济各方面的统制，须要是“合理的统制”。如果是胡乱的统制也是有害的。但是对民众运动就不能适应“合理的统制”。“合理的统制”只是统制的程度和方法的不同，但是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则是一个样。因此对民众运动的“合理的统制”也是不能采用的。

我们反对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是不是不主张民众运动的统一呢？不是的。我们主张民众运动的统一，我们赞成民众运动

的统一，而且我们早已为实现民众运动的统一而努力。因为民众运动的统一能够增强抗战的力量。但是统制政策与统一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能借口统一而进行统制。民众运动的统一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一个共同纲领之下来共同行动。这种统一运动是能使民众运动更能广大的发展。不拘组织的名称，不拘组织的形式，化除门户之见，由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在一定的纲领之下，为着争取抗战胜利的目标共同前进。统制政策是削弱抗战的力量，是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是没有共同的目标，是没有共同的纲领，在少数人包办之下，包而不办之下，用一个笼统的名称，取消民众的民主，自立门户之见，结果不但是使民众运动不能发展，而且是更加使民众运动走上分裂。因此统制政策不但不能帮助民众运动的统一，反而助长民众运动的分裂。

上海抗敌后援会就是想借口统一而进行统制，结果并没有使上海的民众运动统一起来，反而增加上海民众运动的分裂。因为上海抗敌后援会不是由群众产生的，不允许群众参加的，没有共同的纲领，也没有实际的工作，只是官办的，强迫取消其他民众组织，而进行自己的统制。西安抗敌后援会也是一样，当着与西北救国联合会进行统一时，在报纸上公布了共同纲领，但第二天就来否认这一共同纲领。它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西救”，它以为这样就可以统制西安的民众运动。其实它这种不顾信义的行动恰恰只是表示西安抗敌后援会的破产。而且这种不顾信义，破坏团结统一的行动，在抗战中确实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失去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风度。这种行动也是与中央政府的抗战方针，与中央政府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精神相违背的。西安抗敌后援会的这种行动必然要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应受到中央政府的谴责。

由这些事实都可证明统制政策与统一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有人以为，反对统制政策就是反对统一运动，这完全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赞成统制政策却是破坏统一运动。所以要赞成统一运动的必须反对统制政策。

三 把广大的民众争取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广大的民众争取到民族统一战线下来，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到抗战中去。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怎样才能争取广大的民众到统一战线中来呢？

第一，实行对民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即是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就是开展广大的民众运动，而不是取消民众运动，也不是限制民众运动。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要开展广大的民众运动，必须坚持民众运动的独立性。民众运动的统一，必须在一定的纲领之下才能进行。这种纲领的基本内容应当不妨碍与不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在民众运动的统一已经实现的地方，在共同纲领之下坚持独立的群众工作，在没有成功的地方，更应坚持独立的群众工作，来争取迅速实现民众运动的统一。反对那种无原则的统一，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民众运动的统一，而是助长统制政策，使统制政策更能延长时日。要达到民众运动的真正统一，就要改变统制政策。因为统制政策是歧视其他一切救国团体，是自立门户之见，是狭隘的宗派主义，是固持一党一派的成见，有些人说：“大家似乎并不是救国，而只是要救自己的团体”。这种意见确是对“大家”的侮辱。不是“大家”要救自己的团体，只有主

张统制政策的人，才是要救自己的团体，把自己团体的利益看得高于民族国家的利益。

目前民众运动中最严重的错误，或者是等待民众运动的统一因而放弃独立的群众工作；或者是进行无原则的统一因而放弃独立的群众工作。这两种倾向都是表示对于民众运动的正确方针的不了解，表现在只在进行上层的统一而放弃下层的群众工作，表现在把群众的救亡运动服从于少数人包办的抗敌后援会，而不能用独立的群众运动的力量去改变包办政策和统制政策。

第二，深入到群众中去，建立群众救亡运动的基础。没有广大的群众作为救亡运动的基础，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充实的。恰好在这一方面是目前统一战线最弱的一点。虽然统一战线的政治影响是无限的扩展到全国，深入到各阶层中去了，他们都认为目前挽救中国最好的方法是民族统一战线。可是把千百万的民众组织在统一战线之下，还要经过深入群众的工作。

目前群众工作中的危险，正是忽视深入群众的工作。有些人发表这样的意见，以为“只要找领袖人物，而不要找二流人物”。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对于开展群众的救亡运动与深入群众的工作是极大的阻碍。这种只注意上层的勾搭而放弃下层的动员，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严重倾向。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由于不了解正确的民众运动的方针，不能进行艰苦的坚持的群众运动，以为只要上层一弄好就“万事大吉”。他不懂得没有广大群众的压力，上层统一是弄不好的；他不懂得如果没有群众力量，就是上层统一弄好了，也是不巩固的不充实的。

第三，动员群众的力量来改变政府当局的统制政策。要改变统制政策，只有根据上述的两点，即是：坚持独立的群众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把广大的群众组织到救亡运动中来，才

能使统制政策逐渐在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被克服过来。有些人说现在只要“保持原有的系统来救国”就够了。这种人的意见完全是不懂得就是因为原有的系统不适合于抗战的任务，而且这种意见也是不愿意去用一切方法来改变统制政策。这种意见是助长统制政策的延长。因为这些人对于统制政策没有尽一切力量去使之早日结束，而满足于现状，于是又发出“少号召，多建议”的议论。这种观点对于开展群众运动也是有害的。多建议当然是好的，但是要看建议是否能实行，如果建议不能实行，那么就是一百个一万个最好的建议也是没有用处的。建议要能实行，必须要具备一个能够采纳建议的行政机关，即是要一个能代表民意的政府机关，这种政府机关必须是采取开展民众运动的政策。所以改革行政机构开放民众运动是先决的条件。如果以为现在连开放民众运动的号召都不要，那是非常错误的。现在就是因为政府还没有开放民众运动，所以应当特别加紧的号召开放民众运动。号召当然不一定要多，但是万不可少。因为号召是一种工作的方针。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号召变为实际的行动，要把号召变为群众的号召，为群众所了解。现在政府当局就想用允许建议的态度来“安慰”人民对于统制政策的愤怒，于是在抗敌后援会内设立设计委员会，作为专门建议的机关，甚至在政府内也设立咨询的机关。这种咨询的清谈机关，对民众运动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助长统制政策。

因此在目前要改变统制政策，要使国民党及早的结束这种政策，而转向到开放民众运动方面去，必须坚持的把工作的中心放到发动群众运动上面去。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用群众的力量才能去改变统制政策。

最后，因为最近在各个战线上军事上的失利，必然会引起一些失败主义情绪的增长，尤其是某些亲日派汉奸分子，从卢

沟桥事变以后，久已为全国抗战的空气所压倒，不敢抬头，在今天抗战遭受失利和困难的情形之下，必然又会利用机会来进行反对抗战，散布失败主义的情绪。他们企图用目前抗战的失利来证明“中国无力抗日”的理论。现在就有这样一种议论：“我说中国要两年以后才能抗日，现在的失败，不是证明我的话吗！”也有这样一种议论：“我说了中国不能抗日，你们硬要抗，现在不是失败了吗！”他们用这幸灾乐祸的态度来掩盖他们的汉奸的理论。他们正利用目前的困难来达到他们作投降妥协的勾当。因此目前须特别加紧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民族失败主义事实上是对日寇的投降主义。

我们应当承认目前抗战，由于政府当局把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军事抗战，是遭受了暂时的失利。但这不是最后的失败。只要政府当局迅速转变抗战的方法，即是把目前的抗战变为全民族的抗战，开放民众运动，马上就能转变目前不利的局面为胜利的进攻。只有坚持抗战到底，采取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使中国独立自由解放。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发展广大的群众救亡运动，改变政府当局的统制政策，揭露失败主义的面目，这是开展群众救亡运动的关键，也即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保证。

十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一期刊印。

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三七年十月)

刘 少 奇

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

一、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

(一) 立即普遍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民选；

(二) 由当地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代表组织临时县政府委员会，好的县长可为主席；

(三) 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

(四) 立即准备公开军区司令部。

二、立即颁布临时边区政府的组织法，规定：

(一) 各级政府负责人的产生办法；

(二) 实行委员制与民主集中制；

(三) 各级政府组织法，边区及县区政府分为下列各部或科：财政经济部、军事部或人民武装部、农政部（管理农民土

* 这是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的两份电报。

地问题)、劳动部、内务部(下设民警局,相当于保卫局,不设锄奸部,取消原来的民团警察)、教育部、交通部(管军事运输)、法院(改组原来的法院,增设一高等法院及若干地方法院,法官由政府委员会推定)、监察部;

(四)区政府可不设监察科及法院,只设专管委员;

(五)取消薪饷制,规定各级政府公务员人数及其生活费的办法。

三、各地临时政府成立后,我党应即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基本政策,向委员会提议:颁布各种法令,主要的是劳动法、农民土地法;废除过去的捐税令,规定统一的累进税则,发布肃清汉奸令等。

四、军区司令部即准备公开,并召集各抗日武装代表成立军区军事会议。

五、设立边区工会、农会、民先队部及妇女抗日会等筹备处。另设军事政治学校一二所,大批招收青年工农学生训练干部。

六、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一面筹备成立,一面向蒋、阎提出,力求取得其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推广到其他边区。在未得承认前,边区可先行办理,唯暂不向全国公开。

此电并致各边区省委,晋西北及绥远亦可采取此种原则,依当地实况,逐步进行。

给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在冀察晋绥已被敌人占领地区,如繁峙、代县、崞县、宁武、神池及雁北各县,原来的县政府被摧毁或人员逃跑

投降，但广大的乡村并无日军或汉奸武装驻扎。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地方工作方针应如下：

（一）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去动员群众。如在当地有友军友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即联合他们，并在战委会名义下共同去动员。

（二）建立当地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并使各种零散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受当地政权领导。

（三）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首先由当地各种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及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成立临时县政府的委员会（名义暂不统一），亦同样成立各区村乡临时政府的委员会。这种县区政府仍应隶属在省政府之下（如山西）。临时政府的任务是：（1）大量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斗争；（2）下令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行减租（战地免租）减息、免税、增加工资等，改善人民生活；（3）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群众运动的豪绅等；（4）颁布县区乡政府民主制的组织法、选举法，筹备选举，产生正式政府。

（四）建立工会，农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首先成立县工会、农会等筹备委员会。其任务是：（1）起草章程；（2）提出当地工农群众各种要求的纲领，并组织群众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3）训练工会、农会工作干部；（4）派人到各区各村，成立区村工、农会；（5）动员群众去参加自卫队游击队及政府各方面的工作。

二、在未被敌人占领地区，当地政府还能照旧维持其统治，我们的地方工作方针是：

（一）共产党与八路军政治部应该独立自主地去动员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当地共产党员尽可能用左派面目出现，如当地有友军及政治团体如牺盟会等，更应联合和推动他们去做，并

可用战委会名义去做。

(二) 推动当地政府进步，要求政府武装人民及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坏官坏人，在发动群众运动基础上逐步改选政权。

(三) 中心一环是广大发动当地群众，要同时采用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去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

(四) 首先在县一级成立工会、农会等筹备会，其任务同上。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增加工资，少交租谷百分之二十五；取消向穷人摊派，增加对富人摊派；优待军人家属及进行其他一切改善生活的斗争。要使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联系，让穷人吃饱饭，好去救国。

三、在已失及未失地区，都要大大发展地方党，吸收在抗日斗争中积极的工农与经过锻炼的知识分子入党。要在各县首先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建立全县各乡村党的支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恢复 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 给朱德等的复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朱彭任邓并告周^①：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洛 毛

二十二日

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恢复政治委员
和政治机关制度给张闻天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洛甫并告周并邓：

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

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地从组织上得到适当地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同时，最近阎锡山、胡宗南、陈诚、张发奎等感觉大革命时期党代表及政治部组织恢复之必要，且闻已向蒋⁽²⁾提议。阎已要我们起草政治组织条例，并在其决死队内已设立政委。故我们更不应迁就友军。组织的具体改变如下：

（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

（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争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旅应设政治处，负责全旅政治工作之领导。

（三）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

（四）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教员。

（五）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六）以上改变意见，请即考虑电复。

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周恩来。

〔2〕指蒋介石。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他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山西亦在危急中。唯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

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

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末，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

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称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

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

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

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

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需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

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

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末，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十五年来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

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周恩来、刘少奇关于独立自主地 动员与领导群众问题给任弼时、 邓小平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任邓并转各师政治部及地方党部：

八路军及各地方党部应即依照下列各项去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

（一）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由八路军以自己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

（二）在我军的后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组织工会、农会，参加自卫队、游击队等；并公开批评一切同盟者的错误，反对统制民众运动的自杀政策，但不应号召群众与抗日的政府、军队、团体对立，相反还应援助他们。唯一般地方党员的面目还不应暴露。

（三）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刊物、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各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

（四）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的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但不要因为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便拒绝与各民众团体及其他党派进行联合运动，或一切都要包办。

（五）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中模糊党的主张。

（六）一切共产党员要坚决地去发动并领导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实际去改善群众的生活并坚决去组织工会、农会等独立的群众团体。

（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要切实地建立各地方的党部。各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与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

（八）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红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

（九）在游击区域中应注意去筹措军费，除没收汉奸财产外，可向富户募集救国捐，以充实地方工作及游击队经费。

周恩来 胡服

10.27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转变中的时局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张 闻 天

一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阴谋

日寇的军队，在华北，正在加紧进攻山西；在淞沪，它又突破了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在华南，它的陆战队又开始在厦门登陆。中国的沿海各口岸均被封锁。飞机到处的轰炸着。而同时它又到处撒播着和平谈判的烟幕。

日寇的这种企图是很明显的。它主要的目的，首先是在将中国军队驱逐到黄河南岸，以完成它占领华北的第一步军事计划，在世界各国及中国前面造成已成事实，再以华南方面甚至上海方面的某些让步，取得世界各国及中国对于华北已成事实的承认，以得到暂时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华北之后的这种暂时的“停战”与“和平”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可以：

第一，巩固它在华北已得的阵地，准备以后的新进攻；

第二，引诱中国当局放弃坚决抗战的方针，分裂与挑拨中国内部开始巩固的团结，以重新遂行它“以华制华”的老方法；

第三，向世界列强，特别是英国，表示日本并无独占全中

国的野心，以分裂列强对于日本的共同行动，首先使将要到来的“九国公约国的会议”无结果而散，像对于西班牙的不干涉委员会那样。

全中国人民应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新的阴谋！我们不要再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再去同它讲和平妥协了！

二 目前时局的危机

但是不幸得很，在冀察绥三省大部丧失，整个华北十分危急，淞沪濒于陷落等不利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方面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停战议和”来响应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和平妥协”的宣传了。

过去三个月来，在全国抗战怒潮的压逼下沉默着的汉奸亲日派与民族失败主义者，现在又从暗中的活动走到公开的活动了。他们以为这是他们公开活动的最好机会。他们说：“中国在抗战中的失败，是中国不能抗战的铁证，因此中国目前必须停止抗日，以求得中日两国的和平妥协。中国要抗日，只有在充分准备之后。”同时，他们又说：“抗战在目前只对于共产党有利。共产党的势力不是在抗战中扩大起来了吗？因此，中国目前自然应该先反共，然后抗日。”

汉奸亲日派与民族失败主义者这一套理论是我们所熟知的，也是我们所早已打倒了的“准备论”、“唯武器论”、“抗日必先剿共论”的旧调重弹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理论的极大危险性。因为我国现在在军事上是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失败，在我国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困难，民族失败主义影响的散布，会动摇我们抗战营垒内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使我们内部的团结发生分裂，使坚决抗战的政策发生动摇，以致造成当前

时局的危机。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在抗战营垒内部某些分子的动摇，特别是那些从来不但不积极参加抗战，而且以压迫群众与限制群众参加抗战为职业的那些分子，特别是那些把个人的利益与一党一派的利益，看做高于整个民族利益的分子动摇得更是厉害。

不用最大的力量，同这些汉奸亲日派与民族失败主义者做斗争，消灭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拥护者与应声虫，是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破坏者与内奸。

三 抗战三个月的总结

我们不能不承认三个月来的抗战，总的说来，在军事上是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失败，所以产生了目前在华北与上海等地的危急形势。但是我们能否从抗战的失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中国根本不能抗日，不能战胜日本吗？不能够的。现在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中国人，都能够看到，至少开始看到，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自身的严重弱点与病态。这些弱点与病态，即是：

第一，党政军当局没有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而且相反的，处处“统制”、“包办”、“限制”与“压迫”民众救亡运动；

第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没有成为坚决实行革命三民主义的政府，没有成为人民自己的政府；

第三，我们的军队还没有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与严明纪律的民族革命的军队；

第四，军事战略上的单纯防御，没有实行主动的攻势防御，没有发动广泛的人民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

这些严重的弱点与病态，在三个月的抗战中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弱点与病态，我们丝毫也不应该隐瞒自己。因为只有公开的坦白的承认这些弱点与病态，我们才能从三个月的抗战中，得到必要的用以战胜敌人的宝贵的教训。这种教训是共产党所早已指出的，即是：

（一）最广泛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使全中国人民参加民族革命的战争；

（二）把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改造我们的政府使之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本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三）使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改造我们军队的制度，提高军队的政治水平，严肃军队的纪律，并且创造新的国民革命军；

（四）军事战略上的主动的攻势防御，发动广泛的人民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

但是我们能够说，我们三个月的抗战完全失败了吗？我们决不能这样说。我们在三个月的抗战中，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成绩。这些成绩就是：

第一，给进攻中国的日本强盗以相当的打击，使他每一寸占领的中国土地，花了相当的代价；

第二，团结了中国内部，使政府与人民、地方与中央、各党各派间的团结，也有了进一步的巩固；

第三，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同情与拥护。

这些抗战成绩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必

须看到这些成绩。而且我们必须指出，正是由于这些成绩，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到今天还不能完全实现它占领华北的第一步军事计划。淞沪一带与山西直到今天还在血战中。没有抗战，华北五省早已完全丧失，而江浙一带亦早非我有了。

三个月抗战以来的这些教训与成绩就是我们争取以后抗战胜利的保证。三个月的抗战，对于中华民族的教益，是很大的。

四 转变时局的力量

从上面的短短总结看来，我们就应该说，不论我们在军事上受到了怎样严重的失败，但是我们不用悲观。三个月的抗战，锻炼了我们中华民族，使我们中华民族更加坚强了，尤其重要的，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最可宝贵的制胜敌人的教训。这种教训已经开始为全中国人民所了解，并且也为党政军当局的某些贤明的领袖们所开始感觉到了。也许他们，特别那些党政军的贤明的领袖们，对于这一教训还没有清楚的意识到与了解到，但是无疑的，他们已经感觉到过去军事、政治、党务方面的那一套陈旧的东西，已经不适用了，他们要求着一个新的转变。这证明坚持抗战的民族革命主义的力量正在生长。这种民族革命主义力量的生长，是我们必须看到的，这种生长着的民族革命主义的力量能够使我们克服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亲日派的阴谋毒计，而坚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严重的指出：为民族革命主义力量的中坚的最广大民众，现在还缺乏组织。党政军当局的某些贤明的领袖们，对于上述教训的领受，还不过是在开始。他们对于军事、

政治、党务方面的彻底转变的必要，还缺乏深切的了解。他们觉得过去陈旧的那一套，已经不行，但是拿哪一套新的来代替旧的，他们还缺乏把握。过去十年来的习惯与传统，过去的那套自高自大主义，那种硬化了的保守性与顽固性，还阻碍着这种彻底的转变。这不能不加深了目前时局的危机。

所以，当我们指出民族革命主义的力量生长时，我们并不只是想以此来安慰人心，不是的。这种指出正是要使我们明白担负起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所应尽的责任。这责任就是要使一切民族革命主义的力量清楚了解这次抗战的教训，使全中国人民，民族革命主义的主力，更加自信的打破目前抗战过程中的一切障碍，大踏步的向着胜利的道路前进，使我们政府当局在军事、政治、党务方面实行彻底的转变。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能克服目前时局的危机，稳着自己的脚步向着彻底抗战的胜利的道路前进。

五 继续前进！

时局正在转变中。还是从全国抗战走向“和平妥协”呢？还是从单面的政府抗战走向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呢？这就决定于民族革命主义力量的是否能够战胜民族失败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抱着绝大的信心。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革命主义的力量一定要战胜民族失败主义。因为四万万中国人，除了极少数汉奸亲日派与民族失败主义者外，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是愿意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而且在他们的前面，已经有着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的光明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胜利的道路，不但在整个事变的发展

上，而且也在实际行动上证明出其完全的正确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冀察绥边与山西的胜利的抗战，已经给了全中国人民以极好的例子，即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就是他在数量上占着极少数，也能够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怎样严重的打击。如果全中国的军队能够依照这种模范改造自己，如果政府方面能够依照这种模范把全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如果共产党的办法能够完全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定可以战胜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人民，号召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中的贤明领袖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亲日派的阴谋毒计所欺骗与引诱，不要为目前军事上的严重失败所恐吓，不要为国内的各种困难所屈服，而以最大的决心，根据三个月来抗战的宝贵教训，迅速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十大纲领，使已经开始的全国性的抗战走向全面的全民族的胜利的抗战！

决不退却！向着彻底抗战的方向前进呵！

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二期刊印。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 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问题 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

博、叶：

关于各地游击队问题：

甲、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一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要求。

乙、留下五分之一，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丙、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丁、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

戊、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能集中。

己、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¹⁾。

洛、毛

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

王 若 飞

一 八路军在战场上出现后对华北抗战的影响

华北抗战从七月到现在已历三个半月。敌人由七月七号袭击卢沟桥，进而占领华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北平天津。更继续沿平绥路西进，于八月末攻陷南口、张家口。九月间又攻陷天镇、大同。至十月初，归绥及雁门关亦相继失守。现在敌军已越雁门关而进至离太原不过九十公里的原平。在平汉线方面，九月失去保定，十月初失去石家庄，敌军正向娘子关及彰德进攻。在津浦线方面，敌军已越沧州、德州、平原，进至老黄河北岸，直接威胁济南。现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山西、绥远的一大部分，均已陷入敌军手中。敌人目前的企图是想一面沿正太路、同蒲路，并力夺下太原；一面沿津浦路及胶济路夺取济南；便可实现其初步夺取华北五省的计划，以达到灭亡中国。然而由于八路军九月间在晋北战场上的出现，以及他从平型关战斗后连续的胜利，使敌人顺利夺取太原、占领山西的企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迟阻了敌人向山西延伸的计划。同时对整个华北抗战以莫大的影响：

首先，是他振起了各路战线屡经失败的士气，坚定了我们

全国抗战必胜的人心。

其次，是他以新的战略姿势，出现于战场，他在山西、在华北展开了广泛的运动战与游击战。他不是单纯的防御，坐等挨打的防御，而是在战争中处处争取主动地位，去消灭敌人，去使敌人的优越技术减弱效力。他抓住了敌人的各个弱点，对准着敌人这些弱点进攻，他向全国友军提供了致敌人死命的战略。

其三，是由于他在抗战中坚决英勇的模范，他的政治主张与军事战略之正确，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战胜的，影响与推动其他友军，也共同走上这一能够争取胜利的途径。

二 八路军现在所采的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他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有着自觉的纪律，有着与人民密切的联系，有着坚固一致的团结，有着英勇坚决刻苦奋斗的牺牲精神，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这是他的长处。但在今天与强暴的敌人作战时，也有他的弱点：第一，是现在八路军的数量还不很大；第二，是他在物质技术上还很贫弱，缺少机械化的、化学的、航空的各种新式武器。而他的敌人，正是在技术上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他必须避免自己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去进攻敌人的弱点。什么是敌人的弱点呢？

第一，他所发动的战争的性质，是侵略的，是在中国境内作战，是要处处都受到中国民众的仇视。

第二，敌人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之严重，财政之枯竭，阶级斗争之尖锐，国际形势之孤立，不利于战争之持久下去。

第三，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交通又极不方便，日本军队不能占领一切中国区域，他只能沿着交通方便的铁道线作战。他的军队愈向内地深入，便愈有时时被截断包围消灭的危险。

由此得出我们对日作战的总的战略方针：应从坚决持久的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去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以致完全把他驱出中国去。而在八路军方面，更应该适合自己现在的力量与坚持自己的特长，发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用以配合全国友军作战。八路军在这个战略方针之下：

第一，他的行动，在军事的指挥上、机动上是独立自主的，但又是与友军行动相配合的，服从一个统一的军事领导与统一的作战计划。

第二，他负担了协同友军作战的任务。他现在山西境内，便是凭借同蒲路两旁的山地深入敌人后方，向沿同蒲路进犯太原的敌人截击。

第三，他在战争中，是处处争取主动的地位。一切战略的退却与防御都是为了要进攻消灭敌人，而不是单纯的防御与退却。

第四，在今天我们的数量与技术比敌人还差的很远的时候，我们军队的行动，是带游击性的。这种游击性，正是我们今天能保存与扩大自己力量，并战胜敌人的工具，是今日能够致敌死命的战略。

三 八路军一月来所获的胜利

自从九月下旬八路军赶上前线后，他的不断胜利的消息，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兴奋，使敌人惊惶失措，咬牙切齿，宣言要

以一切最残酷的方法（毒气轰炸）来消灭这部分军队。八路军为什么能这样所向皆捷呢？因为他是真正人民的军队：他与民众密切联成一片，到处得到人民的帮助。同时又发挥他在过去十年战争中积有丰富经验的游击战略，所以能深入敌人的后方，忠实执行总的作战计划给与八路军的任务。

八路军在敌人攻入雁门关后，他负担了从侧面协助友军作战的任务，即分为左右两翼，深入晋北一带敌人后方，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袭击敌人后方城市，并对沿同蒲路进攻太原之敌，随处截击。晋北民众纷纷起来协助八路军抗战，使敌人非常惊恐混乱，大有应付不暇之势。总计我八路军参加抗战一月来所得前方捷报如下：

我右翼军于九月十五日，在平型关与敌人激战，毙敌官兵数千，缴获满载军用品汽车七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大炮两门，炮弹三千余发，步枪数百支，及其他很多军用品，残敌狼狈奔溃。二十八日在平型关、灵丘间之张树庙，伏击敌人，缴获汽车三辆，步枪三十余支，轻机枪二挺，敌死三十余人。十月十一日，我军一部袭占涞源城。守城之敌，向易县逃去。十三日，我军一部进袭灵丘、广灵两城，并截断公路。另一部收复平型关，破坏公路十余里。十四日，我军一部在平型关、灵丘线，截住敌汽车一百三十余辆；另一部向繁峙、代县之线袭击；再一部向崞县、忻县之线袭击，与我左翼军呼应并策应正面忻口各友军作战；我军某部又东出河北省之行唐、曲阳，夹平汉路活动于敌之侧后方。十五日，我军一部在灵丘与广灵间之马家湾伏袭敌军运输队，获骡子百四十五匹，大车九十余辆，满载食品大衣及敌军劫掠民众物品，毙敌八十余人。十六日，我独立团袭占广灵县，敌守城步骑兵一连，汽车三十余辆，狼狈向蔚县逃去，我军正积极向灵丘、蔚县线活动。二十

日，我军一部以极英勇敏捷之动作，夜袭同蒲路之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又一部在平山县附近袭击敌人，获马二十二匹，毁汽车数辆，毙敌三十余人。

我左翼军于本月二日，袭击朔县以北、平鲁县以南之井坪镇，将敌千余人击溃，收复井坪镇。缴获坦克车八辆，装甲汽车十五辆，步枪三十余支，机枪二挺，炮弹八箱，毙敌二百余人。以后继续推进，收复平鲁县。六日夜，我军一部袭击宁武县，占领该城四门，敌人困守城中。七日，我军另一部袭出大同以南之岱岳镇、榆林村、马邑三处。除岱岳外，其余两处均被克复，破坏了敌人桥梁电线。十日，袭击岱岳、怀仁间之南北新村，缴步枪数十支，汽车六辆，毙敌二百余人。十二日夜，我军一部在崞县以北十里铺，袭击敌汽车十二辆，敌死六十余人。同日又袭击岱岳以南之新庄，毙敌百余人，将敌全部击溃，焚毁汽车十八辆。十三日，敌坦克车装甲车满载步兵炮兵由朔县向宁武增援，我军一部伏击于宁武城北之马家湾，将敌全部击溃。困守宁城之敌，突围逃走。我军确实收复宁武。十四日，我军一部攻占崞县附近之永兴村，缴获装甲车一辆，战马七匹及军用品甚多。十九日，我军一部占领雁门关，并破坏由广武至太和镇间公路，毁桥梁五处，二十日因敌军增援赶到，暂时退出。但二十一日雁门关又复为我夺占。我军另一部在崞县阳明堡间埋伏，截击由崞县北开之汽车三十余辆，毁其数辆。现敌人因大同至延平间交通时时被我截断，非常恐慌。

八路军这些胜利，大大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使向南进攻太原的日军（约五六万人）完全处在我军的四面包围截击中，阻止了他想长驱占下太原的企图。按照现在的情势，假如正面友军能够坚持不被敌人突破，尤其是在战略上，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攻势的防御；在政治上能让广大民众组织起来，武装

起来，参加抗战，那么这五六万日军，不难被我完全消灭。

四 坚持山西的战略支点与对于友军的希望

由于八路军在山西战场上的出现，他正展开着广泛的游击战争，从各方面觅取敌人弱点，去消灭敌人，他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略”，使敌人的优越武器大大减弱效用，使敌人占领山西的企图受到严重打击，无论如何，敌人现在决不能像占领东北和河北那样容易的来占领山西。山西将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即敌人永远不能完全占领的局面。敌人虽可以凭借其优越武器（飞机、坦克、重炮等）暂时占领若干交通城市，但其他许多城市及山地，将仍在我军手中，并且那些深入山西腹地的军队有随时受我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今天的山西不仅是敌人永久不能完全占领的区域，而且将成为展开华北游击战争的中心，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成为收复华北失地的根据地。因此，坚持山西游击战争，保持山西的战略支点，是目前抗战中的重要任务。

一月来，八路军的胜利虽然相当改变了华北抗战的局势，但他还不能就决定整个抗战全局的胜利，他只能以自己的行动作为全国友军采纳的模范。在今天抗战胜负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要靠数量上超过八路军几十倍的全国友军。为什么许多友军在过去遭到很严重的失败呢？主要是由于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是只靠政府军队的抗战，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政纲，去唤起民众来参加抗战，甚至还压迫限制群众抗日运动，自然要使军队的抗战，得不到广大民众的帮助。

第二，在军队中没有建立正确的政治工作，去提高士兵的政治认识，并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而完全保持过去官兵对

立的现象，自然不能望这种军队能拼命去打战。更有许多军队在抗战中还是纪律不好，自然也得不到民众拥护。

第三，若干高级军官仍带着军阀自私心理，不愿自己牺牲，对抗战不坚决。

第四，战略上采取单纯的防御路线，完全是坐等挨打的办法，不争取主动，不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这也是军事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八路军之所以能获胜利，就是他没有上述的缺点，他是真正人民的军队，他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有着坚固一致的团结，有着英勇牺牲的精神，有着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

我们为了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诚恳的希望全国友军从研究过去失败与胜利的教训中，速下绝大的决心，除去自己的弱点。最近我们已听到某些国民党高级军事领袖，对于如何动员群众问题，如何改造军队问题，如何争取主动战略的问题，正在想向这方面转变。我们竭诚的期望这种转变能够迅速实现。

根据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
《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一期刊印。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

报告提纲

（一九三七年十月）

毛 泽 东

第一部 目前抗战的形势

一、中日战争的现状与估计

（一）卢沟桥事变后华北与长江一带的最近战况。

（二）日寇在侵略战争中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这是因为：1. 它是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2. 它同中国为近邻；3. 它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进攻。

（三）但是这一次它同“九一八”不同，它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付了极大的代价，遭到了有力的抵抗。

（四）中国进行了坚决英勇的抗日民族自卫战，虽是遭受了暂时的部分的失利，但是这一民族自卫战：1. 空前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坚决勇敢的精神，打破了过去“恐日病”，给了日寇相当的打击；2. 空前地巩固了中国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表示了中华民国的新气象；3. 使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重返合作，使国民党有了决定的转变。

（五）这种暂时的与部分的失利，也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关系的国家，所以：1. 军事技术落后；2. 政府与军队陈旧腐败，病态与弱点很多；3. 军事指挥十分落后；

4. 政府惧怕开放民运。

（六）这种失利，在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作战时，一般是难于避免的。

二、目前时局的危机与困难

（一）正由于这种暂时的部分的失利，造成了目前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经济上的许多困难。

（二）这种困难为民族失败主义者、汉奸、亲日派所利用，以证明中国之不能抗日，以便利于他们的投降妥协；他们活动的表面化，他们的危险性，他们的力量，也不能轻视。他们的弱点，是没有军队与人民的拥护。

（三）这种困难使抗日派内部一部分人发生动摇与失望，觉得抗战的无办法与无出路，同时他们又为亲日派分子的“不亡于日即亡于共”的谣言所威吓，这是目前最大的危险。但是抗战派内部的“决定的力量”蒋介石，直到今天仍然主张坚决抗战。

（四）目前是危机转变的关头。

三、我们的立场

（一）我们认定这时失利是暂时的与部分的失利，不是最后的与完全的失败。决胜负的战争尚在前面，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二）但我们认定，我们目前是处在危机的关头，我们当前紧急任务，是在团结抗日派内部，首先是国共两党进一步的合作，以一切力量打破亲日派的阴谋，克服当前的一切困难，继续抗战。

（三）我们要用最具体的事实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中国抗战能够胜利，提出具体的办法去解决目前的困难。

第二部 中国抗战能否胜利

一、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因素

(一) 中国的力量。

(二) 日本的力量。

(三) 国际的力量。

但决定的因素是中国自己的力量。

二、中国的力量正在抗战中坚强起来

(一) 抗战扩大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内部的统一与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政府与人民，地方与中央）。

(二) 抗战使政府开始成为国防性质的政府，打下了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初步基础：坚决抗战的国防政策，确定国防会议的召集——释放政治犯——取消紧急治罪法——救亡运动的某些程度的合法化——同贪污作斗争——同汉奸作斗争。

(三) 国民革命军开始成为统一的国防军队，打下了以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的初步基础：统一指挥大本营的建立——各个战区的划分——调动了各省军队上前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建立新军队——比较进步的军队中开始建立政治工作。

(四) 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造成了民族抗战的高潮。

(五) 抗战愈坚持则中国内部愈团结，愈有力量，愈能走上民主共和国，战胜日寇。

三、日寇的弱点及困难

(一) 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特别是军事工业不发展。

（二）国内矛盾的尖锐化（政府与人民，军部，与资产阶级内部）。

（三）中国的地大物博，使日本军队不够分配，无法巩固占领地区。

（四）日本后方不巩固（朝鲜、台湾、东四省等）。

（五）抗战愈坚持则日本的弱点愈增加，愈有利于我们争取抗战胜利。

四、国际形势

（一）中国的抗战引起全世界上无产阶级与人民的同情与援助——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英国工党、工会的态度——法国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同情——美国最反动的工会联合会主张反日抗货——阿姆斯特丹国际苏联工会的加入。苏联。

（二）世界各国的态度——法国——英国——美国——内部态度的不一致。德国、意大利。

（三）一般说来，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而日本比较孤立。

五、结 论

（一）中国有力量战胜日本。国内外的形势对中国有利。

（二）今天的中心是在坚持抗战，进行持久战。

第三部 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

一、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首先必须向党内外人士说明，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

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

(二) 统一战线的内容是：1. 各党各派的抗日合作；2. 统一的国防政府；3. 统一的国防军；4. 统一的民众团体。不是一党一派的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的包办。

(三) 统一战线内各党各派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如我们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各派的态度，是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与团结，不是削弱它分化它（对国民党各派如 CC、黄埔、复兴社、法西斯问题）。

(四) 我们对同盟者工作方法：1. 切实的具体的帮助，多采取建议的方法；2. 依照他们觉悟的程度与迫切的需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3. 善意的批评，也应该赞扬他们的好处；4. 利用群众的力量的推动，即自下而上的推动，但不是对立。

(五) 向国民党人说明，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要为统一战线斗争到底。

(六) 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磨擦不可避免，只能减弱不能消灭，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与和缓内部矛盾与磨擦。

(七) 统一战线中两条战线斗争，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什么是“独立自主”？

(八) 如何扩大统一战线：1. 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2. 各群众团体加入统一战线；3. 组织无组织的加入统一战线；4. 分化亲日派与争取亲日派影响下的分子。

二、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

（一）我们要以抗日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不是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推动现政府。

（二）我们要求各党各派有威信分子，共产党也在内，加入政府，巩固中枢，坚持抗战的方针。

（三）逐渐淘汰政府中的亲日派分子与贪污腐化分子。

（四）帮助中央政府改进地方政府，反对封建割据的局面，帮助地方政府进步成为中央政府的有机的一部。消除中央与地方的对立。

（五）迅速解决特区问题。解决特区政府的原則：1. 保持党的领导；2. 使特区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的地方政府；3. 保持特区为抗日的先进地区、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机和新中国的雏形。

（六）应该严格区别特区及统一战线地区（如八路军驻扎地区）。

（七）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

（八）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这在国内外的形势均须如此（西班牙的例子）。

三、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

（一）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与建立，不是不要现有军队。

（二）不能说现有抗战的军队还是军阀的军队，现在带兵的人还是军阀。军阀可以转变为民族英雄，良好的军人。

(三) 应该如何帮助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 1. 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1) 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2) 改善军民的关系, (3) 改善官兵的关系; 2. 统一指挥、纪律、武装、供给、作战计划等; 3. 反对拥兵自卫的军阀主义, 但也反对中央歧视地方; 4. 帮助政府实行征兵制; 5. 培养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 改善与扩大军政学校; 6. 改善军事技术与军事指挥。

(四) 扩大与巩固八路军, 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政治工作, 改善技术装备, 使之成为国防军之一部, 并在其中起模范作用。

(五) 共产党员应该到军队中去, 到军官学校中去, 到保卫队、壮丁队、义勇军、游击队中去, 成为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刻苦耐劳、遵守纪律的模范, 并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影响其他的将士, 改变军队的质量。

(六) 使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起来, 仅靠游击战不能战胜日寇。

四、动员与武装人民, 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 组织巩固的后方

(一) 国民党在群众运动中的矛盾: 一方面“要”, 一方面又“怕”。“要”, 不能不使运动相当合法, “怕”, 不能不统制。

(二) 我们的矛盾: 我们要发动群众, 而我们的同盟者却怕发动群众, 要统制。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区别。

(三) 但群众运动在这种情形下仍然能够发动, 问题是在经过何种方法、何种道路。

(四) 群众运动中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合法”与“统一”。

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旧形式也好。一切为了统一，反对分裂。即共产党发起的运动与组织也要服从于这两个基本原则。

（五）关于开展救亡运动中两条战线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

（六）关于政府、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如关于民主、民生问题上的磨擦），党应该起桥梁的与调解人的作用。要政府、军队让些步，但也要人民拥护政府抗日。挑动尖锐的对立是错误的。

（七）如何武装民众？1. 主要夺取敌人的武器；2. 向政府要求一部分；3. 设法购买一部分；4. 收集散枪等组织武装的自卫军、纠察队、锄奸团。

（八）同汉奸、敌探、托匪作斗争，巩固后方，特别是托匪：1. 托匪的作用；2. 托匪的危险性；3. 坚决消灭托匪。

五、坚持华北抗战与游击战争

（一）由于我党在华北力量的增长，我们在华北特别在发展游击战争中担负了重要的责任。我们要在那里做出一个好的模范，影响全国。

（二）应该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一切抗日党派合作，帮助组织，以发展力量，不取吞并政策。

（三）在旧政权存在的地方，去利用与经过旧政权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在没有旧政权的地方，应建立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保存旧形式，请求上级政府的指导、委任与援助。在旧指挥系统存在时，仍去利用与经过它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没有时则应建立统一指挥部，求得上级机关指导、委任与援助。

（四）帮助国民党在冀、察两省建立国民党部，使之与国

民党中央发生联系。

(五) 对被占领区域的汉奸组织如维持会等，我们应进行分化，争取这些组织为我们所利用。

(六) 应该大规模地武装民众，扩大抗日军与八路军，建立各种名义的自卫军、义勇军、游击队等。

(七) 利用一切旧形式与合法的形式组织群众进行互相间的合作与统一，一切斗争应以抗日为第一。

(八) 普遍地建立共产党组织，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到处应该有秘密党的组织。

六、扩大与建立国防工业

(一) 持久战中国防工业的重要，国民政府尚未注意此事。

(二) 中央政府应设立国防工业部，统一计划与指导。

(三) 募集国防公债，发展国防工业。

(四) 国防工业应设置在安全地带。

(五) 各省亦应有设置小规模国防工业的必要。

(六) 特区亦应着手做这件事。

七、争取国际的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

(一) 加强国际宣传（电影、画册、报章、共同宣言、代表团等），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抵货，不卖军火给日本而卖给我们。

(二) 同各和平阵线国家英、美、法等进一步地靠拢，利用国际间的矛盾。

(三) 关于同苏联的关系。

(四) 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联系。

八、结 论

这些任务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不只是共产党的任务，而是全民族的任务。我们愿意同政府当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为实现这些任务共同奋斗。

第四部 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

一、中共在抗战中做了什么？

（一）我们的成绩：1. 国共两党的合作，打开了抗战的局面；2. 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纲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在某些地区实现了纲领的某些部分；3. 八路军的抗战及其作用；4. 华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5. 全国党员的参战动员；6. 共产党的组织半公开与公开地位的取得——这些成绩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影响与威信。

（二）我们的弱点：1. 统一战线不够，党员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了解也不深刻；2. 动员群众的力量还薄弱，党员不能深入群众中去；3. 组织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响；4. 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缺乏。这些弱点使我们的工作还不能更大的发展。

（三）应该依靠已得的阵地，纠正自己的弱点，发展我们的工作，使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的作用。

二、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一）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活动的可能“下山”。

(二) 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

(三) 提高党内的警觉性，反对叛徒、奸细、投机分子、自首分子混入党内。

(四) 建立在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

(五) 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

三、干部政策

(一) 目前干部的恐慌，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干部决定一切”。

(二) 审查干部，与考察干部政治面目与工作能力。

(三) 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

四、为党内的团结一致而斗争

(一) 党内的团结一致是战胜日寇的先决条件。

(二)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党，破坏党即是破坏革命。

(三) 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与实际的一致。

(四) 正确地发展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五) 严肃党的纪律，坚决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六) 为国际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对于 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提议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一) 抗战已进入到紧急的转变关头。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本党特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提议，立刻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实现下列的紧急任务。

(甲) 决定具体的国防纲领（希望采取本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保证实施的具体办法。

(乙) 通过民主的宪法大纲，及保证实施的具体办法。

(丙) 选举政府机关。

(二) 为完成上述三大任务，本党所提议召集的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是：

(甲) 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而不是少数人包办的机关。

(乙) 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不是政府的咨询机关。

(三) 本党根据于孙中山先生历次所提召集国民大会的主张与目前紧急情况，认为必须由下列团体的代表来组织临时国民大会：

(甲) 前后方的抗日军队。

(乙) 一切抗日救亡的民众团体。

(丙) 工会，农会，学生会，文化教育团体，商会，实业团体。

(丁) 各抗日救亡的政党。

这类代表的数量，应依照一定的比例，由各团体自己选出。代表总数以便利于切实的迅速的进行工作为原则，对汉奸亲日派则绝对排斥。

(四) 本党认为临时国民大会的召集，实为目前转移时局的主要关键。希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各同志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赞成本党主张，促其实现，不胜幸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十一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 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一 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 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

(一) 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

(二) 但是我们早就指出（今年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三)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四) 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五) 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六) 在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全面抗战中，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必须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府和军队。

(七) 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是这样的：

1. 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

2. 英、美、法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

3. 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国主义。

4. 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

这些是一方面的情形。

另一方面则表现：

1. 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2. 民众运动开展了一步。

3. 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

4. 国民党中主张改革现状的势力正在增长。
5. 世界人民反对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运动正在发展。
6. 苏联正在准备用实力援助中国。

这些是又一方面的情形。

（八）因此，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九）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

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

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

（十）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

（十一）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十二) 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现在是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危机也许将延长，也许将较快地被克服。决定的因素，在中国内部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在中国外部是苏联的援助。

(十三) 国民党有在其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这种可能。这主要地是因为日本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部新生力量的增长。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它实现这一改造，以便作为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基础。这一改造无疑须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我们是站在建议的地位。

(十四) 改造政府。我们提出了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方针，这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一改造也无疑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

(十五) 改造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这种新军将影响并团结一切旧军。这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一改造，同样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八路军应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本身应该扩大。

二 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

(十六)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十七）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

（十八）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十九）还在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又在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特别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时，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二十）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①），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奋斗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

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二十一）几个月以来，主要是抗战以来，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组织，对这种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并且收到了成效。

在参加政权问题上，中央发出了一个决议案的草案。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据地，同样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²⁾（当然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这种议会主义在中国党内是没有的），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

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³⁾（迁就倾向），

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

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⁴⁾。

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

在南方各游击区——这是我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在《解放周刊》，坚持了严正的批评态度。

（二十二）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二十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 this 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

地是不可分离的。几个月来，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群众是在我们的影响下团结起来了，国民党营垒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长中，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二十四）但是必须清楚地懂得，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二十五）上面说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但是还有一种投降主义，这就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

（二十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

本条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

（二十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5]；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中^[6]。抗战的军队是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其中某些成分是开始了或准备着改造。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二十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是谣言的制造厂，“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的谣言，今后将要与日俱增。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

（二十九）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

作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2〕这里所说的“议会主义”倾向，指当时共产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抗日根据地内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改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议会制度的一种意见。

〔3〕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西安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无理取缔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当时，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作了无原则的让步，于同年九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西安的群众救亡运动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中央随即纠正了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倾向。陕西省党组织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展开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安各界群众的救亡团体，又以新的组织形式普遍建立起来。

〔4〕这里所说的陇东，指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合水、镇原等地。一九三七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经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限制，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进行抗日斗争和各项民主改革。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无原则的让步，自动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使当地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遭受到很大损失。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这种错误。陇东特委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陇东所属各县相继恢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界群众组织，重新发动了抗日民主运动。

〔5〕指当时《申报》等报纸所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6〕这里所说的复兴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所说的CC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也是指当时其中非当权的一部分。

毛泽东关于向全面抗战 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朱彭任及恩来、胡服、尚昆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¹⁾诸同志：

甲、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

乙、山西各军大溃，除刘湘、汤恩伯外，暂时均不能作战。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

丙、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丁、林师徐⁽²⁾旅速到吴城镇地区，准备与贺师之贺廖⁽³⁾支队配合作战，打几个小胜仗。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准备打几个小胜仗。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

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多打小胜仗。荣臻军区以杨^{〔4〕}团为基础成立第一独立师是很对的，还应以总部特务营为基础准备成立第二独立师。以上均请朱、彭迅即处理。

戊、向南方及四川招兵计划暂时是不可能的。扩红方法主要经过扩大游击队，其次则向大地方招募，目前汾阳以东、介休以北虽已不可能，但汾阳以西以南、介休以南还是可能。请总部、林师注意及时抓一把，再迟亦将不可能了。过去一切计划应以太原、娘子关失守为基点，今后一切计划应以军渡、临汾、蒲县、晋城失守为基点，晋西北应以宁武、神池、五寨失守为基点，晋东北应以五台、蔚县、广灵、灵丘、阜平失守为基点。以上均请考虑及之。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

〔2〕指徐海东。

〔3〕指贺炳炎、廖汉生。

〔4〕指杨成武。

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周 恩 来

甲、太原既失，敌正长驱南进，沪战亦转至松江，浦东已失。英美出头调解，日敌提出条件：一、沪占领区划为租界。二、华北自治。三、内蒙独立。四、取消中国捕鱼权。因此，沪、宁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晋局亦危。阎⁽¹⁾留石口镇、隰县，集结其教导团、决死队、少先队，坚持吕梁山脉，不来临汾，胜则发展游击战争，败则退河西，战事主持完全推之黄、卫⁽²⁾。黄已失信心，卫虽口头同意我们对持久战与游击战主张，但其心已不在晋，各军均纷纷谋退过河。蒋⁽³⁾似已不如以前之严令坚守。对刘湘，阎已希望其不会来晋主持。故灵石韩信岭之阻敌已无大望，敌直下风陵渡只是时间问题。

乙、因此，我意目前应：

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以此为一切动员的中心。指出凡要退过河的都是帮助日寇统治华北。

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改造，一致行动。分：（1）同情者，如决死队、教导团等。（2）有关系者，如许旅、赵师、孙军⁽⁴⁾等。（3）有来往者。

* 这是周恩来从山西临汾发给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

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
(1) 红军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已达万人。(2) 山西各县游击队，知者十四县，有四千余人。(3) 总动委组织和领导的一千人。关于游击干部训练，各军区应自行组织训练队，收容各地青年学生及工农分子。

四、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此项成绩最差）。胡服^{〔5〕}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提议华北扩大三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华北三万，请朱、彭、任下令规定办法，地方党政协助。

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方开始做，东线稍有成绩，西线因无兵较困难。

六、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彭真去主持，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晋南以雪枫^{〔6〕}为主，兼负责军政党委，以集中和统一党政军的行动。

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以及于省区。

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

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

丙、党的工作布置，由胡服电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2〕指黄绍竑、卫立煌。

〔3〕指蒋介石。

〔4〕许旅，指西北军十七路军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赵师，指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孙军，指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

〔5〕即刘少奇。

〔6〕即彭雪枫。

周恩来关于同卫立煌、黄绍竑 商讨坚持华北游击战争问题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毛、朱、彭⁽¹⁾：

华北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我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为坚持华北游击抗战，将来转入胜利的反攻，目前仍以取得南京及阎⁽²⁾的同意与接济下，布置华北游击战。为能易于争取友军、扩大红军与发展游击战争，今早与卫、黄谈下列问题：

（一）部队改造；

（二）政治工作建立；

（三）政权开放；

（四）民运开放；

（五）战略战术改变；

（六）后方补给（经费、人员、械弹、交通、卫生、器材）应沿豫陕黄河右岸分界设备；

（七）黄河北岸分区指挥，南岸成立预备军区；

（八）一切部队留华北（黄主张好的留下），笨重器材向后方移动及后方移南岸；

（九）黄主张一、五、六、七、八各项速做。已电催阎来商大计，并电话告蒋⁽³⁾取决。因此我以候阎及彭来再走为有

利，但不知彭何日能赶到洪洞，常委会能否等至二十日再开，请分别电复。

周
元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朱德、彭德怀。
- 〔2〕指阎锡山。
- 〔3〕指蒋介石。

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 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则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周并告朱彭任⁽¹⁾：

甲、周元亥电悉。

乙、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²⁾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丙、同意与朱彭任、阎黄卫见面后回延安，回时取道延长为宜，请朱、彭、任快点过汾河会商，以在隰县为宜。

毛泽东

十五日十二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 〔1〕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2〕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

独立自主地领导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刘 少 奇

一、目前，正处在片面的军事抗战已很难支持，而全面全民族抗战还没有到来的危险严重的过渡期中。华北的正规战争大体结束，今后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将是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正因为这样，统治阶级就更加动摇，汉奸活动更加猖獗。一部分统治阶级、军政领袖倾向对日妥协、求和，以保存他们的财产权位，国际上调解“中日冲突”的活动，更增加了他们对和平的幻想；黄河以北的一些军政领袖，则企图逃跑到黄河以南去躲避战争。而另一部分统治阶级、军政领袖，则倾向于开放民众运动、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在民众援助下继续坚持与扩大抗战。

二、华北已经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为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目前在华北，旧的政治机构已被日寇破坏，而日寇与汉奸的政权还没有在广大的乡村与大多数小的城市建立起来，在这些地方，我党公开直接动员与

* 这是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的决定。

武装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有了。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

三、如果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不能继续坚持与扩大，我们就要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地和日寇作战。然而比东北义勇军的困难要少多了。华北游击战争有重新转变为正规战争、驱逐日寇出华北的胜利前途，这取决于八路军若干倍的扩大，武装民众和争取与改造友军的成功。因此，我党在华北一方面要动员人民坚决反对妥协求和的倾向，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国际上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和平方案；同时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

四、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众运动。除开深入与扩大我党的政治宣传外，必须坚决广泛地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使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抗日武装斗争联系起来。要加强反对右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因为惧怕同盟者不高兴，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与减弱领导群众的斗争，放弃领导群众改善经济生活的斗争，惧怕用八路军与党的名义公开去动员群众，模糊我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同时，必须反对左倾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不顾统一战争的原则，提出过高的口号，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不必要地去刺激同盟者等。目前，我们不要去依赖同盟者的帮助，而应独立自主地去领导群众与游击战争，但我们应尽可能取得同盟者更多的帮助。我们不要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领导群众的斗争，但我们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要尽可能不故意刺激与吓退同盟者。目前是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党的独立自

主，而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

五、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要尽可能联合各党各派来建立这种政府与部队，并取得南京中央政府的承认。同时，还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整个系统的组织，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

六、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武装与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即公开。要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要反对党内准备在日寇到来时只潜伏在日寇统治下进行秘密工作的倾向，这只有在日寇统治暂时稳定的城市中才有必要。在广大的乡村中，我党要公开出来进行游击战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目前抗战危机与 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周恩来

一 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危机

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具体地分析来看：

甲、在战局方面——日寇已占领上海，突破松江，我军防线已退至嘉善、苏州、昆山、浏河之线；华北方面，敌人自占领太原后，已进逼汾阳、介休、子洪镇之线；平汉、津浦亦有前进消息。日寇企图是想在稍加整理后，压迫我大军退过黄河南岸，以便其向全世界宣告：华北战事已告段落，上海亦已占领。它将从事于华北自治，上海中立，分化蒙回，捣乱华中、华南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口头的停战协定掩护之下来进行，以欺蒙列强，利诱汉奸。这比明枪真火来得毒辣！

* 这是周恩来在山西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讲，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群众》第一卷第二期。

乙、在国际方面——九国公约会议，虽表示了英美的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硬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能做到。因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意完全赞成日本说话，日本不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提出它的六项要求^[1]，英美并预言，如果日本态度强硬，中国坚持抗战，他们将使九国公约会议延续下去，准备觅取新机从事调停。苏联因英美态度如此，自不能单独行动，虽说它在道义上在实际上已给了中国以有力的帮助。

丙、在军事上——中国正规军队现已用到相当的数目，而全民全面的动员，军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后方工作的改善，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没有开始。战争的失利，部队的损伤，给养的不充，这使部分的军人发生颓丧失望的心理。如恃着现有的正规军持久抗战，其胜利信心确已锐减。

丁、在民众动员方面——三四月来，不但政权没有开放，民运也没有开放。直到现在，党部仍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因此，包而不办是普遍现象。于是，许多大城市民运反不如过去局部抗战时的活跃，前线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民众武装不能组织。这是给日本造顺民，给自己造反对者。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由于上述的严重现象，遂至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而发生了下列的危机：

甲、汉奸政权的活跃——华北自治政府，上海、华北维持会，内蒙独立^[2]，汉奸的活跃等等。

乙、投降主义的生长——亲日派的活跃，主张对日直接谈判；英美系的软弱，主张依靠英美谈判条件，没有自力更生的

信心；对苏联失望的人，主张结束战争。这一切都是投降主义的变相。汪^[3]说主和者是汉奸；蒋^[4]亦说抗战到底，目前讲妥协者是汉奸。政府给中国代表团的训令，亦说日军不从中国撤退，没有调解的余地。这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当头棒！

丙、特殊化^[5]思想的增长——冀察特殊化的影响，至今尚引诱着许多人企图在此特殊化之下苟安。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而且这是制造汉奸、颓丧民气、出卖正义的过渡政治机构。故对日绝交十分必要。战败不能使中国民族屈服，特殊化可使中国民族万劫不复！

丁、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认为军事失败，一切都无办法，不是一拼求幸，便是退求自保。拼而求幸，胜已不可能，便更倾向于退过黄河以自保。果真在华北已无战的可能吗？如无可能，退过黄河也不能自保。故无命令自由退过黄河的，是等于让日寇来便利统治华北。

我们要为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要如此，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得到国际友邦的赞助，才能拒绝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调停，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二 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

抗战危机发生了，日寇更集中全力来加深我们的危机。其中心的一环，仍在压迫我军迅速退过黄河，拿着华北，好做文章。上海原是其牵制方面，次作战线，谁知沪战中的损失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因而进迫苏州，现正向南京前进。但日寇的战略中心，第一步仍在取得华北。故华北的抗战如真告一段落，抗战的危机便严重到万分，而且日寇也可以喘一口气再干。

因此，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目前太原已失，华北抗战能继续吗？能持久吗？我们回答：绝对地能。

第一，假使中央能有得力的生力军开来，能实行各线配合的出击，能增加生力军到敌人后侧，改变过去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能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可转变目前的危机，进入胜利的反攻！

第二，如果上述这些条件一时做不到，甚至于敌人继续前进，占领了我们的渡河点——风陵渡，企图占领我们黄河要口，我们也还是有办法在华北在山西进行持久抗战。这持久战有下列各条件：

甲、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证以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恢复了十四个县城，烧毁了二十二架飞机，最近又夺回了南怀化，击败了敌人许多前进的部队，就可以相信。

乙、在地形上，持久战也是可能的。因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线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识中国内地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存在与扩大。

丙、在气候上，外国人总不能较中国人适应，尤其是冬春两季，更于日军不利。

丁、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日寇侵略中国，不论他怎样欺

骗利诱，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蹂躏的。故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敌人愈摧残，群众将愈觉醒起来，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奋斗。

戊、民众武装已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晋冀察边的广大发展，将是我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

己、政府领袖和军队的决心成为争取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条件。现在蒋、阎^[6]及不少军队，正在加强着这个战争。我们还望他们有进一步的全局的布置。

庚、最后，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也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是红军改编的，他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

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这虽然会有一个时候，但它决不同于六年来的东北四省。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三 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

怎样来坚持华北抗战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的问题，也就是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如何？最主要的，我提出四项问题：

第一，军队的改造。原有的正规军，虽越打越少，但打仗要用组织好了的军队来打，因此，改造旧军，成立新军，便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了。改造军队，目的不是在换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组织制度。在这里，今后在华北作战的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应采用“三三制”，而附有游击队及轻便后方辎重与多数的通讯资材的编制。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提倡自觉纪律，保障部队与人民的密切关系。其三，部队的的生活必须改善。政治生活要平等，连队经济要公开，士兵生活要提高，官兵要团结一致。其四，部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要使其能独立作战，分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其五，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这样的军队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指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开放政权。现在，全华北已不是中华民国的统一政权，而是日寇汉奸的政权。日寇的自治是伪自治，我们应该以真自治来发动民众，开放政权。因此，目前华北的政权，应该是国民政府一部分的地方政权。首先，它在制度上，应该是民主政治，应该团结全华北的抗日人民，不论何党何派何军，均应容纳他们的代表，来共同担当国事，主持救亡大计。其二，在组织上，应该从县区上施行地方自治自给，以坚持中华民国的正统，然后及于省区。其三，在政策上，应实行抗日的纲领。我们提议应该根据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来实施战区的救亡政策。

第三，开放民运。华北若再不开放民运，军队就无法补

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的屠杀，懦弱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无丝毫迟疑地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首先，应向民众作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其二，要组织广大的民众在工会、商会、农会和学生会之中，并吸引他们到政治团体中来。其三，要发动民众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并联系到民族利益上来。其四，要组织他们在武装训练之中，引导其参加人民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并吸引到部队中来。

第四，肃清汉奸。坚持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是争取持久战的先决条件。只有反对这些汉奸，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战争，而取得最后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据英国伦敦《标准晚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报道，日本政府当时曾向蒋介石提出了六项议和停战条件：一、中国承认内蒙为独立国；二、华北五省有决定自治之权；三、上海日军占领区域改为日本租界，并须取得通海道路；四、中国沿海自山海关起至越南界止所有各岛附近之捕渔权让给日本；五、中国退出国联；六、中国不得设立军用航空。

〔2〕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和操纵下，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集团把原“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称“蒙古自治”。

〔3〕指汪精卫。

〔4〕指蒋介石。

〔5〕特殊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策略步骤。一九三五年四月，日本

策划在中国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区域。同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十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6〕指阎锡山。

刘少奇、杨尚昆关于迅速 扩大红军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的 建议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毛、洛：

（一）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

（二）华北游击战是配合华中正规战，当然有胜利前途，但华中华南正规战如不继续坚持扩大，华北游击战争就要在比较困难条件下独立和日寇作战，但我们认为还有胜利前途，比满洲义勇军与苏区游击战的困难要少的多。

（三）目前我们要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驱逐日寇，这决定于红军若干的扩大、武装民众与争取改造友军的成功，如我们能在半年内，扩大红军游击队到二三十万人，坚持半个山西在我们手中，转变成正规战，这些任务是可能达到的。这将极大推动全国使妥协求和成为不可能，此时老蒋⁽¹⁾或再派兵到华北。

（四）目前我们预计，在红军转入华北作战或将来被逼退过黄河的情况下，还能在华北坚持游击是对的，但我们目前一切工作布置，应以争取华北游击战的胜利，红军不致被逼退过

黄河为出发点。目前即以红军退过黄河为布置工作的出发点，似不妥的，某些电报中似有此种精神。

（五）如果红军被逼退过黄河，将使我党与红军在各方面感受极大困难，影响华北人民对游击战争的信心。这是最坏的前途，我们要竭力避免。

（六）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似乎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再加以游击队的发展，友军的争取，才能争取游击战很快转变为正规战，否则红军就有逼退过黄河的危险。

（七）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答复我们，要有可能时，动员全党扩大红军，争取华北游击战的胜利，因为华北游击战是我们领导的，它的胜利是我党在全国极大的胜利。

胡服、尚昆

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 在山西坚决执行游击战争方针 给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胡服、尚昆：

(甲) 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

(乙) 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丙) 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全国。

(丁) 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勿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

(戊) 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后决定。

洛、毛

二十三日

并告朱、周、彭、任⁽¹⁾。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

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 几个先决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彭 德 怀

一 引 言

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三个月了。谁都应该认识，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伟大的事业。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固然不应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而致丧失自己胜利的信心；但亦不应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放松自己的动员与必需的准备。我们需要最高的抗战热情与胜利的信心，我们尤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讲求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不幸得很，直到今天，在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还没有举国一致的见解。

三个月的抗战过程，给了我们不少的痛苦的教训。前线暂时局部的失利，固然不足以判断整个抗战的胜败，但是，假如我们不以最高的警觉来找出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检讨出今后努力的方针，那也很易使抗战走入更困难的状态，使国人走到彷徨悲观、莫知所措的地步。找寻争取抗战胜利的方法，比任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五期。

什么时候都要更加迫切了。

前线的暂时局部的失利，不是由于最高统帅无决心，前线将士们不勇敢。事实上，最高统帅的决心，将士们的英勇斗争，已为世界人士所称道，即我们的敌人亦不能不表示惊讶。不少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作了壮烈的牺牲。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问题来作一番讨论，希望能够引起举国人士和军政当局的考虑。我坚信着，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

二 持久抗战的胜利

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以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

我们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并没有丝毫足以惊讶的地方。只有那些“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才会拿这种意料中的现象，去证实他们的卑污怯懦的理论；只有那些急性病者，才会在前线局部的挫折下，表现着颓丧的心理。一个具有冷静头脑的国人，一个老成谋国的当局者，是不会为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的。

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

历史上曾有不少弱国战胜强国的事实，而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弱国的力量远不及强国。但在战争的过程中，弱的国家不断地发挥与生长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在持久战下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持久抗战中，我们能够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高度地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向来被人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国内的磨擦亦必随之而减弱，全国人民将会各尽所能，坚决拥护领导抗战的政府，争取民族的解放。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反之，在日寇方面来说，就会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战争愈持久，消耗愈大，侵略者在战期中得不到被侵略领土的利益，而本国的工商业亦必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同时，由于中国持久的、顽强的抗战，敌军的大量的伤亡，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意志日趋疲困与消弱，人民反战情绪增高，广大劳动群众、士兵与中产阶层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反对军阀财阀们的统治。他们的斗争，将配合着中国的自卫斗争与其他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根本葬送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侵略者在持久战中，不但不能团结与生长自己的力量，而且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加深本国的

矛盾，这不啻是自己在哪里挖掘自己的坟墓。

在经济力量的对比上，同样可以看到持久战中的变动。不错，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战中遭遇不少的困难。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另一个发展的征象。由于战争的状态，海岸的被封锁，洋货人口的减少，也给了民族经济以相当发展的机会。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假如在抗战中，政府能够及时施行正确的战时经济政策，整理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及投机操纵，提倡国货，改良土产，使土产的小企业能在政府的帮助与奖励之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国家收入亦定能增加。倘能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作抗日经费为总则，确立国家的经济政策，那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问题，是可以得到顺利的解决的。反之，日寇则不然。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农产品不够自给，重工业亦不十分发达，加以战争的需要，集中一切企业，生产军需品与杀人利器，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必将愈益增多。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而我反能在持久战中，发展民族的经济，树立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

在军事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动。尽管我们今天的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但我们能从不断的教训中提高军队的质量，加强战术的素养。不管我们今天的武器如何的低劣于敌人，但我们能从改良军事企业上，以及取得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帮助上，改变武器的质量。甚至可以从战斗的胜利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不少的例子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力量

的不断增强，就是敌人力量的不断减弱。

在国际关系上，也不会例外。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假如日寇遇着中国的顽强抵抗，不能迅速吞并中国，而被迫进行着长期的战争，其国际地位之每况愈下，自是意料中事。反之，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让那些恐日病者、“弱国牺牲论”者去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空气吧！让那些急性病者去悲观失望吧！我们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是要坚决地从持久抗战中去取得胜利的。

三 战略与战术

（一）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

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卫而抗战，所以在战略上是防御的。

但战术上若采取专守防御，是决不能够解决战斗的。因为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必然招致失败的恶果，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应尽可能是进攻的，必须时亦应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

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空军、炮兵及其他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战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防

御也是为着节约兵力——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

在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条件下，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封锁敌人消息，使我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

有一位军事家说，中国只要同敌人拼消耗，我死十个，敌死一个，最后我们也可取得胜利。我很佩服他的坚决意志。但从战术的观点上说，我们却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主张。战术的要求是要以小的牺牲换得大的胜利，因此，我们才要讲求战术和指挥的艺术。我们决不是怕牺牲，而应随时准备牺牲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要自己消耗于敌人的面前，而应讲求怎样去消耗敌人。

（二）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

中国陆军在数量上比任何国家都要多，比日本更要多好几倍，但在质的方面却远不如人，特别在技术方面相差很远。所以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上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

怎样才能实现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人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之一百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

维持战术上的优势。

敌人的长处，主要是技术的优良，我亦避其长而攻其短，如深入到敌人后方或远后方，在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击，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

（三）持久的消耗战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来解决的。至于为什么要持久，因为只有持久才能生长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寇，已于前面谈了大概。现在要说的是持久消耗的问题。

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力量。此外，就是战役战术的灵活运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胜利的发展，来求得战役胜利的展开，决不是同敌人对拼消耗。

（四）争取主动

主动与被动的问題，战略家与战术家都懂得很清楚，但一到实际行动起来，往往一筹莫展。谁都知道，陷于被动，虽握优势之兵力，卒不能克劣势之敌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不胜枚举。

我们怎样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呢？前面已经说过，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目前指挥作战的方针，在使用兵力上，主力应用在主要战区与利于反攻的方面。在战役战术上，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

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但是不幸的很，在华北抗战已往的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今后应乘敌运动中，给以突然的袭击。总之，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

（五）节约防御的兵力

我国原无坚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于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配备机关枪与炮火，取分散隐蔽、火力集中为原则。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求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又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因我工事是圆周形，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

（六）统一指挥与机动

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统一指挥，并不应该限制兵团指挥员之机动。相反的，应该发挥兵团指挥员及各级指挥员之机动性。因为前线上的指挥员，常能看破敌人的弱点，了解有利的时机。如果束缚在请命、待命范围内，常易失掉最好的机会。一个兵团指挥员只知奉命守法，不图有功，只求无过，这不能说是好的指挥员。

好的指挥员要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常能使自己的战斗任务主动地完成。假如自己当面之敌已经解决，而友军方面正在吃紧，则应自动地向炮火、机关枪射击猛烈的方面增援。最好寻求在敌侧后方进行猛烈的突击，与友军协同解决敌人，以求得一个战斗或战役全部胜利。如果请命、待命，易失良机，甚至丧失应得的胜利。所以拘守待命、毫无机动的指挥员，不独不能打开战局，造成胜利的条件，他自己也时常陷于被动。譬如山地战，大家知道山地交通不便，联络困难，要求得绝对一致动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们常常看到高级指挥员的命令，说山地联络困难，务求协同动作。但怎样才能协同动作呢？有些指挥员把部队摆在进攻出发地，等待友军的联络，互相如此，一辈子也不会协同一致。要想求得协同，只有每个指挥员都本着自己的任务和预定计划，以最积极的行动，向着敌人猛烈进攻。大家都积极动作，在积极动作中，求得一致，求得统一。

四 游击战争

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

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

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至于如何打法，如何行动，那是游击战术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发展，会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危害，而对于我主力军的作战，则成为有力的助手。游击战争可以实现迷惑敌人，疲困敌人，阻击敌人，分散敌人的任务，以配合我主力军进行胜利的战斗。敌人深入一步，即被我群众武装重围一层。敌人集中，则以游击战争方式包围它，经常地袭击和扰乱它，断绝其交通运输，封锁其消息，肃清汉奸，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器材上受损失，消息不灵，接济困难，犹如聋子瞎子一般。这样使敌疲困起来，麻烦起来，造成我主力消灭敌人的条件和机会。

怎样才能发展游击战争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有群众，就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因为游击战争是群众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有人把组织游击战争看作一件神秘的事情，而认为自己没有本事去进行这一工作。这种观点，完全是由于他看不见群众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产生的。其实，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只要你认识到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只要你相信群众的力量，只要你相当的给以推动与帮助（如少数武器等），你便可以号召起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队，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

有人把游击队的活动，看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游击队只要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发展的。周恩来同志把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比如鱼和水的关系一样，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鱼在

水中必然活跃自如，鱼离开水自然只有死亡。游击队只要具备了群众的条件，再加上巧妙的游击动作，它是一定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其非常伟大的作用的。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那里去坚定群众抗日的意志，给他们以最后胜利的希望；在那里去破坏日寇和汉奸的欺骗与活动，组织同胞们的抗日斗争，创造许多抗日的小块根据地，支持与开展整个抗战的局面。那里是敌人非常薄弱的地方，敌人兵力很少，只顾前进，侧翼暴露，后方空虚，正给我游击队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那里，我们迫切地需要游击战争来配合主力作战；在那里，我们的游击队必然得到每一个迫近亡国奴命运的同胞的热烈拥护。

我们不仅要说明游击战争的重要与发展的条件，更重要的，还在说明它在今天，特别是在华北的抗战中，已成为迫切而实际的中心任务了。其次，关于游击战术的问题，已有专书论及，这里没有详说的可能。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是用得着的。

游击队作战的基本原则，最忌被动的应战，而须绝对的独立自主，操纵敌人。十六字的游击战术，便是完全以处处居于主动为原则的。游击队的指挥，要机断灵活，胆大心细，当打则打，不能打则跑，这完全要靠指挥者精细审慎，瞬息决断了。至于其他关于游击战术的细小动作，本无不变的成法，那更须要指挥者去灵活地运用与大胆地创造。

五 民众运动与全民抗战

(一) 痛苦的回忆与宝贵的教训

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的身上；一个战争的胜败，也系之于人民的向背。

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

三个月来的抗战中，证明了全国民众拥护政府、拥护前线将士的热烈。可惜在现行政策之下，民众依然没有取得参加抗战的各种机会，也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以致蕴藏在群众中的极丰富的战斗力量，依然没有大大地发挥出来，使今天的抗战，始终停止在单纯军事防御的阶段，而并未能掀起全面的与全民族的抗战。

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未能从华北抗战、上海抗战的痛苦经验中找出自己的教训，始终没有认识到单纯军队抗战可以招致重蹈阿比西尼亚的覆辙的危险。他们至今还不愿意开展民众运动，还不愿意在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民族解放的三民主义的国策之下，启发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动员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如何的坚决抗战，但在客观上他们还没有离开民族失败主义者营垒。

为什么前线的炮火打的这样的激烈，并且有了部分的挫折，而竟还有人不愿去推动发挥全民族的伟大的战斗力量呢？我想除了那些完全看不见群众力量的瞎子和素以摧残群众为荣耀的人们外，还有一些人存在着惧怕群众的心理。

民众的力量真是可怕的吗？民众是天生的造反者吗？这真

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不错，压迫者是要惧怕被压迫者的反抗的，被压迫者忍受不住压迫时也是要反抗的。可是今天的中国怎样呢？压迫者、侵略者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中华民族每一个黄帝子孙都是被压迫的，我们的政府也正在领导全国反抗我们的侵略者，除了汉奸以外，人人对抗日政府拥护之不暇，还有谁会反对抗日政府呢？不错，在抗日过程中，贫苦人民要求相当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使自己得有余力献给国家，这是合理的要求，这于抗日战争有利，并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即对于富有者，也不过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少得一点租息，却在整个民众抗战胜利之下，保持了自己的身家，而不致为日寇所侵占。试问改善人民生活，又会对于政府、对于富有者有什么害处呢？

真正害怕中国民众的力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富有者，阻碍与压迫民众参战的运动，只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使民族的生命遭受危害。动员与发挥民众参加抗战，只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增强抗日的力量，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批评这些严重的现象，其目的是希望这些现象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使痛苦的回忆变为宝贵的教训，今天的教训变成将来的胜利！

（二）持久抗战与全民动员

我们已经指明，只有坚持持久的抗战，才能最终地战胜敌人。要进行持久的抗战，就要在抗战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实现孙总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

福的三民主义。

长期的战争，无一不要民众的动员。前面已经从战略战术上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上，说明动员民众的重要。现更就人力物力的需要上，来补充这一问题。

有了民众的动员，前方的人力可以得到如意的补充。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所以由募兵制转为征兵制，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但是，要实行征兵制，必须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宽大的民主政治，可以提高国家的威信和人民爱国的观念；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使服兵役者无家庭的顾虑，能坚决地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强迫抽派或征调的军队，是无法支持最顽强的战斗的。反之，在民主与民生的纲领的实施中，人人将自动地踊跃地奔上前线，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将热烈地鼓动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这样的军队，质量要好得多，战斗力要坚强得多，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得多。

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的源源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如搬运粮食，救护伤兵，铲除汉奸，侦探敌情，帮助带路，封锁消息等等。

重复地说，给民众的自由和生活，是动员民众参战的前提。全民的动员，是持久抗战胜利的保障，即使在军事上遭到某些不利，最后我们仍然要依靠全国民众的力量，转不利为有利的。至若一切企图只用强迫命令的方式，不顾民众的生活与要求，不但不能收到好的效果，而且会使民族走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三）军民关系

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军民关系之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之有无严格的纪律，以及每个军人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假如一个军队能有严肃的纪律，每个官兵对于人民，能够做到买卖公平，态度和蔼，虽在极困难、极混乱的环境中，不乱拿民众一点东西，那这个军队必然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取得人民的帮助。反之，纪律坏的军队，虽然有时可以从民众身上去满足自己的欲求，使民众徒唤奈何，但是一遇困难，他便会得不到群众丝毫的帮助而无法解决。

这一时期，特别在战地中，某些军队的纪律之恶劣，对人民利益之极端的不加顾恤，我不愿加丝毫的批评。我只诚恳地热烈地希望这些部队的长官，加以严格的注意，勿因为军队缺乏纪律而致民众失望悲观，增加敌人欺骗的作用。某军队经过某村后：“日本人来不过这样吧?!”请听群众的怒声呵!

六 几句结语

我们提出了在持久抗战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动性，我们指明了抗战的胜利的前途。但这一切决不是命定的，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战争越打越紧急，华北战线的影晌，使整个抗战处于困难的地位。假如我们能够克服这一时期在战术和指挥上，特别是在民众动员上的弱点，我们是能够迅速克服这些困难，取得胜利的。

时机愈加紧迫了！我们已经暴露的弱点不能再存在了！建立正确的方针不能再迟缓了！今天放在全国同胞身上的责任，

是拥护、推动与帮助政府和领袖，从困难中去求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坚持执行 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

朱任邓并告雪枫尚昆⁽¹⁾：

(甲) 日寇正在进攻我红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

(乙) 对于假借名义及其他一切离开统一战线原则，应即具体取缔。

(一) 八路军应带符号，从新规定证章，凡无此据者应一律取缔，并将规定报阎及通报友军及地方行政机关出布告、发表谈话、登报。

(二) 扩大之地方部队，应与地方政府以合理负担解决给养，避免以八路军此面磨擦。

(三) 现在征集粮食资材，应秘密保存，不应现在送回陕北。

(四) 贺萧⁽²⁾在岢岚银行所拿之五万元应送还，并告以一时款项未到早时假用。

(五) 征钱粮布等应即停止，应向当地政府借拨准予筹还。

(丙) 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切实检查。

毛、周、彭^{〔3〕}

六日二十一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任弼时、邓小平，彭雪枫、杨尚昆。

〔2〕指贺龙、萧克。

〔3〕指周恩来、彭德怀。

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

项 英

开始的话

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作了最英勇的战斗，为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而奋斗。正因为我们在战略上违背了革命军队作战的基本原则，采取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虽然在五次战役中动员了全苏区的工农群众，集中一切财力人力为了战争，虽然英勇无比的红军作了最勇猛壮烈的牺牲，终于不能挽救战略的错误，最后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突破敌人的包围，不得被迫而离开了中央苏区，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而企图新的发展，于是中国红军创造了世界的空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事业，创造了西北新的苏区，取得了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前进的阵地，促进了全国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告成，开展了当前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当着红军主力组织野战军准备冲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进行

* 这是项英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报告共六个部分。这里收入第一、第三至第六部分，并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作了文字校勘。

远征时，为了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留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在中央苏区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反抗敌人进占我们的苏区，无论如何，应当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反攻，这是当时领受党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野战军正式向南开动，十月十二日，党中央与红军总司令部同我们在西江县之梅坑作最后之分手，二十日野战军将敌人在金鸡、新田、安息、固陂的封锁线突破向西前进，从此与党中央及主力红军分别，直到今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对日抗战发动，我们与国民党取得和平之后，我于十月二十三日在南京会见博古⁽¹⁾同志，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到达延安，才恢复党中央对于我们的指导关系，算起来分别的时间是整整三年了，在这整整三年中，开首还能靠无线电的通讯取得中央对于我们的指导，随后无线电的失掉，使我们脱离了党中央的领导，失掉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形成了各个区域的独立的各自为战，来坚持与敌人作最顽强的斗争。

我们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因为开始对于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使我们对于整个工作没有及时转变，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影响任务全部的完成。可是在继续长期的坚持的游击战争中，由于不断血的教训，使我们的斗争方式和游击战术不得不随斗争的环境与敌人进攻手段的转变而转变，所以在敌人长期的继续不断的残酷进攻中，终使敌人消灭各游击区和游击队的企图归于最后失败，使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向我们屈服，而我们终于最后战胜了我们的敌人。因此，这三年的坚持游击战争，无论在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无论在游击战术和群众工

作，无论在党的领导和党内斗争，都有很多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这种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后斗争，特别对于当前的持久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有极大的帮助。目前，全党应当研究这些经验和教训，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和斗争中去，是非常必要而且必需的。

这三年，南方各地区的游击战争，虽在极端困难和困苦中，能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地坚持斗争到底，虽然中央及其周围的苏区被失掉，武装力量有了大的削弱，但终能最后战胜了敌人，保持我们经过十年血战在南方的许多战略支点，保持了经过最艰苦所锻炼出来的各地游击队。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年的坚持游击战争，在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说的各地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正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

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是最残酷而最尖锐的斗争。这种残酷性和尖锐性，不单反映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反映于党内斗争，充分表现是我们十年血斗中的最尖锐的阶段，因为依靠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终于打败敌人，获得最后的胜利，终于使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党的利益的家伙，以及只知为个人前途计算而不肯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人，在每一次斗争达到最紧张关头，就不断的陆续的先后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一部分变成工农阶级的敌人，一部分为了他的狗命而逃生。可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的英勇战士们终于获得胜利，高唱最后的凯旋。

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却获得最多宝贵的实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把它所有的材料收拾起来，加以整理，成为全党的财产，成为今后斗争的一种新式武器，这是迫切而必要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各个区域在过去互相不能联络的各自为

战的特殊情况下，目前不能把所有区域的斗争经验汇集起来，作成一个总的结论，仅仅是将我们在赣粤边一个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写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等候我们将各地经验总结以后，再写一个东西以供全党的参考和研究。

游击队与游击战术

这三年我们是处在游击战争的时代，可是因为在第一阶段中，对于斗争形势估计的不正确，对于斗争内容和实质没有明确的了解，因此由大规模的正规战转为游击战的过程中，不能彻底的转变，使我们的部队受到大的损失，但因对主客观条件认识不够，不能使我们很适时地灵活地转变我们的战术，正式运用起来，直到继续受打击，游击战争更趋于群众性，使我们适合于这个斗争环境的战术发展起来，形成起来。

游击战争是农民性的战争，是革命战争中一种初期发展形势和正规战的一种辅助方式，但这种战争的实际性质，因当时主观条件的不同而形成各种的性质和不同的特点。我们大概把它分为三种：

第一，井冈山时代的游击战争，这是农民战争初期发展走向大规模国内战争的游击战。一方面有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另一方面有广大的幅员进退自如，便于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固然我们是在创造时代，可是敌人更加幼稚无经验，加之阶段斗争的尖锐程度不深，还没有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使我们能依靠根据地向四周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即或被迫离开根据地也可以在广大幅员内打圈子或进行游动的活动，在部队行动上可以采用大兵团的行动，在战术上说是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带正规性的运动战山地战。

第二，在江西苏区进行大规模革命战争中周围的游击战争，这时的游击战是配合主力军队战争，争取整个战争的胜利，他是革命战争的辅助力量。因此，他不与敌人决胜负，而在给敌人的打击，破坏敌人的后方，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以削弱敌人后方侧翼以及交通线。进行挺进的游击动作，便利时随便活动，不利时转回苏区休息和补充，在战术多采用突然的袭击和伏击，多是进攻，而敌人完全处于防御地位。

第三，是我们在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这时主客观条件完全同上两种的游击战争完全不同，这时阶级斗争已进行到最尖锐的阶段，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又加以在长期国内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和苏维埃运动的根据地，虽然主力红军出动离开江西苏区而转入到西北，但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并未消除。正因敌人取得了优势，企图铲草除根，以最大的决心来将我们的力量彻底消灭，因此形成长期的进攻和包围，加以敌人利用堡垒封锁的特点，更使我们活动受到最大的限制。因为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结果，使汽车公路普遍建筑起来，敌人的追击和增援很迅速的便利的适应进攻的要求，到处组织民团，增加他们进攻的力量和耳目作用，这样使我们不能有巩固的根据地，同时也不能作大部队的游击战，否则只有被消灭和不断的打击，这样的游击战争，只有更带群众性的游击战，是游击队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共同斗争方式，才能长期的抵抗和对抗敌人不断的进攻。

我们开始没有这样的了解，也不能根据这些特点来确定我们的方针和战术，反而以井冈山和有苏区的游击战看待，由于这一错误而受大的损失，直到后来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渐了解了，而实行整个的转变，才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

现在我们总结一切经验与教训来说明我们的战术：

(一) 我们根据斗争的性质与任务，是要与敌人进行坚持的斗争，因此我们的抗战方针（也可说是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群众保持有生力量并与敌人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因为对付敌人长期包围和残酷进攻，没有群众力量是不能对抗敌人，如若不好好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拼一拼就说不打败仗，总说是打胜仗，但每次作战不可免有损伤，在长期战斗中的不断损伤，不要打败仗就要把自己力量耗费殆尽。因为在这一斗争环境扩大游击队较困难，如若将武装力量消失，就谈不上坚持斗争了。游区失了武装力量，就要迅速被消灭，即或有一个小的武装力量能团结群众，就能作长期的坚持斗争。这一方针的确很重要的，而且在这一方针下才能确定我们正确的战术。

(二) 我们的战术是根据上面的总方针来确定的，同时加以各个时期的形势和进攻敌人的特点来决定我们对于战术的运用。战术的基本原则是：

1. 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
2. 不打硬仗，不攻坚；
3. 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拼（即躲）；
4. 反对只吓敌人，要歼灭敌人；
5. 有利时集中消灭敌人，不利时就分散。

我们曾写一个战术的歌诀，便于一般不识字首长记忆，不过还未包括整个原则在内。

附录游击战术的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硬打强攻，战术不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线，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

不动，挨打最痛，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另外，还有关于行军、宿营、侦察、警戒、袭击、伏击动作的歌诀，不能有秩序的记清把他写出来，只能大意的讲一讲。

对于行军，主要是利用夜间和敌人不常出的时间，大路不走，专走小路，以及严重时找无路的山爬。行军前先问群众，将敌人弄清再出发，行军中要安静，好静听路上的动静，如有敌情，也不致被发觉而好转移或后退却他路。

对于宿营，完全不住房子，如部队到垠无山时才住屋子，主要是绝对秘密，不许外人知道，仅仅是有关系而必须要他报告消息的人知道，住山要选择有树的山，还要退路好而便于侦察。宿营时要寂静无声，经常以战备姿势，注意出进目标，经常转变，一遇有征兆就要立即移走，转移要消灭宿营地一切目标，不致使敌人发觉，如无山窝，也可在光山的小树宿住，因为敌人不注意这种山，但要保证秘密。在平原里宿营，一定要依靠有后山的地方，主要封锁消息，而且要转远的地区转移。

侦察完全依靠群众，教育群众侦察方法以及侦察什么。部队及机会本身主要靠自己的观察哨。

警戒是建立在群众的保证基础上，只警戒自己的宿营地。如有远处敌情或敌人侦察，依靠群众掩护和报告，因此，就很少使敌人突然进迫宿营地，只有叛徒带路那是例外。在紧张情况下，日夜有哨兵警戒，夜间是靠听动静，白日靠观察，所有步哨多是隐蔽哨，如若敌人不向自己四方而来就不动，只报告首长发生的情况，如果向自己面前则鸣枪报警，哨兵以复哨最好。

袭击分伪装袭击和突然的战斗袭击。袭击时不行火战，突

然实行白刃战，袭击不成迅速退走，埋伏侦察依靠工作，确切判断、选择敌人不好走的地势，是消灭敌人的必要条件，应从侧翼出击，适当时先将部队展开，对于相等之敌侧击后卫，弱小敌人取歼灭包围。

在执行战术原则中，依照敌人的特性来灵活的应用，是非常的重要而保证胜利的条件。我们对于任何敌人，首先就要了解他的特性，部队性格、战斗力和作风和部队团结，特别是他在作战中善于和惯于使用哪些手段，然后才能针对敌人的长处和弱点来决定我们的战术和行动。

如广东军队的特点，是顽强而有战斗力，动作快，武装好，在袭击和追击时的动作迅速，好用埋伏。因为我们要避免与他决战，只有被迫而掩护退却时才进行战斗，主要是迅速脱离他，如遇粤敌的行踪，立即转移他去，注意他的埋伏，即走新路。如蒋军四十六师虽是正规军，他战斗力不强，武装不好，动作慢，尤其无“抄剿”的经验，我们对他仍然是避免决战，因为战斗损失对于我们是不利的，但对于他的进剿又要掩蔽好，不动不露目标可不必转移，只有在包围内才迅速脱离。保安队的战斗力更弱，不堪一击，但多以集团行动，善于抄山，而且抄得最严，因此，我们对于保安队在一中队（即一连）可以打他一下，使他不敢分散，如遇集团行动则避免作战，以免包围和损失。但遇保安队在搜山时，就要迅速脱离被损的地区。民团最弱，要打击，但他地形熟，常是配合白军部队行动，在这一情形就不宜打，同时注意在民团行动时虽无军队配合，但军队很近，很快发现目标，使敌军集团包围，特别在打击敌人，要注意群众的利害关系，常常在群众地方打击后，使大批敌人到该地来摧残群众蒙受大的损失，则我们就不应该在该地打。任何情况战斗和暴露目标后，立即转移地区以

免包围，这是非常重要的。各地敌人相距很近，一得消息即四面包围抄剿。但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埋伏，无论敌我很难获得效果，因为山路多，双方都是突然行动，与群众相邻易于发现目标。同样我们只有一次，在北山先埋伏好，然后以少数部队诱敌出外而遇埋伏，同时敌人的埋伏我们很少中伏，多以突然的袭击生效。在信南游击即有侦察班事先伪装袭击，夺取堡垒，在松山因无短枪多以强袭收效。

这一区域的游击队以河东过来为主体，本地成分占少数，经过两三年来河东人仍占主要成分，一方面表现土地革命出来的战士忠实勇敢，只有极少数叛变，多是英勇牺牲，更无三人以上叛变的事。另一方面，因与当地群众的联系上，外地人不如本地密切，特别对于地势道路的熟悉更觉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游击队到一地应吸收当地人愈多愈好，才能增加部队的耳目，才能迅速取得与群众联系。

游击队因为经常分散的结果，使部队涣散，如若政治领导弱，各种严重现象就易于发生（如破坏纪律、腐化等等事情都发生了）。在这样的游击条件下，游击队主要是靠最坚强的政治领导和以身作则为重要，军事首长差一点还不要紧，士兵很好，一切观念都由于官长发生而影响全体士兵，这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游击队主要的是依靠经常的政治工作，但这种政治工作是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不能采取一种公式，为了保守秘密进行分组的教育和上课，利用本身一切发生事件作材料是最有效的。

经过长期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游击主义的习气是很重的。一方面由于客观斗争的条件（如不规则的生活和行动，经常的政治工作不能建立，以及农民成分为主体），另一方面，因为

分散的独立行动，经常与上级关系不密切，加以领导干部的弱，使游击主义的习气日益发展和增长。这样发展的结果，使土匪主义的倾向易于发生，游击主义的发展根本的例子是涣散，纪律松懈，首长执行纪律马马虎虎，群众执行纪律也就马马虎虎，小团体观念重，执行任务的坚持性差，随意损坏武器和服装，自由行动不听指挥，不愿学习（无论政治军事），土匪倾向最主要的是脱离群众，讲嫖，讲赌，讲吃，讲喝，只打土豪筹款就行动，不做群众工作，也不愿发动群众，乱杀群众等等。我们在两年中间同这倾向做了不断的坚持斗争，大体上才把他打击下去。但是在较远处的部队，或多或少还存在，因为斗争的客观条件使我们不能将部队集中行动，也不能经常去指导。在游击战争中，对于游击主义的克服，防止土匪倾向是保证游击队执行任务的重要前提，这就依靠有坚强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才能保证这种现象不发展起来。

在游击队中易于发生两种现象，一是领导干部能力较弱，使部队中极端民主的现象严重。相反的，领导干部强而政治又较差，则军阀习气、军阀主义就生长，这两种现象对于游击队的团结和执行任务有极大妨碍。

我们的游击队因分散地区与环境不同，养成两个不同的特长，一是信南地区游击队会打仗，信丰及南山善于拼而不善于打，但能在远地方打土豪。

对于游击队的扩大，据我们的经验，在长期的游击区域中较困难。因为敌人对于群众的监视过严，对于红军家属压迫最凶残，将老婆强卖掉，一发现某某人有当游击队员，立即将全家或父母拉出去拷打，追问罚款。但新区域较容易，因为斗争没有这样尖锐，不过无论白区游击区，如若我们能把群众本身斗争发动起来，以后极多群众一经听鼓动时就易于扩大部队。

我们对于部队的教育，开始缺乏具体办法，故无多大的成效。以后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如规定任务纪律等等，使每个部队都了解遵守，建立士兵委员会，辅助首长维持纪律，帮助学习，管伙食，反对贪污。部队休息时，委派负责人到部队去指示和帮助他们的党与政治工作，在军事上以老战士传新战士，注意射击和刺杀动作，养成紧张的战斗习惯和敏捷动作，制定各种军事政治教材给他们，这样在信丰和南雄方面收有成效，信南较差些。

我们对于游击队的任务和纪律规定如下：

（一）游击五大任务：

（1）做群众工作；（2）打土豪分田地；（3）消灭反动武装；（4）建立苏维埃；（5）创造新红军。

（二）游击队五大纪律：

（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3）打土豪执行阶级路线；（4）爱惜武装同自己的生命一样；（5）不准打人骂人。

（三）十项注意：

（1）武器不能离身；（2）说话要小心；（3）行军不能掉队；（4）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5）打土豪要归公；（6）说话要和气；（7）买卖要公平；（8）借东西要还，损坏的要赔；（9）不搜俘虏的腰包；（10）对同志要友爱。

另外编了红色指挥员必读与红色战士必读。

指挥员必读的内容：（1）指挥员的职责；（2）战术要诀；（3）游击队的政治工作；（4）行军宿营要诀；（5）侦察警戒要诀；（6）袭击要诀；（7）埋伏要诀。

红军战士必读的内容：（1）歌（红军歌，杀敌歌，游击队歌）；（2）共产党十大政纲；（3）红色战士的职责；（4）五大

任务；（5）五大纪律；（6）十项注意；（7）射击要领；（8）刺杀要领；（9）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群众工作的经验

我们这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是一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主要的基础是依靠在群众力量上。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不断的“进剿”，不能对付敌人大规模的抄搜，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线，保证长期的给养的供给，使我们清楚了解敌人的情形而敌人不知我们的实际行踪，也不能在敌人集中和交通便利的狭小山地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以至最后战胜敌人。这一切我们都能得到，毫无疑问的主要是依靠群众的力量，不仅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拥护，而且我们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共同斗争，使我们与群众的利害关系联成一气。游击队打了胜仗，群众等于自己的遇着喜事；游击队受了打击，群众感受非常的悲愤，一听见对于我们不利的消息，非常担心探问；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等于向他们的进攻，不仅十分关切，而且用一切力量去保障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注意侦察敌人的行动，探听消息，迅速告诉我们。在敌人的进攻中，特别关心我们的行动是否妥当，要早警惕我们应注意的地方，用尽一切方法在敌人进攻中替我们购买粮食和一切东西设法送给我们，替我们工作和部队放哨、送饭，反复侦察敌人的侦探，一有生人发觉，立即告诉我们注意，自动把侦探和反动分子捉起，只要得着我们的批准，他们就动手干，甚至在路上发现胶皮鞋的脚印（群众穿草鞋及布鞋，我们及白军穿胶皮鞋）即警觉起来。有敌人夜间进攻，打埋伏，要我们不要走这些地方或叫我们行路注意。因此，敌人长期的不断的埋伏，没有收到什么成功，正是

这一原因。敌人将他们捉着，用毒刑拷打以至枪杀来追问我们的行踪，他们宁可自己身体打伤、坐牢以至牺牲性命，绝不说出我们一个字来。这样为保护我们而牺牲的，在最基本地区的群众是很多的，替我们搭棚、拆棚特别是在敌人进攻，冒险替我们拆棚消灭目标。至于打土豪、筹款、消灭敌人武装，完全是群众替我们调查，侦察情况、带路（队）。敌人进攻时，要他们带路，总是向没有我们的地方去抄山；要他们抄山时，故意怠工和乱吼，使我们知道好走；敌人放火烧山，他们有机会将火扑灭；遇见我们时，告诉我们怎样去躲；敌人强迫砍山，不是表现不去，去了就怠工，配合游击队们来扰乱敌人对于内山的“搜剿”。我们最困难无钱时，基本地区的群众赊米、赊菜、借钱给我们，以渡过困难。群众对于我们的爱护真是无所不至，所以敌人很清楚这一点，用一切方法使我们失掉群众的拥护，才好便利消灭我们。封坑就是为了使群众与我们脱离，可是群众留粮食、设法通消息。敌人围房子，使我们不敢与群众发生关系。建立民团、堡垒，是以土豪反动分子充当队长。为了监视和阻止群众与我们发生关系，在南康赣县将一切壮丁每夜集中在哨位放哨，一方面放哨，一方面使群众不能与我们工作人员接头报告消息。但是群众告诉我们的记号未通过他们的哨位，使敌人还不知。敌人用残酷的压迫手段使群众害怕不敢接近我们，可是敌人的一切都归于失败。所以我们能在敌人附近驻，能在道路旁驻，看见敌人通过，能在对面山看见敌人抄山，敌人完全是瞎子、是聋子，我们有千里眼，有顺风耳。正是我们有了群众的拥护与参加，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基本力量，使我们的敌人不得不最后向我们屈服。

群众对于我们这样的爱护，好像爱护他们自己一样，绝不是偶然的。正因为这些基本地区的群众，他们在一九三〇年暴

动后，得到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后来虽遭了失败，土地被地主夺回去了，但因我们继续在该地领导游击战争，与敌人坚持斗争，事实上就使地主收回的土地，不敢直接收回去的仍保持在农民手里，地主只有依靠反动武装的保护才能进坑收租。除此以外，只能当农民出到外面场上阻拦□追索，农民一进坑就不敢来了。有少数狡猾而聪明的地主，常常用可怜的请求的方式，请求农民多少给点谷他们充饥，这样在农民的怜悯心下给点租他们。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们党和游击队坚持的，在这些基本地区来反抗反动派，来反对地主收租收债，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我们最基本地区的地区，实质上是不还租的，只有在武装的压迫下才被迫而还租。土地的所有权在外表上是归地主所有，实际很多是照以前暴动时的分配而未变更。至于耕种权的变更，完全经过我们党的批准。常常因人口变动或是外面要进坑做田，一定请求我们的党来分配或允许。至于地主的山林竹木，成为农民公共的享受。正因为这样，使这些基本地区的农民，深刻了解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知道我们的胜利与失败，就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持和失掉，明白我们能够坚持在这些地区继续斗争，就是对于他们利益有力的保证。所以他们爱护我们与他们自己一样，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财产，绝不愿使我们遭敌人消灭和打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虽然有一时期发生肃反的错误，农民对于这种行动不满意以至害怕我们某些人，但绝不投向敌人而反对我们，也正是这一基本原因。同时，我们在这一基础上与农民连成一体，依靠他们的拥护和爱戴而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以至战胜敌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不仅基本地区如此，而且直接影响周围的工农群众的兴奋，增加对于我们的同情，特别威胁了周围的地主，使他们在剥削农民时发生惧怯。农民常常依靠我们来威胁地主，使他不

敢残酷的剥削。有时，在秋收时有些要求我们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到他们那里，使地主不敢进来收租，即或收租时也不敢凶狠恶逼，这是造成我们争取基本地区周围群众的有利条件。

当然，非基本地区的群众，对于斗争的经验当然差些，斗争的顽强性也较弱，一经摧残，害怕起来，不敢积极动作。基本地区的群众就好得多，乃因一方面是斗争的经验有高低，一方面主要的还是直接享受土地利益与否，而影响他们斗争的程度。

我们深知道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游击战争的基础，只有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础，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能与敌人继续斗争。因此我们把群众工作看成为我们最主要工作之一，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一工作。有些同志不认识这一点，常常企图削弱地方工作力量去加强游击队。当然加强游击队是很重要，可是在我们人力不够分配时，放弃地方工作去加强游击队是极不对的。因为在这种游击战争中，不能有大部队的经常活动，不得不分开活动，也不能如井冈山时代游击部队到某一地，可以住一些时便利进行群众工作。我们这时候就不同了，一方面部队小，不便长期的直接做群众工作，同时，敌人的进攻使我们游击队不可能停留一地或久住一地，只能在行动中来传播我们的影响和主张，打土豪消灭反动派时来发动群众斗争，争取群众对于我们的同情，便利于我们去进行地方工作。因此，进行群众工作主要的是依靠地方工作，在这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与敌人作长期的坚持斗争，放弃群众工作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那时，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反对这种倾向，完全是必要的。事实上的表现，群众工作的好坏，成为我们发展的测量尺。

我们的群众工作主要方针，是建立在为争取和拥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当我们自己的利益

一样，一方面坚决反对离开群众切身利益的单纯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妨碍群众利益以及不顾及群众利害的行动。

我们初到时期，我们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主要限于打土豪筹款，对于群众利益争取的不大注意。曾做了无情斗争，把这种现象打下去，渐渐注意群众切身利益的拥护。可是因为群众工作没有很好的转变，还不能取得大的成绩。过去工作人员及游击队不顾群众的利害和打击敌暴露目标，引起敌人摧残群众。只要自己本身不受打击，群众的被摧残和损失好像与他无关。我们曾不断的斗争，消灭这一现象，处处以群众利益为主，以群众利害关系决定我们的行动，总是使群众不受大的打击和消灭、摧残。对于群众被捉被打，我们用一切方法援救，发动群众实行互济，这样使群众认识我们处处关切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对于一切脱离群众的行动严厉打击，特别对于肃反错误的纠正，使群众大大兴奋，更亲密的密切与我们联系起来，这对于周围的群众争取更大的影响。对于打土豪，绝对执行阶级路线，在长期的游区周围，很多真正土豪，不是□了就是逃到城里住，这样打土豪筹款不得不打，打富农以至打到中农、商人身上，如继续下去是非常危险。我们首先反对这样打土豪，宁可自己受困难，另由其他方面去打土豪，严厉禁止这样破坏我们的现象。对于富农捐款也禁止。在我们游区，得到富农的中立，对于我们反对敌人的“进剿”是有帮助的，不致使富农坚决反动，帮助敌人来进攻我们。同时我们对于富农应有戒心，信南很多同志曾忽视这一点而受到不应有的牺牲（如李乐天牺牲等等）。

群众斗争中对于落后分子的争取，是巩固团结，对抗敌人各种进攻的最主要工作。这些落后分子，只有我们努力争取，是很可能站在我们这边反对敌人，而只有把这些落后分子争取

过来，才能巩固自己，使敌人失掉了耳目，失掉了领导而变成软弱无力的进攻。许多人把落后分子当成反动分子一样看待，必然遭受打击和失败，敌人正希望我们这样做，他才可以增加进攻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在敌人进攻特别注意争取落后分子，用一切方法向他解释，即或他偶然透露了消息，我们不应把他当反动分子看待，而用阶级教育去说服，使他感动，站在我们方面。有些对于我们工作人的不满意，我们应该实行自我批评或向他解释误会。常常在敌人进攻中，发现我们过去工作中对于落后分子的不好的处置而受敌人引诱来进攻我们。受到一些打击，使我们在血的教训中注意了这一工作，而且收到了大的成效。

为了分散敌人的力量，特别打破敌人的企图，以自新分子做死走狗进攻我们，因此我们对于仅仅自新而未做任何反动事情的分子，使他消极中立，对于叛徒和反动的分子采用坚决的反对态度和必要的办法。群众对于自新和叛变是最痛恨的，对于许多光荣牺牲和被捉的坚决分子十分爱敬，并用各种方法去帮助他们，群众常常对于工作人说，你们不要做“反水鬼”，反水要不得。

对于农民群众的组织是感觉很大困难。一方面由于农民的散漫性，同时加以在残酷的斗争中，敌人对于加入组织的采用屠杀，使我们对群众组织不易建立。过去工作中又把群众组织变成第二党的形式，后来我们采用工农同盟的组织，把基本地区的群众组织起来。可是为了使他们加入组织时，一定使他们明白组织的意义，主要的还是与他们的利害关系。开始，我们以反对敌人进攻，实行互助为动员他们加入工农同盟，有些地方不正式提出组织的名称，只说我们联合一致反对敌人，以后再使他们了解我们，更用群众中日常问题以及群众互相的问

题，都在这一组织中来讨论来解决，使他们直接感觉这种组织对于他们的利益，保持组织的作用。有很多地方不注意这一方面，来运用组织实际教育群众，使成立的组织无形坍台下去。总之，在农民中，特别在斗争严重环境中，组织工作较困难进行，处处要以各种方法和耐心的进行，才能使群众组织发展起来，巩固起来，这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干部多是农民成分，更缺组织能力，不注意组织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很多同情和拥护我们的群众，但没有把他们很好的组织起来。

对于群众斗争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新的区域群众，他们有很高的热情，而无斗争的经验，常受敌人的欺骗（如冒充游击队工作人员用各种欺诈方法等等），遭受打击，影响他们继续斗争的热情。因此我们把敌人一切手段和其他直接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们，而且不断的教育，受打击后还要教育，使他了解而接受，因为农民无经验的事是不相信。我们在敌人新的进攻和对其他区域所用的手段，常常告诉和教育全区的群众，经过几次事实后，农民才相信我们的一切话，如告诉群众如何侦察敌情，如何做标记表示有无敌人，如何传达消息等等，都是要进行教育，才能在实际中获得更多的对于我们的帮助。

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干部能力太弱，旧的方式不易转变，我们若用大的力量去进行教育，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绩，仅仅是将他们从前只争群众同情，而不注意群众切身利益的争取，以及组织工作的认识转变了，可是许多群众工作的方法没有多的改变，也是群众工作不能做得更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领导作用

一切斗争的胜利和失败，对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是有密切

关系，也可说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

我们转到信康赣雄游区，能够坚持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斗争，正是因为首先建立党的正确领导。如若继续过去错误的领导，这个游区在敌人残酷的长期进攻中有消灭的可能，即或没有全部消灭，也不能保持原状，更谈不上发展游击区和土匪主义的继续发展，有可能走脱离党而为土匪的危险（当然名义还是游击队，但实际变成土匪）。特别在长期的坚持斗争，每一斗争的紧张中，发生不断的叛变和逃跑，没有党的正确的领导，也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与敌坚持斗争到底。至于在对付敌人进攻和转变我们一切斗争方式以及战术运用，克服许多的不正确倾向，更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来解决。

在失掉中央的领导、陷于孤立斗争的环境，保障党的领导正确，以我们的经验，必须依靠以下几个条件：

（一）要时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加强对于整个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的正确性，来保证党的方针正确。这一方面我们曾进行过学习理论的运动（我们曾带有少数的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国际纲领》、《“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政治常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等等）。

（二）要用尽一切方法取得报纸看，能够了解全国形势，不致弄成狭隘的局部的观念，并在干部中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这方面对于县一级的干部政治水平有相当提高，但对于区一级干部成绩少，由于文化程度低、不识字，加以环境不允许经常集会和谈话。在估计政治形势和确定自己的方针时，应该依据全国形势，确定我们的总方针。随时依照自己当地的斗争形势来决定一切执行方针和反对敌人进攻的方法和策略，这样才不致使我们与全国斗争脱离，同时可以力求我们的斗争与全国斗争的联系。

(三) 要在斗争中时时检查自己的方针和策略是否有错误，在斗争中学习一切经验与教训来帮助对于以后斗争的领导。

(四) 以最高警觉性注意时事和敌人一切动态，以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以判断事先布置我们的工作以迎接敌人每一次的进攻。

(五) 以最坚忍不挠的意志来坚持党的正确方针，任何困难情形绝不动摇而改变自己的方针。

(六) 领导者自己的模范作用。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不怕任何苦，如二年多不住房子，吃冷饭饮冷水。任何危险和困难，坚持不动，才不致受埋伏包围而影响全党，特别是最有力的。这种模范可以帮助克服□□现象，巩固自己的阵线。这在环境的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

(七) 领导者要常在斗争前线的地区观察一切征兆，才能事先指出全党的工作。

在党的领导方式上，开始，我们曾极力集体领导和会议生活，不久因环境日益吃紧，使会议困难，各处干部不断的牺牲，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常常一个区只有党团工作人一个。为了加强各地的党直接领导力量，把许多干部分派各地作经常的指导工作，形成个人负责制，同时成为绝对集中制，这是为了保证在最紧张的斗争环境中党的正确领导实现，直到和平以后才恢复集体领导，实现民主生活。

我们对于每次敌人进攻，事前已知道，迅速判断，各地的负责人如找来谈话时，用直接谈话的方式指示对抗敌人一切工作，否则用信指示。遇有任何问题都给予具体指示和回答，并将某地方发生的问题和指示转抄其他地方以供他们的参考。这样具体的指示方法，对于工作和干部是有大的帮助的。

区委的组织极不健全，只有几个中心区域较强，斗争的过程中，事实上县委的同志成为区委书记，真正起区委的作用仅是中心区委。

支部工作一般说来没有很好的建立，形成区委同志代替支部的许多工作，这样使支部离开区委就不能独立工作，但在斗争的要求，是要支部有独立工作能力，只在基本地区的几个支部达到相当的程度，其他成绩较少。

党内教育和斗争

在这样残酷的长期斗争中，以及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敌人不断的进攻，各种困难与困苦，特别是与各方失掉关系的孤立战斗的状况下，加以干部成分几乎全属农民，很易于发生各种各色的倾向和现象。最严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叛变、逃跑。几乎在每一斗争达到紧张关头，或是全国某一事变结束，都要或多或少的发生叛变、逃跑事件。这一现象，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当时的斗争（如叛变后即带敌人进攻）；另一方面间接影响我们内部的巩固，所以反叛变和逃跑的斗争可成为整个斗争中的一个主要斗争。这种叛变（以当地人居多）逃跑的（以河东苏区的人多）发生是有两个来源的。

1. 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动摇。只见眼前的严重现象，没看见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在敌人严厉进攻中以及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的解决，认为革命无希望，于是叛变逃跑。

2. 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不能牺牲自己来为革命，如是就不能吃苦耐劳，尤其是许多干部当着未被敌人捉着时表现很坚决斗争，到被捉后就实行叛变。还有一种尤其生活腐化，把革

命意志消磨和丧失，而在斗争紧张环境到来就实行叛变逃跑，以图个人出路。

这两种是互相关连而不易分清，同时客观上由于长期艰苦的环境，干部以农民成分为主，再加以党的政治教育差，于是促进这一现象的发展。

我们研究很多叛变逃跑的分子，绝不是一时的动摇，而是有他的长久根源。如在政治上由某种倾向到动摇以至叛变逃跑，如开始很纯洁，由于到独立工作时即无经常的监督和教育的教育，在某种环境下由贪污腐化发展到脱离群众、镇压群众，最后叛变革命。因此，我认为要消灭这一现象，就不仅从消极方面开展反叛徒逃跑的斗争，还应从积极方面加强党的政治教育，从政治上来坚定动摇分子。同时，注意每个人的开始的各种倾向与不好意志和行动，用教育方式进行斗争，使他不致发展起来。这种积极方面的工作和斗争是能争取许多动摇分子能坚定起来坚持斗争，可能的克服这一严重现象的发展和增长。事实上我们在信丰已获得大的成绩，叛变逃跑现象大大减少，县委机关内从未发生过这一现象。谁不了解这一点而不努力于这一工作，也就使叛变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起来。南雄和信南因为不注意积极做这方面工作，造成在最后时期的严重现象，而影响整个工作的发展。

当着我们由河东转移到游区时，主要的是反对失败情绪和企图脱离当时的艰苦斗争，以及反对在长期斗争中不耐心的忍耐的进行艰苦斗争是很重要的，才能把内部巩固起来，保证坚持斗争到底。

在政治上易于发生几种倾向：只看见全国形势发展而忽视当前自己的斗争的形势而发生空洞乐观，结果放弃自己的斗争准备和布置，易于受到敌人的打击。另一种是右倾，只看自己

当前的严重形势，而看不见全国形势和革命实际的发展，就要发生悲观失望，大家依靠天吃饭的倾向，只希望全国的形势来改转自己的斗争现况，不了解要用主观的斗争来争取形势改变，一遇全国某些事变的结束，就要悲观失望，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是最危险的。

在游击战争中不相信群众，只希望单靠军事力量来战胜敌人，以及在资产阶级在敌人长期进攻中不能忍耐，企图将部队集中去同敌人拼一拼的冒险主义也有发生。至于游击主义和土匪倾向更成为主要的现象和斗争，在群众工作中的雇佣观念，脱离群众，欺压群众（如好多的干部开始做工作也就像自己当了官一样，公开向群众宣布这条坑为我管，一切事都归我说话）以及假公报私仇，乱罚款子等等。

在生活中贪污腐化现象特别创造许多腐化的理论（如游区应当吃好些，不吃不喝就要准备逃，不吃不喝不穿死了也不值得，找伙计婆更普遍），至于怕困难、消极怠工更属普遍。

因此，我们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和现象，作了坚持的无情斗争，同时采用了各种教育办法，如将种种现象写成教材或在全党游击队中进行教育，如遇有新的现象，毫不放弃把他轻轻放过，但这斗争主要是教育的性质。

因为在我们这样环境和条件，使我们一方面同各种现象作斗争，同时不得不采取群众的教育的方式，一切简单的斗争方式在这样斗争的环境只有害而无利。但有一个主要标准，一切错误分子只要他不投降敌人，我们于是用耐心的去教育去争取他。相反的，我们对他应该提高最高的警觉性，否则就是帮助了敌人。

这三年斗争是在最残酷的、最尖锐的环境，同我们敌人苦打奋斗，同时不断在党内进行残酷的斗争，依靠党的政治教育

去克服一切现象来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在这样内外的斗争中最后战胜了我们的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的《项英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即秦邦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政治局听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1〕}、康生、陈云三同志工作报告之后，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特米脱洛夫^{〔2〕}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1〕 即陈绍禹。

〔2〕 今译季米特洛夫。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 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政治局听了项英同志关于南方各游击区的报告之后，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现在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任务，是在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日寇。政治局相信南方过去各游击区的同志同样能够在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之下，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神圣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一) 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

(二)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三)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

(四) 党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政治局暂提议为下列各项：

- (1) 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奋斗的基本方针。
- (2) 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
- (3) 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
- (4) 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
- (5) 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此大会议程应交六中全会审核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决定。

(五) 为的有系统地进行一切有关于召集七次大会的准备

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准备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 | | | | | | |
|----|--------------------|----|--------------------|----|--------------------|
| 一 | 毛泽东 | 二 | 陈绍禹 | 三 | 朱 德 |
| 四 | 周恩来 | 五 | 项 英 | 六 | 张闻天 |
| 七 | 张国焘 | 八 | 秦邦宪 | 九 | 赵 容 ⁽¹⁾ |
| 一〇 | 廖陈云 ⁽²⁾ | 一一 | 王稼祥 | 一二 | 彭德怀 |
| 一三 | 任弼时 | 一四 | 邓 发 | 一五 | 刘少奇 |
| 一六 | 何克全 | 一七 | 林祖涵 ⁽³⁾ | 一八 | 吴玉章 |
| 一九 | 董必武 | 二〇 | 徐特立 | 二一 | 曾 山 |
| 二二 | 张鼎丞 | 二三 | 陈 毅 | 二四 | 杨靖宇 |
| 二五 | 高 岗 | | | | |

准备委员会之主席为毛泽东同志，书记为陈绍禹同志，为的便利于进行经常工作，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 | | | | | | |
|---|-----|---|-----|---|----|
| 一 | 毛泽东 | 二 | 张闻天 | 三 | 赵容 |
| 四 | 廖陈云 | 五 | 陈绍禹 | | |

(六) 准备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责任，在于在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和扩大民众积极参加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

(七) 各级党部对于大会之应行具体准备工作，由准备委员会秘书处拟定交政治局批准后通知全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刊印。

注 释

- 〔1〕即康生。
- 〔2〕即陈云。
- 〔3〕即林伯渠。

朱德等关于减少磨擦 巩固抗战团结的训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主席，刘徐张宋萧贺关甘聂罗徐黄⁽¹⁾并转各级军政首长、政治机关：

甲、在日本未继续南进，战局比较稳定情形下，由于敌人的挑拨、汉奸的破坏，某些分子惧怕群众运动，政府对各种进步法令与条例不愿忠实执行。我军在群众中影响的扩大，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与我们扩兵，使晋绥军感觉扩兵困难。某些不良分子假借我军名义的违法行为及我们地方工作同志某些幼稚行为等，最近引起不少与晋绥军及地方政府的磨擦。这种情形的继续，是可以影响抗日团结的。

乙、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在山西方面的地方工作中，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与山西当局及地方政府、民众团体与附近友军的协同与合作。须从抗战利益说服其采纳我们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的，不应出于勉强，而应让步，求得在继续的说服、善意的批评、群众的要求中，使其能采纳而后实现。同时我们应检查与纠正我们某些“左”的急性病与幼稚，甚至违反路线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帮助敌进行其破裂统一战线的阴谋。

丙、为着减轻磨擦，巩固抗战团结，特有下列各项决定：

一、十二月底停止扩兵突击。各部派出之工作团，统限于本十二月底结束工作，带新兵归还原队。所建立之各地方党及群众组织，交由地方党部指挥。指示地方党努力下层群众工作之发展。必要时可留少数得力干部做地方工作。各师、旅、团政治处应详细检查工作团工作，并以其经验教训教育部队。以后部队只在驻地附近做招兵工作，组织游击队，即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

二、各工作团地区，由我们组织之游击部队，大部只集中靠近粮食较易解决之主力附近，加紧训练，并随同主力游击部队行动。另须以一部当留给当地方部队（某县游击支队等类名义），可得当地政府之承认，并可受其指挥，由当地政府负责其给养被服，游击队避免直接筹款、筹粮。但这些游击队内，须留得力干部领导。

三、阎⁽²⁾主任现以教团、决死队为基础，扩大新的部队。这种新的进步的抗战军队之建立，我们应加以帮助。除告他们许多扩兵工作方法外，可以帮助其组织游击队，动员一部加入其军队。在他们要求或取得其同意下，并可帮助其建立与健全其部队的政治工作。对于其他友军在当地扩兵时，亦应给予可能的帮助。

四、各师、旅、团及独立行动之司令员及政治机关，应派得力之军政干部与驻地附近地区友军密取联络，必须改正不善于与友军联络的关门主义。在与友军来往中，应与交换工作经验，态度恳切的提出我们一些工作方法与经验，并接受他们各种善意的批评与意见，与其建立密切关系，并解释某些误会。反对任何骄傲自大的态度。

丁、对地方政府中或地方绅士中某些阻止政府进步法令（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合理负担、改善生活）执行和破坏抗

战团结分子，尽量向同盟及地方政府提出，以他们的权力和经过群众的要求，去求得纠正与制裁，应避免我军直接干涉。即对汉奸处置，除特别情况下，亦须交由行政机关处置。在山西政府权力所及地区，我们不应直接筹款与罚款。集中游击部队必须之粮，除合法接收富户完全自愿之捐助外，亦必须经过政府从合理负担去解决。

戊、我军各部指战员均必须配带臂章符号，严紧管理教育，整顿军风及群众纪律。必须严厉处罚一切贪污欺诈破坏纪律分子，对一切假借我军名义分子严加追究。如系友军，须收集确实证据转交直属主管机关处理。如系当地坏分子，应交当地政府处理。

己、在深远后方及敌占领区域应增派力量，加紧做组织和武装民众的工作。如该地带有友军及抗日民众团体，同样应根据统一战线原则与之联合和协作的进行各种工作。一切可能争取参加抗战的力量，不应以简单的、幼稚的、“左”的办法逼其脱离抗日阵线。斗争环境复杂，部队新兵增加，各部应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工作，不断揭破一切分裂抗日团结的阴谋，并须有高度的革命警觉性，对付敌人与汉奸坏分子破坏抗战团结。

本训令一直发到连队作深入的传达，并在各级干部小组及支部中讨论。

朱 彭 任 邓⁽³⁾

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宋任穷、萧克、贺龙、关向应、甘泗淇、聂荣臻、罗荣桓、徐海东、黄克诚。

〔2〕指阎锡山。

〔3〕指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

巩固国共合作 争取抗战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张 闻 天

接着华北中心城市太原的陷落，又是南京首都的被占。芜湖、杭州、扬州、合肥、徐州、青岛、济南、厦门、福州、广州等沿海各省重要中心城市，正在危急中。日寇军队正倾其全力，企图一鼓作气，鲸吞中国沿海各省，以达到征服中国与独霸东亚的野心。

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关头。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不屈不挠坚持抗日民族自卫战，到最后胜利。

我们并不否认，自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中国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失利。然而我们应该告诉全中国人民，这种暂时的部分的失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中，早在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中有远见的领导者的意料之中。但是，暂时的部分的失利，决不是中华民族的永久的与完全的失败。中日两国决胜负的战争尚在前面。中日两国最后的胜负决不是在几个月内所能解决的，而是要在持久战争中去解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中有远见的领导者所早已指出了的。

我们不用讳言，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武器不精，军队不强，政治不够修明，民众缺乏组织与训

练，所以我们在开始反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日本帝国主义时不免要受到暂时的部分的失利。然而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我们的抗战是神圣的进步的民族自卫战，所以我们能够这样举国一致的去反对我们民族的共同敌人。在短短五个月的民族自卫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内部空前的统一与团结，我们已经看到了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国民政府的国策的基本转变，我们更看到了全国军队那样勇敢的在前线上同敌人血战。全中国广大的民众觉醒起来了，他们都积极的起来帮助政府与军队负担各方面的战时任务。只是短短的五个月，然而中华民族却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前进着。这些空前的进步，没有民族自卫战的发动，是不可能的。

然而正是由于抗日民族自卫战还只有五个月，所以政府与军队方面还有许多弱点没有纠正，广大的民众还没有大量的起来帮助政府与军队去抗战，国内的团结与统一首先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还没有达到完全满意的地步。然而我们相信，中国的抗战愈是持久，则中国国内的团结统一必将愈加巩固，国共两党的关系必将进一步的改善，政府军队与人民之间更将完全打成一片，因而中国更将愈加坚强起来，愈将向着民主共和国的前途迈进，而能够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对于其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最好方法，也就是持久战。我们相信，只要中国抗战愈是持久，则日寇的困难亦愈多。它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将在持久战中大大增加起来，它的国内的阶级矛盾，它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也将在持久战中尖锐化起来。而且中国地大物博，日寇愈是深入中国内地，则它的兵力的分配愈是不够，它的后方愈不巩固，而愈将便利于我们的各个击破与包围歼灭。

在国际上，中国的持久战，更将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

位，取得全世界人民及爱好和平的与民主国家的同情与援助。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抗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应该有这种必胜的信心，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此地，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

然而我们必须严重指出：今天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在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所以使国共两党合作发展与巩固起来，更是今天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之中心。

中国共产党员与中国国民党员以及全中国人民应该最清楚认识这一点，抓住这一点。如果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巩固下去，则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就有了保证；如果国共两党的合作中途分裂，如像过去大革命时一样，则中华民族就要被日寇所灭亡。过去国共分裂后的痛苦的教训，是不能再行重复的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要求国共两党的亲密的合作与团结，而不是分裂。

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的汉奸与托洛茨基派的匪徒们，显然是完全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们利用各种阴谋诡计，来进行挑拨离间，来企图达到分裂国共两党合作的目的。而我们两党内部，还有一些顽固的与幼稚的分子，还抱着过去十年来的对立所造成的一些成见与仇恨，不肯互相推心置腹的亲密合作，以至造成互相间一些不必要的怀疑与磨擦。而这种怀疑与磨擦，正好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的汉奸与托匪所利用。

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国共两党间还存在着的一些不必要的怀疑与磨擦，对于巩固国共两党合作上说来，是不利的。特别

在今天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这类怀疑与磨擦实有立刻说明与纠正的必要。

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同志必须向国民党同志诚恳的说明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两党关系的问题。

有人说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假的，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在合作的中间削弱国民党的影响与力量，是在利用合作的名义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谣言，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所决不能相信的。我们认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不应有这种思想，正像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也不应有这种思想一样。因为今天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而建立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国共两党实行合作，这都是诚心诚意的事。这中间决不能包含有丝毫的虚伪与玩弄。共产党的真诚，由共产党历来的一切言论与行动上，可以完全证明，我在这里不必多说了。如果这种合作是出于至诚，那末，谁也不能希望自己朋友的力量，在合作的过程中削弱下去，因为朋友的力量削弱，即是合作的共同的力量削弱，即是减弱了反对共同敌人的力量。这是任何以国家民族利益为第一位的政党所不愿意做的，因为这只有对于日寇有利。这种简单的道理，我想所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都是应该清楚了解的。

相反的，我们两党在合作的过程中，不但不是要互相抵消，互相削弱，而正是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扩大与巩固国共两党的力量，因此，也就可以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也就能够战胜日寇。

至于说共产党要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同国民党争取所谓领

导权，这种说法，显然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完全不相符合的。共产党人始终认为，像抗日救国这样的大事决不是一党一派所能担负起来的。所以共产党人始终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以达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目的。这并不是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而是愿意在民族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帮助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担负起一部分责任。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因为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政党，而且向来是一个统治的党。如果国民党能够像现在这样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坚持抗战方针，则国民党的影响不但不会缩小，而且会大大的增长起来，其领导的地位自然不但不会动摇，而且会更加巩固起来。

共产党人始终认为，在各党各派合作的过程中各党各派所占领的地位决不是由一党一派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而是要由全国人民的公意来决定。既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自然国共两党均将为全国人民所拥护。

所以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今天的问题不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争取替国家民族多做一分事业的问题。如果一个党派，兢兢业业于自己的领导权，而不去在替国家民族多做一分事业上着想，那这样的党派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共两党中间不能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因为既然是两个不同的政党，既然双方都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与批评的自由，所以虽是两党今天在抗日救国的基本方针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不能完全相同，也是不足为奇的。因此在某些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问题上，两党间产生某些不同的意见，也应该在我们的意料中。这种个别具

体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工作上不会有什么妨碍，而且真理常常经过“共同讨论，共同协商”而更加明显起来。两党的领导者不但应该注意不使这种个别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变为尖锐的对立，变为破坏合作的罪恶行为，而且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如果这样，则我们国共两党的关系，决不会因为某些争论而走向磨擦以至分裂。

对于那些有意把某些争论扩大化，有意在争论的中间推波助澜，以破坏国共合作的人，我们双方应该严密的戒备，因为这些人不论他们的居心如何，实际上是要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对于日寇、汉奸、托匪等这类挑拨的活动，我们两党的人，应该共同给以致命的打击。对于那些误入歧途，受了日寇、汉奸、托匪欺骗的人们，不论他过去在中华民族前面犯了怎样重大的错误，我们两党的人，应该给他们以很好的解释与规劝，使他们回头猛省，站到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对于两党内那些犯过这种错误的顽固的与幼稚的分子，则应该加紧教育，使他们能够深刻懂得两党密切合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抛弃一切过去的成见与仇恨，为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努力。总之，我们国共两党的方针，是要使站在日寇方面的人愈少愈好，而站在我们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则愈多愈好。我们国共两党的同志，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努力。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国共两党合作的时间性的问题。国共两党方面，近来有些人正在忧虑，恐怕国共两党的合作不能持久，而又是中途分裂，使中国的抗战再度失败。这种忧虑，显然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想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新中国。如像本党九月二十二日所公布的宣言上所说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新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没有国共两党的长期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这决不是几年的事，而是很长时间的事。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一定更加密切，国共两党的威信，一定更加提高，民主共和国也因此得以更加巩固起来。这是我们预先可以看到的。

第二，是关于国民政府的问题。

有人说，共产党人总是要反对政府，总是不拥护政府，而且甚至说共产党人把现在的政府看做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因而共产党人要推翻现在的政府另行组织新的政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谣言，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所决不能相信的。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因为这个国民政府今天是一个已经开始担任着国防任务的政府，已经开始代表着民族利益的政府，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同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克伦斯基政府完全不相同。克伦斯基的政府是拥护当时帝国主义侵掠战争的政府，是代表当时英法少数帝国主义者及俄国少数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只有托派匪徒们，才把我们的中央政府来同克伦斯基政府相比拟，好达到他们反对政府抗战、拥护日寇灭亡中国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决反对托匪们的这类荒谬主张的。

我们共产党人只是认为，我们的中央政府今天还有很多的弱点与病态，所以在过去一时期内对于政府某些弱点与病态曾

经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我们的批评与建议的中心所在，只是要使我们的政府更能负担起国防的任务，使我们的政府更能在抗战中提高它的威信与地位。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为人民所爱戴的坚强的中央政府来领导抗战，那抗战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批评与建议的目的，只是要使现在的中央政府向前进步，向前发展，更加健全，更加充实，成为统一战线的坚强的中央政府，而完全不是要在现在政府之外再成立一个新的政府。

为了要加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共产党人今天首先要求政府，将各党各派有威信的能够坚决抗战的分子吸收到政府中去，以充实政府，以加强政府领导抗战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在今天民族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政府，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斗争。一切对于国家民族有利益的事，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帮助政府与政府合作。但我们诚恳的声明，我们决不愿意同任何人争夺政府中的领导位置。

至于还有人说，共产党人主张分裂，不主张统一，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共产党向来主张中国内部的团结统一，而且已在事实上表现了出来。苏维埃政府的取消，红军的改编，不就是主张统一的最明显的例证吗？中央政府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命令，虽是尚未发表，但只要国共两党能够推诚合作，互相谅解，我们相信这个问题是不难立刻解决的。

共产党人已经一再声明，我们反对封建割据的局面，而主张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共产党人始终要向着这个目标奋斗。共产党人以后仍将本此方针，切实帮助中央政府改进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一视同仁，并帮助地方政府进步，使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有机的一部，以消除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因为这样完全统一的政府与统一的国家，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全

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第三，是关于国民革命军的问题。

有人说共产党人只说八路军好，不说其他国民革命军好，所以共产党人不要其他的军队，甚至说共产党人只要组织新军队，不要老军队。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谣言，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所决不能相信的。我们应该向国民党的同志声明，我们对于那些在前线上英勇牺牲与受伤的国民革命军将士，八路军的将士也在内，表示深切的敬意。一切在前线上英勇牺牲与受伤的将士，都是为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他们的牺牲与创伤是光荣的。这不只是一党一派的光荣，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我们想：有着这样众多勇敢杀敌的革命军人，证明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

我们不赞成那种说法，似乎现在前线上抗战的军队，还是过去军阀的军队，现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军官，还是军阀。自从他们参加对日抗战以来，一切过去的旧部队，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军队现在已经是开始担任着国防任务的军队，这些军官已经是革命的军官。他们已经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地盘与地位而作战，而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整个生存而作战。在这中间，我们可以断言，已产生并将产生出无数的在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深切的感觉到我们的军队还有很大的弱点，我们在军事指挥上也还有很多可议之处，所以自抗战以来，我们对于这些方面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我们的批评与建议的中心所在，只是要使得我们的军队更能担负起国防的任务与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始终相信，没有几百万有高度政治觉悟，有坚强的战斗

力，有全副新式武器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中国的战胜日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共产党人主张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民革命军。我们愿意帮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进行这一巨大的工作。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具体提议：

（甲）在各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达到下列目的：（一）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二）改善军民的关系；（三）改善官兵的关系。

（乙）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教育与纪律，统一的装备与供给。

（丙）改善军事技术与指挥。

（丁）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改善与扩大军事与政治的学校。

（戊）建立国防军事工业。

同时，我们向国民政府提议，为了扩大国民革命军到数百万，目前征兵的办法立刻应该有必要的改善。这种办法，常常造成政府与民众间的不必要的对立。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这方面帮助政府使征兵法令的实行，不但不引起全中国人民的不满，而且可以造成全中国人民武装上前线的热潮。

有人说共产党只要游击战，不要正规战。这种说法也是不合事实的。共产党人认为要最后战胜日寇，没有正规战与游击战的配合是不行的。所以共产党今天主张扩大与建立几百万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坚强战斗力、有全副新式武器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在一起，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创造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第四，是关于民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国共两党的磨擦比较的多。一部分国民

党同志常常惧怕共产党到民众中去活动，似乎共产党人一到民众中去就会动员民众来反对政府。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国共两党既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合作，那么他们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方面，也应该一样的合作而不分彼此。目前国共两党在动员民众方面的一些磨擦，实在是不必要的。

我们希望国共两党，以后在民运方面有亲密的合作。国民党方面尽管可以大胆的开放民运，放手地去同共产党合作；而共产党方面保证民众运动的发展，不是同政府为难，而是帮助政府。我们认为目前国共两党在民运方面的一些不必要的磨擦，常常由于国民党中某些同志对自发的民众运动的过分戒备，过分不放心共产党在民众中的活动而产生的。而某些共产党同志也却又由于国民党同志方面的不必要的限制与不放心，而常常发生一些过左的与偏激的言论与行动，这种言论与行动反过来更使国民党同志觉得开放民运的危险，而加强其限制。于是双方的对立似乎愈来愈尖锐。其实只要双方能够开诚布公的把问题谈谈清楚，以后民众运动就能顺利的向前发展。这岂不是国家民族之福。

有些人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民运方针，因而常常怀疑共产党不要民运的统一，只要民运的分裂。其实，我们共产党人在民众运动中，同样主张统一，而反对分裂的。因为既然全中国人民有着反对日寇的共同任务，为什么又要在组织上使之互相对立与分裂呢？所以我们主张工人方面，有工人的统一的抗日救国的组织，农民方面有农民的统一抗日救国的组织，青年学生方面有青年学生的统一的抗日救国的组织，妇女方面有妇女的统一抗日救国的组织，以及商人方面、职员方面、文化人等方面，均有他们自己的统一的组织，而这许多的组织都统一于各地方的以至中央的抗敌后援会或动员委员会中，受其总

的指导。抗敌后援会或动员委员会在领导这些民众团体时，只要它们的基本方向不错，就不必多方限制它们活动自由，干涉它们内部的生活；相反的，应该用各种方法启发这些民众团体参加战时动员工作，发扬它们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同时，抗敌后援会或动员委员会应该容许各种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使下情得以上达，上情也经过他们得以下达。一切问题均可共同讨论，共同解决与共同执行。我们想，我们如果在民运方面能够实现这样的统一，那动员民众援助政府与军队抗战的力量，必将增加数十倍，以至数百倍。这岂不是国家民族之福。

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与军队现在是处在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下，如财政经济的困难，兵夫补充的困难，巩固后方的困难，交通运输的困难，在目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困难的解决，只有依靠民众力量的发动。共产党愿意在这方面用大力来帮助我们的政府与军队解决这些困难。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在目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大家的任务，决不是什么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动员民众与武装民众，帮助政府与军队去战胜日寇的问题。

国民党同志常常责备共产党人，不应该提出“改善民生”的问题，使民众同政府对立，使政府为难，其实这是国民党同志方面的误会。首先，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口号，并不是同目前抗战的任务对立或并立的，相反的，这个口号应该服从于抗战的任务。这个口号的提出正是为了要更便于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其次，“改善民生”的口号，并不是要求政府负担它今天所不能负担的任务，而是要使政府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用各种方法去减轻民众的某些过重的不合理的负担，比如像贪污中饱的铲除，重利盘剥的废止，过高地租的相当减

轻，捐税制度的改变为统一的累进税等，都是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直接关系的。这些办法的实行，不但对政府毫无困难，而且的确可以使政府的机构健全起来，使政府与民众打成一片。第三，政府还可以用发展国防教育与文化事业，提倡合作社，发展手工业与土产，举行各种低利借贷，修理水道沟渠等办法，替民众生活的各方面谋幸福。这些事都是政府在抗战时期所能够做到的。如果政府能够经常注意民间的疾苦，那这些工作是一定可以做到的。我们共产党人也愿意在这方面帮助政府去取得民众的信任与爱戴。

如果国民党同志认为我们所说的话是有理由的，那么我们希望立刻开始国共两党在民运方面的密切合作，实行互相协商、互相帮忙的原则，以推动民运工作的前进。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将来一定很大。四万万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将最后粉碎日寇的进攻。

* * *

上面四个问题，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关头愿意向国民党同志诚恳说明的。我们相信，这种说明可以使国共两党的关系从此大大改善，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起来，使抗战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

我们认为，只有那些中华民族的败类，才会利用目前抗战的暂时的部分的失利与由此而发生的一些困难，宣传各种投降妥协的主张，散播民族失败主义的空气，企图使抗战不能坚持，使中国为日寇所灭亡。但是全中国人民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他们在暂时的部分的失利与由此而发生的一些困难面前，并不悲观失望，并不自暴自弃，相反的，他们将以全中国人民团结的力量，将以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以国共两党的

密切合作，去粉碎日寇的进攻，去转败为胜，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失地，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出版的
《解放》第二十八期刊印。

陈绍禹等关于同蒋介石谈判 情况给张闻天等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洛、毛^[1]转中央政治局：

(甲) 今晚见蒋，蒋表示等候已久，亟愿知道肤施讨论情形。已由王明^[2]说明目前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及国际活动情形与远方^[3]某些提议。次由博古^[4]将边区、联络参谋、办事处、参观等问题加以回答。再次由恩来^[5]说明具体提议，和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成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军事工业部、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后蒋当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想的亦不过如此，对我们所谈完全同意。彼也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前线将领，士气甚旺，极可乐观。现部队已均令各在原地集中作战。今后两党关系归告陈立夫等与我们共商一切，最后并留王明在汉相助。

(乙) 两党关系委员会，闻国方为陈立夫、康泽、张冲，我们提议加入邵力子，不日即可开始商谈合作各事。

(丙) 各项具体提议，既已取得其同意，拟再以书面交蒋，并与有关各方讨论计划实行。

(丁) 宣言决定即起草。

（戊）共同纲领待与陈等见后即写。

（己）日报^{〔6〕}已着手组织，周刊^{〔7〕}已出两期，我们主张将在第四期分类作文发表。

（庚）昨晚会见立夫谈话，尚接近，彼亦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如远方电通请即电告，如未通请电邓发转。

陈、周、博、叶^{〔8〕}

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毛泽东。
- 〔2〕即陈绍禹。
- 〔3〕指共产国际。
- 〔4〕即秦邦宪。
- 〔5〕即周恩来。
- 〔6〕指《新华日报》。
- 〔7〕指《群众》。
- 〔8〕指叶剑英。

关于十二月会议讨论总的结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张 闻 天

一、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 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从《八一宣言》起至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英勇抗战与模范的群众工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等等。

(二) 检查过去的工作，因为整个抗战中某些友军与地方遭受了失败与失地，这是事实。自然我们也应承认在抗战中某些工作不够，某些工作疏忽与对情况的不了解，今后应根据新的具体环境来使今后抗战工作更加充实，更有内容。我们有信心更进一步的去努力，我们已有国际与东北等过去统战工作方面许多宝贵经验，同时，还有斯大林等同志的正确指示。

(三) 统战策略只有一个，或许在近几十年这一策略都不会改变。今后仅对这一策略加以充实，并应在执行这一策略的实际行动中收集其经验与教训。

* 这是张闻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二、过去的缺点

（一）要说前一段工作的缺点首先是因为有大革命时代的教训——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教训。

（二）不仅有大革命的教训，还有着十年残酷的斗争。国民党十年来用全力来对付我们，屠杀我们，我们对这十年的仇恨，在一时也不易消释。正因为有此长期历史的根源，对立的状态自然难于消释。

（三）还有，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朱毛^{〔1〕}出洋，军队编三千人，派参谋长，逼着我们发生痛恨，不得已采取防御方针。

（四）加上党过去主要活动在苏区内部，故容易只看到苏区与红军。虽在西安事变后，许多方面我们都很顺利，如抗战开展等，但许多同志缺乏远见。

（五）我们确有着许多旧的残余还不能一时洗清。但我们必须认识，不会鬼水的总会要吃水。联邦党^{〔2〕}比我们老几十年，对于托匪，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成功，还怕这些东西做什么？结果，造成托匪还能大的活动。我们今天就不是靠一个决议就完，还须千百倍的努力来学习。

三、求得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发展

我们虽然目前主要的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然而今天

不是在于这样说说，而是如何实际去做。领导权不在争，而在做。

四、自我批评

(一) 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待过去的弱点与缺点，并不是要拿自己的屁股给人家打，而是说时局演变了，在这时局演变中我们的工作还比较不适应，对某些地方，或有某一点过分了一点。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取消我们对友党批评的立场，不过要注意其态度与方法吧了。

(二) 我们今天同国民党的合作是“共同领导”、“共同负责”。显然过去某些缺点，并不能由共产党一党来负责。有人说我们过去没有拿住“抗日第一”，这是过于把我们的责任强调了。固然我们今后说话也要学习，要使思想更灵活一些，但说国民党的失败我们要负责，这是说不通的。

(三) 我们对友党在许多问题上互相让步，而不是让步政策。

(四) 我们对友党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应从积极方面提出。对外人只说今天的事；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现在是如何保证抗战胜利，如何实现民主与民主共和国。

(五) 今天主要是要学习抗战的实际工作，教育群众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问题，要把抗战在群众中更提高一步。

(六) 国民党中的派别问题，我们不要把他扩大，并且要使他们不能成为派别，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同时要看到国民党中虽然主要成分是资产阶级，但也有不少是小资产者，黄埔军官中就有不少的好的分子。

五、国共两党合作与对群众的说法

（一）要群众参加国民党各方面的工作。

（二）我们是否加入国民党，现在看来没有这个条件，以后再说。

（三）武器与财政应尽可能的去争取帮助。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毛泽东。

〔2〕指苏联共产党（布）。

毛泽东等关于在友军区域内 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五县警备区、两延司令部^{〔1〕}及警备一、二、三、四、五、七团及关中独立营各级军政首长、各政治机关：

一、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由于敌人的挑拨，汉奸的破坏，某些分子惧怕群众运动，以及党和八路军影响的扩大，各地对于统一战线存在的弱点，某些同志狭隘的观点与方式的机械，在邻近边区的统一战线区域内，引起了与友党友军及地方政府的某些磨擦。这种情形的继续，是可以影响抗日的团结的。

二、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

三、为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为减少可能发生的磨擦，特有如下的指示：

甲、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

乙、除宣传党的主张和八路军胜利之外，对于政府抗战的

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

丙、因征兵或抽捐税的事，引起群众与政府磨擦时，我们应居中调解，避免对立。

丁、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予以必要之保证，同时应要求政府帮助我们完成募补计划。

戊、在统一战线内，立即停止募捐筹粮的行动，已经借用的仓库存粮，须即归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捉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毛泽东 萧劲光 谭 政

二十四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五县警备区，指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所属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两延司令部，指陕西延川、延长两县八路军河防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
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全国各界同胞们！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对暴敌已进行了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虽然由于日寇军事技术的优越，由于我国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存在有不容否认的弱点，以致平津察绥太原沪宁相继失守，遭受部分的领土损失和暂时的军事失利；然而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表示出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觉醒，造成了我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团结，显示出我军将士惊人的英勇牺牲精神，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提高了我民族抗敌致胜的信心，相当地打击了日寇的凶焰，部分地消耗了日寇的力量，增加了日寇前进的困难，助长了日寇内部的矛盾，同时，增加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进步力量对我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因而也就奠定了我们今日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宣言：蒋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国国民书所提出之“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之主旨，与本党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坚决地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

中共中央郑重地向全国同胞宣告：我国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的成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且目前最大难关，既不在于兵力不济、武装不足和财政困难，亦不在于日寇的前进深入，而在于日寇于暴力之外，又加紧“以华制华”的企图，并在于汉奸、敌探、托匪等正在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的阴谋，尤其在于我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同胞宣布：当此民族危机更加紧迫之时，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共中央认为当前足以告慰于全国同胞的，就是在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合作的决心，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在目前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为保障继续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定能共同努力实现下列工作：

（一）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这首先要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巩固江防，保卫武汉，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援助东北及各地的义勇军，来击破敌人的前进，阻止敌人的深入，以便争取时机，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

（二）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的

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三) 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吸收坚决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团体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刷新各省吏治，肃清贪污腐化分子，使政府一切机构和施政方针，能适应抗战胜利的需要。

(四) 实行国防经济政策——首先须努力建立军事工业，加速军事交通和实行战时财政政策。

(五) 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一方面坚决肃清汉奸、敌探及日寇走狗的托洛斯基匪徒分子，另一方面广大地动员组织和武装政府统治区域和被敌占领区域的民众，使之积极参加各种有利于战胜日寇的工作，同时加紧动员千百万国外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

(六) 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

中共中央坚决相信，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力量定能在最近期间内，共同完成这几项迫切的基本工作，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和国家的同情援助之下，定能在持久抗战中，最后战胜内受人民仇恨外遭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出版的
《群众》第一卷第四期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 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

（一九三七年）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章第十四条，中央委员会可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其任务为：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之党的政治工作。

2. 政治局本身不能开除政治局委员，也不能自由增补委员，遇有政治局委员出缺及因特种情形不能执行其任务时，可由中央全会所选举出之候补委员按次替补之。

3. 政治局暂时规定每二月开会一次，到会之委员超过半数以上，得举行会议。会议之决定或通过之文件，经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签字后认为有效，但必须立刻通知未到会议之委员。遇特别紧急情形，不足法定人数，可由中央所在地之委员集会讨论，其决定以迅速方法送达各地的政治局委员，征集其意见作最后决定。

4. 政治局有权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与其他党派组织机关，发生关系。

5. 凡各地中央分局之负责同志、各省书记、各师以上的军政首长、各参加全国性的政府工作之党员，必须经过政治局决定和批准，在特殊紧急情形下，各中央分局、中央代表可以决定省委书记，但必须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6. 任何政治局委员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之意见，亦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

7. 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能代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之文件。

8. 政治局会议中所讨论或决定的问题，未经政治局决定发表时，任何政治局委员要严守秘密，不得向政治局以外之任何人泄露。

9. 政治局同志遇有错误，除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外，凡不得到政治局决定要公开时，各委员不得在口头报纸文件上向党内外任何人泄露；任何政治局委员不得破坏政治局和各政治局委员之威信。

10. 政治局委员遇有破坏纪律时，政治局以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的处分，或提交中央全会解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 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 书记处的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并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

2. 书记处可以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发表关于组织性质和日常工作性质的文件、训令、电文、信件等给下级党部，但不能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重要宣言、决议、文件、电文。

3. 书记处不能改变政治局的决定或不执行政治局的决议。

4. 书记处每三日开会一次，集体地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部的问题，遇政治上军事上重要的问题为书记处所不能解决者，提交政治局会议。

5. 凡用书记处名义所发之电文文件，非经过半数以上的书记签名同意后不得发出。

6. 各书记所领导之各部工作，须经常向书记处报告，各部重要问题之处理和答复，各部重要工作人员任用或派出必须经过书记处批准。

7. 凡各种问题、各种文件电信，不属于各部或个人的日常工作范围内者，不能用各部名义或个人名义处理答复。

8. 各书记之重要文章、对外发表之重要谈话或重要的报告大纲，必须经书记处集体讨论后，才能公布。

9. 中央各部所拟定的文件、大纲、工作条例等，必须经书记处批准始能有效。

10. 各地党部不得到书记处之允许，不能自由派遣同志到中央来，在通信困难之处，无法先得中央同意时，各党部要慎重考查对中央绝对负责；中央直属各校招生，亦必须得到书记处之同意。

11. 书记处对讨论之问题未经决定公开时，各书记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在党内外泄露。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决定事项 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邓发转书记处：

甲、王明⁽¹⁾等到此，正当中国各地政治局委员集会将要开会之时，所以此次政局会除稼祥⁽²⁾、邓发两同志在国际未到会外，其余均到会。项英同志亦从南方来此开会。

乙、此次政局会一致地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政治局更通过了在最近期内召集七次大会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代表团工作及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定。

丙、会议在组织上决定：王明、陈云、康生留书记处工作；由恩来、博古⁽³⁾、项英等组织长江局，领导南中国的工作。但王明可去武汉一次，见蒋介石，因蒋有电来要他去。

丁、会议后，王明、恩来、博古、项英等均去武汉。已同蒋有了一次谈话，蒋对我们提出意见完全同意。并决定组织国共两党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张冲、刘健群、康泽，我方为王明、恩来、博古、剑英⁽⁴⁾。已开了一次会，决定由恩来、刘健群起草两党共同纲领。我党关于时局宣言，旬日后

发表。

戊、党的日报^{〔5〕}即可在武汉出版四期。请即将萧三夫妇，吴玉章、廖涣星夫妇派回中国帮助办报。

己、全国工作大开展。八路军扩大大有成绩。但干部与金钱极感缺乏。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即陈绍禹。
- 〔2〕即王稼祥。
- 〔3〕即周恩来、秦邦宪。
- 〔4〕即叶剑英。
- 〔5〕指《新华日报》。